



走向
新
社会主义

保罗·科克肖特
阿林·科特尔

目 录

译者序言.....	I
中文版序言.....	VII
捷克文版序言.....	XIX
导 言.....	1
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存在缺陷的?	2
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4
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6
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7
本书内容介绍.....	8
第一章 不平等.....	11
不平等的来源.....	11
总结.....	21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23
收入再分配的好处.....	25
劳动的不平等.....	29
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	35
与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作比较.....	37
附录：熟练劳动乘数的说明性计算.....	40
第三章 工作、时间和计算机.....	43
时间的节约.....	44
客观的社会核算.....	47
定义劳动量.....	48
规模问题.....	49
高科技和中等技术的解决方法.....	53
第四章 计划的基本概念.....	55
计划和控制.....	56
资本主义的目标是次要的.....	58
什么才应当是首要目标?	59
计划的层次.....	60
第五章 战略计划.....	63
产业结构计划.....	63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66
生产的时间维度.....	69

市场和非市场的分配方式.....	71
农业.....	73
第六章 详细计划.....	77
苏联计划的情况.....	81
详细计划和库存约束.....	83
新的计划均衡算法.....	85
智利的经济控制.....	89
第七章 宏观经济计划和预算政策.....	93
建立在劳动时间上的宏观核算.....	93
家庭储蓄和信贷.....	97
税收政策.....	102
第八章 消费品市场.....	107
市场出清价格.....	108
消费品和宏观计划.....	109
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比较.....	112
结论.....	113
第九章 计划和信息.....	115
信息和财产.....	115
一个统计服务的需求.....	116
信息：社会问题.....	118
奖励与处罚.....	121
第十章 对外贸易.....	125
技术和贸易伙伴.....	128
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129
贸易赤字的优势.....	131
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贸易.....	132
汇率，旅游业以及黑市.....	136
政策工具.....	139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	143
贸易与所有权.....	143
欠发达国家.....	145
我们倡导什么？.....	148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150
第十二章 公社.....	151
城市公社的活动.....	152
效率方面的理由.....	154
付酬制度与对外贸易.....	155
任务分配.....	159

公社的法律性质.....	160
公共政策.....	160
第十三章 论民主.....	161
民主与议会制度.....	161
直接民主还是苏维埃式民主？.....	164
民主制度在当下依旧可能么？.....	168
民主与计划.....	170
无领袖的（Acephalous）国家.....	172
第十四章 产权关系.....	175
谁拥有什么？.....	175
什么能被拥有？.....	177
社群主义模式.....	181
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题外话.....	188
第十五章 对相反观点的考察.....	193
分配、价值与价格.....	193
市场社会主义？.....	196
参考书目.....	203
译后记.....	208

译者序言

葛兰西曾经这样评价他生活的时代：“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这里的旧世界和新世界说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怪物则喻指当时正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差不多一百年后，旧世界仍在经济危机中挣扎，新世界又隐而不显；法西斯重新在欧洲兴起，各种各样的保守主义思潮席卷全球。我们似乎又回到了葛兰西所说的明暗交错之际。

不同的是，在葛兰西的时代，有一支强大的共产主义进步力量在对抗法西斯主义怪物。斗争的目标不仅是回到正常的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生活，还要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而在我们的时代，通向新世界的道路已经堵死，进步力量不得不诉诸于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如果新世界只是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而旧世界在经济规律的支配下又必然走向死亡，那么，等待全世界劳动者的，就只有各种各样的怪物统治这一种前景了。正如撒切尔夫人的名言一样，我们“别无选择”。

任何一个阶级要组织为一个阶级，就必须有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而任何一个阶级要取得统治权，就必须使其理论体系取得文化上的领导权。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争取统治的意识形态武器。在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搏斗的时期，资产阶级理论宣告了美好新世界的法则。同样，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也需要发展出这样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预言的新世纪曾经指引了人民取得二十世纪革命的辉煌胜利。这场革命攻势让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其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波及了生活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人。但是，由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存在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社会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末一败涂地。资产阶级高呼，历史终结了！终结于实行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苏联解体、中国改开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似乎只是历史上一次追求乌托邦的失败尝试。在经济上，这次失败表明，任何人为的经济管理必然失败，只有自然

的经济运行即市场才是可行的。这种意识是如此顽固，以至于那些强烈认同社会主义的人，也往往会反对过于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而在政治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即共产党本身的变质，又表现为一种动物庄园式的荒诞。在知识分子中，社会主义的威信几乎消失殆尽，甚至把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画上等号，将二者一并视作疯狂的极权制度。

因此，思想理论斗争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树立人们对于新世界的信心。社会主义思想能战胜资本主义思想，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最先进最有战斗力的阶级——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吸收了最先进的思想，在理论上碾压资本主义思想，能够科学地回应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质疑和批评。

在当前的情况下，仅仅捍卫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历史经验，是不足以赢得这场斗争的。只有回到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当代的生产力状况，提出一套的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才能（至少在思想理论上）真正挽回颓势。但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左翼理论家都认为，对于现代经济体来说，只有市场才是可行的。而在少数认同计划经济的理论家中，绝大多数都反对“从消费者需要出发”的原则。而从消费者出发，至少从其表面上看，一直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最大的优势。因此，无产阶级政治急切地呼唤能够为其目标正名的经济理论。

《走向新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部著作。本书作者之一保罗·科克肖特（Paul Cockshott）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计算机准教授。在从事计算机科研之外，他撰写了一系列经济学书籍，其中包括《走向新社会主义》（Towards a New Socialism）和最近的《经典经济物理学》（Classical Econophysics）等。另一位作者阿林·科特是美国维克森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主要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经济物理学。

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一书中，作者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与大多数左翼理论家不同，这两位作者坚决捍卫计划经济和劳动价值论。在他们提出的新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活动是在计划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但这一计划体制与传统的苏联模式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的差别是：

（1）计划的目标是消费者对最终消费品的具体需要，而不是钢铁、石油和煤等中间产品的产量。

（2）重大经济决策由全民做出，而不是共产党政治局说了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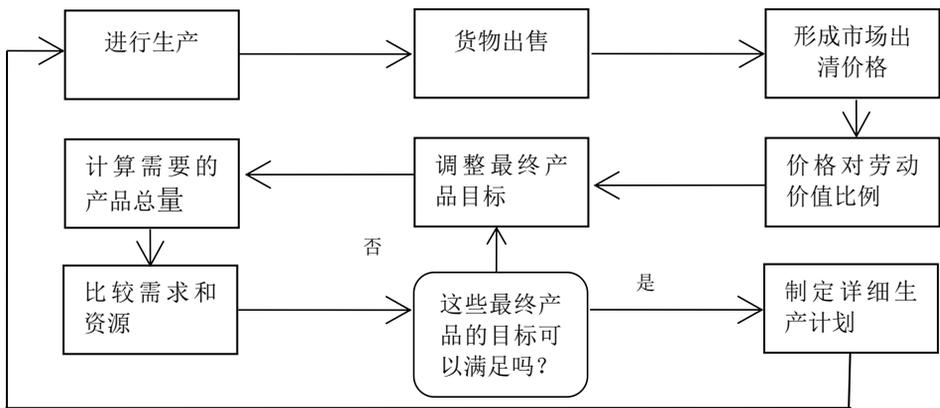
(3) 劳动者得到的不是货币工资，而是劳动券。一小时劳动对应于一小时劳动券(有必要的扣除)，劳动券总量与民主决定地分配在消费品生产上的总劳动量相等。

(4) 详细计划可具体到单个类型的产品比如某个样式某个尺寸的鞋子，而不是多少双鞋子这种总量计划。

光看这几条，读者肯定会满腹狐疑。比如，如果每个人干的一个小时都只能领到同样一小时的劳动券，那岂不是受过很多年高等教育的工程师能跟没读过大学的环卫工拿一样的工资了？复杂劳动的价值如何体现？又比如，如果计划要以消费者的需要为起点，但消费者的需要瞬息万变，如何制定生产计划呢？再比如，不同企业的效益不同，但如果员工都是工作一小时领一小时的劳动券，如何刺激落后企业提高生产率呢？

这些问题都是合理的问题，在过去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并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作者在书中也详细讨论和解答了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疑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考虑新社会的制度构想时，并不是单纯的幻想，而是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失败的研究和反思。比如，作者认为，取代资本主义家庭的，应该是公社。这一设想显然吸取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但与中国的公社不同，作者提出的公社不是生产单元。理由是，集体经济仍然是商品生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出现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因此，所有生产都必须是社会所有的并纳入计划机构的统一管理，而公社只是一种生活集体，主要目标是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从而为女性解放提供根本性的经济条件。

本书介绍的计划体制是一套完整的反馈系统。作者曾经在《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计划》^[1]一文中以如下流程图的方式展示了计划系统的运作机制：



[1] Socialist planning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llin Cottrell and W. Paul Cockshott, 1993 年。

在这一计划系统中，各行业产量的计算和消费品市场是最核心的、同时也是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消费品市场的作用是获得消费者需求信息，这一点在苏联模式下是必然缺少的，因为苏联的计划并没有计算某个商品内蕴含了多少直接和间接的社会劳动时间，也没有计算发给工人的卢布代表多少社会劳动时间，因此要进行商品价格和价值的比较是不可能的。而各行业产品的计算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方法。苏联模式下，中间产品的产量被看做是计划的目标。而在新社会主义的计划系统中，各个行业产品的产量根据最终消费品产量和技术矩阵计算而得，真正实现了生产为人民群众需要服务的目标。

作者的计算机专业背景在书中也有体现。在第三章和第六章，作者提出了计算每个产品包含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和根据最终产品产量计算所有产品产量的算法。作者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提出，经济的内部结构决定了，计划的计算复杂度遵从 $n \log(n)$ 率^[1]。也就是说，即使产品生产种类达到 10 亿级别的经济体，其经济计划的计算能力要求也是当前普通 PC 电脑可以满足的。

这几年，人工智能也成了一个十足的时髦概念。这很大程度上是阿尔法狗的功劳。阿尔法狗打败人类顶尖棋手，让人工神经网络这一专业术语经常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实际上，早在 30 年前，为了更好地根据资源约束调整计划目标，作者就提出了应用人工神经网络技术，来实现智能化的计划管理。在马云都在大谈计划经济的时代，社会主义者更应该意识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造成生产方式的革命化。无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革。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新技术的发展是一种制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信息技术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更全面地造福于人类。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国际左翼中都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计划思潮。他们认为，计划是自上而下的，具有压迫性；而真正的社会解放要求自治，即每个生产单元内部民主决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拒绝政府，拒绝中央计划。历史地看，这种思潮即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缺少民主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在反抗资本主义垄断企业对普通劳动者生活的全面宰制。但问题在于，单个企业并不能只靠自己生活，它需要别的企业提供设备和原材料，它的工人需要其他企业提供各种生活用品，它的产品也需要卖给其他的企业或者消费者。单个企业是存活于一

^[1] Average and marginal labour values are: on $\log(n)$ —a reply to Hagedorf, Michael Reifferscheidt and Paul Cockshott,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 No. 2 Summer 2014

个巨大的经济网络之中的，这一网络中的信息流是企业制定理性生产计划的基本条件。如果企业得不到应该生产多少的信息，凭借主观判断进行生产，那就很可能出现生产的产品没人要的情况。

如果没有计划机构来管理经济网络中的信息流通，那就只能通过市场来实现。因此，无论其言辞多么具有革命性，这种思潮所主张的，其实无非是合作社市场社会主义。任何对资本主义从事过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市场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必然出现周期性的经济高涨和衰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作社也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有的合作社越来越富，而有的合作社只能艰难维持，甚至破产倒闭关门大吉。如果只是消灭了单个企业内部的剥削，却放任非理性的市场继续主导社会生产，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是资本主义复辟，即便复辟的具体道路和方式会与苏联和中国有所不同。总而言之，在经济已经高度集中化，技术发展又已经为高效民主的计划经济奠定了生产力基础的时代，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能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反动幻想。

传统社会主义之所以遭遇复辟，不仅有经济模式上的原因，还有政治模式的问题。苏东剧变和中国改开，从直接的政治原因来说，是由于执政党当权派主动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问题。如何防止被剥削阶级的造反者又变成新的剥削者。

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斯大林派主张回到“苏维埃”，托派强调“工人民主”，毛派诉诸“文化革命”。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引入了一个新的民主模式：无政府民主（demarchy）。无政府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不要政府，同时实行民主。但这里的无政府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消灭任何集中的社会管理，而是指不再存在职业政客构成的政府，各项社会管理，大事情如税率等由全民民主表决决定，中小事情如某条铁路的具体路线则由（从相关人群中）随机抽取产生的委员会来决定。

资产阶级理论家认为，民主只能是精英统治，尽管需要每隔几年让老百姓选他们一次，社会管理跟普通劳动者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民主理念已经全面侵蚀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想象的当代，甚至许多左翼人士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任何一种精英治理模式，都是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平等原则相矛盾的，与社会主义传统所提倡的劳动者全面参与社会管理的理念背道而驰。只有在无政府民主制度下，

列宁所说的“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参加社会管理”才能最终变成现实^[1]。这是一种彻底的全面的参与式民主，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

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明确提出了应该用随机选择代替选举。其理由是，民主的含义是人民做主，也就是按照民意办事。由于人民不可能一起讨论所有事情，所以很多普通的议题就需要一些代表来代替全民做决定。选举制度下，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更容易获得选票，因此人民群众选举的代表未必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见。只有放弃选举制度，采用随机抽取的方式挑选代表，才能避免“代表性断裂”。实际上，在民意调查领域，正是通过随机抽取样本的方式来了解民意的。按照统计学原理，选取的样本只要足够大，就能够代表总体。统计局的许多统计数字，都是通过抽样调查得来的，全面普查由于太耗时耗力，很多年才会做一次。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随机抽取的代表比选举产生的代表更能代表该议题的相关人群。

在这明暗交错之际，怪物们对全世界劳动群众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在中国，这场进攻尤其疯狂。而当代的怪物们，一方面试图恢复反动的传统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大肆鼓吹技术的发展，用科幻电影式的反乌托邦前景来吓唬劳动者。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左翼，应该在新的旗帜下团结下来，发动理论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斗争，逐步壮大力量，为另一种可能性创造条件。翻译本书的目的，就是想为左翼的团结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源。

达瓦里希，让我们携手前进吧！

^[1]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一文中说，“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知道，不是随便哪一个粗工和厨娘都能马上参加国家管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列铁里是意见一致的。”但是列宁接着就说，“我们同这些公民不一致的地方是我们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偏见，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工作。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中文版序言

引言

本书写于 1980 年代末，当时社会主义在苏联和欧洲正经历一场危机，本书就是对这场危机的回应。

混合经济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这是战后欧洲的共识。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包含私人部门和较大的国有部门的经济。在 1980 年代以前，这被认为是简单的常识。争论只是限于是否应该把国有部门扩展至其他工业部门如汽车、船舶或者飞机制造业。同时，包括外企在内的私营部门，则被鼓励到政府还没有兴趣的领域内发展。在宏观层面，政府负责保证充分就业，减少收入差距，以及管理外贸平衡。

大型国有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在投资方面），同时也存在大量私有部门——中国在 1980 年代开始转向的正是这一模式。

二战后的大约三十年里，这一模式曾经非常成功，为欧洲带来了最长的快速发展时期。但是到了 1970 年代末，这一模式的内在矛盾开始显现出来。长时期的增长和充分就业促进了强大工会的形成。随着劳动供给短缺，罢工变得越来越有效，而工资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相对私人利润也提高了。三十年的急速资本投资也提高了资本对劳动的比率，因此这些较少的利润散布在了更大的资本总量上。结果是，在欧洲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利润率（按不变价格）下降了。

政府可以通过信贷扩张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这一点，这样价格相对于借贷的资本的提高就抵消了收入率的下降，但是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却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混合经济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功，长期来看却是不稳定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左翼需要不同以往的思路。

英国、瑞典和法国的社会党左翼提出的一个选择，即转向更加社会主义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中，资本和劳动的基本矛盾将被消除。通货膨胀带来的工资增加会减少，而投资会越来越地依赖于私人部门的盈利率。

右派的回应则是转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他们说，国家应该放弃履行确保经济增

长、充分就业、平衡外贸和更大程度的平等的责任。他们利用美国芝加哥学派经济家的观点，宣称经济复苏的关键是要回到类似于 1850 年代的经济模式。1976 年，英国放弃了混合经济模式。政府停止对就业、收入和价格进行计划。接着，国有部门被大量出售。银行基本上不受监管。政府放任失业，以削弱工资。工人的权利被大大地削减了。通过装备新的导弹系统和向阿富汗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武器，加强了对苏联的军事竞争。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系统性地支持苏联部分地区和东欧国家的反对派运动。

我们的中国读者对这些军事策略、意识形态和伊斯兰主义的压力会很熟悉，因为它们现在正被用来对付中国。

面对这种军事和意识形态的进攻，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在经济意识形态跟军事政策方面都做了巨大的让步。的确，苏联经济增长在 1970 年代减缓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跟西欧一样，苏联农村的劳动力后备已经用光了。西伯利亚的能源的开发，相对于里海的能源来说，要昂贵得多。这些实际情况很棘手，必定会降低增长率。中国目前的增长率正在降低，也正是因为类似的情况。

苏联最大的成绩之一就是其教育制度，它培养出了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不像他们的上一代人那样，见识过 1930 年代或 1950 年代的快速增长，感受过侵略的恐惧，这些受过教育的新阶层经历着苏联官方意识形态与其经济表现之间的不断增长的矛盾。在 1960 年代，苏联的经济增长比美国快得多，还赢得了太空竞赛，人们很容易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到了 1980 年代末，受过教育的阶层不是把自己和他们的父辈比，而是和媒体中的西方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形象进行对比。在英国和美国付诸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似乎合理地解释了苏联的问题所在，并提供了改善现状的政治和经济纲领。摆脱苏维埃政权，引入总统制，把眼前的一切统统私有化，最后他们都会过上电影里美国人的生活。

苏联模式的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和技术上的原因，苏联未能接近于建设我们认为是必需的那种体制。苏联的计划体制一开始是 very 有效的。苏联建立起了重工业基础，尤其是能够打败纳粹战争机器的军事工业。虽然代价很高，但是所用的时间比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都要短得多。在这一发展阶段，粗糙的计划方法是能够胜任的：经济体的技术复

杂性当然比现在要小得多，而计划只提出了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关键指标。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计划时期，仍然出现了许多供需严重不匹配的情况。但劳动和物资的投入的巨大扩张意味着，即使有这样的不平衡，关键目标仍然可以达成。

自战后重建时期之后，继承自工业化早期的计划体制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动态的、技术进步的经济。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优先部门比如太空探索，表现非凡的成功，但这样的成功却不能推广，这似乎是这一体制的内在特征。与给予特权部门优先地位相反的是，消费品生产被贬低了，只能索取剩余的资源。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反复进行了这样那样的改革尝试，但基本都失败了，从而导致了勃烈日涅夫执政后期臭名昭著的“停滞（zastoi）”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苏联的计算和通信技术处于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因此实施我们在本书中所设想的计划体制的技术前提尚未满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苏联官方对“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的坚持，给采取理性计划方法造成了障碍。新的计划方法经常受到怀疑，甚至那些跟引入市场关系毫不相关的方法，也受到怀疑。至于投入产出法，玛利亚·奥古斯丁诺维奇（Maria Augustinovics）指出了双重反讽：这一方法“既被指责往民主经济中夹带邪恶共产主义计划，也被指责向社会主义经济中偷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TremI 还提出，从最终产品目标出发进行计划的思想，被官方正统思想的卫道士看做是消费导向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资产阶级的”。^[2]类似地，康托罗维奇在线性规划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也长期被拒斥。

这种对理论创新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拒绝，大约在 1960 年代左右被克服了。特列基科娃（Tretyakova）和伯曼（Birman）认为^[3]，在 1959 年，投入产出法得到了官方的尊重；也是在同一年，康托罗维奇写于 1943 年的《资源最优利用的经济计算》一书最终得以出版。不过，尽管投入产出法和线性规划最终得到了官方的某种程度的赞同，但这些技术在苏联实际的计划过程中仍然是很边缘的。这部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计算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对于“物资平衡表”所涵盖的产品（只是生产的全

^[1] Augustinovics, Maria 《数学计划方法和传统计划方法的融合（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al and traditional methods of planning）》，Bornstein, M. (ed.) *Economic Planning,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1975, 137 页。

^[2] 特雷姆尔（TremI）《投入产出法和苏联计划》，哈特, J. P. 编辑《苏联经济计划中的数学和计算机》，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7 年，第 104 页。

^[3] 特列基科娃（Tretyakova）和伯曼（Birman）《苏联的投入产出分析》，《苏联研究》第 28 卷，第 161 页，1976 年 4 月。

部产品的一个相对小的子集),投入产出法无法取代粗糙得多的“物资平衡表(material balance)”计算。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下面提到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在计划机构(苏联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的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缺乏恰当的理论基础,由来自政治局的政治压力所驱动)和研究机构对计划的数学理论化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一方面,“实际计划者”似乎在抗拒创新,甚至当这种抗拒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研究机构中所做的研究多数都非常抽象,带有不切实际的性质:它要求预先说明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对“社会效用”的一般性计量。尽管在这一唐吉珂德式的任务方面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特列基科娃(Tretyakova)和伯曼(Birman)仍把“最优化计划”理论看做是导致人们对投入产出方法兴趣降低的原因:“只有这些能带来最有结果的模型和方法才值得注意。由于人们很快就明白,最优化方法不能建立在投入产出法的基础上,所以很多人就对后者失去了兴趣”。

相比之下,我们提出的方案虽然要依赖于复杂的信息系统,但相对而言比较健壮和简单。我们并不试图先定义出社会效用或者最优化的标准;相反,“社会效用”是通过在各部门在资源分配上的民主选择,和消费品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比率的模式而表现出来。我们认为,投入产出方法对具有一致性的经济计划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点,也更加根本的一点是,苏联基本抛弃了在经济计划中使用劳动时间作为记账单位这一经典的社会主义理念。我们认为,这排除了在微观经济层面进行理性经济计算的可能。我们已经表明^[1],早在俄国革命以前,使用劳动时间进行核算的思想就已经被极具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了。但任何熟悉马克思或者李嘉图的人,都能够重新发现这一思想。我们认为,苏联之所以没有认真对待这一思想,反映了在苏联社会中有权力和影响力的人的经济利益。官员们不欢迎这种思想所具有的激进平等主义的内涵,因为这会威胁到他们的收入差距。

由于未能采取劳动时间核算方法,工人阶级要求平等主义措施的压力就通过对必需品提供补贴的方式解决了。补贴是对社会主义不平等的一种补偿。补贴的后果之一,是把工资压制在必要劳动时间之下。在资本主义下,雇主部分支付工人的劳动,而全部支付固定设备这一事实,造成了反对引入劳动节约型技术的系统性偏差。

^[1] 科特尔和科克肖特 《计算、复杂性和计划:社会主义核算再次论战》,政治经济学评论,1993年。

劳动节约型技术与工资水平成反比。低工资率鼓励人们用血汗工厂技术挥霍劳动。这种效果在苏联类似的。由于劳动力很便宜，那么对企业来说，囤积劳动，不重视人员编制水平就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反之，使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来支付和进行经济计算，则会引入一种强大的节约劳动的压力。一个工厂必须提前在给定的劳动预算范围内达到产量目标。按照这种劳动预算，一小时活劳动和一小时的物化劳动是等价交换的，那么企业就会对用机器代替劳动的可能性更加敏感。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新自由主义是由大量正统经济学理论所支持的。正统经济学已经发展了一百五十年之久了。虽然在西方还有一些异端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派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些学派在欧洲和美国的影響力要远逊于新古典学派。当苏联的年轻经济学家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时，他们读的当然是正统经济学。正统经济学有一套详尽的理论结构，和充分发展了的政策处方。异端经济学家可以反对正统经济学，说它的理论是不现实的，政策处方是破坏性的，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在西方大学学习经济学的人，除了正统经济学就没学过别的。

现在，情况开始变化了，尤其是在 2008 年开始的大衰退以后。但在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英语世界的普遍看法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外，没有其他现实的替代选择。“市场是好的”，“私有比公有好”等教条被各个政治流派所接受，甚至传统工人阶级政党都表示认同。

让情况变得糟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以对资本主义进行抽象“批判”为主，而不是提出具体的经济政策。

本书的目标是要表明，存在着一种替代选择。使用现代科技，人们可以构建一套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机制。

我们讨论了提出社会主义替代时必须处理的所有重要问题。

如何扭转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计划和市场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如何把计算机技术当做市场之外的替代来运用？

未来应该用什么来代替货币？

如何管控外贸和国家预算？

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何种方式来实施对国家和经济的民主控制？
这样的经济应该建立在怎样的道德原则之上？

最近 25 年来的教训

新自由主义经济实际上表现如何呢？它带来了允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了吗？

并没有。英国的增长率下降了。从 1955 年到 1976 年的混合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为 2.8%，而在 1977 年到 2012 年的自由市场时期，增长率下降至 1.9%。由于投资流向投机性借贷，制造业下滑了。制造业业绩不佳导致长期贸易赤字，从而造成了政府预算赤字，只能靠央行印钱来维持。在美国，情况也差不多。同样是制造业下滑，长期贸易赤字和不平等。收入的增长几乎都集中在最上层的 1% 手里。从 1993 年到 2012 年，美国人口中最高 1% 的收入每年增长 3.1%，而对于剩下的 99%，实际收入每年增长仅 0.3%，基本处于停滞。最近这些年里，95% 的收入增长多流向了最高的 1% 的腰包。^[1] 新自由主义模式造成了长期的资产价格通胀、猖獗的寻租和不平等的快速增长。

在俄国复辟市场机制是一场巨大的受控实验。民族、民族性、文化、自然资源和生产潜力全都一样，只是经济机制变了。如果西方的经济学家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在叶利钦的休克疗法之后，会出现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大跃进。结果恰恰相反，俄国变成了没有希望的国家。工业生产崩溃了，技术先进的行业萎缩了。生活水平下降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死亡率猛增了三分之一，造成了 770 万的额外死亡人口。^[2]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去工业化，技术停滞，死亡率猛增，失去国际

^[1] 参见伊曼纽尔·赛斯 (Emmanuel Saez)，《赚大钱：高收入者在美国的演进》（使用 2012 年初步估计更新），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系，<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还有世界顶级收入数据库，<http://topincomes.parisschoolofeconomics.eu>（2013）

^[2] 进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后，额外的死亡显示如下：

年	总死亡人数 (1000 为单位)	相对 1986 年额外的 死亡人数 (1000 为 单位)
1986	1,498.00	0
1987	1,531.60	33.6
1988	1,569.10	71.1

影响力，贫困和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如果你是老人，如果你是一个农民，如果你是一个体力工人，那么市场甚至比苏联经济相对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都差远了。普金时期的复苏，其实不怎么样，却也几乎都是全球油价上涨的副作用，同样的过程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出现过。

实验错得这么离谱，要是这个学科没有经济学这么强的自我确认的话，可能早就质疑它最开始的假设了。

技术进步

比起现在可用的技术，我们在书中讨论的 25 年前的技术显得笨拙和过时。现代通信和现代处理器使得建设民主控制论经济（democratic cybernetic economy）的任务更容易完成了。

本书写作时，想到的都是 1990 年的技术。在那时，我们能想到的可以满足社会主义计划所需的那种计算能力，只有美国和日本公司的超级计算机能提供。苏联和中国还不能制造这种计算机。现在情况大不同了。中国的天河二号计算机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计算机，比我们在书中设想的计算机差不多快 10 万倍。实际上，我们当时

1989	1,583.80	85.8
1990	1,656.00	158
1991	1,690.70	192.7
1992	1,807.40	309.4
1993	1,807.40	631.3
1994	2,301.40	803.4
1995	2,203.80	705.8
1996	2,082.20	584.2
1997	2,015.80	517.8
1998	1,988.70	490.7
1999	2,144.30	646.3
2000	2,225.30	727.3
2001	2,251.80	753.8

额外死亡总数，6,711,200。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认为计算劳动价值和平衡计划所需的计算能力，用现在更加便宜的计算机就能达到了。

我们关于通常使用电子数据表和本地数据库的假设，显然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相信重要数据都会以数字的形式进行保存，这也是对的。

最近 25 年里，变化最大的是全球的通信基础设施。当我们写这本书时，找到集中然后再传播计划所需信息的解决方案，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提出的方法基于的调制解调器和超高频广播技术，显然已经过时了。现在已经有了好得多的解决方案。高带宽数字信道现在已经很普遍。从商店和工厂传输最新的信息到国家计划和分配计算机中心，将会是对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互联网技术的简单应用而已。

智能手机在普通人群中的普及，使得在关键政治和预算决定中的直接大众民主参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能。

本书写作以来的理论进展

在本书出版前的一次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书中的关键主题。^[1] 那时苏联刚刚解体，也许不是做这件事的好时候，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严肃对待了所遇到的批评。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方案要获得更高的可信度，就必须回答对这一方案的主要反对意见：

1，我们依赖于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自身基于“自然主义谬误”（*naturalistic fallacy*）因而被看做是无效的。

2，我们没有正视奥地利学派如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可能性所做的批评。

因此，我们启动了一个研究项目来回答这些批评，这一项目到现在已经持续了 20 年之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其他研究者如迪特里克（*Dieterich*）、弗勒利希（*Frölich*）、迈克尔森（*Michaelson*）、赖特（*Wright*）、雅科文科（*Yakovenko*）和扎卡赖亚（*Zachariah*）等人合作并相互交换意见，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数量马克思主义（*quantitative marxism*）以及新学科“经济物理学（*econophysics*）”。

这一联合研究的成果是对本书关键假定的实证检验：证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

^[1] 阿林·科特尔和保罗·科克肖特 《苏联解体后的社会主义计划》，*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93): 167-185.

^[1]证明经济计划的确遵从 $n \log n$ 律。^[2]

我们的工作已经构成了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统计物理学^[3]、计算复杂性^[4]、信息论^[5]——更广泛地统一起来的工作的一部分。在奥地利学派看来，我们是唯一值得论战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6]

为了反对他们的论点，我们完善了与经济计算限制^[7]和物理学对可计算的约束^[8]相关的一系列论点。只有在读者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学有所贡献时，才有必要阅读这些理论著作。否则，重点是要知道，我们书中论点的关键前提如今都已经有了大量经验和理论的支撑。

我们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信息技术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和民主。在这个方向的实践上，我们迈出了小小的一步^[9]，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做。在这个领域里，全世界成千上万计算机积极分子都可以做出贡献。

^[1] 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尔 《劳动时间 VS 其他价值基础：研究报告》，*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1.4 (1997): 545-549.

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和格雷格·迈克尔森 《检验马克思：一些来自英国数据的新结果》*Capital Class* 19.1 (1995): 103-130.

撒迦利亚和戴夫 《劳动价值和利润率平均化：一项跨国研究》*Indian Development Review* 4.1 (2006): 1-21.,

弗勒利希和尼尔斯 《劳动价值、生产价格和缺失的利润率平均化趋势：来自德国经济的证据》*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37.5 (2013):1107-1126.

^[2] 赖弗沙伊特、迈克尔和保罗·科克肖特 《平均和边际劳动价值遵循 $\log n$ 律——对哈根多夫的回 应》*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5.2 (2014): 258-275.

^[3] Farjoun, Emmanuel, and Moshe Machover 《混沌规律：政治经济学的概率方法》Verso, 1983.

德拉古莱斯库、艾德里安和维克多·雅克文科 《货币的统计力学》*The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B-Condensed Matter and Complex Systems* 17.4 (2000): 723-729.

韦尔斯和帕特里克·朱利安 《利润率作为随机变量》Diss. The Open University, 2007.

阿林·科特尔等：《经典经济物理学》Routledge, 2009.

^[4] 阿林·科特尔和保罗·科克肖特 《计算、复杂性和计划：社会主义核算再次论战》*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5.1 (1993): 73-112.

^[5] 保罗·科克肖特和阿林·科特尔 《信息和经济学：对哈耶克的批评》*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16 (1997): 177-202.

^[6] 例如：Nenovsky, Nikolay. "The Economic Philosophy of Friedrich Hayek." *Discussion Papers* 8 (1999)., Horwitz, Steven. "Money, money prices, and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3.1 (1996): 59-77., Brewster, Len. "Towards a New Socialism? By W.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F. Cottrell. Nottingham, UK: Spokesman Books, 1993."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7.1 (2004): 65-77.

^[7] 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和格雷格·迈克尔森 《经济计划是超计算性的吗？——来自康托尔对角化的论证》*Journal of Unconventional Computing* 5.3-4 (2009): 223-236.

^[8] 保罗·科克肖特、路易斯·麦肯锡和阿林·科特尔和格雷格·迈克尔森 《超计算的物理限制》*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394.3 (2008): 159-174.

^[9] 两个开源包。支持计量经济学分析的：<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gretl/> 以及 参与式民主：<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andivote/>

与中国的相关性

一本 25 年前写的关于欧洲和苏联社会主义危机的书，与中国有关吗？

我们认为是相关的。

中国的一些特征，在苏联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中也存在着。显然，中国的政党结构与苏联类似，而其混合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 1970 年代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相似。

中国面临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两个方面的进攻。在政治方面，自由派主张，应该建立多党制，结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在经济方面，自由主义要求降低国有企业的地位，增强私营企业和国际金融的作用。本书提供了可用来击退这两种自由主义进攻手段的一整套论点和政策。本书提出了一套社会主义参与性民主模式，暴露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欺诈性，以及一套比华盛顿共识推广的任何经济模式都更加现代、进步和平等的经济模式。

只有当新自由主义的反对者有一套理论上经过深思熟虑的替代选择时，才能反击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我们相信，这仍然是最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替代理论。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改革派^[1]都把我们的著作挑出来进行批评，是因为本书仍然是信息技术时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如何管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唯一严肃的著作。

（黑夜里的牛 译）

^[1] 梅森，保罗 《后资本主义：我们的未来指南》 Macmillan, 2016.

捷克文版序言

1 本书的政治背景

本书写于1980年代后期，在1993年首次以《走向新社会主义》为名出版。鉴于写作年代，它打下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局势的烙印。那时，社会主义制度仍然存在，但明显处于危机之中。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倡导的改革已经开始影响经济，从政治上鼓动了那些想要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在英国，掌权的是极右翼的撒切尔政府。在十年中，她的政府系统性地摧毁了之前社民主义政府下工人阶级创造的社会利益。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立法限制工会，通过征收人头税剥夺穷人的选举权。

撒切尔中止社会主义并确立富人权力的计划的合理性，被一个经济学学派证明了。这一学派随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领军人物，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提倡完全的自由市场，最小化社会福利，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被限制于控制通货膨胀。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给了新自由主义者们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的首次机会；撒切尔政权是他们的第二次实验。他们下一个经济胜利将是叶利钦的俄国。

一个世纪前，在敦促建立俄国共产党之时，列宁写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将之总结为，没有足够的理论认识，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把自己组织为政治意义上的阶级。一个半世纪前，在德国成立共产党之时，马克思写到，“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俄国和德国工人形成阶级的过程，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解读的传播是相联系的。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崛起的社会民主党视《资本论》为圣经。当然，并不是每个成员都读过《资本论》，但在党的知识分子传播理论的过程中，《资本论》的观点塑造了社会民主刊物、社会主义政治家演讲的内容。社会主义教育家，格拉斯哥的约翰·麦克莱恩，就曾在劳工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状况看起来很糟糕。面对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在西欧的渗透，右翼经济学家，像哈耶克，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担心不已。作为回应，其理论计划的目标是：为资本——正如马克思为工人阶级——提供一套充分适

应时代需要的完备的政治经济学。正如波尔迪加所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宣言，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是一部反革命的宣言。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从图书馆的角落中走出来，逐渐支配了世界各地的经济政策。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在于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对于现存社会秩序貌似有理的批评。他们掌握了霸权，定义辩论规则。他们被撒切尔等政客们公开地接受，但同时也在消灭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施加了影响。他们制造了新的学术氛围：左翼理论家也愿善意地倾听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和推崇市场经济的主张。在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布鲁斯^[1]、科尔内^[2]、阿甘别吉扬^[3]和诺夫^[4]等，都开始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直接促成了我们写作《走向新社会主义》的，应该是亚力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983）的出版。它把社会主义的政治观点与对苏联经验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市场的认同结合了起来。这本书直接影响了工党的主要政治家。尼尔·基诺克（1983-1992年工党领袖）用这本书来证明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纲领的合理性。我们感到，尽管诺夫的论点貌似有理，但是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本质上是错误的。市场并不是运行复杂经济体系的唯一手段。中央计划不仅是可行的，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可行。我们的书主要是为了驳斥诺夫，而非直接反驳哈耶克，但哈耶克和米尔斯站在诺夫身后的影子里。

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不仅需要经济学理论，还需要政治理论的指导。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有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列宁的国家政党理论作为支柱。新自由主义则有自由市场理论和代议制政府的主张。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以更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列宁的国家理论为目标。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用劳动价值论来分析资本主义，还要把它应用与社会主义。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九十年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修改，使列宁对代议制政府的批判更加激进。我们认为，必须结合三个核心概念：劳动价值论、控制论协调（cybernetic coordination）、参与性民主，来代替自由主义的价格、市场和议会。我们已经在一系列出版物中阐释过这些主题（科克肖特和科特尔 1989, 1992, 1993；

^[1] Włodzimierz Brus，波兰经济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曾参加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译者注

^[2] János Kornai，匈牙利经济学家。他批评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一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译者注

^[3] Aganbegyan，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前院长、戈尔巴乔夫原经济顾问。——译者注

^[4] Alec Nove，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苏联问题而著称，他提出了独特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译者注

科克肖特 1990)。

我们对于参与性民主的强调可能是由于 1980 年代苏格兰的特殊政治状况。当时的苏格兰几乎被撒切尔政府当作了殖民地，这引发了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不仅工人阶级，大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共同反对撒切尔主义，争取民族自决。这场运动明显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有利于宪政改革。它将我们（诺夫同样）曾经所属的苏格兰社会党和更偏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宪会议党等联合起来。我们和运动中的极左翼看法相同。我们认为，只有直接的、参与性的群众运动才能帮助民众对抗政府。民族运动的这一派组织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群众运动，抵制英国政府强加于苏格兰的人头税。我们呼吁人们拒绝缴纳这项用于换取选举权的税收。在运动的高潮，格拉斯哥大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拒绝缴税，群众纠察队保卫工人的家，防止征税员的侵扰。本书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写成的。这场群众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人头税的浪潮扩散到了英格兰并最终导致了撒切尔的下台。

2 一些提问

捷克文版的编辑曾要求我们在新序言中回答一些问题。可以总结如下：

1、我们的观点是否依赖于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假定？

2、关于从现有经济体系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们有怎样的观点？

3、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看法？

4、有人认为我们所倡导的直接民主很幼稚，会让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应对任何国际的或外来的政治压力。如果回应这种批评？

5、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

6、我们如何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

另外，其他人曾让我们论证劳动时间计算作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合理性。下面，我们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3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3.1 财产关系的矛盾

八十年代的形势是促成我们观点诞生的直接因素，但我们的这一思想也已经有了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受法国的阿尔都塞传统，以及一定程度上受意大利博尔迪加主义传统的

影响。在 70 年代后期，我们一方面相信共产主义政治在西欧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在政治运动由于其自身需要而提出的问题的语境下，这样的理论发展才能出现。于是我们专门研究了西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提出来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在写作《走向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对于什么是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模式之间的过渡是如何进行有着明确的概念。这些观点作为本书的背景起作用，为公开解释的观点铺平道路。

我们的分析是，资本主义有向私有制的废除和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最初在财产关系的层面表现出来。一系列新出现的财产形式表明了生产资料的日益社会化：小商品生产者、资本主义企业、合资股份公司、国有资本、社会主义财产。这些财产形式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积累也遇到了内在的限制。工人阶级稳定下来，能够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生活状况。资本遇到了与利润率下降相关的积累障碍。普选制度的建立允许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力。这些发展的综合结果导致了周期性的重组危机（restructuring crisis）。这些危机可以用进步或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决定结果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着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转型方案的工人运动。没有特有的、进步的经济计划，就不可能有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式解决重组危机。在出现危机时，关键的政治问题是，所有制的转型是向着还是背离共产主义^[1]。

我们分析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方法，开始于对财产关系的经验主义理解的批评。经验主义者抓住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说法有两个理论后果：它抹除了不同资本主义财产形式（例如，个人所有、有限责任财产、国家财产和合作社形式的财产）和它们相应的经济、政治联系的区别；并且它将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废除”行为。相反，人们需要将废除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过一系列财产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导向私有财产的废除。

为了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要理解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变的财产关系，而是理解在资本主义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中财产关系变化的范围。对于恰当理解现在的形势，阐述共产主义纲领，以及详细说明共产主义者介入的目标而言，这样的研究是必须的。

研究财产关系，并不是从它的表现即从其法律表述开始。相反，必须把财产关系看做

^[1] 这些危机是否导向在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的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它取决于国内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是再生产关系的特定类型。因此，必须把财产关系置于其所属的社会再生产形式的背景下来理解。社会的持续依赖于生存必须的物质财富的不断重复的再生产。社会共同体源于社会生产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交互和相互依赖。因此，任何社会研究必须以物质再生产的过程为起点，就像科学生物学以种群的再生产为起点一样。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一定是在有组织的形式下，在一定结构下进行的。提供这种结构的，是一种或多种社会再生产形式。马克思将这种结构命名为生产方式。

一种生产方式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结构：劳动过程要素的特定的技术组织。这种组织决定了生产过程不同要素间的特定技术关系。如果要把原料和其他劳动对象制成成品，就需要合适的劳动工具。组成生产力系统的技术关系的类型主要取决于使用的工具。工具决定了什么资源能够成为劳动对象，工人必须完成什么样的操作，什么样的合作和分工是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结构决定了基本生产单元的规模和属性，并由此决定了与生产的延续相容的剥削形式。

生产单元是理解财产关系的枢纽。生产单元是工人和生产资料的总体，其中进行着某些有机联系着的劳动过程。在生产单元中，不同的劳动过程直接相互关联，并且是确定的技术上的关系，一个过程的产出直接是另一个过程的投入。正如贝特尔海姆（Charles Bettelheim）所说：

“生产单元的物质基础是一组用来再生产特定劳动过程的劳动方式。只有劳动过程的总体能够持续，生产单元才能存在；生产单元的存在不是别的，而是使用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同一种劳动过程的成功循环。”（Bettelheim, 1971, p. 94）

我们区分出财产关系执行的三个功能：

第一级财产关系确保生产单元的再生产。

第二级财产关系确保剩余劳动的榨取。

第三级财产关系管理剩余劳动的分配。

尽管分析地看，这些功能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是说一种财产关系只执行一种功能。

任何时候，现存具体的生产关系集合的变动受到这样的限制，即这些变动必须与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延续相容。只有在这样的变化范围内，有效的政治斗争才能改变财产关系。而此范围内的运动是两种力量的合力：生产力系统（尤其是技术方面）和阶级斗争。生产力系统的变动调整其变化范围的限制和边界。例如，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是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资本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导形式的前提。

财产关系的支配形式变化范围也在不断改变。现在它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资本主

义,但是当下的生产力结构排斥独资私营企业的支配地位。返回这种主导形式是不可能的,这已经由自机器工业发展以来小资产阶级保守民粹运动的反复失败所证明。这指向进入所有制转化的第二种力量,即阶级斗争。一旦一种新的生产力体系和生产关系建立了,该领域中的变化就由政治决定。阶级斗争常常围绕国家权力展开,而国家权力是改变或废除私有制的手段。自觉阶级斗争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所有制的改变。它赋予阶级斗争以内容。没有对阶级斗争发动的范围和各种可能转型的意义的深入理解,阶级斗争的科学实践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趋势是向着废除一切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发展的。首先,直接生产者被剥夺,沦为穷苦的无产阶级。然后,资本的集中和合资公司消解了个人资本的私有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使得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作用被雇佣的职员(尽管报酬优厚)代替,而作为所有者的资本家成了毫无作为的食利者。食利者的个人所有权,反过来成了法律上的骗局,纯粹的第三级关系,只关心剩余价值的分配,完全没有对生产方式的有效控制。由于食利者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是多余的,他们可以消亡了。这里的“消亡”,并不是废除的意思。食利者对财产的主导性降低了,从而为资本的新形式让位,但他的股权还存留着,因为:

- 1, 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不是均匀的过程。一些领域集中得更慢:资本在新的技术领域首次出现,将重复资本发展的整个历程。一些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本将继续存在。

- 2, 股权仍是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标准法律形式。这里,资本主义表现出保守性,在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了不变的法律形式。通过股份所有权,公司仍然构成私有财产,但组成所有制主体的具体人格改变了。一些大金融家进入了食利者的行列,还有一小群非个人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私人股东并没有被完全废除或剥夺,只是逐渐被取代。

资本所有权的不断去人格化,并不破坏资本家生产中的角色。它并没有引领我们进入管理主义或技术官僚的新时代,仅仅提供了管理生产方式的非个人法律角色。回顾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舞台上的人格仅仅是生产方式奠定的目标功能的代理人或人格化,这一马克思的论点得到了证明。没有合资公司或个人所有者,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依然合乎法理。所以,贝特尔海姆的抽象论述,说苏联是资本主义的,并不荒谬。但关键是生产单元是否通过商品关系再生产自身。由此,由于价值规律的调节,就必然有破产的可能。从私人所有到国家所有的转变削弱了破产作为调节器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奥地利学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关闭公司成了政治决定,受制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而不是自

主经济领域的自由行为。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作为一种公司财产份额不断增加。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凸显与技术上的变化密不可分。信息技术，即广泛意义上使得复制和传播信息更加便利的技术，在过去 40 年里是技术发展最有活力的领域。远程通信、复印、传真、软件、互联网、数码游戏、数码相机，都极大地降低了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成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信息生产的职业中：编程、录制电视和视频、出版。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点是：尽管生产信息的第一步所需的劳动是巨大的一—轰动一时的一部电影也许耗费几百万工时——但复制它所需的劳动几乎为零。

相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制药和生物工业。这里，发现和测试一种药品的劳动量是巨大的，然而一旦了解了其化学式和用途，药片的大量生产所需追加的资本相当便宜。

姑且将复制这些产品所需的信息称为“物化信息 (embodied information)”。物化信息有价值，即首次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只有法律给予他们垄断权，来使他们收回生产或发现“物化信息”的成本，这些产业的再生产才有可能完成。于是他们以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卖出这些产品。这种状态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在这里，资产阶级法权与生产力的潜力发生了激烈冲突。财产关系的执行变得很成问题。

这种现象在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互联网上复制文件的爆发允许人们规避电影和录像行业的垄断。便宜的常规药厂家可能会在艾滋病人被药物垄断企业拒绝时，为他们提供救命的药品。在大部分城市都有盗版软件专卖店。大型传媒公司加密付费电视台和视频格式的努力几乎被黑市的黑客设备立即破解。现在，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当下的技术革命对于私有制有着不利的作用。过去，财产是内在于物质之中，其所有权比信息更容易管理。而现在，除非信息的私有产权能够被强制执行，否则它不会带来任何税收，生产也无利可图。

同时，我们看到，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初生的反产权的共产主义形式诞生了：开源运动和 copyleft 运动。因特网的绝大部分都运行着开源软件，如 Linux 操作系统和 Apache WEB 服务器。这类软件不是为了盈利而编写，而只是为了满足于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这预示着一个生产性社会劳动自我消亡的未来。这些先驱者们的出现，说明私有制已经变成了技术发展的桎梏。如果有一个大洲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生产信息——不论是视频、软件还是新药——的高昂费用可以由一般税收支付，从而允许信息免费传播。

3.2 积累过程的矛盾

除了上面讨论的所有制的变化，资本主义系统中还有长期的结构性发展。这些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元素的逐渐引入。

资本主义建立在财产价值的积累之上。所有公司的目标都是提高股价，增加营业额。但它有着内在的限制，即任何长期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增长都会以停滞和衰退结束。对此，有大量马克思主义文本阐述，我们在此不能一一涉及，但一些关键的概念是相对容易理解的。

考虑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企业。假设它在贸易中赚取 10% 的利润。假设利润的一半被所有者消费掉，而另一半留作内部投资。理想情况下，公司的增长率是每年 5%。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中国，就是这样。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门会稳定地持续增长几十年。随着企业的成长，它雇佣越来越多的员工，购买额外的原材料的股票、更多的土地。假设它雇佣的人数与增长率同为 5%。每年 5%，14 年就会翻一番。如果 1990 年“中国”这样的企业雇佣着 2 亿人，那么 2004 年就会有 4 亿人。很明显，即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持续不了多久。雇佣劳动人口如此快速增长，依赖于农业中剩余人口的存在。历史上，农业人口有较高的生育率，为了在严峻的婴儿死亡率下生存，这是必要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举措之一，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公共卫生措施，诸如疫苗接种运动、消灭害虫的措施以及清洁饮用水的供应。这在世界范围意义上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可供资本主义雇佣的潜在剩余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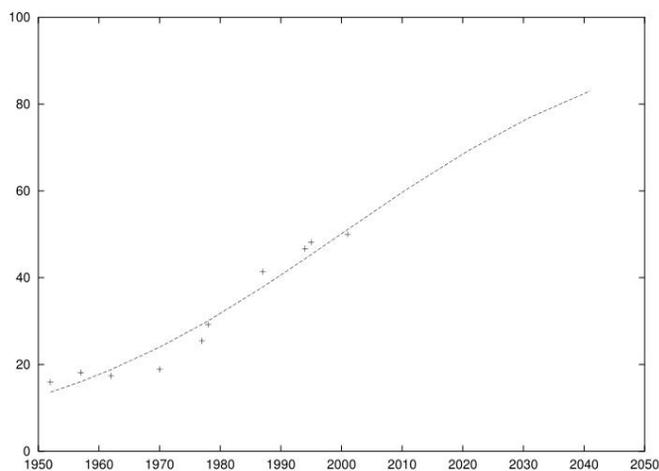


图 1：中国非农劳动人口的增长率。2001 年后的数字是使用逻辑斯谛曲线（logistic curve）得到的。

原始数据来自 Maddison (1998)。

随着人们迁入城市，成为领薪水的工人而不是农民，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家庭不

再是生产单元，家庭中的孩子就不再被视为额外劳力。工业社会要求孩子去上学，在经济上则依靠父母。在大约一代人之后，工人阶级的家庭变小了，人口增长缓慢下来，向城市移民也变少了。图 1 表示了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发展，尽管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被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如果我们考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发现这一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

在英国，从乡村到城镇的移民在一百年前就事实上完成了。随着工人阶级的稳定和阶层固化，工会组织广泛发展，罢工和工人抗议越来越多。资本家已经很难在旧的工资水平上扩大工人队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雇佣新劳动力的限制使得投资向资本密集型发展。资本对劳动的比值上升了（科克肖特、科特尔和迈克尔逊，1995）。

想象我们将这个“典型”企业向前转移一个世纪，到 1904 年的英格兰。假定年贸易额为十万英镑，老板支付薪水两万英镑，六万英镑购买原材料和偿付工厂折旧。他的贸易利润率为 20%，资本增长率为 25%。由于不能雇佣更多工人，他决定每年投资一万英镑购买新的机器和厂房。到 1912 年他拥有了 16 万英镑的资本和更加现代化的厂房，但他的收益能力呢？

仍是每年两万英镑。为什么？因为企业获得的利润更多依赖于雇佣工人的数量，而不是拥有资本的数量。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价值来源于雇佣劳动者，而不是机器。增加的价值被分成工资和利润。不同企业，不同时期，作为利润被拿走的价值增长份额有一定波动，但平均比例趋向于约 50%（Farjoun 和 Machover, 1983）。所以，当资本与劳工比率升高，企业从资本获取的利润是趋于下降的。我们的资本家每年仍获得约四万英镑的价值增加，其中两万英镑作为利润，两万英镑作为工资。当然，也许他的商品幸运地卖出了好价钱，或挫败了一场罢工，压低了工资。但他也可能被迫将货物低价处理，或败给罢工。既然我们选择一个作为代表的企业，这些可能性先排除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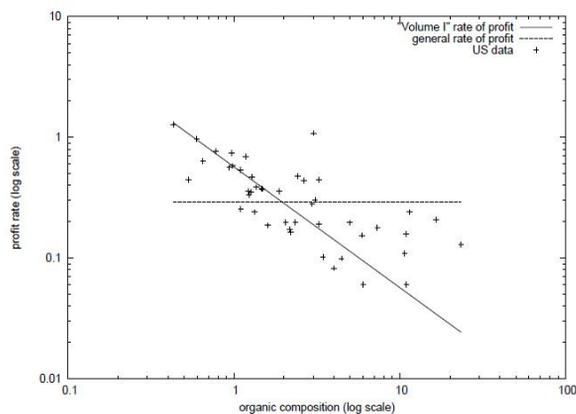


图 2：美国 1987 年 47 个部门的有机资本构成和利润率的关系。向右下倾斜的线是我们期望的与雇佣劳

动力成比例的利润率。横线是假设所有部门有同样利润率。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企业会有更低的利润率。

来源：（科克肖特, 科特尔, 2003）

图 2 显示了这样一种总的趋势。对于美国，高资本劳动比的企业利润率更低。在英国也有相似的数据，证明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定律。由于资本积累的加强，导致了更高的资本劳动比和利润率的下降。资本越集中的企业利润越低，并且，由于越来越多的产业变得资本密集，“典型”企业期望中的利润率是长期下降的（如图 3 和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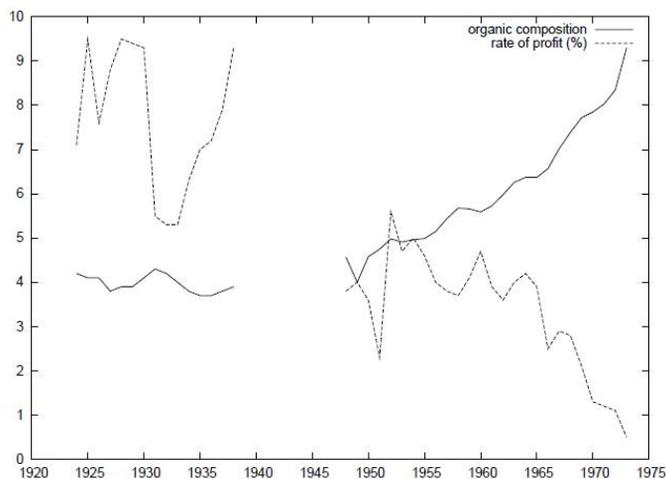


图 3：英国企业 1924-1973 年总体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的演变趋势图，来自科克肖特，科特尔和迈克尔逊（1995）。

利润率下降和不断增长的有机构成是私有产权与长期技术发展已经不相容的早期指标。这也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在发展高度资本密集产业（如铁路）时如此乏力的原因。它们长期的低利润率逼得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它们收归国有。英国保守政府在八九十年代尝试扭转这个趋势，例如私有的海峡隧道和铁路网的私有化。海峡隧道公司反复破产，在最初的股东赔掉了他们的大部分投资后工程就停止了，最后靠提供公共补贴才完成。在英国总铁路网的私人经营中，也提供了大量公共补贴。若非如此，所涉及的巨量资本的回报率低得根本不足以吸引私人资本。

置盐信雄(1961)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基础提出了非常有名的质疑。这一反对意见提出的背景是这样的争论：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是否会出于技术经济的原因而增长。我们拒绝利润率趋于平均的假设直接适用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科克肖特和科特尔，2003），并且同样拒绝利润率可作为企业做出投资决策的标杆的看法。我们认为利息率才是这一角色，并且主张在资本积累率与人口增长率相比的基础上讨论利润率下降。

我们将利息率低于利润率看做资本的重要指标，只有这样积累才能继续。当利息率不得不降到接近于零才能维持住经济时，这个趋势就结束了，正如当代日本发生的那样。

利润率的常规衰退仅仅发生在资本持续积累的时期，但同时也限制着资本持续积累的能力。如果积累持续，利润率就一直下降，趋于陷入长期衰退。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入了危机-繁荣的长期循环。经济危机时期如三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打断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经济的重建伴随着突如其来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些危机可以通过进步的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保守的方式解决，结果如何取决于政治。进步的重建如三十年代美国的新政和战后西欧经济的重建；保守的重建如 1890 年代的欧洲帝国主义，三十年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英国的撒切尔主义。

表 1：不断上升的资本有机构成：瑞典资料，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数据。来源：Edvinsson (2003, 表 7.5)。

	1871-1900 平均	1971-2000 平均	变化率
$\frac{c}{s+v}$	184%	305%	66
$\frac{s+v}{c}$	54%	33%	-40
$\frac{s}{s+v}$	34%	21%	-38
$\frac{s}{c}$	19%	7%	-61

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s=剩余价值

进步的重建趋向于反对食利者的利益，改良财产关系。保守的重建则走相反的道路。例如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试图用如下措施解决低利润率的问题：

1. 为了让更多人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国家服务私有化。这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比例相对较低，从而允许一段时期内广泛的资本积累。
2. 普遍地削弱工会以降低工资。
3. 允许资本密集型企业关闭。
4. 修改国际贸易法规以促进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

5. 将颠覆东方的社会主义作为主要政治目标。

前三项措施相对来说只在短期发挥作用，最多在几十年之内是有效的。而后面两点将发挥长期的作用。它们有效地为粗放资本积累大开方便之门，将整个新大陆的人口置于资本剥削之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积累不再受限于之前国家性质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对英美统治者来说，如果中国、印度、罗马尼亚或者其他地方有很大弹性的劳动力供给，本国人口是否增长缓慢就不再重要。

现在，这强大的政治力量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即使大城市资本主义作为进步的历史角色已经过时了，但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如此。除非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再一次将一个大陆规模的经济脱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广泛的资本积累还可以持续几十年。但最终，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规律将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历史性的障碍。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均质化的。例如，现在合并进欧盟的东欧地区，由于相对而言已经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相比印度，它们受到影响的时间会早很多。但即使在中国，如图 1 所示，资本主义也将在 21 世纪的开头几十年内到达成熟点。于是，新的重构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但这次将不会再有资本输出的选项。废除私有财产的客观必要性将会再次显现出来。

4 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过渡

《走向新社会主义》中最明显的空白之一就是缺乏任何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系统讨论，即从为了赚钱而交换商品来作为调节手段和把剩余作为剩余价值进行榨取的经济，到事实上由计划调节、由计划支配剩余产品的经济的过渡。在本节，我们试图补足这个缺陷。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过渡应该通过合作社、国有资本主义企业等中间形式，分三个阶段完成。

过渡的第一阶段涉及到从股东资本主义体系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所有的企业的结合。第二阶段涉及到的是向一个完全计划的经济体的过渡。

当所有制改变时，需要确保物质生产的连续性。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变更所有权也是司空见惯的，仅仅所有制的变化不会威胁到生产的延续。历史上有大量企业完成了从私有到国有，国有到私有的有序转化。商品生产级别上的平滑过渡所需的仅仅是企业员工继续工作，提供国家信用来支付即将到期的购买原材料的账单。最近的例子是英国铁路网的高效的再国有化，几乎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立法，政府宣布经营铁路的私有公司破产，资产转移给一个新成立的非盈利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任何被清算的公司中

那样，股东仅得到他们认为曾经属于他们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特例，毕竟被接管的公司几乎破产并且依赖于政府的订单。

关于工人所有企业，相对容易立法，公司董事会可以全部由雇员投票产生或者部分——例如 75%——由雇员投票产生。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仍在运行，保有了它们的财产，仅仅是董事会的决策权改变了。

在以上两种形式，即“非盈利企业”和雇员管理企业中，输家都是最初的大股东。在工人所有企业的例子中，有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股东的权利被限制了，但并未被废除。但雇员选举的董事会相比于股东选举的董事会，明显更倾向于发放更少的分红。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公司股价的大跌。

当国家直接没收企业时，必须面对补偿股东的问题。英国工党政府国有化公司的做法是向之前的股东发行国债。对于国库来说，税收和资本账户的净价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资本账户上，不断增加的国债被获得的股份所抵消，而在财政收入方面，为国债支付的利息被新的国有企业的预期收益所抵消。可以设想类似的规定，在立法建立工人所有的公司时，股东权益转化为债券。

这些措施可以使股东所有的资本主义相对平滑地转化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资本主义，但这种中间时期的缺点是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每年向食利阶层支付红利的负担。很明显，在这种情境下，仍然存在很大的收入和财富差异。

在这些过渡形式主导经济的时期，由于股票市场受到了限制，需要一些其他手段作为新的投资资金来源。最明显的就是银行角色的扩展，尤其是国有银行，作为投资资金来源。

在经历这步转型之后，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但私人资本家的所有者身份被大大弱化了。最严重的经济破坏将发生在金融领域，股票交易公司和投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将彻底衰退。但这种衰退是可控的，不会比过去二十年间许多重工业的结构调整更糟。

第二步转型需要详细计划能力的发展——组建管理体制、建立民主管理机制、构建计算机网络和软件，以实施我们书中所讨论的那种计划。最初这些计划将是指示性的，随着系统成熟逐渐成为指令性的。

第三步包括货币交易的废除和转而采用劳动券支付。在这点上，残余食利者和广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利益发生了尖锐冲突实施劳动券支付的系统与支付利息是不相容的，因此支付利息在法律上就是非法的了。在这点上，食利者阶层本质上的寄生性将表现得很普遍，因为他们将失去任何剩下的生产功能。这里问题的复杂在于，国家的养老金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财产——股票和股份。如果很多人依赖养老金生活，他们的财产将突然蒸

发，那么，使用劳动券支付的政治反对意见会比较强烈。然而，基于股票市场的养老方案也面临着严重的支付能力问题。如果预期的领养老金者可以按比例转换，有可能让向着不依赖于股票市场的公共养老方案转型变得吸引力。如果这在劳动券转型之前完成，那么预期的被剥夺者就限制在了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在大规模人口中最终废除货币的政治诉求基于两个预期。一是它将同时废除所有债务。由于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净债务人——不论是在信用卡还是房贷上——这将产生强力支持来击败在这个进程中失去财产的少数。二是向平等报酬系统的转换将显著提升大部分人的收入。

5 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

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其经济体制内在的原因，但并不是所有可能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内在地具有的这些原因。在本节，我们将分析一些“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广为人知的内在矛盾，并强调我们的主张中区别于苏联式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方面。

5.1 剩余价值的榨取

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后期，榨取剩余产品的机制渐渐地崩溃了。这次崩溃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看做生产方式的标志性特征。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剩余产品的榨取通过政治决定的国家计划中物质产品在消费品和其他产品之间的划分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正是社会主义“最深的秘密，整个社会结构隐蔽的基础”。榨取剩余的制度与在资本主义下在这几个方面有很大区别：

- 产品的分配由物质条件直接决定，而不是间接地，作为交换关系的结果。

- 分配是集中决定的，而非通过大量局部的对劳动力价格、工作时间等的讨价还价。
- 由于消费品供给在计划中提前决定了，实际的货币工资水平是无所谓的。更高的货币工资并不带来实际工资的增长，而一大部分实际工资以免费商品或补贴商品的形式出现。

这种榨取剩余的形式由社会主义生产高度的整体性和社会性所决定。从中发展出了个体工厂对中央绝对从属的必要性，而个别企业的盈利性相对说来就不重要了。由此，它决定了国家的中心角色，使得地方当局不可能拥有分配资源的自主性。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不变的特征。

这个“最深的秘密”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考虑两种可能：或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不同的群体；或者是同一个群体。正如迄今曾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一样，如果他们是不同的群体，那么任何掌握计划权力的人就既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拥有者，又是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实际上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使经常贪赃枉法，也难以通过无耻的资产阶级式的追求私利来完成他们的社会功能。他们反而被迫扮演了高度社会化公众化的组织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生活的角色，以确保人们服从于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某一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狂热崇拜，并或多或少由国家恐怖予以支持。

个人崇拜，领袖表现为共同意志的化身，它的产生并不意外，但要有效适应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矛盾需求（在市民社会中建立政治统治），需要和代议制政府制度结合起来。

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讨论代议民主政府似乎是奇怪的，但这种思想是很适用的。代议政府选择一些人，通常被称为政客，在政治决策中来代替或代表其他人。这正是列宁主义的党在执政时所做的。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做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决策。正如这样，它和议会系统同样是代议制的。谁被代表和他们怎样被代表是不同的，但代议原则是相同的：做出决定的并不是这些被涵盖到的人，而是被一群专职的统治者所垄断，而他们的法令由代议程序提供了合法性。通过多党制选举选择的统治者并不能淡化他们代议的特征，更不能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

社会主义代议政府的矛盾性是明显的。普罗大众的代表——通过他们对计划的控制，因此也通过从直接生产者中榨取无偿剩余劳动的手段——暂时地变成了生产资料的有效控制者。于是他们个人的阶级立场转换了，不再能够继续代表无产阶级。

只有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差别被废除，当群众自己通过参与式民主制度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时，社会主义核心深处的集权主义秘密才不再是矛盾性的。只有当由群众投票决定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多少用于国防，多少用于医疗，多少用于消费品，等等——时，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才不再是一场骗局。

但是，回到剩余榨取的问题上来。在社会主义下，这内在地是一个极权主义过程：部分对整体的服从，工厂对计划的服从，个人对集体的服从。生产不再是为了私有利润而是为了整个社会。在参与式民主系统下，这种极权主义服从也许更像是瑞士民主党，而非德国法西斯，而这并不会更不真实。

戈尔巴乔夫对极权主义原则的攻击破坏了整个剩余榨取过程。他的措施之一是允许工厂保留大部分利润。突然间，他引入了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剩余榨取的原则：个别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他使整个制度陷入混乱。从苏联建立计划经济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营业税是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法律形式。用资本家的语言，就等于是说，用国有企业的利润支付大部分国家开支（新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福利、国防、科学研究、养老等等）。另一个重要税源是伏特加税。它们一起提供了稳定的税收基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运动，加上同时他允许工厂保留大部分利润的决定，动摇了国家财政并使得卢布大幅贬值。

但这些税收只是（正如凯恩斯也意识到的）为维持货币稳定而采取的必要官方政策^[1]。这些税收既没有保证剩余的生产，也没有决定剩余的多少。当计划决定了分配多少社会劳动用于生产消费品，多少用于其它活动时，剩余的真正的量也同时由计划确定了。一旦计划指定了多少工人修建新的钢铁厂、新铁路、矿井、坦克和炸弹，剩余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就确定了。在社会层面，剩余产品的生产是有意识的和明确的政治决定。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守夜人”国家，不简单满足于从自主生产的剩余中收税。国家必须使自己成为实际生产和管理剩余的机制。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是它的运行规律。

正如通过购买和剥削劳动力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秘密，在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质，公共、计划的剩余的社会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秘密。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产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从必然出现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产生了经济危机、衰退和不时打断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经济周期。从社会主义下剩余的计划分配产生了阶级对立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从剩余榨取的必要的政治形式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周期：斯达汉诺夫运动、大清洗、去斯大林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在戈尔巴乔夫毁掉了税收基础后，缺少了主要税收形式的国家诉诸于印发货币。工厂有了额外的钱，但由于社会生产的分配依然由计划决定，他们不能像私有企业一样将这些新得到的钱变成生产性的资本。社会主义的剩余榨取制度被破坏了，但却没有一个资本主

^[1] 这里提到凯恩斯和他的小册子《如何筹措战费》（凯恩斯，1940）相关，其中他提到了英国战时财政相似的一点。

义的体系来代替它，经济陷入了通胀和衰退。

5.2 价格和经济计算

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被经济计算系统的缺陷所限制。所有右翼的批评者都提到这点。他们理直气壮地指出，苏联运行的价格系统使得合理的经济计算变成了不可能。众多的轶闻告诉我们：

“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植棉者的谷物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惊异的建议。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同时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一般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明白的道理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大约在斯大林做出这项观察四十年之后，价格政策的改进如此之小，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可以引用集体农庄因为面包比谷物价格便宜而用面包喂猪的例子。

当商品的相对价格系统地与相应的生产价格不同，这使得人们没办法选择经济的生产方式。由此，我们可以说，*不像资本主义，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缺乏有效使用劳动，并由此提高生产率的内在机制。*

任何新的生产技术要想在经济上根本上证明自己，就必须能够在制造产品时比之前花费得更少。只有这类技术不断在经济中被四处应用，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休闲或满足新的更复杂的品味。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中，工人必须总是想办法节约时间。时间，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是我们用来从自然界购买所有我们想要的以及必需品的“原始货币”；一个瞬间的不必要浪费，时间就永远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只有提供了更好的节约时间的方法，才能说和资本主义相比具有历史进步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自然是分配不均的，但它内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支撑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扮演着进步的角色。如果失去了这项潜力——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1930年代已经失去了——那么很久以前就在与苏联集团的竞争中失败了。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商为了追求利润努力减少花费。这些花费包括工资。企业经

常引进新技术来裁员，减少劳动花费。因为技术变革导致失业而批评技术变革，是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形式。在这点上，真正能做批评应该是，资本主义经济采用劳动节约型设备的速度太慢了，因为劳动力被人为压低。

但在这方面，苏联甚至做的更糟。国家补贴食物、房租、儿童衣物和其他必需品。基础商品上的补贴补偿了较低的货币工资。但补贴和社会服务要用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支付。而要让这些企业赚得利润，就必须把工资维持在低水平，而低工资意味着补贴必须保留！

最坏的方面是企业靠着劳动力的廉价而肆意挥霍它们。如果劳动力如此便宜，为什么还要引进现代自动化机器呢？

5.3 计划机构：正统观念和保守主义

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双重原因，没能够建立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中认为必需的那种体制。当然，苏联的计划体制一开始是相当高效的。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苏联还是比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快地建设起了重工业基础，尤其是建立了打败纳粹战争机器的军工体系。在那个发展阶段，粗放的计划手段是足够的：经济在技术上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计划仅需指定相对很少的关键目标。即使如此，在早期五年计划时期还是有不少总供求失衡的例子；即便如此，劳动力和物资的大扩张意味着，尽管存在不均衡，关键目标依然可以达成。

早期苏联计划不是根据我们在书中谈到的模式制定的。详细一致地从最终产品目标列表倒推出总产出需求列表，这远远超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能力。于是，通常计划者们只是从他们自己设定的粗略目标出发：1930 年之前生产多少吨钢，1935 年之前生产多少吨煤，等等。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早期实践可以说对经济结构产生有害的后果。它造成了一种“生产主义”，大量关键中间产品的生产成了最终目的^[1]。事实上，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看来，人们其实想尽可能地节约中间产品，即计划的目标应该是：保证所需最终产品产量的情况下，生产最少的煤、钢、水泥等等。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的，即在战后重建时期之后，要利用从 1930 年继承来的计划系统来建设一个有活力、技术进步的经济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不够的。某些优先的部门如空间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似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系统内在的特性决定的。给予特别部门以优先权的另一面，是消费品生产降到了索求剩余资源的角色。到

^[1]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1952）感到必须反对这种观点：社会主义下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是生产本身（参加他的批评《亚罗申科同志》）。正如他在《胜利冲昏头脑》（1930,1955 年再版）中对强制农业集体化的过激行为的批评，这无疑是斯大林对他之前曾鼓励过的观点或实践的迟来的否定的一个例子。

六七十年代，各种反复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导致了勃列日涅夫晚期臭名昭著的停滞。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技术本身的原因是苏联当时的计算机和通讯设备。我们指出，使用当今西方的技术，高效、详细的计划是可能的，但苏联计划者在七十年代使用的技术相对来说还很原始。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还会提到，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值得强调。

众所周知，苏联官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是应用合理计划方法的障碍。关于计划理论新的进展总是被怀疑——即使与介绍市场关系完全无关。正如投入-产出方法所遭遇的，Augustinovic (1975, p. 137) 指出了的双重讽刺：这种方法“被认为将共产主义计划的罪恶夹带进了自由民主经济，又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罪恶夹偷运到社会主义经济。” Trembl (1967, p. 104) 同样指出从最终产品开始计划过程的独特观点被官方正统认为是消费导向的——从而多少是“资产阶级的”。相似地，康托罗维奇 (Kantorovich) 在线性规划方面开创性的工作长期不被接受。

在 1960 年左右，这种对理论革新的意识形态抵触最糟糕的方面似乎被克服了。但即使投入-产出分析和线性规划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赞同，这些技术在实际的苏联计划程序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这一部分由于上面略为提到的计算上的问题，这意味着投入-产出分析不能替代更为粗放的“物资平衡”计算，后者覆盖了大量种类的商品（相对于所有产出商品仍是一小部分）^[1]。其他原因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计划委员会 (Gosplan)、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 (Gossnab) 的日常活动（缺乏适当的理论基础，常常受到中央政治局的历史政治压力所驱动）和研究机构中高度数学化的计划理论的发展严重脱节。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实际计划者似乎拒绝革新——即使这种拒绝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合理的。转换到像我们所说那种以最终产品为中心的计划系统，将标志着传统苏联模式的本质变革，国家计划委员会似乎是多余的了。正如 Kushnirsky 所说，“由于苏联经济中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被产出水平导出的所谓满足了的需求代替，计划者们相信他们可以比最终需求更精确地决定生产计划” (Kushnirsky, 1982, p. 118)。简单说就是：对计划者来说，生产他们喜欢的，比生产人们实际上需要的要更简单。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参见科特尔和科克肖特 (1993)。

另一方面，这种脱节是由于研究机构中的大部分工作的抽象性质。他们提出了许多微观计划方面的好主意（如康托罗维奇的线性规划），但关于系统整体最优化的大部分工作

^[1] 关于计划者们估计他们在不同时间内能够处理的投入-产出系统的规模上的限制，参见 Trembl (1967), Ellman (1971), Yun (1988), Trembl (1989)。

都过于抽象：它需要事先有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对“社会效用”^[1]的普遍衡量。当在这条唐吉珂德式的道路上缓慢前行之时，“优化计划”理论家使得人们对投入-产出方法的兴趣冷却了下来。如 Tretyakova 和 Birman (1967, p. 179) 所描述的：“只有这些模型和方法能够产生优化结果，它们才值得注意。由于很快就弄明白了优化模型不能建立在投入-产出模型之上，大家就对后者失去了兴趣。”

值得注意，S·Shatalin——受到短暂的赞扬却不切实际到荒诞的地步的“500 天”计划的作者，这一计划是为了在 1990 年的苏联快速引进资本主义——之前也是一个典型的最优化计划观念的代言人。（见 Ellman, 1971, p. 11, 引用了 Shatalin 讨论投入-产出模型和“计划优化”，并指出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科学的。）

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中的主张——尽管他们必然依赖于发达的信息系统——是相对健壮和直接了当的。没有尝试为社会效用或最优性定义先验的准则；相反，“社会效用”是通过在各门在资源分配上的民主选择，和消费品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比率的模式而表现出来。

苏联计划系统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早期改革尝试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显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持这种看法——新的数学或计算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优化经济机能的平稳方式，它不会从基础上动摇现存体系（与广为传播的采用市场关系相反）。实际上，先进技术手段只有在整个经济系统彻底革新的背景下才能产出红利，这将涉及到重新研究并澄清计划的目标和逻辑，同时重组评估及奖励企业绩效的制度等等。

考虑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第八章中提出的计划体制，如果商品的市场结算价格（以劳动量计算）与劳动价值比率高于平均，则扩张生产；反之则减少生产。这样一个系统可以有效地奖励（能够分配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特别高效地利用社会劳动的企业。因此，企业就有了动机用任何方法来节约每单元产出所需的劳动输入（直接和间接）。在传统苏联模式中，企业仅仅以完成可实现的计划产出配额为目标，而对提高他们自己的效率毫无兴趣。如果想要突破传统模式，这些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5.4 计算机技术

在论证我们的计划经济方案时，我们提到的是西方最新一代的超级计算机。毫无疑问，苏联可用的计算机技术与之相比要落后一些。古德曼和麦克海因（1986, p. 329）描述了苏联八十年代中期计算机产业的情况，某种程度上，经济孤立是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

^[1] 除了这类问题，Kushnirsky 指出 ASPR 工程中研究机构进行的对现存计划技术的研究质量很差。他发现学院给出的账目经不起算法的检验，并且“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的目的”（1982, p.124）。

首：“如果被严格限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联系，任何计算界（computing community），包括美国，都不可能能够以现在的速度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在其他地方（科克肖特、科特尔，1989，附录）也提出过，企业级的个人计算机的分布式网络，与相对合适的中央计算机连通的方法，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虽然慢一些，但仍在对实际计划目的可用的时间尺度上。从这个方面说，在苏联，最严重的技术限制要数通讯系统的落后了。古德曼和麦克海因（1986）注意到了苏联电话系统的极慢速度和不可靠性，以及找不到能供数据传输的链接的问题。他们也引用了惊人的统计数据，例如，1985 年只有 23% 的城市家庭拥有电话。

再一次，我们并不想过分强调技术。在阿连德时期的智利，斯坦福·比尔开发的经济信息系统（比尔，1975）表明运用适当的资源、政治决心和关于系统目标的清晰理论可以做到什么。如果苏联同样清楚他们希望通过计划的计算机化达到怎样的目的，那么即使一开始不能建立起所有他们希望的，也会在新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出现的时候处于开拓创新的位置。实际上，似乎苏联经济学家——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领导层的消息——对我们所讨论的算法和计算机系统并不感兴趣。到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明显对高效计划的潜力失去了信心，很多人见风使舵地加入了复活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行列。

6 捍卫直接民主制

通过计划获取剩余的过程潜在地具有矛盾性。这一过程可以导致阶级对抗，使国家精英和工人阶级相对立。这些阶级之间斗争的过程具有复杂动力学（complex dynamics）的特征，其中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虽然国家精英倾向于腐败和公共资源私用，却只能把剩余的一小部分用于个人消费。这与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国家中，大量剩余最后用于上层阶级的个人消费。国家精英只有靠其占据国家公职，才有机会消费公共资源。而在一个公开宣传平等主义的国家里，他们的私人消费天然是不体面的，是不合理的，除非他们具有爱国者和老革命家经历。当革命家的一代逝去之后，他们的继承人们望着资本主义国家，内心充满了渴望。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像他们这样的人，不仅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且奢侈是正当的，并不丢人。

政治——无论是“苏维埃政权”、暴政、共产党的独裁，还是大众的革命热情——约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坦率地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阶级未能提出一种可以足以长期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一贯是革

命专制或者革命贵族制。只要最初的英雄-国王活着，专制就能运转下去。就像卡斯特罗所证明的，这可以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这种事总是后无来者。革命贵族制或者“共产党主导地位”不依赖于个人生死，因此能存活更长时间。列宁主义政党的统治起初是被压迫者中最自觉最有自我献身精神的代表的统治，但由于贵族政治衰落的铁律，这种政治最终把自己变成自私自利的寡头制。

为了与这些形式做斗争，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出了两种替代选择。

1. 右翼的社会民主党鼓吹常规化的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光荣的始终如一的立场，可以追溯到考茨基对新生的苏联的批评。他们提倡自由公开的议会选举，而不是社会主义君主制或者党独裁。

2. 极左翼则主张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代表按区选举，可以被他的选民罢免，而且只领工人的平均工资。

我们相信，有充分的理智和经验的理由拒绝这两种替代选择，而支持直接民主制。

通过定期选举获得合法性的代议制政府，被当做“民主制”呈献给现代世界。我们不这么看。我们和列宁一样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富人统治的最完美的形式。我们认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选举制随时随地都带着贵族制而不是民主制的印记。经验也教会我们，被选进议会的那些人总是不代表那些选他们的人。无论看哪个指标——阶级、性别、财富或者教育——这些被选举人总是比投票选举他们的人享有更多特权。

所以我们毫不惊讶自由和平等的选举制度在东欧导致资产阶级政权在顷刻间建立起来。匈牙利新政府解除工厂民兵武装，就是象征性的标志。苏联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人们对共产主义候选人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偏爱意味着，叶利钦对苏联共产党的禁止以及随后使用坦克把俄国杜马夷为平地，是通向“民主”的必经之路。

那些鼓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进行公开议会选举的人主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自觉的拥护者。他们吸引了一些幼稚的社会民主派。与之相反，那些提倡公社式国家的人，则是希望改革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唯一的问题是，斯大林早已在他们之前实现这种制度了。苏联的斯大林宪法已经是公社国家为典范：它是委员会国家，人民代表是选举的，而且可以被撤换。当然，这个宪政形式只是共产党统治的面具罢了。为什么列宁也如此推崇公社式国家呢？

正如列宁把代议制共和国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理想形式，他把委员会国家，苏维埃共和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形式。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重生的布朗基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政党。正如布朗基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对巴黎公社的主导是公社争取政权的关键一样，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主导也是有效的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条件。在大多数革命危机中，原始的委员会—国家都会抛弃了。近期欧洲最好的例子是 1975 年的葡萄牙。委员会—国家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必须尽快解决，要么赞成议会，要么赞成委员会。如果革命政党主导了委员会，并且出现军事政变，那就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政变或者没有革命政党的主导，议会就会胜出。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上海左派尝试过左派关于用委员会国家对付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贵族制的提议。就我们所知，这是唯一的一次尝试。尽管社会主义贵族制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动摇，但这次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文化革命中建立的革委会最终仍然是被共产党所主导，正如俄国苏维埃一样。我们认为，在共产党地位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草根代议机构要么被共产党主导，要么被反革命代表主导。这是不可避免的。绝大多数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在共产党内，而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纪律性会使得他们能够轻易主导草根组织。在这些草根组织中，主要的倾向都是亲社会主义的。而在草根组织变得一贯反对共产党时，它们往往也是知识界中亲资本主义的部分以及中产阶级所主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那些倡导用理想的委员会国家反对实际的苏维埃国家的人，是在尝试占据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政治基础：委员会国家要存在，就必须废除共产党。托洛茨基在喀琅施塔得就明智地看到了可能引发的后果。而在七十年之后，他的那些自称是他追随者的人，却没有了这种意识，竟然欢呼叶利钦对苏联共产党的镇压。

为了向前进，就得承认选举机构是民主制的说法是空洞的。无论这个机构把自己叫做议会还是委员会，这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成员是通过选举决定的，代表们就一定不能代表选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商人和专家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革命贵族和党）在选举机构中安插了亲信。我们相信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直接民主制。

7 社会主义 vs 共产主义

我们书取名叫做《走向新社会主义》，但是它实质上是对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的详细说明。书名用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是为了适应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本书的英文版出现时，社会主义正值最低谷。自那十年之后，新自由主义的进程变慢了。国际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正在形成，虽然还不是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替代资本主义的条理清晰的方案的读者群体将会增长，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 1990 年代初期，要找

到愿意印刷倡导社会主义的书籍的出版商是很困难的。我们认为，稍微公开鼓吹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出版或者读者将会锐减。我们的共产主义的狼披了一张社会主义的羊皮。但是，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义务解释一下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再重复一遍，我们在本书中所倡导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为社会主义。苏联正统观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步建立生产力，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

苏共和西方的托派政党在思考共产主义的时候，都有相同的问题。共产主义被看做是社会之后的阶段。他们断言这一阶段的基础是物质极大丰富，那时消费品将会免费分配。在这里，发展顺序被看成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这跟马克思提出的公式是不同。马克思的公式是：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同于社会主义，把他们都看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义词。所有基于列宁主义的传统都接受了这一公式。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过度简化了马克思的表述。

被定义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等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为后者意味着货币的消灭以及采用劳动时间的经济计算活动。列宁定义的社会主义与货币的继续存在能够相容。苏联在集体化之后，就是列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但货币还存在着，工资和商品形式也继续存在。这一货币的延续不是被看做是持续 5 年或者 10 年的短期现象，而是某种要延续几十年的事物。事实上，货币也的确也存在于了半个世纪。列宁的表述方式的结果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独特特征不可见了。经济计算和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观念消失了。而没有这一观念，任何实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纲领性理念都无法作为确定的任务予以实施。

应该清楚一点，采用货币形式付酬会导致小时工资悬殊。人们的收入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地呈现为“按劳分配”，虽然劳动的质量有差异。尽管这些经济中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形式比如利息、租金或者分红，但是把差异很大的货币工资被称作“按劳分配”的观念，就正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把工资、价格和利润等价为“生产要素”收入的想法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虚构。

列宁主义观点中的共产主义还剩下马克思的第二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通过免费发放或者补贴消费品，最终发展到所有的分配都是免费和不受限制的，被看作是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

我们强烈反对这种观念。我们认为这一观念是基于对按需分配的错误理解，有很恶劣

的后果。

1, 当它与劳动的货币付酬结合起来, 会建立一种会系统性地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计算制度。

2, 它让共产主义成为一个永远在后撤的幻象, 因为无论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 总是不足以免费分配所有产品。

按需分配跟不受限制的免费分配不是一回事。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中, 如果有需要, 医疗就是免费的。^[1]但是这种免费分配能行得通, 是因为有医生对需要的相对客观的评估, 以及与之结合的候诊名单(加上私有化的因素)。这跟说免费分配比如说免费分配衣服是不同的, 它意味着“按需分配”。如果消费品一般而言都是免费分配, 那就会要么导致挥霍浪费, 如果减少浪费, 则会造成消费方面军营式的统一。

马克思没谈免费分配, 他说的是“按需分配”。这与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模式更一致。福利国家为残疾人、学生和大家庭等等提供补贴。按劳分配以某种社会地评估需要的流程为先决条件。在这方面, 福利国家预示了共产主义, 但是它是在存在着很大收入差异的货币经济中实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差距在今天比在马克思的时代小得多了, 因为马克思那时候尚不存在福利国家。在加拿大和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按需分配的原则已经在一些经济部门中被接受了, 其中许多都会延续到共产主义社会。有特殊需要的人会被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免费的特定产品和服务, 或者会给他们额外的劳动时间, 让他们从社会商店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8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

在这一节里, 我们简略介绍一下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 指出当时的论点和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表达的看法的某些关系。对这场历史性论战的完整讨论可以参见科克肖特和科特尔 1993 年的论文《计算、复杂性与计划——再谈社会主义核算论战》。在这里, 我们将专注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介入, 兰格(Oskar Lange)的回应, 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进一步的回应。

1920 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获胜, 共产主义幽灵再次徘徊在欧洲, 米塞斯随即发表了他的经典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他的观点令人震撼, 如果它能够成立, 显然会摧毁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

^[1] 对医院外面医疗处方收费除外。这些费用按与配药的商品价值无关的固定价格收取。

货币，但是米塞斯认为“我们每离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使用一步，就意味着离开了理性经济学一步”（Mises, 1935: 10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经济必然“陷入黑暗中的摸索”，生产出“一架盲目的机器的荒谬产品”（p. 106）。马克思主义者把理性计划与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对立起来，但是米塞斯认为这种观点全部站不住脚；废除市场关系只会摧毁经济核算的普遍基础，即市场价格。无论社会主义计划者本意有多么好，他们完全缺乏作出明智经济决策的任何基础：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对理性经济的废除”。

米塞斯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呢？首先，他阐明了经济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次，他详尽列出了理性经济决策所有可能的方法；然后他要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法运用这些方法。

在考虑经济理性的性质时，米塞斯想到的显然是在既定经济资源的基础上生产最大可能的效用（满足需求）问题。换言之，问题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如何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使生产一定量的效用的成本最小。米塞斯在批评社会主义时反复采用后一种表述方式，列举了修铁路和建房子的例子^[1]：社会主义计划者怎么能计算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小成本方法呢？

关于理性决策的手段，米塞斯指出了三种可能：实物计划（以实物为度量单位）；利用与市场价格和货币无关的“在客观上可认知的价值单位”（如劳动时间）的计划；基于市场价格的经济核算。让我们依次分析这三种可能性。

8.1 实物计划

我们暂且假定，问题是如何配置给定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涉及某种“价值判断”（即对效用的评价）。对于最终消费品（米塞斯称为“下游商品”）能够直接做出判断，不需要实际的经济核算：“通常人们了解自己的思想，能够评价下游商品”（Mises, 1935: 96）。在非常简单的经济系统中，这种直接评价可以扩展到生产资料：

对于孤立经济中的农民，在扩大牧业与发展狩猎活动之间做出选择并不难。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生产过程相对较短，很容易算出发生的成本和收益（1935: 96）。

他又说：

比如，在家长能够监督全部经济管理的范围狭小的家庭经济中，不必借助智力

^[1] 铁路的例子见 Mises, 1935: 108。建房的例子见 Human Action (Mises, 1949: 694)。请注意，米塞斯在《人类行为》和《社会主义》（Mises, 1951）中对社会主义核算的讨论与 Mises (1935) 基本一样，这些著述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其中许多内容。

工具（如货币核算），就能大致正确地确定改变生产过程的意义（1935: 102）。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谈论实物计划，不必依赖货币（或劳动时间）之类的会计单位。关键在于“苹果和桔子”能够在主观使用价值层面上进行比较，如果生产资料配置与特定使用价值生产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这对于实现效率就足够了。

实物计划受到生产过程复杂程度的限制。到了一定限度，便不可能对各种关联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全面的评价；超过这个限度，合理配置资源就需要使用能表示成本和收益的客观“单位”。在我们看来很有意义的是，米塞斯在论证复杂系统不可能采用实物计划时，明显是基于人脑的能力：

单独一个人的头脑决不会如此聪明，它非常弱小，无法知晓无数上游商品中任何一种商品的重要性。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掌握生产的全部可能性，谁都不可能不借助于某种核算系统，对这些数不胜数的可能性做出直截了当的价值判断（1935: 102，着重字体原有）。

除了人脑之外，还可能采用别的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实物计划吗？本书赞成计划的主要论证涉及到把劳动时间作为会计单位（因此不属于纯粹的实物计划），但是我们愿意指出，人工智能的某些进展，特别是近来的神经网络研究，也许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解决。^[1]

米塞斯其实是要证明，复杂系统的最优化必然涉及核算方法，其表现形式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功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典型事例是利润）的明确最大化。但是，算术计算可以被看作更一般的计算或模拟的具体事例。控制系统需要的是计算能力，无论该系统是在市场上经营的企业、计划部门、飞行器自动驾驶仪，还是蝴蝶的神经系统；这未必意味着要用算术方法进行计算。关键在于控制系统能够为受控系统要素建立模型。企业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原料控制和会计核算，用簿记标记为商品配置和流动建立起模型。在建立这些标记时遵循算术规则；算术对这个问题的适用性，取决于量化理论可以成为商品属性的模型。

我们再考虑一个神经控制系统的例子。飞行中的蝴蝶必须控制它的胸部肌肉，以便飞向可能带来能量的目标，如水果或花。在这一过程中，蝴蝶必须计算，在许多可能的翅膀运动中，哪一些运动可能让它更接近花蜜。肌肉运动的不同结果具有不同的能量消耗成本，也带来不同的花蜜收益。蝴蝶神经系统的任务是，使用非算术的计算方法使成本和收益最优化。蝴蝶的持续生存证明了它高超的计算效率。看来神经网络能够产生最优（或至少是

^[1] 神经网络理论的最近成果，又称平行分布过程理论，是 Rumelhart et al.（1986）提出的。Narayanan（1990）对有关问题作了有益的总结。

高效率的)行为,即使面对极其复杂的约束时也是如此,而不需把问题简化为单一标量的最大化(或最小化)。

计划部门可以广泛地使用算术,并且事实上,如果是用算术方法做出资源最优使用的局部决策,那么米塞斯关于要把不同产品转换为某种共同的度量单位以进行核算的论证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想让整个经济实现全面的最优化,与神经系统运行方式大致相同的其他计算技术也许更加合适,并且在原则上不借助算术也可以完成。

当然,苛责米塞斯没有考虑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未免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这是他写作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纽拉特(Neurath)和鲍威尔(Bauer)等人在1919年基于战争经验提出的实物计划建议在和平时代大有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1]但是对于当代批评社会主义的人却可以公正地说,他们不该不加批判地重复这种对实物计划的批判,因为这种批判是在尚未对计算的性质形成科学的理解之前作出的^[2]。

8.2 使用劳动价值

在否定实物计划的可能性之后,米塞斯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者有无可能在经济核算中使用“客观可认知的价值单位”(Mises, 1935:116),即某种可计量的商品属性。米塞斯认为,唯一可以考虑的这样一个单位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的劳动量。(从现代的形式化数学角度来看,把劳动挑选出来担当这一角色似乎带有随意性。直接或间接进入所有其他商品生产过程的任何要素商品不是也可以作为这种价值基础吗?Farjoun and Machover 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讨论,有效捍卫了劳动作为价值基础的选择。——科克肖特1993年论文注释)但米塞斯最终否定了劳动可以作为价值单位;他提出了两条相关论证,都是为了证明劳动量不是计算生产成本的适当方式。

首先,米塞斯宣称,采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价值忽视了使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成本。其次,他认为劳动不是同质的。他说,把技能和紧张度不同的劳动时间加在一起,具有误导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提供了一组工资率,这使得不同质量的劳动可以通约,但是在社会主义中,由于没有劳动力市场,就没有理性的可以通约的办法。

米塞斯这几个论点构成了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进行论证的部分背景。我们在本

^[1] 参见 Hayek (1935: 30-31)。米塞斯在该书 108 页提到了纽纳特。他们针对的是纽纳斯和鲍威尔的著作(分别为 *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 和 *Der Weg zum Sozialismus*, 皆出版于 1919 年),这些书没有英译本。

^[2] Cockshott (1990) 借助于神经网络文献中的“模仿强化”(simulated annealing) 观点,提出了在特定生产资料存货约束下平衡经济计划的具体建议。他的建议事实上涉及算术的使用——本质上是关于理想最终产出向量的损耗函数的最小化——但是指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经济计划任务的方法。

书第五章和第十四章就自然资源的问题做了回应。我们在第二章讨论了劳动质量的问题，该章的附录表明了，可以如何通过“复杂劳动乘数”的计算来解决米塞斯的问题。

有必要指出，米塞斯对劳动价值的批评是非常简略的。在米塞斯 1935 年的论文中，基本论证只占了两页左右的篇幅，1951 年的著作又重复了这一论证。在《人类行为》(Mises, 1949) 一书中，这一话题减化成了两句话。这无疑反映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强调计划就是对劳动时间的配置，但是到了米塞斯写作的年代，这种思想基本上已被西方社会主义者抛弃。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一问题。

8.3 使用市场价格

在讨论市场价格时，米塞斯旨在证明两点：市场价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理性核算的充足手段；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市场价格。

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显然能够提供核算的基础。参照价格，企业能够决定成本最小的技术，也能基于赢利性决定生产不同的产品。我们认为不必反驳米塞斯的价格制度可以理性而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甚至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他们批评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价格机制可以（不完美地，但比随意要好）按需求调节商品供求，迫使资源向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方法汇集。我们准备声称生产的货币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与有效满足人类需求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两个标准并不像米塞斯所认为的那样有着严格的一致性。请看下面这段话：

想对复杂生产过程进行核算的人立刻就会注意到自己能否比其他人更节省地经营；如果他发现，参照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不能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这就表明其他人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相关的上游商品 (Mises, 1935: 97-98)。

米塞斯说，那个人可以“立刻注意到”自己能否比其他人更有利润地经营，但他没有证明这里隐含的断言：最有利可图的就是最“经济的”或“更好的”。^[1]当然，资本家生产没人要的商品或者采用不合理的无效率技术进行生产，是不能获利的，但这不足以支持米塞斯的观点。不顾一切地使用当前便宜、最终会耗尽的自然资源，不是也可以降低生产的货币成本吗？如果生产豪华汽车比建造简单住宅更有利润，这就证明豪华汽车代表了资源的更好用途吗？

社会主义者通常强调，追求利润并不等于满足需求，这涉及资本主义的收入不平等问

^[1] 这种断言在《社会主义》一书中非常明显：“让生产以利润为导向就是让生产以满足他人需求为导向。……在为利润而生产与为满足需要而生产之间没有对立” (Mises, 1951: 143)。

题。米塞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很有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这种说法本身就具有误导性，因为“收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而市场交易与生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Mises, 1951: 151）。^[1]并不存在“先”生产产品然后再“分配”产品的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谈论“收入分配”，它是与生产计划相分离的政治决定。但是，要采纳米塞斯的观点——购买力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生产系统的内生要素——就必然要承认，赢利性的商品生产不受“人类需求的最大满足”的支配，除非我们认为人类需求本身是产生于它同货币收入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

下面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无法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核算手段。米塞斯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存在消费品市场，从而也存在市场价格，但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及其市场价格。米塞斯写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完全是公有的；它是该社会不可分割的财产，因此是不可交易的”（Mises, 1935:91）。并且，“因为生产资料不会成为交换对象，所以不可能确定其货币价值”（p. 92）。对于米塞斯来说，有意义的价格必然是独立产权所有者之间真实的市场交易的结果。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产生于所有交换参与者的主观评价的相互作用”（p. 97）；只有这样，交换价值才“可以决定商品的恰当用途”（p. 97）。我们同意米塞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存在“决定商品的恰当用途”的其他手段，但我们接受米塞斯的价格概念：价格是财产所有者愿意放弃或获得商品的条件。然而，兰格认为米塞斯恰恰在这一点上非常脆弱，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米塞斯的攻击。

8.4 兰格与新古典社会主义

兰格说，“‘价格’这一术语有两个含义”。它可以表示通常意义上的价格，即两种商品的市场交换比率；它也可以表示一般化的含义，即‘替代品被提供的条件。’……只有一般化意义上的价格对于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才是不可或缺的”（Lange, 1938: 59-60）。兰格在捍卫社会主义时采用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这种一般化意义上运行价格制度，在某些方面模拟市场系统的运行，而不需要实际的生产资料市场。兰格的立场众所周知，这里无需赘述；我们只概括其要点以便与本文的设想进行对比，并为奥地利人的反驳提供背景，这种反驳与我们的设想有一定关系。

兰格从瓦尔拉一般均衡原理着手，他强调说，竞争性经济的均衡价值向量得到确定的条件是，它使所有商品的供求达到平衡，只要

^[1] 这与马克思的如下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收入分配受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参见 Marx, 1974: 348）的支配。按两人的观点，论证都会导致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收入再分配的激进方案的蔑视态度。

- (1) 经济主体把价格当作参数；
- (2) 经济主体根据这些价格以确定的方式进行最优化。

给定 (1) 和 (2)，那么，每一个价格向量都对应于一个明确的、全部商品的超额需求/供给结构，并且只有一个价格向量对应于超额需求的零向量。^[1]兰格认为，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利用这一原则。这需要计划当局确定所有生产资料的“会计价格 (accounting prices)”，向企业经理发布某些指令：把会计价格当作参数；在给定价格下选择平均生产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要素组合；确定可以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出价格的产量。同时，所有产业的经理都要遵循后一条规则，“在决定一个产业应该扩张（通过建立新工厂和扩大旧工厂）还是收缩时，把它当作一个指导原则”（Lange, 1938: 76-77）。同时，消费者和劳动者基于他们面对的参数价格和工资率，分别做出需求决策和劳动力供给决策。

当然，不能保证任何给定的会计价格向量下的决策都是相互协调的。在不协调的情况下，计划当局就要充当瓦尔拉“拍卖人”角色，提高超额需求商品的会计价格，降低超额供给商品的会计价格。^[2]在多次重复之后，就会形成社会主义一般均衡。这个“解”无疑具有创造性，而且我们不难看出它的策略优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既然认为瓦尔拉理论充分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以他们似乎也必须接受兰格社会主义的有效性，虽然会有细节上的修正。

8.5 奥地利学派的反驳

我们对照以上对兰格的简要介绍，来考察奥地利学派批评者的一些反驳。我们分析三个主要观点：兰格的设想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打了折扣；兰格理论的静态性；激励问题。

米塞斯（1949：701-702）认为，根据传统定义，社会主义必然“完全废除市场和交换竞争。”社会主义的所谓优越性，正取决于计划概念内在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

因此，社会主义的思想领袖们如今忙于设计方案，意味着他们完全承认经济学家分析的正确性和不可辩驳性，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毁灭性批判……他们在这些方案中保留了生产要素市场、市场价格和交换竞争（Mises, 1949: 701-702）。

米塞斯没有点名提到兰格，但是兰格的方案显然是他的攻击目标。我们承认，后来的许多“市场社会主义”文献对社会主义作了折中，但还是可以为兰格做出几点辩护。首先，

^[1] 兰格知道在某些条件下会有多个解和均衡稳定性的问题，但他假定唯一的、稳定的一般均衡是标准状态。

^[2] 这里引用的是里昂·瓦尔拉斯。他在 1874 年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引入了全经济范围的拍卖人的理论虚构。

兰格强调，在他的系统中收入分配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第二，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者将考虑私人企业所忽视的外部成本和收益（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考虑）。第三，尽管兰格的系统在某些方面模拟竞争性经济，但他指出，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寡头和垄断普遍存在”（Lange, 1938: 107），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第四，兰格在论及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附录中，坚持认为商品“免费分享”的古典社会主义设想（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决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是经济谬论”（p. 139）。在技术发达的经济中，某些商品可以达到饱和点（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价格变得如此之低，使需求“完全失去弹性”）。兰格谈到了消费的“社会化部分”；最初这一部分主要包括“集体需求”，但是他接着说：“可以想象，这一部分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越来越多的商品以免费分享的方式进行分配，最后所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用这种方式供应，只有高质量产品和奢侈品才通过价格系统进行分配”（Lange, 1938: 141）。最后，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兰格那篇回顾自己三十年前观点的论文（Lange, 1967）。他认为自己最初的市场模拟建议只是求解联立方程式系统（即一般均衡方程）的初级手段。他说，既然有了电子计算机，为何不直接解这些方程式呢？“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试错法似乎过时了。事实上，市场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前电子时代的计算设备”（1967: 158）。这样看来，把兰格思想称作“新古典社会主义”比称作“市场社会主义”更加恰当：显然，他所设想的市场——甚至他1938年所说的人工市场——不过是实现某种最优化的可能手段。

奥地利人对兰格的第二项反驳涉及兰格解的静态性。拉瓦伊（1985，第4、5章）坚持认为，兰格回答的是米塞斯认为不重要的问题，而完全没有回答困难的动态问题。兰格无疑采用了静态均衡理论，不过其方法至少是相对静态的，他确实具体说明了一种调整机制，认为它会随着参数变化而趋向于形成一般均衡。再者，米塞斯虽然否认经济核算是一个静态条件下的问题，但他考虑的其实也是静态现象，“经济生活中同样的事情总是反复发生”（Mises, 1935: 109）。无论兰格系统存在什么问题，都很难认为他事先已被米塞斯驳倒。

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后来又被拉瓦伊所强调的更有力的观点，涉及随参数变化做出调整的速度。例如，哈耶克指出真实世界“总是不断变化”，并宣称“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接近于理想均衡，完全依赖于调整的速度”（Hayek, 1949: 188）。哈耶克接着论证说，中央指定的价格不能像真实市场价格那样对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超出了对兰格具体观点的评价。一般说来，如果相对于消费者需求和技术变化的速

度，社会主义计划所需的核算费时太长，计划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将在本文 4.2 部分提出论证，利用现代计算技术，可以足够快地完成有关核算。

也许我们应该就这一问题多说几句。拉瓦伊批评兰格系统的“静态”本质使其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是他复兴奥地利学派观点的核心依据，尽管我们以下提出的积极设想根本不同于兰格，但也很容易招致同样的批评。我们不想被指责再次忽视了这一点。与我们的观点密切相关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者不可能置身于静态经济之外，拥有他们所需的关于生产可能性的全面而及时的信息。假如他们的观点的论据是通信和数据储存能力的限制，那么它就完全过时了。然而，这些观点还有进一步的论据吗？拉瓦伊认为，问题与其说在于信息的搜集，不如说在于相关信息的创造。诚然，如果技术和消费需求随时间而变化，那么我们未必总是（甚至大体上）知道实现任何既定目标的最好方法。试验是必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从事这类试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执行着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但是，只有资本主义企业家才能够执行这种职能，在我们看来是站不住脚的。^[1] 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立“创新预算”，把适当比例的社会劳动时间分配给试验新工艺和新产品。具有新思想的现有企业和社团都可以申请这一预算。预算的分配可以在两个或更多的同级机构之间进行划分，以便有前景的创新者有多次机会使自己的新想法获得资助（从而减小管理“僵化”的风险）。试验有了结果后，成功的新产品可以纳入常规计划，成功的技术可以被“登记”为经济的正常投入产出结构的基本要素。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第六章和第九章。

奥地利学派对兰格的第三条反驳涉及激励问题，这与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有关。兰格让他的社会主义经理遵循某些规则，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米塞斯反驳道，把社会主义经理等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领薪经理貌似有理，但整个论证忽视了资本家本人的关键角色，这种角色是领薪经理无法模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调整要求：

资本从特定生产线、特定企业和特定关系中撤出，用于其他生产线……这不是股份公司经理的事务，这在本质上是资本家——买卖股票和股份、放款和收款，……投机于各种商品的资本家——的事务（Mises, 1951: 139）。

米塞斯进一步认为，“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投机者从事商业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激励，要维护自己的财产、通过赢利使其增值或至

^[1] 动态经济必须不断寻找新方法和新产品，因而“生产函数”信息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正确的观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著述中逐渐变成了一种可称为“企业家神秘主义”的观点——一种激进的主观主义，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科学依据。

少不使其贬值” (Mises, 1951: 141)。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一论证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在一个层面上，米塞斯是要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制度没有资本家就不能运行。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如前文所述，准确地说兰格系统并不能称作“市场社会主义”。那么，米塞斯也许是要说，重大投资决策，解散或扩大企业的决策，等等，不能简化为遵循简单规则。这也是对的，并且也许击中了兰格的要害。但是，**如果米塞斯说的是，像尽职尽责地决策、在风险中运筹帷幄这样的职能，只能由受到未来巨额个人财富（在成功的情况下）或个人财务破产（在失败的情况下）激励的人来执行，那么我们不敢苟同。**

9 为什么采用劳动时间？

1992 年，在洛桑帕累托研究所一次由瓦茨拉夫·克劳斯建议召开的会议上，我们是在唯一在捍卫计划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人们把我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使用批评为“自然主义”。他们认为，说劳动是价值的基础跟说石油是价值的基础，意义都差不多。我们最近十年的研究计划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重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有效性。现在，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劳动价值论，对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1]

这一次，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劳动价值这一范畴是否合理。我们不应该把价值以及“抽象劳动”看做是某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吗？第二，马克思不是对“劳动货币”的想法做过严厉的批评吗？我们提出的东西不正是马克思所攻击的吗？

9.1 价值和抽象劳动

关于第一个问题，认为劳动价值的概念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观念一开始是有吸引力的。人们不想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把工资和资本等短暂的历史性的形式看做是所有经济永恒的特征。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消灭，价值自身不会消失？

我们认为这种观念混淆了超历史范畴和他们的历史表现形式。劳动工具是超历史范畴；资本是历史的特定的范畴，劳动工具通过这一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把抽象人类劳动看做是与之相似的超历史范畴。人类劳动的适应性是把人和动物区别之所在。不像蚂蚁或者蜜蜂，我们不是为某个任务而生；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自己的角色，可以学着从一个角色换到另一个角色。正是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的多态 (polymorphous) 的潜能使得人类社会成为可能。

^[1] 参见 See Ochoa (1989), Petrovic (1987), Shaikh(1984), Valle Baeza (1994), Cockshott and Cottrell (1997), Cockshott, Cottrell and Michaelson (1995), Cockshott and Cottrell (2003)。

所有社会都受到每日的小时数和人口规模的限制。他们的差别在于，从非分化的婴儿到完成具体职能的生产性活动者的人类个体所使用的工具。在种姓社会里，每个个体的抽象劳动潜能可能不能实现，但这个潜能是有的。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印度各种姓以外的、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最底层的一部分人，也称作贱民。——译者注）婴儿和婆罗门的婴儿之间，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基因上的差别，但社会习俗的固有属性可能使得在这种社会的行动者（actors）们看来，这样的差别是存在的。

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允许任何人被雇佣做任何工作，只要他们经过训练后干得下来。资本主义比之前的生产方式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人类劳动的抽象多态性（polymorphism）。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基于肤色、宗教和性别的歧视，但这些歧视是与构成基础的劳动流动性原则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是减少这样的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劳动的抽象流动性被阶级划分所阻碍。这种阶级划分限制了工人阶级家庭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但是，社会主义要废除的，正是剩下的这些对抽象劳动的限制，好让所有孩子都能有同样的机会选择职位。这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特征：它将人类平等的抽象性变成社会现实。

9.2 马克思和对“劳动货币”的批评

我们犯了提出某种马克思攻击过的“劳动货币”计划的错误吗？简单回答：并没有。但是，从考茨基到反共经济史学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等著作家都误读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劳动—货币计划的批评。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尝试纠正这一错误。

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中最基本的反对对象，是一种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幼稚的社会主义的挪用。这些改革家主张，要是我们能够实行使所有的商品按照其中的物化劳动交换的条件，那么剥削当然就不再可能的。因此这一计划从英格兰的约翰·格雷（John Gray），经过一系列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到法国的普鲁东，再到德国的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Rodbertus），都支持强制实行按照劳动价值的交换。^[1]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计划虽然就其宣传者的目的而言是值得尊重的，却代表了一种想把世界时钟往回拨，回到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简单商品生产和交

^[1]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对普鲁东计划作了批判，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中讨论了约翰·格雷，而恩格斯在1884年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第一个德文版的序言中，攻击了洛贝尔图斯的变种。在马克思1847年的著作和恩格斯1884年的著作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这种提议的一致批判思路。

换的乌托邦的甚至是反动的尝试。

劳动货币的乌托邦主义者没有认识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剥削通过商品交换发生。商品按照劳动价值相交换，而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劳动量所决定的。第二，虽然劳动量支配着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间的长期均衡交换比率，但是市场体制下，生产持续不断地调整以符合变化的需求，而且技术也在不断改变，所借以实现的机制依赖于市场价格与长期均衡价值的背离。这种背离产生了不同的利润率，然后再反过来引导资本进入供给不足的生产分支，并把资本推出供给过剩的生产分支，正如斯密和李嘉图所分析过的那样。如果下令强行排除这种背离，市场价格的信号机制由此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就会出现混乱，到处都是某种商品的短缺或者过剩。^[1]

在马克思的批评中重复出现的一点是：按照劳动价值论，决定均衡价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自然（raw）”劳动量。（马克思，1963，pp. 20 - 21, 66, 204 - 5）但是在商品生产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出现。劳动一开始都是“私人的”（在独立的企业中进行），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被确认或者构建为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必要性有两个维度。首先，我们指的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生产的技术条件。低效率或者懒惰的生产者，或者那些使用过时技术的生产者，不能够按照他们的实际劳动投入实现市场价格，但只能实现较少的被定义为“必要”的量（至于是平均生产率还是最佳实践的技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严格地一致）。其次，还有一种意义是，社会必要劳动对应于普遍的需求结构。如果某种商品相对于需求生产过多，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劳动量实现价格——甚至它是用平均甚至更好的技术效率来生产的。劳动货币的支持者想要绕过这个过程，假装似乎所有劳动都立即是社会的。在商品生产社会里，这是不能实现的，实行了其结果也只会是灾难性的。

现在，马克思给劳动—货币社会主义者灌输的东西，即关于供求机制的魅力和按照实际劳动量任意固定价格的愚蠢，颇讨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喜欢。比如，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就称赞恩格斯在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中承认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哈奇森写到，“米塞斯和哈耶克都不能更有力地指出这一点”。但是，哈奇森的赞扬不过是他抨击恩格斯的前奏。他痛斥恩格斯没有认识到，同样的批评拆了恩格斯和马克思自己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台。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定义马克思关于劳动货币的批评的界限。

这场争论历史更重要的是，似乎考茨基也阅读了对劳动货币的相关批评，对马克思使

^[1] 要确立这些论点，没必要直接引用。参见 马克思（1963，pp. 17 - 20, 60 - 61, 66 - 9, 203 - 6）

用劳动量进行直接经济计算的目标提出质疑，以至于在 1920 年代，这位在西方被广泛地视为马克思的遗产权威守护者的人物，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中心信条。^[1]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米塞斯可以三言两语就把采用劳动价值的计划给摒弃了。

通过我们上面关于对劳动货币批评的论述，这一批评的界限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拒绝的，是在商品经济也就是生产是私人的条件下按照劳动量固定价格的想法。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处于公共控制的经济中，劳动在从它属于预先建立起来的中央计划的意义上，变成“直接社会的”。在这里，产品劳动量的计算是计划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按照不断改变的社会需要和优先级对资源的重组，在这里也不是通过逐利的公司对价格和长期均衡价值的偏离所做的回应来进行，所以，对劳动货币的批评根本不相干。这正是马克思建议通过“劳动券”进行消费品分配的语境。

这一建议的最完整形式出现在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 1975 年《哥达纲领》的批判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首先，马克思反对那种每个工人应该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分配总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补偿折旧、积累生产工具、社会保险、社会管理、需要的公共满足（学校、医疗服务等等），以及为了满足那些不能劳动者的需要。尽管如此，总劳动产品中有一份还是要作为工人消费资料进行分配。关于这一分配的性质，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发展中的两个阶段。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时，就有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现著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设想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其中个人——在做上面所提到的扣除之后——拿回他给予社会的。

他所给予的，是他个人劳动的量。比如，社会工作时间由个人劳动小数数之和构成。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因此构成了他对社会工作日的贡献，他在其中所在的份额。社会给他一个凭证，说这就是你所做这么多工作的量（在减去为公共基金所做的工作之后）。他拿着这个凭证，就能够从社会消费资料供给中取出代表等量劳动耗费那么多的消费资料。（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1] 考茨基在《社会革命》（1902 年）一书中，提供了关于“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简要而且含混的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论点的陈述和对货币的“不可或缺性”的奇怪的不和谐评论结合在了一起。在他后来的著作《劳动革命》（1925 年）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被降为赞成货币和价格必要性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看起来应该归功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劳动货币批判”；它还利用了劳动量的测量是不切实际的观点——劳动量的测量“用能想到的最复杂的国家机器也无法实现”（《劳动革命》）。顺便说一句，考茨基以跟米塞斯和哈耶克同样的理由极度批判奥图·纽拉特（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实物计划”。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劳动券与货币是非常不同的。劳动券不能流通，只能与抵消对等量劳动内容消费品的购买。而且劳动券也只能用于购买消费品——不能用它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就不能作为资本发挥作用。

马克思的立场的逻辑是清晰的：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劳动货币”是乌托邦的和经济上无知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下，通过劳动券来分配消费品，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一个生产方式已经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计划体制的建立而改变自身的制度下，这是一种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可能的模式。而且，这种分配模式正是马克思自己所倡导的。

(未完成的乌托邦、黑夜里的牛 译)

导言

“社会主义已经试过了。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年之后，历史已经给了社会主义失败的判决。”对于这一人们广泛持有的观点，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仍想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有义务作出某种回应。本书就是我们的回应。不过，先辨明我们的观点和西方左派中有的一些观点之间的差别，也许会是有益的。

或许大多数社会主义想要说的是，他们追求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模式是有显著区别的。但这一断言的理由却可能各种各样。首先，我们要区别社会民主主义者和那些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前者可能认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将来之间并没有多少关系。这也许是事实。不过，在苏联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恰巧遭到猛烈攻击。在英国和美国尤甚，但并不限于这两个国家。但是，有人认为，这种联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逻辑上的必然：也就是说，哪怕苏联模式已经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钟摆”在西方又摆回向社会民主主义。然而，我们后面将会谈到，我们是有理由质疑这一观点的。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往往宣称苏联集团的失败不能说就对马克思主义不利，因为苏联体制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理想的实现，不如说是背叛。社会民主主义者说苏联社会主义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主义，而这些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却说苏联（也许是列宁之后的苏联）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可能赞同苏联体制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拒绝马克思主义；而理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忠于他们的理论，宣称理论尚未付诸实践。

我们的观点与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卖空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理想；它是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弊病不够彻底的解决方案。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相反，我们相信经典马克思的彻底的社会改造方案是很有价值的。另一方面，我们反对理想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企图以背离史实为代价，来保持社会主义理想的纯洁性。我们认为，苏联型社会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当然，它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宁的理想的实现，但在历史上有哪个社会曾是某种理想在世间的化

身呢？当我们把“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当做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来使用，以其特殊的生产方式来辨别其特殊的社会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一些人宣称苏联体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更一般地，把任何他们觉得应该有的特征都塞进社会主义的定义中。这种做法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1，苏联的确是社会主义的。

2，这一社会有许多不好和成问题的特征。

3，苏联社会的问题部分与布尔什维克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极端困难的历史环境相关，但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苏联犯了重大的政策错误（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有可能发生），此外，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严重缺陷。

4，因此，苏联体制的失败绝不是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无关。我们必须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并小心翼翼地对这些教训进行反思。

5，尽管如此，与那些兴高采烈地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溃败了的人不同，我们相信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显然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已经极大地被重新修订了——是可能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但其他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是可行的。

6，要维持这一论断，就当前所说的是不够的，只有靠在细节上更加详细地阐明那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种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才能做到。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本书中做的。

在导言中，我们会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不可行？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造成苏联社会弊病的错误政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陷是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复兴是可能且有益的，这种说法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很宏大，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回答；我们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线索，并之后的章节对其进行充实。

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是存在缺陷的？

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上一直代表着“混合经济”，它借助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来减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它还代表议会民主和公民自由。在社民党最成功的时

期，与资本不受约束的时期相比，的确成功地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仍是这类改良的最持久的纪念碑。尽管如此，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存在着非常重大的问题。

首先，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容易造成收入、财富和“生活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第一章有讨论），而社会民主主义对这些不平等的影响甚微，而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当中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只有个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彻底变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种——能提供消灭严重的不平等的现实前景。其次，“混合经济”有两个严重的问题。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混合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一直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成分的。更确切地说，商品和工资形式仍然分别是组织生产和劳动报酬的主要形式。“社会主义”政策必须由从资本主义部门中取得的赋税收入提供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提高“福利”标准和“免费”分配基本服务的机会，依赖于健康的资本主义部门和牢固的税基。只有当资本主义部门迅猛发展之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才能够“履行诺言”。这样，社会民主主义政府重塑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尝试进行彻底的再分配，就会有摧毁资本主义这棵摇钱树的危险，而这些政府最终是依赖于这棵摇钱树的。

联系前面提到的内容，如果混合经济是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混合的话，那么对社会主义部门运行原则进行定义的严肃尝试就太少了。这就使得整个混合经济的思想在计划经济解体的世界背景下显得非常脆弱。事实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可以这样批评：“如果计划经济正在其中心地带受到排斥，那我们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为体制的从属性因素……”目前西方社会民主主义者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计划的、非商品的生产形式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清楚如何衡量这种生产形式的效率。他们对于自己钟爱的“混合”的辩护，不是模糊的道德说教，就是苍白无力的辩解。

从这一点看，我们尝试定义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原则，可以说是为了提供在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中明显缺乏的社会主义纲领：甚至那些不同意我们所提倡的全面计划经济的人，也能够我们的论证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用以阐明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成分。

苏联在何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

在这里，我们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出发。在马克思看来，不同社会制度的最基本的区别特征是这一制度从直接生产者手里“榨取剩余产品”的方式。这里需要做一点解释。在这一理论中，“必要产品”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自身所需要的产品。必要产品表现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费品和消费性服务，以及维持社会生产资料正常运转所需的在工厂、设备和其他方面的投资。“剩余产品”则是指社会产出中用于维持非生产性社会成员生活的部分（非生产型社会成员组成复杂，从无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装部队，以及退休劳动群众等），加上为生产资料数量的增长而投资的部分。任何能够供养非生产性社会成员，或者能制定生产资料增长计划的社会，都必须有某种机制迫使或者引导直接生产者生产超过维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产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机制的本质，是理解社会整体——不仅仅是“经济”，还包括国家和政治的一般形式——的钥匙。我们认为，苏联体制实施了一种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榨取模式。我们需要陈述一些历史背景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虑一下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在封建制度下，剩余产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确的。具体的形态多种多样，但典型的方法是让农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几天，而其余时间在地主的地里劳动。或者，农民必须将自己地里的产品的一部分交给地主。如果这样的社会要再生产自身，直接劳动者必须被束缚在某种形式的主从关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这样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它鼓吹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并保证那些认真扮演了神分配给自己的角色的人将得到升入天堂的回报，那么这样的宗教意识形态会非常有利用价值。

而在资本主义下，剩余价值的榨取却以工资合同的形式变得“不可见”了。契约双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为每一方都带着自己的财产来到市场，进行自愿的交易。工厂里不会有铃声提醒工人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劳动时间的结束和为雇主生产利润的劳动时间的开始。虽然如此，工人的工资比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要少得多：这就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基础。剥削率的高低取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各种形式

的斗争：围绕工资水平的斗争，围绕生产速度和工作日的长度的斗争，以及关于决定生产给定量的工资品所需劳动时间的技术变革的斗争。

苏联社会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推行了一种新的非资本主义的剩余榨取模式。这一点有些模糊不清，因为工人的工资依然以卢布支取，而计划性产业中继续使用货币作为账目单位。然而，这些“货币”形式的社会内容已经彻底变了。在苏维埃计划之下，社会产品的必要份额和剩余份额的分配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中央计划机构把大部分产品和劳动力直接分配给企业，而中央计划机构始终会保证企业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这些分配给他们的实物产品。如果一个企业“亏”钱了，就必须给点“补贴”以保持资金平衡，这很容易。另一方面，拥有货币本身并不能保证能够买到实物产品。与前文相同，进入消费品生产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机构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获得更高的卢布工资，他仅靠这个也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消费者的消费不会对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影响。涨工资只能意味着商店里货品更高的价格或者货品短缺。在计划者分别分配资源到重工业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时候，剩余生产的比率就固定下来了。

在计划经济中，必要产品和剩余产品的分配是社会有意识地调控的结果，而笼统地说，苏联这种向计划经济的转换，也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期望。只不过马克思设想的这一“社会调控”政策的制定是彻底民主的，所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会在本质上成为合理的事。因为如果让人民做出决定，把这么多的共同劳动投入到净投资和赡养非生产者中，那人民就会愿意实施他们自己的决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苏联社会在推行计划经济的时候是远远算不上民主的。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引诱或者强迫工人去实施计划呢？（这一计划虽然应该是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确不是工人们的决定。）

我们知道，这些计划总体说来都实施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重工业基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的时期。这一基础在成功抵抗纳粹侵略的过程中受到了严苛的检验。我们也清楚斯大林时期的特点，那是一种奇特的混合：一方面是恐怖和强制劳动，另一方面是真挚的向前的激情。在一个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产品如何实现？从这一问题出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似乎不仅仅是“畸形”，而是构成体制所必须的特征。斯大林：一个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虽然缺乏口才却用决心和毅力弥补了这种不足，他既能激励人民参与到建设苏联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业中来，又能对那些没有参与到这事业中的人（及他周围的人）进行坚决彻底的冷

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义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核心所在。

从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中能学到些什么？

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危机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存在着对不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老式苏维埃政治实践的普遍厌恶，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苏联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代以来一直运行的基本经济机制已经过时，再继续保留这些机制会使得（前）苏联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且长期缺乏消费品的状况得不到改善。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持续的活力一相比较，人民就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的状况了。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随着苏联从斯大林时期进入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之前体制的恐怖与强制的缺点得到了改观。然而，在苏联早期建设和抵抗法西斯的过程中广泛激励过苏联人民的向前进的激情，却被腐蚀了。换句话说，（在计划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苏联模式榨取剩余产品的两个支柱都被侵蚀了。还应注意的，斯大林并不反对把巨大的工资差别作为刺激人民奋力劳动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迈向了更加平均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者当然可以为平均主义欢呼，但要是利己主义的金钱刺激被削弱了，社会就需要采用其他类型的激励方式——比如用共同奋斗的民主参与意识来激励。而就算不以更高的报酬作为好好工作的回报，那总得以发展和晋升机会作为回报（至少表面上是有回报的）。在勃涅日列夫时期腐败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这些激励方式几乎是完全缺失的。因此人民对工作越来越漠不关心。前一代人还懂得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在苏联实现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严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拥护的理想——而在勃涅日列夫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整代人却把苏联和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就像这一制度自己宣传的那样：如果他们憎恨苏联体制，那他们就是憎恨社会主义。

分析到此，似乎导向了有点模棱两可的结论。我们强调苏联的问题在于不民主的计划体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让苏联社会和经济起死回生。换句话说，如果用民主的计划取代不民主的计划，人民就会热情地支持的经济现代化，而这一现代化仍然是在计划的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框架之内的。当然，这种观点现在已经被近期俄国历史的残酷事实所证伪：苏联改革并没有在达到政策“透明化”

以后就停下来了，甚至在经济改革之后仍未停止，而是继续往前，显然无情地走向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完全毁灭，以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

对这段历史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有一种单纯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中央计划经济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高压一消失，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市场。民主不可避免地导致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拒绝。本书包含有一系列专门的论证来证明这种结论是没有根据的，换言之，一种高效率的富有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至少从大多数劳动者利益的立场上来看）也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我们如何解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苏联和其他地方被摈弃的现状呢？有两点至关重要。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特别指出过的，社会主义对于许多人来说，不过就是勃列日涅夫体制而已。这是他们不断被灌输的观念，而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一点。只有依赖于社会主义创始者们的经典论点、方案和理想，人们才有可能认为另一种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且值得实现，但人民只能从华而不实的官方御用文人那里了解到经典理论，而御用文人们当然不可能接纳这种观点。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苏联实行旧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经济停滞并不能简单认为是缺乏民主参与的结果。这一体制有许多技术/经济问题；但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本身所固有的。

那么，我们的观点是，总体上，彻底的民主化加上计划经济的实质性改革可能已经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复苏创造了机会。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里行政管理独断专制而且效率低下，这样的历史经验在意识形态上又为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所巩固，因此似乎已经排除了将其（民主化和改革）作为当前实际政治选择的可能性。某些苏联人民可能会觉得这种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苏联人已经准备要求与共产主义的过去彻底决裂了。

新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后苏联社会主义的首要基础必须是彻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计划。现在我们已经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种在形势特别顺利之前可以推迟的东西。就像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那样，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剩余产品的生产，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压。而如果政治高压减弱，社会就会趋于停滞。同时，

没有各种意见的公开讨论，高效的计划机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来，苏联共产主义者未能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改革提案，这暴露出体制推崇服从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实现经济发展，因为即使在这种专制统治下，私有经济活动的领域也是相对不受约束的，正常的竞争过程仍然起作用，而对工人阶级组织的镇压还使得高剥削率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没有这种镇压性国家和“自由”经济的分离；如果意识形态“正确性”准则支配了经理的晋升，甚至主导了对经济理论的讨论，那长远看来增长和效率的前景的确是黯淡的。

我们不得不说不说在苏联的例子中所出现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计划机制的方面的问题，反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缺陷。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否定要多于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的理论设想。而关于民主机构，布尔什维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苏维埃不放，偏爱这一形式。虽然在战术上，这可能很高明，但我们认为苏维埃有内在的不足而且的确具有危险性，所以必须在别处寻找社会主义民主宪法的原则。至于计划机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些有意思的建议，但这些建议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概述。苏维埃计划者临时创制出他们自己的体制，这一体制服务于它所在时代的一定的目的，但计划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理论发展却受到他们自身理解的限制。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正统性，他们排斥、甚至公开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资产阶级的”污染的理论方法，比如边际分析，因为它看来似乎被“资产阶级”内涵所玷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种倾向是基于一种对马克思的误读。很有可能是这样，但事实是马克思并未试图尽可能详细地说明计划经济的运作原则，而这就使得对他的误读成为可能。除非我们能在细节上合理地阐明这些原则，否则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就无论如何都不会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本书内容介绍

在导言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概述一下将要谈到的主要论点的内容。这些论点讨论的是上面已经发现的问题。第一章和第二章处理有关平等和公正的问题。第一章概述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改良无法解决这些根源问题。第二章介绍一种稳固的社会主义薪酬制度是怎样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将概述这一制度依赖于这样一种思想：每一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总劳动量都可以计算。第三章将证明这一论断是合理的，同时提出了以

劳动时间对经济进行计算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计算方式合理且在技术上更具进步性。

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高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这一体制可以确保经济发展受到人民以民主的方式建构起来的需求的支配。第四章确定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项，并区分了计划的许多不同“层次”，即战略性计划、详细计划和宏观计划。第五、六、七章分别详细研究这几种计划。第八章概述一种具体机制，这种机制能保证生产方式满足消费者的喜好，同时又能避免产品的短缺。第九章详细考察我们设想的这种计划体制对信息的要求，并将个人受到的奖惩与信息发布的准确无误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些章节中，我们把我们提出的这种制度，跟一般认为已经在苏联失败了的那种制度做了大量对比。^[1]

第四到九章处理孤立的单一经济体的计划，而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则将延伸讨论与其他国家经济体的贸易问题。在一个各方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这是非常实际的考虑。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将超出经济领域，进一步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第十二章将把社会主义目标和女性主义者关注的问题联系起来。该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传统家庭的可能性，并且指出这样的公社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的运作方式。第十三章考虑政治领域，提出一种能够让普通人真正掌握他们生活的彻底民主的宪法。就像早先提到过的，我们批评苏维埃民主模式。我们同样批评议会民主制度。而我们自己的提议则源自当代语境下对传统（雅典）民主的重新考察。第十四章研究产权关系的问题，详尽阐述了作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基础的特殊的产权形式。

在最后一章，我们回应了充满怀疑的社会主义者们近年来提出的一些反对观点。一些人支持以“市场社会主义”代替我们倡导的计划经济，我们对这种观点做出了回应。

我们希望，读者在看过各种各样的详细论证之后，就会明白驱动全书的总论点是什么。这一论点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每个人——无论是作为个人的人，还是作为社会一员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身的潜在价值。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满足人的尊严、保证人的安全、实现真正的平等（当然不是平均主义）以及提高社

^[1] 在此书中，我们从基本原则发展出了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提议，没有太多提到已经存在的文献。关于对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的详细讨论和批评，请参看科特和科克肖特（1993a）；关于苏联式经济计划的理论和实践的更详细的考察，请参看科特和科克肖特（1993b）。

会生产率。它还要求人类能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地球的总体环境保持平衡。我们认为在彻底民主的政治宪法之下，通过合作和计划的社会经济形式——一种后苏联社会主义——能够最好地实现这些目标。

（黑夜里的牛 译）

第一章

不平等

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克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收入、权利和机会的严重不平等。社会主义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资本主义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们。相反，那些从不平等和特权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对者。

富人会轻易地相信实现社会平等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但他们贫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费一番口舌才会相信。为此，有人就认为不平等不仅实用，而且不可避免。为了激励人们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无论他们最初的目的怎样，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现他们为了让经济运转，不得不引入不平等。能让富人产生反应的激励，与穷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倡导者是如何看待这一点的呢？如果劝一个富人去工作，他们要求的是更大财富的刺激：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为高收入者减税。而谈及穷人的时候，恰恰相反，却认为最好的劳动激励莫过于愈加贫困的前景：因此头等重要的是严格限制给予他们的补贴。

我们强烈反对这两个论点。我们想表明，尽管少量的经济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当前社会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量是极小的。我们认为，管理一个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会是可能的。可持续的经济机制可以产生出这样的社会，在这一章里，我们概述一下这种经济机制的首要原则。

不平等的来源

在当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们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坏；他们已经了解这一点了。重要的问题是：造成当前贫富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种贫富差别，能做些什么？从逻辑上讲，第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当前社会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 (1) 对劳动者的剥削

- (2) 少数人对财富的继承
- (3) 失业
- (4) 年迈体衰
- (5) 女性的经济从属地位
- (6) 技能的差异

剥削

日常用语中，我们说到强者占弱者便宜的时候，就会使用剥削一词。经济剥削牵涉的是人们没有为他们工作获得足够的报酬。这既可能是一个妻子被迫无偿为她的丈夫当佣人，也可以是员工工作让雇主致富。在一个剥削关系中，被剥削的人没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东西。这种看法在个人关系中会显得有点模糊和不准确，但在工人和雇主的现金关系中，它的含义是非常准确的。如果一个工人得到的报酬不值他劳动的产品，那他/她就被剥削了。

这一思想是非常简单的。说明这一思想的最好方式是先想象没有剥削的情况。假设一个工人每周被雇 40 个小时。如果他没有被剥削，那他从工作中得到的工资就应该可以让他买到四十个小时的工作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

虽然产品不会像麦片包装盒上的卡路里量一样，把劳动量标记在上面。但原则上讲，计算劳动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剥削。作为一个厨师或者公交车司机工作一周所换得的，是提供职工们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农民、制布工人、银行家、演员，等等——的等量的工作。

但实际上，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会发生。尽管雇主和雇员间的劳动合同形式上是自愿协议，但其条款却是雇主说了算。失业一段时间或者害怕失业的人，会乐意干任何工作，而不会太挑剔条件。雇主不会面临同样的限制。通常每份工作都会有许多求职者，以至于如果有人试图沟通工资率，总会有其他人愿意降低价格与他竞争。

在劳动力非常缺乏的罕见情况下，工资增加到没有剥削的水平，那时雇主就会选择把资本放在银行里生利息。他们宁愿这样做，而不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润率的工资水平来雇佣劳动。最后，他们还可以考虑把生意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那里的工资水平低得多。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雇员被被迫以低工资水平廉价出售自己。看看表 1.1 的

英国国家收入细目，我们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对于每个经济部门，我们考察了，通过劳动增加的价值是如何在工资和利润间进行分配的。价值增量指的是一个公司的总销售额和生产过程的非劳动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机器折旧等等）的差额。

这些数字取自 1983 年国民收入支出蓝皮书，由中央统计局发布。两列显示各经济部门的总工资和总利润。总价值增量是工资和利润之和。我们可以看到，不同部门之间用于工资的价值增量的份额差别很大。1982 年，能源工业的价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额只有 27%。相当于能源工人每工作一小时，其中的 16 分钟是为自己，而 44 分钟是为了雇主的利润。

在其他产业中，剥削率要低一些。例如在制造业中，大约 75% 的价值增量用于工资。为了得到整个经济中对雇员剥削率的估计，我们把各个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的工资和利润加起来。如果我们看一看工资和财产收入的总额，就会发现只有 60% 的价值增量流向创造这些价值的工人。

更进一步研究，发现这高估了工人获得报酬总额。关键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能像制造和餐饮一样被视为财富的生产者。金融部门获取其收入的来源有二：从当前账户的持有者手里抽取的服务费，以及贷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后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门提供像兑现支票和银行账户之类的服务。这些服务的价值是通过服务费来测度的。服务费减去相关的工资账单就显示为官方统计数据中的交易利润。这些交易利润必须和银行赚取的总利润区别开来，后者会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抬高。

银行部门的总交易利润一直是负的，这表明银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运营的成本。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银行雇佣的劳动投向了交易服务；剩下的劳动是银行为管理贷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这一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财富生产部门通过支付利息的形式来负担。当我们计算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全国总工资额时，我们应该只包含这些银行中提供交易服务的雇员的工资；银行的其他工资应该被看做是剩余价值。我们在表 1.1 的下面部分做了这些调整。调整后的结果给出的剥削率估值要高一些。

我们可以从这一结果计算出实际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产财富的雇员手里。这体现在调整后的工资和财产收入数字。使用这些数字，我们发现资本主义部门中的工人仅仅拿回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增额的 53%。

表 1.1 : 计算剥削率, 1982

产业或部门	工资	利润和其他财产收入减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制造业	44337	14105
建筑业	7774	5706
配送&餐饮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银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务	11176	3367
农林渔业	2044	3708
总计	121105	88014
	(= 57%)	(=43%)
原剥削率 (每工作一小时的分钟数)	为自己	为别人
	34.4 (57%)	25.6 (43%)
银行和金融服务进一步细分项目如下:		
工资薪水	15205	
服务费	10589	
交易利润	-4616	
假设按照创造价值的 60%付工资给银行职员, 从交易费获得的收入细分为:		
工资薪水	6353.4	
剩余价值	4235.6	
总计	10589	
调整后的银行部门:		
对工资薪水贡献	6353.4	
对剩余价值贡献	22686.6	
调整后的总额:		
工资薪水	112253.4	
财产收入	96865.6	
调整后的剥削率 (每工作一小时的分钟数)	为自己	为他人
	32.2 (53%)	27.8 (47%)

* 所有的数字以百万英镑为单位。来源: 国民收入支出, 中央统计局, 1983 年版

实际上，他们每小时中有 32 分钟为自己工作，28 分钟用于维持各种剥削和供养社会上的非生产性群体。

对雇员的剥削与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有关。^[1] 剥削所得主要用于两个目的。它们要么按照分红和利息报酬进行分配，要么被公司用于给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任一情况下，受益人都是股份、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所有者。如果利润用于分红，那他们就直接获利。如果利润被用于资本积累，股东通过股票增值间接获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 年，皇家收入和财富分配委员会报告，80%的底层人口之拥有不到 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国这样有着发达的股票市场的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却一点股票都没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价值几百磅的股份，以至于他们从股份得来的收入在他们的总收入中是无足轻重的；他们的股份所得总额还不及他们要个人贷款和抵押贷款（房贷）支付的利息。除了被他们雇主剥削之外，他们还受到金融机构的净剥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续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拥有大多数股份。皇家委员会报告，大约 330,000 人占有 55%的股份和 58%的土地。这部分人能够以财产收入为生。这样的人可以选择工作，获取额外的董事费收入，等等。在任一情况下，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将其中的一大部分再投资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资产。因为比起一般的职员，他们能够省出收入的更大一部分。一代接着一代，这一阶级将会持续持有全国金融资本中更大一部分。^[2]

这一小众是对劳动人口系统性的不足额报酬的最终受益者。只要当前的市场体系持续下去，这就注定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失业

失业是一个次要但依旧很重要的经济不平等的来源。有工作的人会很容易忘记，或者没能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失业以后收入会降到多低。很多被雇佣的人不重视的平常小支出——买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电影——都突然显得不寻常地昂贵。那些因长时间失业耗尽了有限的积蓄的人，还有那些从来都没有获得有偿就业

^[1] 说不平等是由剥削“引起的”是不太准确的。这两种状况是相互加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深层次的不平等迫使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大多数人向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出售劳动，并因此屈从剥削，而这又反过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2] 与之不太符合的一个事实是，实际工业资本的直接所有权现在主要是由人格化的企业行使，而不是单个的资本家。关于这一点，请参看科特（Cottrell，1984）

机会的人，依靠国家福利生活。但国家福利进行了严格的计算，只够他们勉强维持生存。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的人甚至连这点福利也得不到。英国也是越来越如此。这些群体被迫进入犯罪和卖淫的黑社会，或者依靠慈善过活。

就业的人和失业者的生活条件的差别吸引了许多政治关注。政治家谈到长期失业的新下层阶级的出现。王子们用委婉的术语担忧起“市中心贫民区”。尽管如此，失业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来源。首先，它只是影响劳动力中的小部分；失业率会波动，但通常都会少于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失业起着维持对就业者的剥削的作用。失业创造了劳动力的买方市场；每份工作都会有许多应聘者。没有别的选择的人不会质疑剥削性的工资率。如果工会知道雇主可以稳定地从失业人群中雇佣顶替罢工者工作的人，就会对争取更高工资的罢工感到犹豫。全部劳动力都可以被解雇，然后以更低的工资率雇佣替代性的劳工。

失业是剥削的稳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这样来维持它的。带来充分就业的经济政策是众所周知的。这些政策在二战后采用了大约二十年，使得失业率低到大约劳动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一。现在也可以应用这些政策。创造充分就业的杠杆仍然是一样的。不再实施这些政策的原因在于最近二十年发生的事情。

那时，保守党总理（哈罗德·麦克米兰）可以诚实地对工人阶级说，他们“从未这样好过”。充分就业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实际工资持续增加的时期。在半个世纪的萧条之后，真正的实得工资差不多翻倍了。^[1]但是在同一时期，公司产出中流向利润的份额减半，从1950年的23.4%减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换句话说，雇员运用劳动短缺减少了剥削。公司通过增加价格来维持其利润的尝试导致了通货膨胀。

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两个主要政党的政客们都承认充分就业是不现实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业，就会再一次引起通货膨胀。一个基于系统性地剥削雇工的经济，需要制造劳动力过剩的情况，而这就需要失业。

为什么失业势必造成贫穷和匮乏？并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原因。如果没有工作可干，那么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向这些暂时空闲但却愿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适的工资。如果某人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空闲，为什么他应该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的那样，失业的来源是技术变革，机器人和计算机的进步，那么采取

^[1] 劳工数据历史摘要（1886 - 1968），就业和生产率部（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1971

这种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没有任何障碍。但是失业是因为政策改变。一旦政府赞同把失业作为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永久必要措施，他们就会开始让失业者的生活状况恶化。

年复一年，提供给失业者的福利的真实水平在降低，而获得福利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严格。像青少年这样的弱势群体，他们获得福利的权利被收回了；贷款代替了服装和家具的补助；失业者还必须承担人头税（Poll Tax），等等。

通过把失业者降低到绝对贫穷的境地，政府压低了工资等级中较下层的工资水平。当年轻人被迫为被慷慨地称为培训计划的事情工作而每周仅获得 25 英镑的时候，还用惊诧成年人的工资低至每小时 1.7 英镑吗？而且，这些工资率是付给每周干十几二十小时的兼职工作。失业者的贫困是通向就业者贫困的大门。

年老体弱

一个人仅仅因为他年老，残疾或者因为别的原因无法工作，并不必须成为穷人。拥有充足财产的上层阶级退休者过着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财产，以出卖劳动为生的人，才会因为受伤或者年老被扔进苦难之中。因为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所以大多数老年人和残疾人会相对窘迫，依靠极少的国家养老金生活。

这些养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决定的结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励人们依赖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计划，而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可以依赖法定养老金，就会不太愿意购买这些私人养老金和保险。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国家退休金的压力。做出这些决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们个人而言，在退休之后会有充足的储备金可以依靠。这一事实不可能不会影响他们，但他们并不就是出于纯粹自身利益行事。当他们鼓励使用私人养老金时，他们是在遵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逻辑。私人养老金计划将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别延长至退休生活；他们就这样为基本阶级结构增添了安全和稳定。除此之外，他们还给了中产阶级以储蓄的激励。通过储蓄，他们入股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没有私人养老金，而且国家养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认为自己会依靠这些养老金生活的人来决定，那就会非常不同。有理由期待基本国家养老金相比于平均收入较现在更高。

妇女的经济从属地位

西欧国家的社会体制有若干不同的经济形式组成。社会主义者传统上大都知道资本主义部门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当人们谈起混合经济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私有产业和国有产业的混合：私有产业和国有产业的混合。除此之外——而且有时也让人感到困惑的——还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比如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与私有和国家资本主义部门的区别。这些被视为混合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家庭经济。

我们认为，就像资本主义经济要为一组经济不平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不平等——负责一样，家庭经济也最终要为另一组不平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不平等——负责。

家庭经济以家庭中的无偿劳动服务为标志。直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妇女；而从这些劳动服务中受益的非生产者儿童和丈夫。家庭经济的另一特征是，无论工作结果还是工作本身都是无偿的。如果一个妻子给家人做了一顿饭，她不会因为花在劳动中的时间而获得酬劳，这顿饭本身也不会出售。如果家庭成员到饭馆吃饭，他们可能会吃到在营养上相同的饭，但其社会特征会完全不同。这顿饭是作为商品买来的，由饭馆里的工薪雇员所生产。

因为家庭经济基本上是非货币性质的，其对国民产品的贡献就没有被包括在官方统计数据中。如果我们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妇和其他参与者的数量，以及劳动的市场等来衡量其贡献，家庭经济无论怎样都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

在资本主义时代，家庭经济的重要性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下降。当古典作家谈及经济或者 *oikonomia*（希腊语的经济一词——译者注）时，他们说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内生产的组织（参看 Tribe, 1978）。如此高比重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家庭中，以至于赚钱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动。当亚当斯密形成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时候，出现了完全的反转。现在，为市场的生产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特有形式。这种看待经济活动的视角根本就是市场导向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系实际上高于家庭经济的事实。

在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是以家庭部门为代价的。历史地看，这一过程的最重要阶段是资本主义农业取代家庭食物生产。

在英国，这一过程在十九世纪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欧洲其他地区，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 20 时候的下半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家庭经济在食物生产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家庭经济的余地就变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于这几个领域：（1）食物准备的最后阶段；（2）照顾学前婴儿；（3）一部分照顾学龄儿童的工作；（3）一部分清洁和维护家庭房屋的工作；（4）一部分照顾年老体弱者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发展期间，人们可以发现好几个生产领域已经几乎完全从家庭经济中消失了：（1）栽培农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纺织；（7）修建房屋。这些活动都转移到资本主义部门了。这一进程仍在持续。饭馆的增加以及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这些东西减少了家庭部门完成的食物生产量。另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家庭购买住宿学校服务也是一个例子。

部门间的这些转换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市场部门更有效率。在某些情况下，曾经使用强制手段来吞并土地和减少家庭农业（英格兰的圈地运动，苏格兰的高地清洗），这是事实；但甚至在那些没使用强制手段的国家，家庭农业也衰退了。资本主义在其组织的所有活动中都造成技术进步。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最高效技术的采用，而劳动生产率也因此提高。在曾经属于家庭生产的领域，现在投入的工作更少了。从中释放出来的劳动现在可以用来运营全部的新产业和近代发展起来的生产部门。

尽管仍然要消耗许多劳动在家庭生产中，但家庭生产创造出来的实物相对较少。与之相反，市场经济的物质生产一直在增长。资本主义部门供应的产品越来越多，而家庭部门的生产率却一直相对停滞。但并不是完全停滞；家庭生产资料的改进是相当大的。煤气和电炉取代木头和干粪火堆，自来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机取代了洗衣桶，这意味着完成相同任务需要花费的劳动现在大大减少了。但这些进步是对家庭经济来说是外部的；他们是引进资本主义技术的结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经济没有显示出多少创新能力。

家庭经济也让位给了社会主义。在工业化国家，国家向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常规。这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家庭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它较少了母亲的工作，因为母亲不用全天负责孩子们。另一方面，它从家庭部门中移除了潜在的劳动力，因为在学校上学的儿童，在更早的经济制度中，已经到了开始进行生产性工作的年

纪。在中国，恢复家庭农业的一个悲剧性结果是，农民家庭倾向于让他们的孩子退学；因为让他们干农活更有用。家内劳动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国家开始承担部分照顾老人的任务。不像资本主义部门的入侵是自发出现的，用免费公共服务取代家庭劳动需要直接的政治决策。社会主义者和家庭生产模式之间最近冲突的领域包括喂养儿童（免费校餐），以及照顾婴儿（托儿所护理）。在食物生产、清洁和育儿等家庭部门，半社会主义部门进一步扩展的余地还相当大。

就像上面谈到过的，在家庭组织中，已婚妇女一般都为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做无偿工作。这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隐藏在性爱和母爱的意识形态之下，人们倾向于忽视这种剥削。因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常常以个人的对抗的出现。经济上的阶级剥削表现为争论，道德压力，殴打妻子，抛家弃子和离婚。

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甚至是雇主和雇员间的阶级斗争，对参与者来说也基本都表现为私人纠纷。当这些纠纷牵涉到一类有着相同的特征个人，与另一类的个人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私人纠纷的集合就成为阶级斗争。因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板和雇员间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出现一两次的孤立的情况，而是同时数百万次地重复出现，所以必须将这些斗争视为不同阶级间的冲突。

当这些纠纷被政治化的时候，参与者就会清楚这是阶级问题。也就是说，这方或者那一方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为其洗冤。家庭阶级矛盾尤其是如此。因为只有在这种政治舞台上，大批妇女才能够相互合作与对她们的剥削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就跟在其他情况下一样，让矛盾保持私人化和个人化，完全是为了剥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阶级斗争都要求阶级意识的领导和可以让整个阶级围绕其联合起来的纲领。目前为止，妇女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议题也许是关于堕胎权利的斗争。只要家庭生产方式继续存在，对希望掌握自己的劳动时间的妇女来说，掌握生育就是必不可少的。

妇女作为一个阶级反对家庭剥削的斗争，只有在其斗争目标变成用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取代家庭经济的时候，才会呈现出革命的特征。除非坚持不懈地宣传人们共同生活，准备食物，照顾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撑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间的矛盾超出个人政治的层次，提高到政治阶级斗争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男人和女人间的矛盾看做是英国政治中仍然是被压抑的和潜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权制家庭将会被公社取代。我们认为，赋予女性斗争革命内容的最佳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体图景。第十二章会着手完成这一任务。

总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让大家注意到了市场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以及导致不平等的一些根源。我们在对劳动的剥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对这种不平等的反对，以及消灭这种不平等的尝试，处于全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道德中心。在随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表明，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人类劳动是价值独一无二的源泉的原则，可以建立起一个既正义又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黑夜里的牛 译）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书的目标旨在描述一系列原则和经济学机制。这些原则和机制除了防止前一章中论述的各种不平等之外，还有其他益处。我们认为，对雇员的资本主义剥削和失业造成了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们认为，消除了这些经济活动人口中的不平等，会创造出有利于结束老一辈人经历过的经济贫苦的政治条件。我们认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发展会大大地有助于消除性别不平等。最后，我们还认为，尽管（新的社会中）还会有与技能和培训方面的差异相关的经济不平等的残余，但是我们能使之减少到只占当前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

相关的经济原则并不新鲜。这些原则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早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继续往前追溯到早期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个基本思想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只能建立在劳动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收入的原则上。长久以来，这一原则在社会主义原则中最特别，也是最为流行。它赋予工人们权利，根据每天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换算成工资的劳动所得；由此寻求解决剥削问题的良策。与之相伴的是第二个原则：只有劳动才是收入的合法来源。

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来源，比如地租、分红和利息等。这些收入的受惠者并不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是靠财产所有权才获得相应的收入。杜绝不劳而获的收入显然是第一个原则的必然结果。因为在一个生产者获得其全部劳动所得的社会里，不会有剩余被用作非劳动收入。

这些是相当古老的社会主义原则（有人甚至会说这已经过时了的）。仅仅时间长短并不能证明一个经济原则是否站不住脚。沉湎于重新发现亚当斯密十八世纪经济学的“新”右派指责社会主义原则复苏是守旧，这完全是用错了地方，因为这一原则是作为对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反击（回应），才在十九世纪兴起的。

这些原创性的原则的重要价值在于，他们为一整个制度（不仅为包括经济组织，还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会秩序），提供了连贯一致的基础。这意味着货币系统不是基于任意的无意义的货币单位比如英镑、美元或欧元，而是基于时间。在每一个周末，记入人们账户的将不再是钱，而是工作的小时数。人们将会以时间为单位支付产品和服务。你会用你自己的两小时来支付一件需要两小时来生产的衣服。人类平等的民主设想是内在于基于时间—价格的经济之中的。^[1]

马克思把我们心中的这一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

注意，这些劳动券起着与货币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得到劳动券，而且劳动券只能用来交换消费品。在另一篇文章里，马克思认为罗伯特·欧文的所谓“劳动货币”完全就不是货币：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当马克思说劳动券同戏票一样，不再是货币时，我们可以发掘某些隐含意思：

- (1) 劳动券不能流通；只能用来直接交换消费品。
- (2) 像许多种票一样，他们不可转让。只有完成了劳动的人才能使用他们。

^[1] 第十三章展开讨论考虑到民主控制经济的劳动时间带来的影响。

(3)就像进入剧院的时候就销毁戏票一样，它们在一次使用后即被注销。当人们从商店里拿走货物时，他们的票券就会被注销。这家店作为公社的机构，并不需要购买货物，只是分配货物，所以它只是为了进行记录的作用才与劳动券发生关系。

(4)他们不是充当价值贮藏。他们会有一个“使用”日期加诸其上。除非人们在年底之前拿回他们在这一年产出中的份额，否则就会认为他们不想要。如果劳动券没有花出去，那么这些包含了劳动的货物就不会被使用。许多货物都是容易变质的，它们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处理掉。

现在，人们不必按把劳动券想成是已完成劳动的纸质证明。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使用某种劳动信用卡，这种信用卡可以记录你做了多少工作。当填补过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记终端时，就会从你的社会劳动信用账户中扣除。

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主义模型——模型的轮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这一社会中没有商品（例如，专门为了在市场上进行交换而生产的货物）。人们完成工作后以劳动信用的形式获得报酬。为了公社的需要，进行一些扣除。货物依据其中的劳动量进行分配，并在人们的信用账户中做相应的扣除。产品按照直接的社会原则组织起来，而中间产品也绝不会表现为商品形式。

自从按照劳动时间报酬的原则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郑重的反对。第一个反对意见是，人类并不平等，所以给他们平等支付报酬既不正义，经济上也没效率。我们下面就详细研究这个论点。

有人认为，尽管鲁滨逊·克鲁索的岛上，按照劳动时间计算也许是可以的，但在实际经济中，由于问题全然的复杂性，这完全不可行。我们认为，记录生产东西投入多少工作量，对现代计算机技术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第三章会研究这一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提出了另一个对使用劳动价格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认为劳动货币与市场运行是不相容的。这一论点宣称，在面对供需波动时，按照生产产品的劳动成本来固定产品的价格的尝试都会失败。我们在第八章研究这一问题。

不过，我们先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报酬制度实际上有哪些好处。

收入再分配的好处

在社会主义报酬制度下，普通人会富裕多少呢？

一小时劳动能生产能多少东西？

我们估计，在 1987 年的英国，每小时劳动生产价值 7.5 英镑的产品。这就意味着以劳动货币形式的报酬应该相当于 1987 年的 7.5 英镑的计时工资。这就意味着，我们说的是相当于每周四十小时劳动获得 300 英镑。当然，这是税前的情况。

表 2-1 说明了这是怎么算出来的。数据来自 1988 年版的《英国国民经济核算年鉴》。我们从国民生产总值开始。我们从中扣除资本折旧的数值。资本折旧是一个国家资本存量损耗或破败的速率；审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国民生产总值中相应的一部分，用于更新损耗的资本存量。近年来，政府并没有一直这样做下去，而听任国家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统、下水道和住宅——损坏衰败。缩减资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终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未来的需要；所以在我们的计算中，扣除了资本折旧，得到国民生产净值（NNP）。这就是 1987 全年可以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表 2.1: 1987 年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英国国民生产总值	4200 亿英镑
减去 资本折旧	480 亿英镑
等于 国民生产净值	372 亿英镑
雇佣劳动人口	2570 万
所以：净产品每雇员	14474 英镑
每周工作小时数	40
每年星期数	48
所以：每年工作总小时数	1920
所以：每小时创造的价值数=14,474 英镑/1920=	7.53 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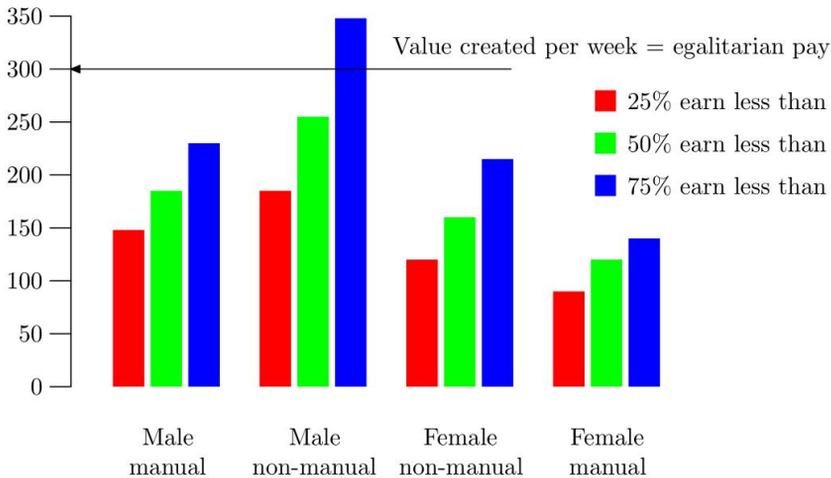
请注意这里低估了每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因为部分劳动力是兼职工作，每周工作时间少于 40 小时。

我们接着将其除以雇员总数，得到每雇员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14500 英镑。这是每个雇员在 1987 年创造的价值的平均数。^[1]如果再将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时数，就得出结果是每小时劳动创造大约 7.5 英镑的价值。

四十小时的工作周可以得到 300 美元的税前收入。我们不是说人人每周都可以随意花费这全部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为了支持教育、医疗服务、公共投资和科学研究等等，个人纳税的水平也许比现在还高些。与之相比，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主义经济中，需要较少的税收来为社会安全提供资金。但是，通过税收制度分配国民收入根本上不同于剥削，因为税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响税率，所以税收会代表人民准许分配给公共目的资源。与之相反，市场经济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民主决定的结果。

每周 300 英镑的平等税前收入是否显得有点多还是中等水平，取决于你的角度。如果你认为这是中等水平，那么你要么是被 1987 年的通胀水平所误导，要么是对人们的收入之少毫无概念。

新收入调查 (*New Earnings Survey*)^[2]显示 1987 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数是 145 英镑。收入中位数是收入分布的中点：一半女工每周挣的不到 145 英镑，一半比这更多。



^[1] 必须铭记在心的是，这样的数字在通胀期间很快就过时了。读者们要记住，在她读到此书时，每个工人生产的价值会相对高一些。

^[2] 英国政府每年发布。

图 2.1 显示了更加详细的收入细分。可以看到，超过 75% 的女性体力劳动工人每周收入不到 145 英镑。甚至在非体力劳动工人中，也只有 25% 的人每周挣的钱超过 213 英镑。把这个图标和每周 300 英镑的平等报酬标准相对照，看起来一半女性劳动力会发现自己的收入在社会主义模式下会增加一倍多。接下来的百分之二十五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增加了 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一的女性雇员中，大多数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显，女性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甚多。同样情况对男人们也成立吗？

表 2.1 同样表明，虽然男人一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一，但大多数男人也会从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社会主义原则中获益。收入超过 300 英镑水平的唯一一类人，是男性白领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一。这表明雇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被剥削的。也许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们会因为级差工资受损，但如果不再受到剥削，获得的益处也会多于抵消级差工资带来的损害。几乎所有雇员的收入会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主义薪酬制度中，财产性收入被废除了。社会主义以牺牲股东和其他财产所有者为代价，让雇员们成为受益群体。

平等比增长更有效率

这是一个需要紧紧抓住的重要观点，因为常常有人宣称从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主张，让整个经济增长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实际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办法。随着经济增长，金字塔底层的人们会从上层“滴漏”下来的财富中获益。（这就是所谓的涓滴效应——译者注）看看数字，就能发现这类说法的虚假了。

英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为每年 2.5%。按照这个增长率，一个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达到每周 300 英镑？答案是 30 年，可以用你的计算器核对下。社会主义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一个制度下却必须要花上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一大半。有了社会主义，员工就能够“鱼和熊掌兼得”。通过再分配，她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收入的增长，但经济增长并不停止，所以她会继续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长。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反驳道，不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激励。他们指出，1980 年代中期就是证据。作为计划用来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结果，英国政府声称促进了 3% 的持续经济增长。这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时期，而只是比英国经济近年来的增长率高一些。让我们姑且认为这额外的每年 0.5% 的增长率代表不平等（而

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与收入再分配同样的好处,每年0.5%的增长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这还是考虑一个事实,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长意味着与更高收入者相比,劳动妇女收入增长会更低。中等收入的劳动妇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长是很成问题的。

劳动的不平等

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都假设劳动本质上都是同等性质的。我们说过,社会主义最初依据的是一个民主假定。这一假定认为,人类是平等的,因此也应该同样地看待他们的劳动。我们暗中假定每一小时劳动生产等量价值,而所有工人应该由此获得相同比率的报酬,比方说,每小时一劳动券。尽管我们依据哲学上的理由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却不能否认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实际差别。让我们探究一下这种劳动力不平等的后果。我们想看看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是什么:技能上或者培训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阶级差异吗?

我们并不这么认为。工人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异——一种与他们受教育或培训的方式和学位有关,另一种则是“个人品质”方面的差异,比如努力工作的决心,与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这两种区别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获得更多的报酬。第二个问题是,尽管秉承人类平等的哲学,但为了计划(分配)的目的,他们是否也会不得不承认不同类型的劳动。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教育/技能的差异化报酬?

我们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级别的差异与个人工作报酬的差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更有技术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一般说来收入会高些。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这些理由在何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呢?

一种公认的解释是,这种薪酬溢价中至少有一部分起到这样的作用,它是对教育和培训费用和此前放弃的收入的补偿。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对自己的教育和培训在经济上负责的程度是变化的,但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存在着放弃的收入这一因素,即如果一开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接受额外的教育,

可以挣得更多。因此，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劳动力的供给，一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业，就必须付给他们一份加价。理由就是这样。

这又有多实际呢？相比于离开学校到建筑工地上班，当学生真的是一种“牺牲”吗？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年轻人相比，学生的日子很好过。这项工作干干净净的，也不是太苛刻。还有很好的社会设施和丰富的文化生活。这是一种可以在未来的生活中要求经济补偿的经历吗？

即使补偿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现实的一种精确反应，也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中，专业工人应该获得同样的差别工资。那时，教育培训的费用会完全由政府承担。不仅教育将完全免费，就像在英国已经实现的情况那样，而且学生在学习期间还将能获得一份正常的工资。学习是一种正当而且对社会来说必要的工作形式。学习“产出”掌握技能的劳动者，因此就该相应地获得回报。学生不需要有任何个人花销和收入的损失，所以就不需要补偿了。

在当前的社会，阶级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数永远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在工人阶级社区长大的孩子甚至意识不到教育所提供的机会。他们的职业展望从一开始就被抑制了。许多人囿于现实——向他们开放的都是低级工作，谁又需要为了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一些正是反映了孩子们所看到的他们父母能得到的工作。如果没有社会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这些工作本身并不会发生改变。同工同酬并不会在一夜之间提升人们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之后的民主设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一方向上产生效果。同工同酬是一个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称一个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样的价值。他宣称，“公民们，社会面前人人平等；你们可能干着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只要残酷的经济现实仍提醒着你：社会将把你看做是下等人，谈论教育机会的平等就是虚伪空洞的。除了能买到的东西以外，工资还是社会地位的符号；而工资的拉平就会在自尊心方面引发革命。与工人阶级大众不断增加的舒适和安全感想伴随的，是他们对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们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会在金钱方面平等地对待人民，这将鼓励人们争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钱更充实更丰富的东西，但是“凡有的，还要给他”（译者注：出自《圣经》（马可福音 4:25），指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现象，即“马太效应”）。目前，教育机会总是与金钱相关。一旦工人阶级赢得了经济平等，他们就有信心去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这一过程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人类的

创造力和智慧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通过教育发展这种资源，经济进步会随之而来。

特定劳工短缺

资本主义条件下，除了高教育获得高工资的一般趋势之外，还可能不时出现特定类型的劳动力短缺（未必一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类劳工的市场价格暂时上升。所产生的额外费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们用“租金”这一术语，以此类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这一术语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资源所有者收取的垄断价格。马克吐温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质：“赶紧投资土地，因为上帝已经停止制造”。因为土地的供应是短缺的，而且由于它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从需要耕种土地或者以此为生的人那里获取报酬。如果某种特殊技能或专长的供给相对于需求是短缺的，拥有那种技术的人就有点像土地所有者。没有他们的技能，经济就没法运行，所以他们可以就他们的劳动要求额外报酬。

在某些情况下，这一高价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给短缺的特定专业。在其他情况下，这一高价将会继续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该专业的障碍。美国医学会在医学院训练新医生，以及控制医生移民的规则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它就运用这种影响力来控制进入这一专业的人的数量。这就造成医生收取更高的费用。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同样很可能出现特定技能的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短缺的情况。因此，必须有扩大供给的机制。一个教育、培训和劳动力配置已经社会化了的制度将更容易预计和宣传潜在的短缺。如果他们追求针对性的职业，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机会的希望来吸引新成员进入需要的专业。要是这样还不能保证足够数量的人进入这一行业或专业，那就需要劳动管理或者支付高于正常劳动券的“租金”。

劳动管理听起来很残酷，而苏联在 30 和 40 年代的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强制劳动也符合这样的图景（尽管为了劝说人们自愿地进入新的工业专业，广泛使用强制劳动相结合的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工资级差和激励报酬。）。激励性报酬和劳动管理都来自于快速工业化时期重新配置劳动的需要。二者都不受欢迎，所以赫鲁晓夫政府实质上摒弃了劳动管理，同时大大地减少了工资级差的等级。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工资级差仍在继续减少。（参见 Lane, 1985）。

很可能，告诉人们应该做某种工作，或者给他们很大的工资级差，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会一直受到人们厌恶。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对平等拥有强烈的感情。据说在俄国，新合作社成员赚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这正好证实了上面的说法。

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发生。英格兰北部的工人必须南下到伦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见见家人。失业福利办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绝工作的人的福利。每当工作短缺一出现，这一隐蔽的强制就会发生。失业迫使你接受提供给你的工作。以前苏维埃的特殊奖金报酬和显性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有必要的，因为存在着充分就业。当缺少这些措施时，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时期，工人们倾向于频繁转变工作，以至于企业很难维持稳定的劳动力。英国的1960年代的时候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时失业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岗位比就业工人多，那么一些雇主就愿意提供激励，诱使工人离开当前的工作。供给格外短缺的技术会很受青睐。当这一情况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时，某些体力工人开始赚取专业工人的工资，造成短暂的媒体轰动。

应该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计划设计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劳动力资源，既没有过量需求也没有过量供给。尽管如此，劳动供给和需求的总体平衡，并不能应付特定专业不足的问题。假如存在着电气技师的短缺。如果这是由于没有训练电气技师的设施造成的，那么给技师们付更高的工资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的是加强版的培训计划。现在假设存在着深海潜水员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术学院有空缺，但申请者不足。拥有冒险气质的人可能天然地对潜水生活感兴趣，但其他人，却害怕危险和艰苦，不愿意申请。怎么办？

在市场经济中，答案很简单。给潜水员支付高于一般体力工人的工资。然后，你就会发现人们愿意为这一份额外的收入冒险。这能让人满意吗？另一种途径可能是承认并没有太多的愿意冒生命危险下海，因此耽搁了离岸石油开发，直到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自动机器造出来。

潜水员是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一些工作比另一些工作更让人不愉快，这一事实是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决定用何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通过提高工作条件和质量，还是给愿意做这种恶劣工作的人以激励性报酬。如果整个经济是基于劳动货币，那么给予激励报酬就存在风险。危险在于，如果人们每干一小时可以得到两小时的劳动券，那“一小时”就会贬值了。这些激励报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

降为代价的。为防止通货膨胀，让公众对工资级差能有所控制，这种激励报酬就必须由总税收提供资金。

“稀缺租金”这一概念也许有更广的应用。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保证其对熟练劳动的投资不会被浪费，要么通过熟练工人移民，要么就是他们决定把精力用于更高回报的“非正式”活动。先不管道德劝告——虽然这是我们认为理所应当的，但却并不够。只有两种办法能保证熟练工人持续地按照预期方式工作——监督或者足够的报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欢迎的，但全面监督也同样不可取。计划体制可能造成某些类型的工人缺失，当政府处于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支持某种程度的“租金”报酬的实用主义论证。

给“个人能力”支付级差报酬

在任何给定的以教育或技术的级别和形式来定义的工人阶层中，明显仍然会存在天赋、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别。级差报酬制度应该承认这些差别吗？

在尝试回答之前，考虑下问题的含义——我们在这里触碰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提取剩余产品的问题。“剩余产品”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过维持工人自身的产品之外的额外产品。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剩余表现为剥削收入的形式：利润、利息和租金。

剥削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适用，因为剩余产品的配置是民主决定的；尽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证从生产性工人身上“提取”剩余，用于满足非生产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费需要，以及生产工具的积累。正式一点来说，这一目标将会在我们提出的制度中，通过对劳动收入征税和收取地租（例如，这些国家“财政”“收益”转移给非生产者，社会服务和积累，如第七章中讨论的那样）达成。但这一正式机制的存在决不能保证能实际生产出充足的剩余；真正要紧的是，工人必须足够勤劳和高产（或者他们选择少生产，那他们的个人消费就相应地受限制）。什么办法可以保证这一点？

作为比较，考虑一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情况。在这里，生产剩余产品的要求表现为，一个公司需要获得利润。我们知道加强或提高生产率的机制有利于创造利润。工人订立的雇佣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现的概念；然后，这个合同由企业监工（经理，组长）来执行。如果工人不能达到要求的绩效标准，或者不够顺从，就通过解雇这一最终处罚来兑现合同。当然，解雇惩罚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

上取决于在单个企业控制之外的状况，主要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失业情况，以及失业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补助的水平。除了对劳动力的这种“消极”控制，企业还有一些积极的提高生产率的办法：奖金和可变薪水；升职的前景；对取得优秀绩效的杰出个人进行宣传；以及创造一个工人能够感觉到他们提出的提高公司生产率的建议能够被倾听并得到回报的环境。当然，资本主义企业对后面这种更“开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变的。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失业处罚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机会，那社会主义的情况与资本主义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们可能希望争辩说，如果工人们感觉到他们不是为“老板”的利润，而是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产，社会主义可以为剩余的生产提供良好的总体社会环境。但如果认为这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开明”资本主义企业的“开明”策略（公开认可工人的成就，构建民主的工作环境），仍然会有使个人报酬适合生产率的某种需要。如果人们认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却“白费力气”，或者认为某个同事在偷懒，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给其他同事，就会产生士气问题。

要使报酬与贡献相适应，一种办法是全经济范围内的劳动分级。比如，有A、B和C三个劳动级别，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产率，A高于平均，而C低于平均。新工人可以从“B”级工人开始，然后通过审视他们（自己发起的或者他们工作的项目发起的）工作绩效，可能评定为A或者C。注意，这些等级与教育和技能水平无关，而只考虑和所在行业或职业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产率怎样。

出于计划的目的，这些劳动分级会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创造价值”。工资率会与这些级差生产率相对应：“B”级工人每小时能得到1劳动券，“A”级工人得到更多，“C”级工人则得到更少。为了保持发行的劳动券总量与工作总时长相等，工资率必须以这样的比例固定下来。一旦知晓每个级别的人的数量，精确的工资率会由计算机自动算出来。

做一个“C”级工人没有什么可丢脸的。这样的工人基本上选择以更轻松的节奏工作——从而相应地接受稍微低一点点的消费。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斯达汉诺夫。如果一个生产率较低的工人没有怎么装模作样，就不需要怨恨他。这样，高生产率工人的贡献得到了承认并被鼓励，同时计划人员对社会劳动力的分布有了更精确的了解。

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

我们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会被分为个人生产率不同的几类，并出于计划的目的，承认这种分类。计划者知道，比如，某个需要 1000 工时（人 - 小时）平均水平的劳动的项目，就需要 800 工时（人 - 小时）的 A 级别劳动。现在的问题是，计划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异的存在，如果是的话，又应该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劳动力技能方面的差别是重要且不可简化的。采矿工程师、外科医生和计算机程序员的技能不能互换。这样，在这个时间段内，计划者就不能简单地考虑“劳动”的配置，而必须承认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诸的约束。这就暗示了，必须保有每种专业资格的人的详细记录。那么，怎么处理价值的劳动概念以及劳动—时间作为记账单位的使用？

从长期看，工人会重新接受培训，而社会主义的“民主”假定认为，除了某些极端苛刻的任务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几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长期性计划的语境下，当前有那些特殊类型的熟练劳动可用并无所谓，重要的是培养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机器的价值可以按照生产它们所需的时间来计算一样，为了长期经济计算的目的，也可以这样来计算人类技能。

我们可以设想建立一种基线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这种级别教育的工人只会被视为“简单劳动力”，而接受了额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会被视为“生产出来的投入”，这很像其他生产工具。这种作为生产出来的投入的熟练劳动的概念，通过如下示例说明。

假设成为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学习四年。这四年生产技术工程师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劳动投入。首先是学生的工作——听讲座，在图书馆学习，做实验，等等。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会视为有效的生产劳动，因而得到相应的回报。这些学习工作按照“简单劳动”投入计算。然后是教学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学生身上。这是熟练劳动投入。第三，还有与教育相关的其他“开销”（图书馆管理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工作。这就可能是技术和简单劳动的混合了。^[1]

^[1] 注意，为学生提供生活物资的劳动并不真的是熟练劳动的生产成本。无论是否学习，这一劳动都必须由某人进行。

这就阐明了一个笼统的观点，即熟练劳动的生产通常需要投入简单和熟练劳动。原则上，测量当前的简单劳动投入是很简单的；难的是如何处理熟练劳动投入。如果熟练劳动表现为过去劳动投入，就要按照简单劳动的倍数来计算，但是如何确定这个乘数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术工程师劳动生产中的技术（如教育）劳动时，出现了随后衡量合格工程师劳动时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问题。在下面的讨论和本章附录中，我们一并处理这两个方面，使用一个简单化的假定，即所有“技术”劳动的生产都要求相等量的劳动投入。

拿无生命生产工具作个类比。确定从这样的生产工具“转移”到产品的标准方法是，把生产工具的劳动内容“分布”在其所处贡献的产品总额上。比如，如果一个包含 1000 小时劳动的机器，在生产一百万单位的 X 产品过程中用完了，那么，我们就说这个机器转移了 $1,000/1,000,000 = 0.001$ 小时的劳动到每单位 X 产品中。进一步计算，假设我们的机器以每小时 100 单位 X 产品的生产速率运行。这样，机器每运营一小时，“传送” $100 \times 0.001 = 0.1$ 小时的物化劳动。

现在回到我们的技术工程师，并使用同样的原则。假定一旦取得资格，她每年工作 45 周，每周 35 小时，也就是，每年 1575 小时。假设她的工程技能的“折旧时限”为 10 年。（换句话说，在这个时间结束时，他需要去或者说符合条件，去接受另外一段时间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识或技能，或者改变专业，只要她愿意的话。）在这 10 年里，她将工作 1575×10 小时。为了确定在这段工作时间内，她的物化劳动的传递率，我们将她所受教育的总劳动量除以 15,750。

本章附录说明了用简单劳动作为记账单位，计算熟练劳动中物化劳动总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这些计算，“传递率”可能大约

10 年折旧的情况下为 0.50

15 年折旧的情况下为 0.33

20 年折旧的情况下为 0.24

例如，0.33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工程师的技能在 15 年的时间内折旧，每工作一小时传递 0.33 小时的物化劳动。与机器只传递过去的物化劳动不同，我们的工程师每小时也工作了一个小时。我们的工程师的直接和间接劳动贡献之和因此是每小时 1.33 小时，是简单劳动工时率的倍数。就是说，如果计划人员在长期计划的

背景下考虑使用一百万小时技术工程师劳动，他们应该认识到，这相当于承诺了 133 万小时的简单劳动。

我们并不是说，就因为一个熟练工人的社会成本估价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一，他们就应该多得到三分之一。这多出的三分之一代表了社会使用熟练劳动的额外成本。在为工人的教育付钱时，社会已经支付了这个“额外的三分之一”，所以，没有正当的理由要求为个人付额外的工资。尽管不会影响到个人收入分配，但熟练劳动乘数在计算工程的社会成本时，仍是重要的。对社会来说，需要熟练劳动的任务代价高得多，即便熟练工人得到的工资与非熟练工人一样多。

与历史上存在的社会主义作比较

结束这章时，把马克思的模型与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达成的做一番比较，可能会有帮助。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分配原则得到运用的唯一实例是在中国 1960 和 70 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里，产品按照工分制度进行分配。成员一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时数会记录下来，而收获时他们的份额就基于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能也应用了这种原则，不过我们还不清楚。

大体上，社会主义经济体都保留了货币。他们发行进入总体流通的纸币和硬币。这些货币在五种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间的交换。这种交换的基础是国有企业在运营和管理上的相对自主。

(2) 国家和集体农场部门的交换。

(3) 集体农场和城市工人在市场上交换农产品。

(4) 家庭农场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产品，而这一交易的基础在于家庭农副产品生产的继续。

(5) 国家零售机构和国有企业职工的交换。

经常有人提出，在第一种情况下，货币已经不是真正地作为货币发挥功能了，因为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如果企业 A 向企业 B 交付货物，企业 B 可能会为此付钱，但由于他们是国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权变化。^[1]这其中有一定道理，因为

^[1] 有关财产关系的要点在接下来的段落会涉及到，在第十四章中会进一步发展。

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计划来的，但这种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没有所有权的转变，那为什么还有货币名义上的交换呢？

如果生产是直接社会化的，那就没有理由企业 B 应该为企业 A 交付的货物付钱。而是 B 单位——比如说一个医院——可以被给予 X 小时劳动的预算。单位里所有护士、保洁和医生的工作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任何药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药厂的药物供应等，都从这个预算中扣除它们的劳动量。但是，医院不会向他的员工或者供应者付钱。国家或者公社会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记账，而药厂不必要求“付钱”，因为它们会有自己的劳动预算。

我们可以看看这种在国民医疗保健系统中处于萌芽状态的制度。在保守党进行改革前，企业不用为实验室的测试和卫生部内生产的 X 光机付钱。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工业部门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远超过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看起来所必须的程度。斯大林说，商品形式的持续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换，主要是集体农场和国家之间的交换。^[1]一开始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想到了保加利亚——集体农场对国家的独立特征，在 1960 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货币的使用在所有情况下依然保持不变。

如果整个经济中流行劳动会计，就可以设想农业生产中的过渡形式，其中集体农场作为一个整体，为交付的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得到酬劳。这就让农场劳动离直接社会劳动还差一步，但已经与货币的消灭相一致了。

最后的交换体系——消费品市场——是最关键的。在这里，根本性的阶级冲突在阻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完成。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激进平等主义的。除了劳动之外，没有别的收入来源，而所有的劳动都得到平等对待。要达到这一点，就会要求消灭官僚享有的特权和工资级差。马克思主义计划与任何精英阶层的继续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马克思为巴黎公社采取的政府官员不能得到超过一般工人工资的原则欢呼。^[2]近年来，毛和中国的左派反对工资级差，指出中国要达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们认为，八级工资制仍是社会主义的障碍。

中国是独特的，因为废除资产阶级劳动级差制度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它是文化革命中的关键问题之一。随着那里的左派被击败，邓小平路线获得主导权，向实

^[1] 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1952）

^[2] 见《法兰西内战》（马克思，1974）

现马克思主义计划进一步推进变得不可能了。在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劳动为基础的薪酬制度的问题，甚至从未排上过日程。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们，都很少对“平均化”感兴趣。尽管反对极端的财富积累，他们仍然认为应该维持某种程度的差别。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货币形式完成的，在意识形态上证明差别合理就简单些。如果会计以劳动时间的形式完成，那么专业级差工资的骗局就变得有点太明显了。为什么一个秘书每工作一个小时只能得到30分钟的报酬，而隔壁专家每投入一小时就能得到2小时的报酬呢？

秘书和保洁员很快就会说：“等等！这是哪种社会主义，可以让你们比我们贵五倍呢？”。那个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平均化倾向（如此原始如此纯朴），就冒出来了：“我们都是约翰·汤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A Man's a Man For A' That 《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是著名的苏格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1795年发表的著名诗歌。歌中极力赞美无论贫穷我们都保持做人的尊严，不贪钱财，不惧权贵，不能丢失洞察真理的睿智，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译者注）。这一民主感情一直处于每次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到19世纪晚期，认为一个人的劳动与另一个人的劳动相同的主张，现在依旧是社会民主运动的指导原则。每当资产阶级民主在那宣称“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就要求现实的经济平等。平等投票权对资产阶级民主意味着什么，劳动平等对无产阶级就意味着什么。

政治民主的敌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谴责一人一票的原则无视人类天然的不平等。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刚从丛林里出来的黑鬼相比吗？经济民主的敌人则谴责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因为它错误地使人们均质化。就像一个中国访问学生对我们其中一人直言不讳地说道：难道我接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不比一个无知的酗酒的工人更有价值吗？

确实，人和人不一样。大学教授的工作跟劳工的工作不同。布尔人的文化跟祖鲁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对那些处于社会高层的人们来说，差异证明了工资级差的合理性。但底层的观点却是不同的。

附录：熟练劳动乘数的说明性计算

这一附录就文本中讲过的熟练劳动乘数的计算，做更详细的解释。我们先说明熟练劳动总的物化劳动量的计算。

(1) 学生方面。假定学习四年，每年工作 45 周，每周 40 小时。总计：7200 小时。

(2) 教室教学。假定每周十五小时，每年 35 周，共四年，分在平均 30 人的班级大小之上（大讲座班级和小的实验室和讨论班等等相平均）。每个学生总计：70 小时。

(3) 辅导工作。假定每周两小时，每年 30 周的一对一辅导。在四年之中，共计：240 小时。

(4) 教育开支。让我们假定这方面贡献的量与教室教学劳动相当。总计：70 小时。

把这个总的劳动量细分为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再逐一检查。学生自己劳动贡献是简单的；教师的贡献是技术的；让我们为了讨论方便，假定“开支”贡献的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是 50:50。然后我们就获得如下：技术生产的总劳动量大约等于 7,600 小时（四舍五入），其中熟练劳动占到差不多百分之五（再次四舍五入）。

上面引用的物化劳动总小时数只是一个初步近似值（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是低估了）。让我们把这个近似值记为 TH_0 。使用 TH_0 我们作出有熟练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的传递速率的近似：

$$R_0 = TH_0 / AH.D$$

这里的 AH 代表每年熟练劳动取得资格后的工作小时数， D 是折旧年限的年数。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R_0 来重估总的物化劳动小时数（假定在复杂劳动生产中，老师和其他提供复杂劳动输入的人的传递率与他们的学生相同。）如果 TH_0 中熟练劳动占比记为 SP ，总物化劳动的估算则改为：

$$(1 + R_0)SP.TH_0 + (1 - SP)TH_0 = (1 + R_0SP)TH_0$$

但这个总物化劳动小时数的新数字可以用来重新估算传递率，然后新的传递率又可以重新估算总小时数——等等，如此递归下去。生成的对熟练劳动生产中总物化劳动小时数的连续近似形成一个几何级数，其第 N 项为：

$$\left(1 + R_0 SP + R_0^2 SP^2 + R_0^3 SP^3 \dots + R_0^n SP^n\right) TH_0.$$

使 n 趋近于无限，我们可以推出估算的总小时数的最终极限值，即 $(1 - R_0 SP)^{-1} TH_0$ ，而相应的物化劳动的传递率的最终估算值为：

$$R_f = (1 - R_0 SP)^{-1} TH_0 / AH.D.$$

记得 $R_0 = TH_0 / AH.D$ ， R_f 可以重写为

$$R_f = TH_0 / (AH.D. - SP.TH_0)$$

使我们可以直接计算最终的传递率。使用上面的用作说明的数字 $TH_0 = 7600$ ， $AH = 1575$ 和 $SP = 0.05$ ，我们得到

$$\text{当 } D=10, R_f=0.50$$

$$\text{当 } D=15, R_f=0.33$$

$$\text{当 } D=20, R_f=0.24$$

像文章引用的一样。在每种情况下，熟练劳动乘数无非是 1 加上 R_f 。

(黑夜里的牛 译 Siegfried 校)

第三章

工作、时间和计算机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亚当·斯密，《国富论》）

我们将在这一章里阐述，合理的经济计算应该以对时间，具体而言是对劳动时间的计算为基础。这不仅有利于建立公正的社会，而且同样有利于技术的进步。我们将进一步说明，一套按照劳动时间进行产品成本估价的制度不仅仅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过现代计算机技术得以实现。在这个说明的过程中，我们将向读者介绍一些关于计算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经济的组成有关。

在上一章我们说明了人们如果按照劳动时间取得报酬，就是说人们劳动一小时便得到一小时劳动货币，长此以往，剥削就消灭了。这一巨大的社会利益自然是采用劳动货币的一个理由。它的确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经典理由——它废除了工资上的压迫并把劳动果实还给劳动者。这样的正义和公平并非这种经济计算方法所带来的唯一好处，它还能促进技术的进步。

很遗憾，人并不能永生。人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产的产品总和，即社会的财富，取决于他们为了生产其渴望得到或者需要的产品而被迫花费的时间。人类文明的进步受制于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必需品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愈大，这个社会就愈贫穷，也就愈加不能维持我们称作文明的娱乐、艺术、文化。所以，用来节约劳动力与劳动时间设备的飞速更新换代正是最近两个世纪以来工业化世界的发展欣欣向荣的根本原因。

时间的节约

节约劳动力是任何新技术崛起的基本经济理由。只有在经济上不断应用这样的发明，人类才能因此被解放出来，从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光或去尝试更加新鲜而复杂的事物。一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必须一如既往地寻找节约时间的方法。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它是我们的“原币”，一旦被浪费，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只有当社会主义证明自己能更好地节约时间，才能表明其相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商受利益驱使，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资。公司经常采用新技术以便削减劳动力和相应开支。尽管新技术的应用经常与工人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导致他们失业，但整个社会最终会受益。技术变革所带来的利益并没有被平均分配——雇主比雇员获益更多——但是最终，其促进了技术的变革，资本主义正是以此为基础才宣称自己是进步的制度。工会也普遍承认需要应用新技术，只不过它们试图调控引入新技术的条件，让工人们也能够分享利益。

社会主义经济经常批评技术变革，认为其导致失业，而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需要反思的是其劳动节约型设备的更新换代速度太慢了，因为劳动力被人为压低。

尽管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古罗马的工艺，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没能创造一个工业社会。历史学家经过长期争论认为，其原因在于奴隶制。当所有的工业生产都由奴隶来进行时，对劳动力成本的理性计算就显得多此一举。一个奴隶并非按小时付给报酬，所以主人就没有计算劳动时间的动力。而没有这样的计算，节约劳动时间概念就更无从谈起。所以，比方说，尽管罗马人知道水车，却从未进一步广泛地应用机械动力。（White, 1962）

资本主义相对于奴隶制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资本家按小时付给劳动力工钱，因此不愿意浪费。他采用工作时间和动作的研究，来检验自己是否充分利用了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但是，他仍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劳动力，否则他就得不到利润。这里有一个悖论：价格便宜的东西永远不会真正被珍惜。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但是工资低的时候，雇主就浪费得起劳动力。在理性方面，资本家比奴隶主更高级，但仅仅是高级一点而已。

英国铁路是个技术奇迹，宽广笔直的铁轨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桥横跨峡谷
 如今铁路的印记在这片土地上依旧存在
 这是创造巨大财富的商业之路
 这是日不落帝国的供给之路
 这是无处不在的光明之路^[1]

……毫无疑问，铁轨将为新千年的到来做准备，像曾经的罗马帝国的道路和水利工程一样。用着过去罗马奴隶修水利时使用的工具，劳工们和“航海家们”修建了铁路。铁路是强健的肌肉用凿子和铲子建成的。两千年里的一个伟大的技术进步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独轮手推车。工人们使用它，而奴隶们则不使用它。^[2]

铁路是机器时代的产物。但是没人超越史蒂芬孙和布鲁奈尔的智慧，去设计蒸汽动力的挖掘机械。由于工资奴隶相对而言更便宜，所以就用不着那么麻烦了。

在本世纪的英国码头（本书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译者注），码头工人仍然用着自中世纪就没有改变过的技术去装卸货物。工人们按天雇佣，做着奴隶的工作，却没有奴隶制下的安全。要想让资本家阶级意识到在推土机、重型挖掘设备和集装箱化上的投资是划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业、强大的工会和更好的工资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体力工人，通常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受剥削最深的一群人。类似情况也存在于许多低工资的血汗工作中——服装制造，玩具制造等等。在这些领域，生产技术停滞，创新的热情也不高。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规律，工资越低，雇主就越不愿与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用表 3.1 中的例子说明这个规律。

表 3.1 两种挖沟的方法

方法	直接劳动	间接劳动	总劳动耗费	总货币耗费
旧方法	100 小时	100 小时	200 小时	1053.00 美元
新方法	50 小时	125 小时	175 小时	1091.25 美元
假设：				
劳动创造的价值	7.53 英镑每小时			
工资率	3 英镑每小时			

^[1] Gaston,P, ‘Navigator’ ,onRum,SodomyandtheLash,ThePogues,StiffRecords.

^[2] 在黑死病以后，由于劳动力的短缺，独轮手推车被介绍到欧洲。

表中显示的是用两种方法在一条路上挖沟的相对成本分别是多少。用旧方法，承包人雇佣两个人，每个人在一周内分别劳动 50 小时。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租一台压缩机和两个风钻。它们是用来进行路面破碎，然后让工人用铲子掘土。压缩机和风钻的损耗加上压缩机所耗费的燃料，共计达到 100 小时的劳动。使用现代技术，承包人只需一台挖掘机并雇佣一个人，工作 50 小时就可完成。这里，挖掘机和燃料的消耗共计为 125 小时的劳动时间。现代技术仅仅需要 175 小时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就可完成这项工作，而旧技术则需要 200 小时。

假设在 1987 年的英国，一个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售价为 7.53 英镑，而一个小时的劳动报酬为 3 英镑。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两种技术所耗费的货币成本，我们会发现一个颠倒的结果，旧方法更便宜。因为劳动力更廉价，劳动力密集的技术显得成本更低，这就导致资本家浪费人类劳动。

计算机工业中也能找到很贴切的例子。20 世纪 50 年代，IBM 开发了高度自动化的机器去为他们的计算机构建核心存储器。随着需求的增长，他们的工厂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到了 1965 年，他们甚至要为制造电脑的机器开设了一条全新的生产线。即便如此，计算机的生产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势变得更严峻了。金士顿 (Kingston) 新上任的经理曾经在日本待过几年。他提出，东方国家的工人有足够灵巧的双手和耐心，可以找他们手工制作磁芯板。他带着一包包磁芯，线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后，他带着手工磁芯板从日本回来了，质量和金士顿工厂里的自动送丝器制造的一样好。这个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东方工人的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致于生产费用实际上低于金士顿的全自动生产。(Pugh et al., 1991, p. 209)

对于苏联七八十年代针对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有一种批评是：低工资会导致同样的劳动的浪费。在苏联，工资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丰厚的住房补贴和公共服务。雇人的企业不给人们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改革派支持价格和工资体制的变革，以提高服务方面的支出，而工资相应增长则可补偿这一部分。他们宣称，更高的工资会起到创新激励的作用。

这一论证是可行的，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工资，也就是付给劳动的价格而不是劳动时间本身，被当作了成本，所以问题出现了。这意味着，一切不同生产技术之间的成本比较，其结果都会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如果我们将工资纳入成本进行计

算，我们就无法抛开收入分配而对经济效率进行衡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客观的方法衡量产品生产所用的劳动量。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客观的社会核算

厂商依据市场价格变化确定成本。这为厂商选择更廉价生产方式提供了某种理性基础，即使这样的选择会更多地偏向浪费劳动的工艺。如果想找到关于成本方面更客观的信息源的话，我们需要一个独立于市场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统。这时就需要引入计算机技术了。我们需要一个计算机化的信息系统，它能准确估算不同工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并将这一数据提供给产品工程师。

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价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这有一定的盲目性。一位艺术家死时分无分文，而几十年后他的作品几经转手却已价值百万；股票市场被突如其来的恐慌所袭击，仅仅几个小时，股票市值就蒸发了数百亿；因为价格过低，农民不得不销毁自家庄稼。走过英国或美国的贫民区，你会看到人们憔悴的面庞和发育不良的身躯，因为食品价格对他们来说太贵了。

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两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赖于人们的实际需要，而依赖于支付的能力和意愿。这意味着财富的分配、一时的心血来潮和时尚潮流都会影响需求。供给受制于更加单调的约束：用于进行生产的资源。

一幅凡高的新作品需要凡高自己来创作，但凡高又在哪里呢？所以，凡高原创作品的供给不可能再增加。而这些现存的原创作品由于承载了人们对这位作家的无限遐想，其价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虚荣心无限推高。

西红柿的供给依赖于劳动、土地、阳光、水、温室、油等等。它们的生产成本取决于农业技术和投入的成本。它们的供给受制于客观的约束，这限制了它们的价格。

我们永远不能合理估算达芬奇现在一幅作品的创作成本，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应该可以对不同的产品的客观费用做出一些估计。原则上，我们可以对任何广泛使用的资源的费用做出估计。在工业社会，我们可以根据生产中消耗的产能给商品定价。如果由于环境原因，工业生产面临着全面的产能限制，那么也许就该换一种产品定价方法了。我们支持用劳动时间作为计算的基本单位，因为我们认为社会是人

的社会，至少从目前来看，人们怎样生活至少比任何一种自然资源都重要。我们会在第五章回过头来讨论基于环境的考量而反对过分依赖基于时间的核算方法。

定义劳动量

为了按照劳动去估算成本，我们需要给一个产品的劳动量下定义。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西红柿的劳动量，就不能只计算农民照看和采摘它一共花费了多少秒。我们还要将间接劳动考虑在内：人们建造培育西红柿的温室所花费的劳动；石油工人生产温室所需燃料的劳动，等等。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循环的矛盾中：要想知道一种产品的劳动量，我们就还要知道另外好几种产品的劳动量。

为了解决这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问题，我们需要的一个投入-产出表。它记录着一些部门的产出是如何被用作另一些部门的投入的。在表 3.2 中给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门每周消耗 2000 桶原油，雇佣 2000 名工人，生产 40000 条面包。石油部门每周雇佣 1000 名工人，耗费 500 桶原油，生产出 2000 桶原油。这个简单的经济体净生产 40000 条面包和 500 桶原油，作为 3000 名劳动者食品和燃料。

表 3.2：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系统

部门	投入		总产出
	工人	原油	
面包生产	2000	2000	40000 条面包
原油生产	1000	500	3000 桶原油
合计	3000	2500	
净产出			
面包	40000 条面包		
原油	500 桶原油		

表 3.2 所展示的关系可以被用来计算原油和面包中的劳动量。

先来看面包。我们希望发现，生产一条面包需要多少个“人-周”的劳动时间。一个人劳动一周可以说创造了一个人一周的价值。我们从表中可以知道：

$$40000 \text{ 条面包的价值} = 2000 \text{ 人-周} + 2000 \times \text{桶原油的价值} \quad (3.1)。$$

也就是说，面包生产中创造的价值，等于这项生产中直接劳动，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间接劳动。为了说明面包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周”的价值，式（3.1）可以被化为一下形式：

$$\begin{aligned} \text{面包的价值} &= (2000 + 2000 \times \text{原油价值}) / 40000 \\ &= (1 + \text{原油价值}) / 20 \end{aligned} \quad (3.2)$$

因此，按照劳动，如果我们知道原油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的价值。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3000 \text{ 桶原油的价值} = 1000 \text{ 人-周} + 500 \text{ 条面包的价值} \quad (3.3)$$

所以，2500 桶原油值 1000 人-周，而一条面包值 1【人-周】的 0.4 或者五分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算出面包的价值：

$$\text{面包的价值} = 1.40 / 20 = 0.07 \text{ 人-周}$$

所以最终结果是，一条面包和一桶原油的劳动价值分别是 0.07 和 0.4 人-周。^[1]

规模问题

在《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1983）一书中，亚力克·诺夫强调了现代经济的规模的重要性。他说苏联经济包括 1200 万种产品，并且引用了 O·安东诺夫的估计：为乌克兰起草一个完整且平衡的计划会耗费全世界人口超过 1000 万年的劳动。

同样的争论也适用于计算劳动价值。投入产出表格里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一回事，而解开一个由 1200 万个方程式组成的联立方程组却是另一回事。但是，仅仅指出计算一个大经济体的劳动价值是复杂的这一事实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知

^[1] 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投入产出表，只有两种投入和两种产出，而真实的经济中会有成千上万种商品。但无论经济的规模如何，数学方法都是一样的。从投入产出表中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线性方程：

$$L_1 + I_{11}v_1 + I_{12}v_2 + I_{13}v_3 + \dots + I_{1n}v_n = Q_1v_1$$

$$L_2 + I_{21}v_1 + I_{22}v_2 + I_{23}v_3 + \dots + I_{2n}v_n = Q_2v_2$$

...

$$L_n + I_{n1}v_1 + I_{n2}v_2 + I_{n3}v_3 + \dots + I_{nn}v_n = Q_nv_n$$

L_i 表示第 i 个行业中使用的直接劳动量。 I_{ij} 是第 i 个行业使用的第 j 个行业的产出品的量， v_i 表示第 i 行业产品的单位劳动量；而 Q_i 表示第 i 行业的总产出。我们有 n 个等式和 n 个未知数： v_i 。因为独立等式的数量和未知数的数量相等，所以从原则上讲，我们可以解出 v_i 。而这些未知数正是我们在寻求的所有产品的劳动量。

道它到底有多复杂。诺夫引证的例子让我们感觉这是一种庞大的难以处理的复杂事物，而这种印象似乎关闭了进一步研究的大门（我们应该指出，诺夫绝不是唯一做出这种结论的人。这种论点在反社会主义者中经常可以见到。我们举出诺夫的例子来证明即便是左倾的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复杂性也往往束手无策）。而我们需要描述一套法则，这些法则能决定为复杂程度不同的经济所做的劳动价值计算需要耗费的时间。

用人工方法准备这个方案（或者计算劳动价值）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用计算机也不行。为了着手做这件事，我们需要在将要制定的经济规模和所需的计算机工作时间之间建立数量关系。计算机科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复杂性理论所研究的，正是进行计算所需要的时间。

复杂性的理念

复杂性理论解决完成计算所需要的不连续步骤数量的问题。这些不连续步骤大体上要与在计算机程序中执行的指令一致。举一个例子来考虑这个问题。

给你 99 张卡片。每张卡片上分别印着 1 到 99 这些数字。卡片的顺序是任意的。你需要把他们按升序排列。你会怎么做？有一种解决方案需要应用下面所述方法。

(1) 把第一张卡片与第二张比较。如果第一个比第二个大，则交换它们的次序。

(2) 用第二、三、四对卡片去重复步骤一，直到你到达底部。

(3) 如果你发现这一叠卡片的顺序是正确的，那么你可以停下来了。否则，你还要重新进行第一步。

用这种方法给卡片排序会用多长时间呢？这取决于卡片原有的顺序。最好的情况是，卡片一开始就是升序排列的，这样进行一遍 98 次的比较就足够了。最坏的情况是，卡片一开始是降序排列的。你现在需要将顺序颠倒过来。你看到的第一张卡片上的数字是 99。第一步将它移动到第二张，然后第一步会被重复直到我们翻到这一叠的最后一张。每一次，印有 99 的卡片都会被移动一个位置。最终，经历 98 次重复，它到达了底部。

于是，一次对这叠卡片的单程扫描会把一张卡片移动到正确的位置。开始时，有 99 张卡片都处于错误的位置。所以，我们需要对折叠卡片做 99 次重复扫描。最坏的情况下，操作的次数将会是 n^2 （ n 表示卡片的数量）。

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 (1) 依据卡片的末位数字是 0, 1, 2, ……9, 将这一叠卡片分成 10 组。
- (2) 将各组按照 0 到 9 的顺序排列, 形成新的一叠。
- (3) 从叠的底部开始, 依据每张卡片的第一位数字, 将它再次分成 10 组。
- (4) 重复步骤 2。这一叠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种方法, 我们只需要对每一张卡片看两次。操作的次数也就是 $2n$ (n 表示卡片的数量)。相比于前一种, 这显然是一个更快的方法。我们说它需要耗费时间量级为 n 。

时间量级为 n 的问题比时间量级为 n^2 的问题要容易。需要指数级的步骤才能解决的问题是最糟糕的。指数问题通常被认为实际估算起来很复杂, 除非 n 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在考察一个经济计划问题和用计算机进行必要计算的可行性的时候, 我们需要确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时间量级和输入数据的规模 (n)。

简化劳动价值问题

让我们回到在一个经济体内计算各种产品的劳动价值这个问题。生产的条件可以体现为一个投入产出表。从这个表格中我们可以得出一组方程, 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理论上, 这些方程无疑是可解的——我们所列的方程数和我们要解的未知的劳动价值是相同的。问题在于, 这个系统实际上是否可解。

解决这些联立方程的标准方法是高斯消元法。^[1]这和学校教课书里的方法是一样的。这种方法可以在与方程组内方程数量的立方成比例的运行时间中得出精确解。^[2]

让我们假定, 在要进行计划的经济中, 不同的产出类型是百万 (10^6) 量级。这种情况下, 高斯消元法应用到投入产出表格里, 将需要 (10^6) 的立方次也就是 10^{18} 次迭代, 每次迭代需要 10 次原始的计算机指令。

假如我们能在一台现代的日本巨型计算机例如富士通 VP200 或者日立 S810/20 上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这些机器在处理大规模数据时, 可以

^[1] 我们从 n 个等式 n 个未知数开始。通过将第 n 个等式乘以合适的倍数, 可以将其减少为 $n-1$ 个等式和 $n-1$ 个未知数。然后, 迭代执行这一步骤, 我们最终得到 1 个等式一个未知数。这一等式是直接可解的。然后, 我们再把这个值代回到之前的 2 个方程 2 个未知数的系统, 如此循环往复。

^[2] 背后的原理并不复杂。要消去任一变量, 我们必须执行 $n(n-1)$ 次乘法运算。有 n 个变量要消, 因此问题的复杂度的量级为 n 的立方。

在一秒内进行大约 2 亿次计算。(见 Lubecketal., 1985)^[1]。所以, 计算经济中所有劳动价值所需的时间将会是 500 亿秒或者 16000 年。这显然太慢了。^[2]

遇到这种量级问题时, 常常把任务重新划分成不同阶段。在实践中, 一个经济的投入产出表格多半会是空白的。在现实中, 每种产品平均只有数十个最多数百个投入, 而不是一百万个。这使得用一系列向量而不是一个矩阵来表示这个系统会更合算。其结果是, 我们可以走捷径得出结果——使用另一种方法, 即逐次近似算法。

这个想法是, 作为第一个近似值, 我们忽略生产过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费的劳动之外的所有投入。这给了我们第一个每种产品的劳动价值的近似估计值。这将是一个低估值, 因为我们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非劳动性投入。为了得出第二个近似值, 我们在第一阶段中计算的劳动价值的基础上添加了非劳动性投入。这将会使我们向真正的劳动价值又接近一步。重复应用这种处理过程, 将使我们得到所需精确度的答案。如果一种平均产品的价值来源于直接的劳动投入, 那么围绕我们的近似值的每一次迭代过程都会给我们的答案增加一位二进制有效数字。一个精确到四位十进制有效数字的答案(比市场可以得到的更精确)将需要在求解过程中进行 15 次迭代。

这种算法^[3]的时间复杂度, 与每件产品投入时间的平均值的数量成比例。根据我们原先的假设, 这将在超级计算机上用几分钟完成, 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几千年。^[4]

^[1] 计算机技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应该牢记这一点。到 90 年代中期, 制造商希望实现能够进行每秒十万亿次运算的机器。

^[2] 富士通 VP-200 是 1983 年出的超级计算机, 速度不过 400MFLOPS。一直到 1990 年, 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只有 23.2GFLOPS (NECSX-3/44R, 1990)。计算机技术一直在进步, 到了 2013 年, 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是中国的天河二号, 速度达到 33.86PFLOPS, 即每秒 3.39 亿亿次双精度浮点运算。对于文中列举的计算量, 1983 年的超级计算机要 500 亿秒才能完成, 三十年后的超级计算机则只需 250 秒左右。——译者注

^[3] “算法”一词是 al-Kowarizimi 这一名字的变体。al-Kowarizimi 是九世纪波斯数学家。他写过一本书, 普及了使用印度十进制系统进行的基本算术。现在的“算术”这一术语就是在这本书传入欧洲时, 被为“算法”(algorithmics)的。它与使用算盘和罗马数字系统的算术“arithmetics”不同。Algorithmics 的关键点是使用一组简单的规则和基本的加法和乘法表。把这些规则和加法乘法表背下来, 就能进行任意大小数字的计算。扩展到其他数学问题, 算法就是不需要太高智慧, 能一步一步执行下来, 得到某种结果的过程。长除法或者取平方根时就会用到简单的算法。这种算法的正式名称是递归过程, 使用这种方法, 能够在有限数目的步骤内能得到问题的答案。任何能够表达为算法的问题都能被机器求解。

^[4] Hodgson(1984,p.170)宣称求解投入产出表的最好方法需要 n^2 计算。但是他们没有对此给出解释, 我们假定他会使用迭代方法(要不然复杂度就会为 n 的三次方), 但是他没人认识到技术系数矩阵会是稀疏的。所以正如上面证明过的那样, 更好的运用数据结构, 可以大幅度地减少复杂度。

高科技和中等技术的解决方法

对整个经济的劳动价值的计算，在今天使用现代超级计算机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完成。这类计算机价格很贵，但还可以接受。它们已经被广泛用于天气预报、自动化武器设计、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给国家计划局和气象局同样的计算能力并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级计算机技术已经为少数国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国和日本。英国通过使用高度并发的处理器现在已经拥有了生产有这种机器的能力；爱丁堡大学正在研制一台每秒计算 100 亿次的机器。截止 1988 年，苏联有数项计划正在开发类似的超级计算机，但是似乎没有投入批量生产的。（见 Wolcott 和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实用相当低水平的技术就能够取得本质上相同的结果。下面对实现方法进行简要概述。

中等技术方法需要四个组件。第一个组件是文字电视广播，如熟悉的英国公共商业电视 Cefax 和 Oracle 。它们是用少量电视频道的带宽就可以传递新闻、体育、前期等数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统。第二个组件是公共电话网络。第三个组件是配有接收文字电视广播的个人计算机，现在每台总价约几百英镑。第四个组件是零售业中统一的产品编码系统。统一的产品编码就是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产品所带有的条形码上的数字。

除了规模极小的公司外，在个人计算机上使用电子表格程序包进行成本分析已经几乎成为标准实践。在我们假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个生产单位都用一个这样的程序包来建立其生产过程的模型。这个电子数据表格模型将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劳动量，其他各项投入以及总产出。

在有了各项投入的劳动价值最新数据的情况下，这个电子数据表能够迅速地计算出产出的劳动价值。

从哪得到最新的劳动价值呢？它们会被公共广播机构在文字电视广播上持续不断地广播。和以前一样，我们假设有一百万种产品，文字电视广播能够每二十分钟广播一次修正后的劳动价值。产品会通过统一的产品编码被识别。个人电脑侦听并更新电子数据表模型，以回应任何广播的劳动价值的变化。

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某个工作地点的个人计算机认定当地的劳动价值变化了，那么它将会提醒中心的文字电视广播的计算机并通知这个变化。这类改变或者是由于当地生产技术的一些改变，亦或是由于某种投入品价值改变的广播。整个系统将会像一台分布式的超级计算机一样，不停地通过逐次逼近法去求解劳动价值。

尽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简单的技术，上述方法比一台中央高级计算机更有优势。它不仅进行计算，而且进行数据收集。众所周知，数据收集是任何计划系统中最困难的部分。其次，它将是一个更加健全的系统。如果一些小计算机发生故障，其中一些劳动价值的到会过时，但整个系统会幸免于难。唯一易受破坏的点是中心文字广播电视系统，但它比中央超级计算机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备份机器来进行复制。

使用这个分布式计算系统，每个生产单位都能用得到它计算的各种备选生产方案的社会劳动成本。这些数据，即便不是按分钟，也是按小时进行更新。这一系统更新数据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市场快太多了。

（尘沙译 黑夜里的牛校）

第四章

计划的基本概念

计划经济的思想已经不流行了。纵览当今的世界状况，人们很容易认为计划经济已经过时了。由于美、英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之后经济增长迟缓，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们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在曾经的“铁幕”的另一边——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崩溃几乎是人们看到的全部。即使资本主义明显存在缺陷，计划似乎没能提供另一种可能的选择。社会主义者的自信陷入了历史低潮。

我们在逆流而行，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自信。传统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失败”了，这并不假，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罗斯被放弃的制度只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特殊形式。那是一种由国家对军需品的需求塑造出来的体制，因为苏联是一个陷入军备竞赛，且经济发展水平一开始远在其敌人——一开始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之下的国家。军备竞赛和相应的贸易制裁是美国拖垮苏联的公开、蓄意的政策之一。经济的军事化结构之于社会主义苏联正如其之于资本主义以色列，并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其他的经济制度是可能存在的，而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能有效满足消费者需求，同时导向经济平等、政治公正、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的轮廓。其次，我们认为新的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代价是社会难以承受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接受这个观点。收入、财富分配和经济安全的两极分化；对社会福利和公共利益的无视；对自然资源盲目的开发——所有这些里根-撒切尔时代的遗留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相信，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是解决这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将介绍我们关于这样一个新计划经济制度的设想。我们将从整体上讨论经济计划的关键特征及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之处。之后几章将详细讨论我们认为会很有效的计划机制。我们将指出它和传统的苏联“官僚计划经济”的不同，并说明我们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过利用最新一代电脑的非凡力量来付诸实践。

计划和控制

计划可以看作控制论——对调节系统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论一般处理自动工业设备中的控制问题。自动控制的过程通常可以表示为一个反馈回路；中央供暖控制器就是一个反馈系统的例子。比如目标是为了在指定时间内——例如九点到六点——保持某场所的温度，这个目标或期望的温度就可视为一个计划指标。建筑物内的实际温度就是该设备（中央供暖控制器）的输出。实际温度与指标相比较，产生一个误差信号（实际和期望温度之差）反馈给控制器。它控制流入中央锅炉的燃料，以调节温度。

简易的暖气控制器只是简单地根据温度偏低或偏高打开和关闭燃料开关。这将导致如图 4.1 的不稳定的温度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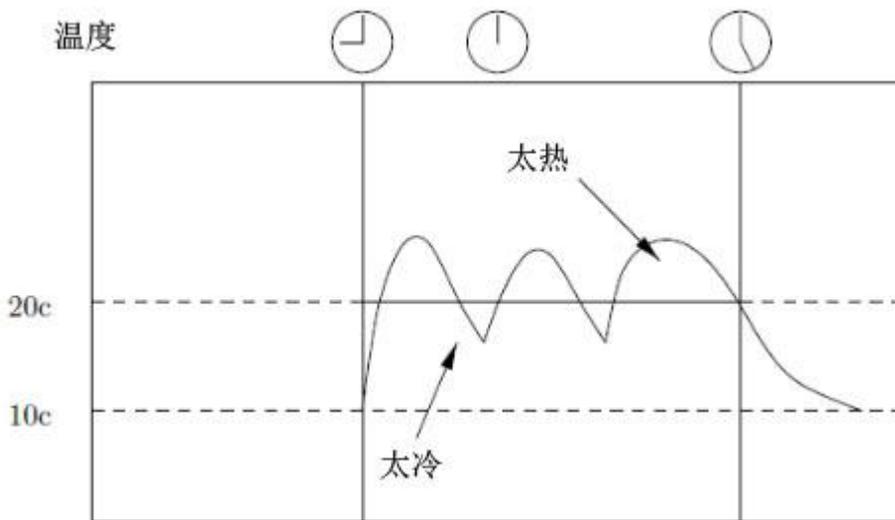


图 4.1：粗糙的控制器

在这个例子中，暖气 9:00 打开，但直到 10:00 屋子才暖和起来。然后屋子里过热了一会儿，直到暖气被关闭。之后建筑物内的温度下降，直到 11:30 暖气重新开始工作，在 12:30 又达到过热状态。剩下的时间里温度继续波动，我们都熟悉办公室里的这种系统！

这种控制器的问题是它缺乏预见能力，且不考虑设备如何响应的问题。更智能的控制系统能够了解设备的参数。它了解锅炉的热量输出，同时用温度函数描述热量通过墙壁和窗户的耗散速度，从而也就知道了建筑物内的准确热量。给出一个供暖时间表，它就能预测何需要打开加热开关来保证 9:00 时足够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温度将要达到目标时逐渐关闭锅炉来避免过热。智能控制器可产生如图 4.2 的温度变化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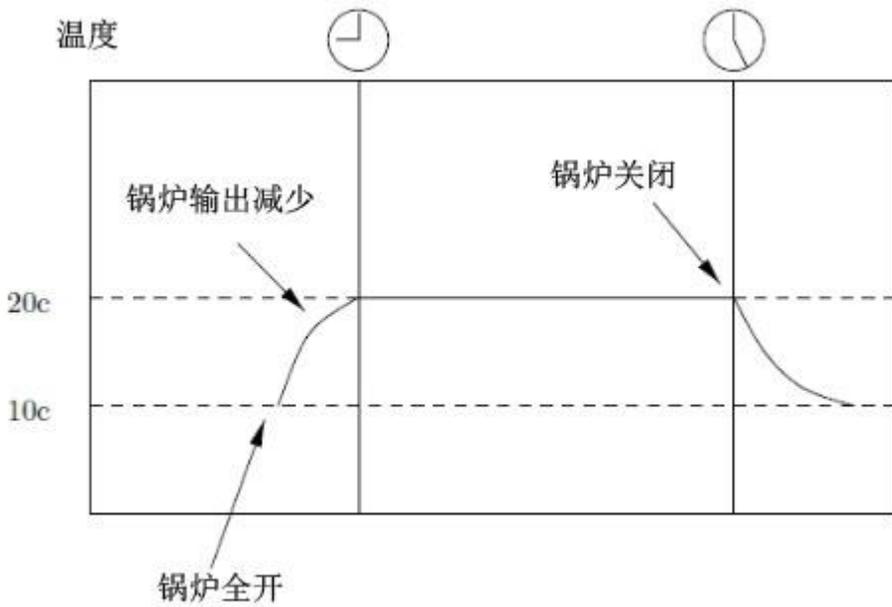


图 4.2： 智能控制器

这种情况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简易计时器和恒温器更复杂的设备。它需要控制整个体系的变化并满足一系列指标。控制器根据它对所控制的体系的了解制定一个计划来满足指标。提前几小时开始加热以保证到时房屋足够温暖，并及时关闭来预防过热。它之所以做得到这些事情是因为它能用数学模型模拟真实体系在不同输入下的反应。其内部对所控制的系统的特性与系统反馈的模拟能力意味着它没有第一种控制器的实验性和试错性操作。

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可与之类比。资本主义公司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比如对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关系的信号。它们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调整生产以应对这些信

号。这种控制模式与笨拙的中央供暖控制器相同：被动而短视。于是必定会发生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实际上的情形更糟，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数量众多的企业对不同的信号会做出什么目标一致的举措。至少，笨拙的中央供暖控制器还有清晰的总目标。而市场经济就没有这样一个总体目标。尤其是消费者的需求不能作为目标或用于控制的输入，因为只有在他们有钱购买商品的时候他们的需求才有意义。但消费者的购买力是经济的一个内部变量，它本身就随失业率、信贷市场的状况等而波动。正如恒温器的控制被锅炉燃料的消耗量影响。

亚当·斯密提出了对市场力量的有力比喻：“看不见的手”。据说，私有企业对私人利润的追求，和消费者对个人利益的维护将产生这样的结果：“似乎”体制是为了给所有人谋求最大的幸福而设计的。现代的一般均衡分析得出了很有用的理论成果，就是说明要达成斯密结果需要多么严格的条件（见 Hahn, 1984）。二十世纪的经济史——其中包括大规模失业，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环境破坏已用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不能依赖市场力量实现社会满意的结果。

资本主义的目标是次要的

如果消费者的需求不能扮演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供外部控制参数的角色，那么政府的政策可以吗？只有在有限的程度上可以，因为资本主义政府为他们自己设定的经济目标是次要的。这些目标与人民需求的直接满足无关，而是与经济制度本身的特征和缺陷有关。例如，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府政策的两个主要针对目标，都不是直接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货膨胀与我们怎样对商品定价有关；这是一个计量问题。通货膨胀既可以发生在极大的物质贫乏的条件下，如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也可以发生在相对处于物质繁荣时期的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通货膨胀率本身并不会说明经济对人民需求的满足情况。国际收支平衡也仅是一个次要现象；它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债务人还是债权人。这是对合同关系的合计，同样不能度量人民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这并不是说，通货膨胀和贸易平衡是无关紧要的，只是它们是经济制度运行中的次要问题。失业问题也是这样。

失业确实会间接影响需求的满足。失业者忍受着生活质量下降的痛苦，全体人民（不如失业者明显）亦同——由于因缺少劳动者而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这又是

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引起的问题。人们无处劳动，从而需求得不到满足，与此同时能满足需求的机器和设备却闲置着，只因为企业认为满足这些需求无利可图。

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上唯一的首要目标就是增长率。这确实和经济满足需求的整体能力相关，但在统计的过程中，许多东西被掩盖了。增长率意味着什么？通常认为“真实增长”是生产总值减去通货膨胀率。其真正意义就是另一码事了。能不能说经济增长了五个百分点，人民的幸福就增长了百分之五？假如增长是以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呢？或者是以破坏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呢？如果增长的代价是空气和水的污染呢？所计算出的经济增长中有多少真正促进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呢？除了从中直接获利的人以外，广告业或信贷业的增长真的能满足谁的需求吗？

什么才应当是首要目标？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它的重点在于计划系统把民主决定的目标加诸经济发展过程之上的能力。让我们先考虑一下，政府应该让计划经济承担什么目标。

历史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推动快速的工业化，其本身就是一个实现集体安全，建设基础设施，以提高社会供给和个人消费水平的手段。在发展程度相当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有更快的工业化速度。根据保罗·葛瑞格利（Paul Gregory）的详细研究（1970），这一点基本上是毫无疑问的。

对于已经工业化的经济，社会主义计划则有以下经济目标：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广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只要明显的“工人阶级”还继续存在。这包括社会供给（公众消费）水平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消费品种类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工作时间的减少和业余时间的增加；并尝试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实现个人价值。

（2）建设长期的资源节约型发展路线，即关注环境和生态，避免由于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留下未来难以解决的问题。

（3）通过逐步淘汰重男轻女的经济形式，改变经济结构，确保性别间的真正经济平等。

（4）减少阶级、地域（在欠发达地区还有城乡）间的不平等。

明显，这些都是很大的目标（虽然比资本主义政府的传统经济目标更具体）。它们必须在制定可操作的计划时被进一步细化，下一部分就将考察这个过程的不同方面。

计划的层次

计划的决策可分为三个层次：宏观计划、战略计划、详细计划。这些层次间的联系如下。

首先，**宏观计划**设定一些基本参数来管理长期的经济运行。具体来讲，它关注不同最终用途的高度集中的生产种类对总生产的细分（或者，我们更愿表达为对总劳动时间的细分）。多少社会生产力应该花在消费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托儿所之类的社会福利上？多少花在生产资料的积累上以增强未来经济的生产能力？多少花在偿还外债（如果有）或获取外国资产上？宏观经济计划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同时，它也必须回答现有的生产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一定是“越集中越好”，尽管在战时这是正确的。例如，资本主义政府可能通过削减总需求，制造失业以降低通胀率——这就是一种宏观经济计划。社会主义的计划部门当然不会考虑制造失业，但也不会让人们拼命工作。当宏观经济计划的决策者们计算有多少劳动时间将用来满足不同需求时，在生产劳动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权衡方面，将考虑人们的偏好。

其次，**战略计划**关注产业结构的变化。已知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将分别用于公社会福利，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生产，那么应该发展哪些部门，开发哪些技术？哪些商品在其他国家生产更便宜，应该进口？长期来看，哪些产业应该被淘汰？战略规划中，诸如各种产业、技术对环境的影响，评估可投资项目要用什么标准才合适等问题，都必须考虑。

最后，在宏观的和战略的产业计划确定了基本框架后，**详细计划**关注资源的精确分配：哪些产品将在哪里，用多少劳动力，以多大的数量生产出来？哪些生产单位从哪些其他单位获取产品？等等。

资本主义政府有能力出台一些宏观层次和战略层次的计划（但除了战时以外，他们明显都不尝试制定详细计划）。但由于这些政府没有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他们的计划能力有限，且需要资本家的企业和其他私人机构的配合。就宏观计划而言，

例如，政府想增发货币，降息以刺激投资，引起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积累生产资料。但企业如果认为投资没有足够的利润，低投资率将保持不变。又比如，政府想通过减税增加总产值，促进就业，但如果消费者选择将从减税获得的利益花在进口商品上，结果将是贸易赤字，而不是扩大国内市场。

至于资本主义的战略计划，有日本的通商产业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显著的成功范例。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模式和本国的竞争优势，通产省富有远见地对日本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根据通产省的统计，那些在长期竞争中前景良好的企业都是有国家基金支持其研究发展的。对这个过程的更好叙述详见 Keith Smith（1986）。通产省的成功是难以复制的；它依赖日本的企业与该机构合作的意愿，而政企合作的环境不是立法就可以创造的。

大体上，由于社会主义政府有生产资料的产权，能够更容易出台连贯的、有效的宏观计划和战略计划。当然，政府有这种能力的事实本身并不保证这种能力能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计划的过程随时都是民主的并且欢迎讨论的，又能系统地号召起科学界的最大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其结果将比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更好。

下面五章将在不同方面详述计划的概念。第五章详细讨论关于战略计划的问题。第六章讨论高效的详细计划的要求。宏观计划在第七章讨论。而消费品市场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整个计划过程中的信息需求问题。

（未完成的乌托邦 译，黑夜里的牛、子辰校）

第五章

战略计划

我们这里所用的**战略计划**的这个术语带着某种综合性。在这一章里，我们对计划做了诸多方面的探讨，主要会谈到经济的整体结构，但并不能将这个结构想当然地轻易划归到宏观经济的或详细的生产计划的主题下，这两个问题我们将会在外章节里解决。

本章讨论的主题如下：

- 1，产业结构的计划；
- 2，需要考虑的环境因素；
- 3，投资计划以及生产的时间维度；
- 4，有关商品和服务分配模式的计划；
- 5，农业生产计划；

产业结构计划

我们可以对由政治决定长期生产目标的许多领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给、通信、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做一些可实现的预想。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做出一些“崎岖坎坷”的决定。例如，新住房的开发形式就是个绝佳的适合作民主讨论、民主决议的问题。或者还可以思考一下关于私人交通出行的问题。

国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车还是公共交通是一个对社会有巨大而长期的影响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每个人基于独立意识做出的决定的总和并不一定与对社会最理想的结果相符。在那些大工业城市的交通运输还依赖于火车和有轨电车的时候，人们坐车通过城市中心可比现在快多了。当然，对于那些能买得起私家车的人来说，这些新兴的私家车确实比电车速度要快，因为他们不用每站都停下来载客。但是当越来越多的私家车涌上道路的时候，交通堵塞也越来越频繁了，整体来看，造成的结果

就是私家车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变得比以前慢了。因为私家车总是保有对公共交通的速度优势，所以人们也就一直热衷于自驾出行。因为不断增加的私家车的使用抢走了公交车和电车的生意，这些公共交通服务的境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城市里常常出现的危险而堵塞的道路、空气污染以及越来越冗长的旅途用时。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基于经济状态的社会决定，有可能产生比仅仅是个人决定的总和更优越的结果。

放宽还是限制私家车的使用，是一个对国家工业有着巨大影响的决定。对一个大国来说，汽车制造业也许直接或间接地雇佣了数百万的工人来制造汽车或汽车零部件，供应汽油，维修汽车，修建和养护公路等等。私家车的占有量还会影响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业的类型。战略规划应该系统地考虑这些派生问题。如果决定要限制私家车的使用，那么计划就必须对与汽车制造业有关的劳动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应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关于一门已经被充分了解的工业技术。然而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产业战略规划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的问题。回顾以前的工业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工业潮流是由一系列不同的产业领域所引导的：纺织业、铁路、重型机械制造业、化工行业、汽车工业、耐用消费品、电子工业等。每一个工业经济体的成功，都依赖于该经济体迅速发展这些先锋行业的能力。在前两次的工业发展潮流里英国处于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国。美国是大规模生产汽车和耐用品的先锋，然而随着电子行业浪潮的到来，领导者的地位流转到了远东。

新近的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有一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已确立的工业基础，由此出发就可以全力建设新兴工业。苏联在 30 年代到 50 年代间通过扩大发展重工业获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率；台湾和韩国通过电子行业也得到了四十年的类似程度的发展。这种最初的工业发展很适合进行计划，因为负责计划的机构能把当今世界上现存的先进国家的工业结构直接照搬过来。

对于一个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来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领跑工业潮流是很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现成的可以照搬。旧产业的投资必然要压缩，以支持新产业的发展。而构成新产业潜在可能性的基础的，是某些尚待开发的技术。这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必须要制定一系列计划，这些计划能够预测当前科学研究在未来产生的结果，而未来全新的工业体系都要建构在这些科研成果之上。要能够识别出将来所必需的知识、科技和技能，并能组建有能力把科学转化为技术的研发机构。要重

新组建能够“生产”出有能力使用这些新技术的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机构。最后，必须能构思和设计出将要由这些新技术制造的消费品，并创造出相应的生产流程。还要发展生产设备以及零部件供应，建设新的生产线并投入生产。

如果经济发展不停滞，将会以 10 到 15 年为一个阶段不断地做出这种产业结构调整的计划。这种水平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这一点并不是十分清楚。哪种技术很有可能在未来的 10 到 20 年里是有价值的？这样的知识一开始会聚集在一个小型的研究团体里，而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很难在这个问题上作出判断。不过，也许可以先让技术专家们提出若干有关未来工业发展的可行的选择方案，然后在公众讨论中征求意见。

负责制定战略计划的计划部门的人员组成必须按照计划相关的时间尺度来决定。长期计划必须要是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从日常工作中调派过来的）共同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制定的。对于 5 到 7 年的计划的制定，会由更多的经济学家在产品工程师的协助下完成。短期计划要在产品设计师和工业主管人员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础上制定。

使得战略规划成功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这些计划利用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天生固有的矛盾，因为就其定义来说，创新并不能在其发生之前就为人所知。然而，一个新的概念发展成为一个常规的工业应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即使创新的过程也许在一开始不可能被计划，但随着这一过程的发展，计划越来越变得可能。任何现代工业经济通常都有一个工业发展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使不可知变得可知，使可知的变成可用的。科学研究成为社会分工劳动的一个分支，并且，在技术层面上来说，还相对独立于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这并不是说社会关系对创新的过程毫无影响，很明显是有影响的。但是相比一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来说，经济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对于创新似乎并不十分重要。创新是劳动分工的一个分支，在这种劳动分工中，一个经济体可能擅长也可能不擅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新科技转化为工业应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国因其科技创新步履迟缓而臭名昭著，快速进行科技创新的日本广受赞誉。这个原因不能过于简单地做出解释，当然更不能归结于“市场越自由，创新程度越大”这一简单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一个社会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应该同等地被纳入考量范畴。

除了这些难以衡量的因素之外，一些具体的客观因素也在起着相应的作用：一个社会的教育体系的优劣能起到什么作用？有多少国民收入用到了研发上？这些研发经费多少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军事研究？一个社会有没有这样一些机构，它们能整合产品从基础设计研究到制成成品整个发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一个社会花在教育 and 民用研发上的经费数量和它的创新速率之间有着许多显而易见的联系。在民主计划制度中，像国防、教育和研发这些国家预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一年一度的普选决定。但这样的制度并不保证会把大量的预算支出用于研发。这一决策对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公民可能会给一个优先级较低的考虑。但这是他们自由而从容地做出慎重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公司会计师狭隘的个人决定带来的副作用。

研发要想有效率就必须有一个涵盖了纯学术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和大规模生产等各个时期的传输带。亚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表明这个传输带的后期阶段尤为重要。西方资本已经有足够多的公众资金支持纯学术研究，但是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过多地面向了武器生产。结果就是制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战斗机和火箭，但是生产民用一般产品的创新能力却消失殆尽了。在将新技术应用于视频录像、摩托车和照相机这些贴近民众生活的产品的方面，美国和英国都没有苏联做得好。国防工业是惟一个把公共资金支持的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引入生产的行业。对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来说，想要把科学用于提升民用工业，那么绝对首要的是创造一系列民用研究机构来代替那些军工复合体。

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在第四章我们谈到，社会主义经济需要采取一种环境友好的发展政策。本节我们将探讨这一目标的可能后果，并且评估市场和计划关于环境问题的相对优劣。一些深入的相关问题会在第 14 章展开，那时将聚焦于确保谨慎借鉴使用自然资源所要求的财产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任何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都被用于生产的人类劳动总时间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一次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批判中，Don Lavoie (1985) 再一次提出了一个陈旧的反对理由：劳动价值不能充分处理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问题。其论据是，根据劳动价值而言的成本花费无法处理自然的或者非劳动的投入。

在市场体系下，自然资源都有一个价格标签，从而会计入生产成本中。但在劳动理论里它们是免费的。因此，他们争论道：劳动理论会低估由稀有自然资源生产的产品成本。

这是个严重而危险的问题。但这个源自冯·米塞斯的论点也能反过来反驳那些支持市场的人，因为理性使用自然资源正是资本主义的弱点，同时又（潜在地）是社会主义的强项。

自然资源的“自由市场”价格是如何确定的？经典的回答是来自级差地租。在这种语境下，那些边际^[1]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费的，并且生产的边际成本来自于劳动（而在新古典理论里，是资本）的投入。采自边际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资源，但在市场体系下这种消耗没有价格。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对于处于边际位置的资源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这里，我们值得回顾一下马克思对美国拓荒潮的看法。由于殖民者从沿海诸州迁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里的土地质量。随着原本在地理上很边缘的土地变成了最高产的土地（因为是从印第安人那里偷来的，所以这些土地都是免费拥有的），所有在自然资源开采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后农业生产活动（没有轮耕而是单一作物种植）在这片大地上开始了，但这种生产活动造成了土壤肥力的急剧枯竭。在大多数市场主导型经济体里，这种生产活动的特点造成了灾难性的土地风沙侵蚀区。边远地区的木材开采也有这样的情况。资本主义企业从北美西海岸或亚马逊和婆罗洲原始丛林原住民那里偷木材，将其看作是免费的自然资源。需要花费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里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市场体制会促使人们节俭地使用土地并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着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地租获得收入，在保持这一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从学术上讲，这意味着级差地租产生于边际收益的递减。政治上，这意味着地主阶级是富裕的、政治经验丰富的，并且背后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种结合只会发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资本主义时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土地由被贫农或者狩猎采集者拥有，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他们的自然资源已经被轻易地征用了。除此之外，对地主们来说，节约地使用还是开采这些资源（会破坏土壤肥力），哪个更理性，这取决于资源的贴现率。只要贴现率^[2]很高，对不可再生

^[1] 边际（margin）和边际成本这两个概念源于地租理论。这里的边缘（margin）只代表字面上的耕种的边沿的意思。故译者称为“边缘土地”，是指那种末等的质量很差的难于犁作的土地。

^[2] 贴现率是利率的一个抽象概念。如果，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如果我有一张一年后可兑换的一千

资源的竭泽而渔的耗尽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贴现率如果低而稳固，那么采取一些投资来加强土地的质量在经济上就是切实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纪英国地主阶级做的那样。但这儿我们说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资源，而是缓慢的可再生资源了。

总之，不管利润在增加还是减少，市场总是会浪费边际资源。在低贴现率和边际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它将节约使用那些缓慢的可再生资源。对于那些不可再生资源，市场总是竭泽而渔地耗尽使用。

把估算租金^[1]引进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就像苏联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样）就相当于用边际成本代替平均成本来计算劳动价值并且还假设劳动收益是递减的。但是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社会主义下的估算租金在节约使用资源方面将不如资本主义下的真实租金有效。我们提出一个更激进的观点：任何“经济的”决策机制，也就是基于单一目标函数的任何决策机制，都会造成生态破坏的结果。任何基于价格的决策过程都表达不了一系列行为的生态的和环境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都很复杂，不能还原为一个会计条目。对环境影响的任何非定性评估都是具有误导性的。一个行为对环境所造成后果必须通过科学地调研才能确定，并通过通过政治斗争方能解决。这方面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苏联科学界曾发起一场运动，以阻止在贝加尔湖沿岸的工业开发，并中止将西伯利亚河引流到南边用以灌溉中亚地区的计划。

不能保证在这些问题上一定会采纳明智的决定。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许就问题展开自由而广泛的辩论的政治条件，有科学调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终的决策通过自由投票来完成。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些决定最终几乎始终如一地都是为了符合那些能够“买到”政治影响的大公司的商业利益而作出的。在社会主义民主体制下，主要的环境问题会在持久公开的媒体辩论之后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解决。如果一个水力发电计划会使得一个峡谷被水淹没，而这个峡谷既是一个美丽的景点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生态栖息地，那么寻找可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应该实行的经济公式就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问题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也就是说，要做一个决定需

美元的邮政汇票，但其实它对当前的价值是少于一千美元的。如果我现在就要用钱，但还没到一年后，我就必须去贷一笔款并承诺一年后还钱。假设信贷公司管我要 25% 的利息，我借了八百美元，那么当我的一千美元汇票到期后我就可以一起偿还贷款和那 200 美元的利息了。未来的 1000 美元的收入就将贴现当前 800 美元的当前价值。可以这么做很明显是由于信贷制度，但资本主义经济把这个概念从他的制度框架里抽象出来并把它推为经济计算里的一般原则。

^[1] 社会主义里的估算租金意味着国家像两个私自的个人——地主和工业家——一样扮演着代理者的角色。作为地主的国家因工业用地而向作为工业家的国家收取地租。因为国家同时占有土地和工业所以这属于纯粹的内部财务运作。

要对优先要考虑的事情做一个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不能把这个决断缩减为几个简单的数字的对比，不论这个数字是用劳动时间或是金钱来表示。

资源消耗的问题是悖论性的，因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极度保护的政策会导致相似的结果。如果我们在一个持续几年的大繁荣时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么我们就剥夺了后人对资源的使用，但如果我们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么我们又是剥夺了自己对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选择是以一定的方式和速度来使用石油，可以让我们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够开发出相应的能源替代品。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市场正这样做。另一方面，有一些证据表明苏联系统性地按照这种方式处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苏联坚持在高能核聚变研究中投入大规模的资源以期开发出一种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装置如欧洲联合核变实验装置（JET）都是源自于苏联的托克马克（Tokamak）设计。而随着 1987 年新的能源号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苏联开发太阳能这一太空计划的主要目标得以被外界知晓^[1]。这些运载火箭预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轨道镜以在冬季给北极圈的工作点提供照明，建设轨道太阳能电站，以微波的形式将能量输送回地球。社会主义经济可以把这种长期项目作为常态计划机制的一部分予以实施。市场机制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他们设立模仿社会主义计划的特殊的国家机构——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或是 CEGB（中央电力局）。

生产的时间维度

迄今为止，我们对劳动价值这个概念的讨论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十年的时间里，每天工作的价值和第二天都是一样的。可能会有人反对说这太不切实际了，这样的计算体系会导致采用过度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我们可以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为了发电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形成一条高速通道，现在提出了一个在塞文河的河口处修建一道大坝的方案。由于能量是由非同寻常的高达 7 米左右的潮汐振动免费提供的，所以这个项目一旦建成就可以以一个非常低的劳动成本来发电。但是建造大坝需要大规模的土木工程，这将比建造一座同等产出的火力发电站耗费更大。

^[1] 见 87 年 8 月 10 日《时代周刊》

图 5.1 在理论上比较了这两个项目在五年期间将花费的劳动力成本。从整个 30 年的期间来看，产出等量的电力，火力发电要比潮汐发电耗费更大的总劳动成本。但是在项目建设的头十年，火力发电站的花费较之更低。如果我们仅仅基于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成本来考虑如何发电的问题，那么潮汐系统将完胜火力发电。实际上英国电力局选择不建造潮汐发电站，因为建造大坝需要偿还的贷款的利息大于投入使用后将节省的燃料的费用。如果是在一个较低的利息率的环境下，那么英国或许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仅仅用劳动量（亦即就纯粹的劳动价值方面）来看这两个选择的耗费成本就相当于是在零利率或零贴现率的环境下进行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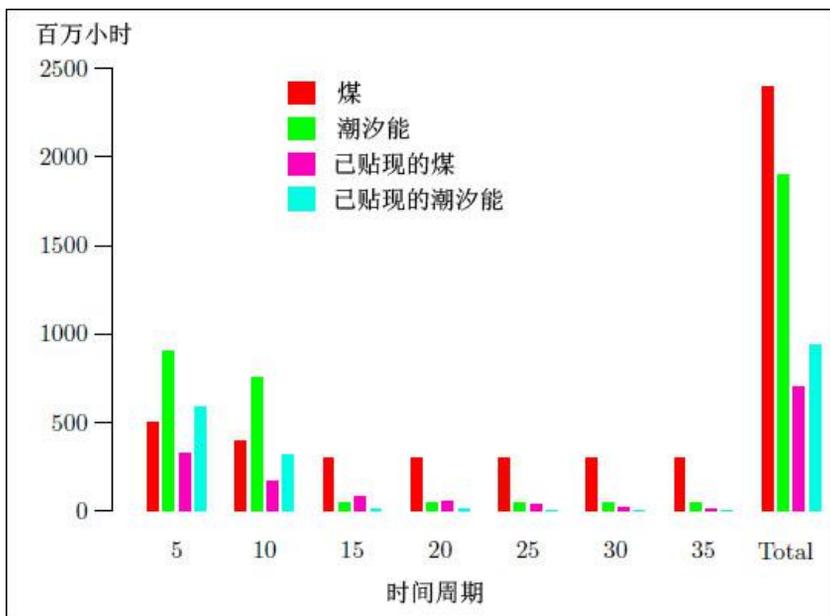


图 5.1: 9%的贴现率对两种电力计划成本的影响

无论根据主观情感还是客观现实，人们都会反对零贴现率。今天的果酱总比承诺的明天的果酱好。照这一原则，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许更好，即使这意味着以后要做更多的工作。一个主观决定的贴现率，可以通过政治的方式确定（人民每几年可以就他们是否希望贴现率上升、下降还是保持原样投一次票）。但是一个更为客观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将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作为贴现率。这样做的理论依据便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每十年翻一番，那么现在一小时的劳动将相当于 90 年代末的半小时劳动的工作（作者写此书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译者注）。因为我们永

远没法精确地预知未来，那就有必要根据最近的历史来预估将来的生产力增长。在这个基础上，人们可能会意识到电力局不进行塞文河大坝项目的决定在经济上是不理性的，因为在他们的计算中所使用的贴现率是远高于经济中实际的生产平均增长率的。这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理性的经济计算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是可能的。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贴现率是由金融市场的偶然性决定的，而这种偶然性是和实际的生产可能性完全脱节的。它是由国际资本的投机活动和金融机构里的不民主决策联合推动的，很不稳定，每个月都在不停地波动。不管是以经济效率或是民主机制做理由，在经济决策中使用这样一个变量都是站不住脚的。^[1]

市场和非市场的分配方式

关于哪种产品应该由计划直接分配、哪种应该交给某种意义上的“市场”来分配，是一个和经济的整体形态相关的战略决定。我们设想的是生产资料完全由计划分配，而消费品由市场分配。消费品市场的确切性质将在第八章阐明。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这一市场是和资本主义经济里的市场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从属于社会劳动时间的计划分配。但我们依旧面对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市场分配和非市场分配确切的分界线到底在哪里？或者说可以应该用哪些原则来判断市场与非市场的分配？

有四个要点和这一问题相关。我们会在这四个小标题下展开探讨：公民权利、选择的自由、应对稀缺和计量的成本。

公民权利

首要的原则是，一些产品和服务，应该由全民税收提供资金，作为一项权利提供给公民，因为这是全面参与生产的和公共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前提条件。这里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卫生保健和保育（我们将在第13章讨论到带有电子投票机的电视也应该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而提供，以保证政治民主的全面参与^[2]）。为了能作为一个积极的、生产性的成员在社会中起作用，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良好的教育，身体健康，并且无需整日呆在家里照顾幼小的孩子。这些产品在给予公民们“积极的自由”

^[1] 有一点必须要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计划体系中使用贴现率绝不意味着还有货币市场、贷款或贷款利息的存在。它只是用在评估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成本的计算机程序里的一个参数而已。

^[2] 这是作者在八十年代的设想，而现在就应该把电脑和宽带服务作为公民权益的一部分提供给所有人——译者注

^[1]来掌握他们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处不是仅限于公民个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富有生产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体健康对整个社会大有裨益。（用经济学里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外部效应或说“正外部性”，而人们普遍认识到，市场在一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选择的自由

第二点是，一旦公民权益的基本前提条件得以保障之后，每个公民（或者家庭、群体）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决定他们想要以何种方式来享用他们的劳动果实。国家分配或配给制是极不适应于这个要求的。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市场”，人们可以在其中花费自己的劳动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们将在第8章详细描述这样的市场。）这种分配模式将被应用于食物、饮料、娱乐、书籍、衣物、假期旅游等领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并不重要的一些产品。对一个社会来说，虽然使其成员都陷入无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扰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里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让他们能够在鱼子酱、红酒、书籍或是去高原地区旅游方面做选择却完全合乎情理。

应对稀缺

第三点关注的是，那些供给相对固定的产品在价格为零的情况下，需求超过供给的情况。拿一段堵塞的高速公路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宽旧路，但这需要花费劳动时间且可能会因为环境理由而受到反对，让我们先暂时假设高速路的供给实际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费的，那么它就会变得特别拥堵以至于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这种情况下，收取通行费用是很合理的。这是“限量供应”稀缺资源的一种方法。那些觉得快捷的个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会付通行费以满足愿望，而一些人可能会选择公共出行方式作为代替。

这种形式的过路费也会给计划者们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设正在考虑修建一条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将会在劳动时间方面耗费昂贵的代价。如果现有的公路已经过度拥堵了且没有收取任何通行费，那么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新建一条公路是划算的。

^[1] 关于积极自由的概念，请见帕萨·达斯古普塔（1986）

但如果已经征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关的通行费之后现有的道路依然拥堵的话，那么这时就有理由来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别强力的来自环境考虑方面的反对）。

这里总的观点是：反对资本主义并不是指完全反对应对稀缺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给当前社会下碰巧是“免费”（即从税收获取资金）提供的产品定价收费。

计量的成本

我们在上面提出：没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应的消费品应该参与劳动券的市场交换。不过考虑到保证基本的经济理性，这一原则必须在一些情况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计量人们消费和要求他们付款这两项操作成本超过可获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价并未包含这两项成本时，个别地收取一件商品的费用是毫无意义的。就此而论，即使把意识形态的考虑放一边，英国将水私有化的行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产品，并且并不完全清楚计量和收费的成本是合理与否的。（如果净水将会成为一种稀缺并且代价昂贵的商品，那么情况将会有所不同。）

农业

在发达社会里，农业领域的自由市场几乎是闻所未闻的。那些倡导用自由市场来解决波兰粮食问题的西方政府却在他们本国内强烈抵制也这样的政策。在日本、欧洲共同体以及美国，粮食市场是受到强力调控的。这种调控的目的在于一方面确保供给的稳定，而更为重要的是缓和严厉的市场对那些政治影响很大的农业游说团体的冲击。各国采取的措施在细节上可能稍显不同，但总体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粮食价格高于自由市场水平以确保农场主们的利益。

这种措施所引起的可预料的后果便是刺激了生产过剩。过量的粮食被生产出来，然后全部被政府以补贴价格收购并积存在仓库里。对剩余的这种处置方式产生了一个经济难题。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全部低价出售给消费者，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削低价格并有损于农场主的利益。还可以诉诸于一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圣诞节给领取养老金、抚恤金的穷人分发黄油。于是在救世军的办事处就出现了卑劣丑恶的一幕：年迈的老人们排着长队，竞相占有那免费发放的几磅黄油。甚至还

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毁坏。大量库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颜料弄脏以使得它们不能再作为人们的消费品。付给农民们一笔钱以激励他们使土地闲置而不是种植粮食。

同时，粮食的高价又激励农民们愈发有动力去开垦边缘的土地。岸边草地、灌木丛以及树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产生了谷物大草原。在补贴价格之下，在土地上滥用化学物质、污染食品、滥杀野生动物以及用硝酸盐化肥和农药污染水源都变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们步入了一个极端荒谬的境地，即只有给土地所有者付钱才能使他们不去通过种植松柏破坏那些有科学价值的地方。而如果不是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报酬，他们一开始也根本不会想到去种树。

西方现存的是一种公共管制和个人私利的离奇的混合物，事实上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发财致富。尽管如此，这一体制的辩护者仍然会指着东方说道：“至少我们不用像俄罗斯那样在食品面前排长长的队”。关于共产主义农业流行的印象就是永远的短缺、俄罗斯的排队以及波兰的肉食品骚乱。

在东方的共产主义体系崩溃之前，那儿的农业系统就有着很大的差异。波兰国内以私人农业占主导地位然而捷克却全境实行的都是集体农业。当布拉格的国营商店堆着萨拉米香肠和腊肠的时候，波兰的肉店架子上却空空如也^[1]。在苏联占主导的是集体农业，但仍然因为短缺而声名狼藉。

正如这些事例所表现的，这不是一个个体农业和集体农业孰优孰劣的简单的问题。其他因素——物价政策、分配体系以及农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发挥着它们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货架是空的还是满的这一标准是不能很好地来评判一项农业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价足够高那么商店将一直都会是满满的。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商店货物充足，但人们却在挨饿的情况。相反的，如果人为地压低价格，那么商店的货物就会一售而空。

评判粮食生产分配体制的一个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体的营养标准，以及这个体制所产生的生态影响。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有关饮食的科学知识体系。甚至在二战之前，营养学家们已经计算出了一份平衡的饮食所需的蛋白质、脂肪、糖类以及维他命的数量。这个知识被很好的用在了战时粮食配给额度的设置上。即使

^[1] 保加利亚的农业实行的是捷克模式。本书作者之一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波兰团结工会骚动发展到顶峰的时候到访过保加利亚。他的很多丰衣足食的东道主朋友们都公然地蔑视波兰人说“难怪他们搞得一团糟，早在 1956 年他们就把农业私有化了。”

往常的供给来源变得混乱，但理性的计划以及合理分配现有的资源也使得国民整体的健康和营养标准在实际增长。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关营养的建议现在看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对饮食以及心脏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引入到了现代的处方建议中，比如少食用黄油和动物脂肪、多食用复合糖类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学知识合理饮食，那么整体的健康水平将会得到提升。问题不再是防止由长期营养不良助长的软骨病和结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饮食习惯带来的现代人类健康的主要杀手如癌症、心脏疾病。

这表明食品供应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进行计划。对于一个给定规模和年龄结构的人口，总的食品需求可以轻而易举地计算出来。粮食的来源有三个：进口、社会化的农场和渔业，以及私人农场和私人渔业。我们假定食品出口受制于与各生产国的长期供应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气候灾难，这能够给那些不能在本国里很经济划算地生产的食品提供一个可靠的供应基础。

进口长期合同确定之后，国内生产的目标就自然是确切可知的了。如果我们假设农业领域是由国营农场、合作社以及家庭农业组成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从这些来源来完成生产目标。农业比其他工业都更容易受天气因素的影响。它的生产值年年都在浮动，要做出精确的年度计划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几年为一个时期的阶段内这些波动是相当平缓的，通过缓冲库存，常规的供给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为农业制定一个三年或四年的浮动生产目标是合理的。家庭农业和合作社将被要求竞标承担三年一期的固定数量的谷物供给。他们会被要求详细说明在机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们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们想要多少附加价值作为自己的劳动所得。供应合同将根据一个公式制定出来，这公式不仅会考虑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还会顾及由于使用特定量的化学物质及化肥而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竞标制度将会避免折磨着西方农业计划体系的生产过剩的痼疾。它把消费者和环境的要求置于生产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励效率，促进了那些不经济的边缘农场的倒闭。那些赢得合同的农场将会获得长期稳定的价格和市场份额。

（Sunshine、黑夜里的牛 译 人海沉钟 校）

第六章

详细计划

在第四章中，我们介绍了作为反馈控制的计划思想。图 6.1 概括了这个基本思想。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个总体概念加以扩展，把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具体要点考虑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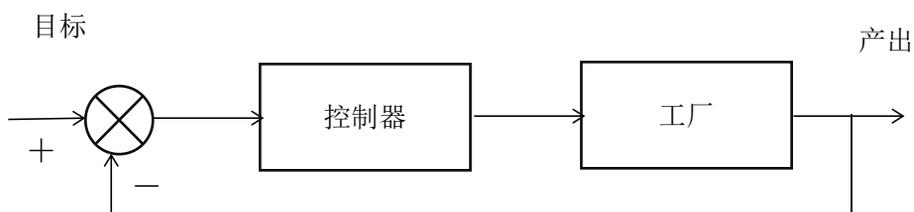


图 6.1 控制机制

之前讲到，战略计划处理经济产业结构的基本形态。在本章，我们关心的是详细计划，它将具体处理各种产品将分别生产多少，以实现这些基本目标。比如，战略计划规定，把百分之七的国民收入分配给电子消费品。详细计划必须明确这意味着什么——各种型号的电视产量、各种规格的放大器产量等等。此外，为了达到这些生产目标，计划必须指定所需的零件数量：500,000 个 14 寸彩色显像管，300,000 个 20 寸彩色显像管，12,500,000 个 10μ 陶瓷电容，等等。

图 6.2 表示了详细计划的输入。通过构建一个经济运行的详细模型，仿真和计划可以预测各个中间环节分别需要多少投入，以产生最终的各种输出。市场机制间接地引入了详细计划：通过人们所愿付的价格是否足够高，来决定计划的下一步。如果人们可以接受的价格相应的劳动时间比生产产品实际所需的劳动时间少，这种产品就将削减产量或停产，将资源用于其他方面。我们的市场反馈原理将在第八章单独说明。现在先来关注仿真和配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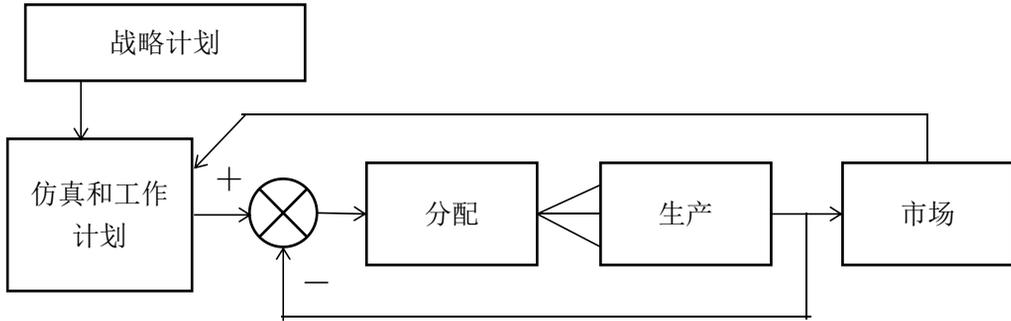


图 6.2 计划的结构

第三章中，在计算商品所需总劳动量时，我们介绍了投入-产出表。这个重现经济运行的方法在规范表述和理解详细计划时也很有效。表 6.1 是一个例子。读者也可以回顾一下表 3.2 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产出表（或矩阵）记录了产品从每个部门到其他部门的流动。每个部门在行和相应的列上分别出现两次。其中，每一行表示该部门供给给其他部门的产品数量。例如，第一行表示石油业，行中的数字分别表示供给给自己、电力行业、卡车制造业等等的石油数量。而在每一列中可以找到该部门所需各种产品的数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车制造业所需的石油、电力等等。

表 6.1：一张投入-产出表

	石油	电力	卡车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电力	50	20	40	...
卡车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门产出的去向。
- 列表示各部门所需的投入。
- 表中数字应该被看做是在合适的单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电力、多少辆汽车）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引入一些基本的术语。首先，总产出是指一个部门不分用途的总输出。总产出又分为中间产出和最终产出（或净产出）。中间产出表示生产系统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炼钢时用掉的煤，生产电脑用掉的钢）。最终产出则是其余部分，可以被最终利用（不论是消费掉的，私人的或集体的，或是投资时为了建立生产系统的）。

一些产品几乎是纯粹的中间产品。比如钢板，除了一些金属加工爱好者，消费者完全没有需求。事实上，可以将整个钢板产出视为进入各行业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另一方面，一些产品完全是最终产品，而没有中间用途（没有行业将成包的香烟用于投入生产）。但一些产品具有双重属性。天然气可用于家庭烹调和取暖，也可作为多种行业的生产输入。

更重要的是：有序产业对的技术系数可以直接告诉我们，需要多少前者的产品，来产出一单位后者的产品。例如，制造一辆自行车需要 10 公斤钢材，那么钢-自行车技术系数就是 10（钢以公斤计）或 0.01（钢以吨计）。注意，自行车业对钢的总直接需求可以由其总产出数量乘以相应的技术系数算出。制造 2000 辆自行车就需要 $2000 * 0.01 = 20$ 吨钢材。

现在我们做好了准备，可以分析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者们面对的问题了。对于经济活动，人们根本上关心的是最终产品。假设我们有一系列的计划目标^[1]。达到这些目标需要生产出合适数量的中间产品。要制造出我们想要的数量和型号的电脑，需要电脑制造业从供应者那里得到相应数量的塑料、钢材、硅等，并且相应行业的供应者们同样得到他们所需的中间产品，等等，形成一个互相依赖的复杂网络。

所以，问题就是：从期望的一系列最终产品出发，如何计算出需要的每种产品（包括中间产品）的总数量？理论上，可以按照如下方式直接找到答案（对于数学公式恐惧的读者可以跳过几段直接看结论，但我们只用了最简单的代数）。考虑一个简单的小型系统，只有两种最终产品。 G 为总产出， I 为中间产出， F 为最终产出。下标代表部门 1 和部门 2。由于总产出等于中间产出加上最终产出，可以将我们的玩具经济表示为如下两个方程，各代表一个部门。

^[1] 这些目标从何而来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五章提到了一些观点，在第八章和第十三章将有更多专门阐述。

$$G_1 = I_{11} + I_{12} + F_1$$

$$G_2 = I_{21} + I_{22} + F_2$$

中间产出 I 的双下标中，第一个数字代表来源，第二个代表去向，例如 I_{12} 代表部门 2 中用到的部门 1 的产品。第一个方程用语言来表达，即部门 1 的总产出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的作为中间产出的产品 1（例如，石油业消费一些石油；对于不消耗自身产品的产业此项为零）；其次是部门 2 所需要的作为中间产出的产品 1；最后是部门 1 的最终产品。

现在，将中间产出用总产出乘以相应的技术系数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车和钢材的例子中的那样，自行车业需要的钢材数量 I 等于自行车的总产出（辆）乘以每辆自行车所需的钢材。如果用 a 来表示技术系数，即得下式：

$$G_1 = a_{11}G_1 + a_{12}G_2 + F_1$$

$$G_2 = a_{21}G_1 + a_{22}G_2 + F_2$$

不必一步一步求解，我们也可知这个方程是可解的。 I 被替换为 a 乘以 G 后，方程被化为有两个未知数（即两个部门的总产出）的两个等式。简单但却乏味的代数可以证明，总产出仅仅由最终产出和技术系数即可求出，同样，中间产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车的例子）^[1]。

自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西里·列昂惕夫和冯·诺依曼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这个问题的算法已广为人知，并且，如果系统不大，求解并不难。但如果用来处理整个经济系统，使问题简化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其化为高度归纳的部门。我们表中的行和列将变成形如“消费电器”，“汽车”，“油气”，等等。对于其他用途，这可以接受，但对于实际的社会主义计划，这是不够的。如果计划者要提供能够有效指导生产的蓝图，确保所有经济活动井井有条，必须能够精确地确定输入和输出。但那样的话，投入-产出表会变得极其冗长，百万计的行列会有千亿计的技术系数。解联立方程的工作已经不简单，何况，甚至在计算开始前，还需采集海量的详细信息（技

^[1] 当方程很多时，用矩阵方式来表示更方便。该方程的矩阵形式为：

$$g = Ag + f$$

g 代表总输出的列向量， f 代表最终产品的列向量， A 代表技术系数矩阵。其解如下：

$$g = Ag + f \Rightarrow (I-A)g = f \Rightarrow g = (I-A)^{-1}f$$

(在这里， I 代表单位矩阵。) 简单地说，我们能够通过求 $(I-A)$ 的逆矩阵，再乘以最终产品向量 f ，得到需要的总输出。

术系数等)。

信息采集及其计算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们先假设必要的数据“已知”(经济学家喜欢这么说),来研究计算的问题;在第九章中,我们将回到获取数据的问题上。

这里涉及的数学问题本质上和第三章中讨论的劳动时间计算的问题相同。原则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决,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对于巨大的系统,这完全没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劳动价值计算中,算法可以利用矩阵的稀疏来简化。当十分细化时,由于矩阵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于香肠业,木材之于眼镜业,等等),我们可以用链表更好地表示生产的条件,找到一个迭代的解。

两个主要的迭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赛德尔迭代算法)都可以接受链表形式的输入。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问题的解,但可以产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对于经济上的投入-产出问题,如果存在唯一解(理论上可直接求出),那么这些迭代方法将产生收敛的结果(Varga, 1962)。

这里的迭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数据输入包括(i)最终目标产出表,(ii)非零技术系数,(iii)每种产品期望的总产出。将这些总产出的初始值代入这套技术系数,就得到每种产品所需要的数量。基于此,可算出一套新的总产出。这些数据又被用于下一轮迭代,等等。如果算法是收敛的(即有唯一解),那么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总产出的变化将越来越小。当变化值小于预先设定的一个界限时,算法就终止。

由于算法的收敛性独立于初始值,初始值的选择并不是关键:如果一些值可以,那么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见 Varga, 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实值,收敛将更快。计划者们可以合理依靠过去的经验来选择具有合适数量级的初始值。

雅克比迭代法的运算次数由输出数量,乘以每个生产过程所需的直接输入数量,再乘以足够产生满意的近似值的迭代次数。例如,10,000,000种产品,每种有200个直接输入,需要100次迭代,那么就需要运算 2×10^{11} 次,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计算机可以在 2×10^3 秒完成,即略超过半小时的时间。

苏联计划的情况

把我们之前的讨论和苏联计划经济的经验联系起来,两类问题在此显现出来。

首先，有人会问：如果完全的详细计划所需的计算是如此庞大和复杂，在高速计算机发明之前，苏联是怎么做到的？

实际上，在计算机发明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计划方法建立起重工业基础时，苏联曾经做得如此成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当然，那时的经济简单的多，而且计划相对来说只有很少的关键目标。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计划中仍有许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过人力和物质的大扩张意味着，即使有这样的不平衡，关键的目标还是能达成。

另外，我们应注意到早期苏联的计划并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样进行的。从一系列最终产品倒推，得出一个完整而详细的庞大输入列表，这确实超出了当时的计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能力。于是，通常计划者们只是从他们自己设定的粗略的目标出发：1930年之前生产多少吨钢，1935年之前生产多少吨煤，等等。这种早期实践按理说会对几年后的经济结构产生有害的后果。它会产生一种“生产主义”，大量关键中间产品的生产成了最终目的。事实上，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看来，人们其实想尽可能地节约中间产品。即计划的目标应该是：保证所需最终产品产量的情况下，生产最少的煤、钢、水泥等等。

这里会遇到的第二种问题正好是前一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提到过的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是众所周知的，那么为什么苏联的计划者们没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高速计算机技术产生后，取得太大的进展？

我们在讨论前一个问题时已经提到过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必要、但却粗糙的计划方法在后来形成的计划体系中打上了烙印。考虑到斯大林时代特殊的意识形态僵化——被赫鲁晓夫的“解冻”中断，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恢复了一——苏联对于新的计划方法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的。从苏联的经济著作上能看出来，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思想，即以最终产品为目标来制定计划，在正统的官方看来有些“资产阶级”。

此外，在苏联，对于新奇的、基于计算机的计划方法的兴趣，和真正的技术可能性并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计划系统的改进还有讨论的可能时），苏联的计划者们能够使用的计算机系统在今天的标准看来还很原始。苏联经济学家很清楚使用一致的输入-输出方法的潜在好处，但他们所使用的设备仅够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输入-输出系统。尽管它可以用于地区间计划（研究苏联各加盟国的相互依赖关系），还是难以胜任日常的详细计划。大多数情况下，投入产出分析仍然是学

术活动，和预期相比，计算机对苏联计划的总体影响是令人失望的^[1]。

需要注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计算机不是唯一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们在第三章劳动价值计算相关段落中解释过的，由大量的个人计算机组成分布式网络，通过经济信息通信系统连接起来，得到同样的计算结果是可能的。这样的设备在苏联认真考虑改进计划体制的年代同样还没出现。廉价的个人电脑相对来说还是离今天不远的东西，而且苏联通信系统的发展缓慢臭名昭著（任何想从莫斯科给列宁格勒打个电话的人都明白）。

还有，正如将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详细计划需要一个标准化的产品识别系统，相应地，这需要一个复杂的计算机数据库。而在苏联，计划者们继续使用着“物资平衡”系统。这个系统构建“平衡表”来显示生产所需资源和每个产品的计划用途，提供投入-产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计划者们不仅难以有效地计算这些平衡间的相互影响，对于产品的识别也是不完整、不统一的。

政治因素也与此有关。我们所提出的关于计划的方案对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计算机系统的自由访问十分依赖，而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政治上是不允许的。甚至由于担心政治异见的传播，复印设备的使用也被严格控制。

最后，计算机化当然也不是灵丹妙药。在不能应用计算机以产生更多效益之外，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不合理的僵化价格系统，许多商品的限价导致了短缺和排队。）

对于复杂经济系统，高效的详细计划的实现，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计算机和通信技术。而这时，苏联的意识形态环境基本上转向了市场导向的“改革”。似乎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多少嗅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风向的人——对于我们所讨论的算法和计算机系统没有任何兴趣。他们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计划的潜力，也许部分是对早些时候对于计算机化益处的吹嘘过度的反应，部分由于受到了西方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浪潮的影响。

详细计划和库存约束

回到讨论的主线，我们指出了，现在对于计划机构来说，即使产业间关系的细

^[1] 对于苏联七十年代在使用计算机参与计划经济的经验，参见 Martin Cave(1980),我们的更多看法可参看 Cottrell 和 Cockshott (1993b)。

节精确到分钟的投入-产出表，从最终目标产品列表倒推出能够使计划平衡的总的产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这对详细计划的计算还不够。因为生产力和劳动力供给产生的额外的约束，还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终产出品算出所有产品各自的数量。

计划者们可以算出生产出 x 万亿千瓦时的电力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投入-产出系统的均衡可以确保足够的油、煤或铀来满足需求，但是，有足够的发电站吗？任何时期，经济系统的生产能力都被需要长期建设的生产手段的库存所限制。此外，还有劳动力：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生产计划所需要的大量产出品吗？

一旦产出品数量算出来，这些问题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计划系统可以预计每个部门的大量产出需要，分布式工业计算机（代替超级高速计算机）利用每单位产品所需生产资料和各自的劳动效率，就可以算出他们对于生产手段库存和劳动力的需要。这些部门的需求可以反馈到中央计算机统合，再与各种生产手段的库存相比较，与各自劳动力的计算结果相比较。

如果约束正好满足——也就是各产业部门要求的生产手段和劳动力不比现在整个经济系统能提供的更多，那么注意，即便所有约束都被满足，依然有在生产部门之间重新分配资源的需要：中央计划部门需要优化重组，发布相应的指示。但如果总体约束在这里不满足，计划就需要做相应调整。最初关于最终产品的目标不再能够达到（除非额外的约束可以以某种形式放宽），而计划者们必须重新考虑。一些社会效益最低的目标将被舍弃，整个计算将重来一遍。由于计算过程可能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对于一定的计划的期限，会有多次重复。

最后这点的重要性在于，不考虑投入-产出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生产力的约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赖计划决策的期限。如果计划是相当长期的，库存约束就变得无关紧要。如果需要更多的电力，可以相应地建设起来。在这种条件下，对于投入-产出系统唯一的额外约束是劳动力的供给和足够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如果那样的话，依照额外约束来调整计划目标水平相对容易。但另一方面，期限越短，额外的库存约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设时间比计划期限更长的生产手段都必须作为库存约束予以考虑；如果计划周期特别短，原材料的库存状况也变得十分重要了。本书作者之一研究了适合于后一种情况的算法，这种算法与之前的标准投入-产出过程有较大差别。在下一部分中，将展示这种替代算法的理论基础，并举例来说明其应用。

新的计划均衡算法

假设我们从年度产出的购物单出发，想要生产十万种不同的消费品。这些目标可能略为保守，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会被闲置；目标也可能定得过高，使用现有资源无法达到。我们想知道是否应调整目标来使资源，包括各种机器的现有库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对每一种消费品限额做同一百分比的调整。一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调整。

如果我们有一定数量的绵羊和化学工业空闲，我们想知道这对于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额意味着什么。羊毛衣物的目标应该削减吗？这对于丙烯酸的生产有什么影响？多少针织品应该从生产羊毛转换为丙烯酸？

假设空闲的针织品机器应该一千条针织衫的生产线。可以将所有空闲的生产能力用于生产一种特殊的荧光蓝色毛衫，胸前印着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这种设想是否能使消费者满意是令人怀疑的。需要的是一系列规则，根据这些规则，计算机可以决定根据资源约束明智地调整计划目标。我们开发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可以基于边际效应递减的经济原则作出这样的调整。算法的完整说明见科克肖特（1990）。

调和值函数

算法应用了神经网络仿真技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领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提出，神经系统可以用热力学的概念来分析。神经系统由大量互相松散连接在一起的实体组成，这样它就可以被抽象为统计力学中的问题。人们已经发现，热力学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应用在神经模型里。每个神经元就像是固体中的一个原子，与全体连接在一起并相互作用。两种情况下，都是大量实体在随机规则^[1]下相互作用而发展的系统。可以为神经系统定义一个合适的模拟能量——其状态大体上有多接近于期望的状态。可以看到，如果为神经系统的状态引入温度的仿真算法，经过弛豫过程后，其稳定于期望状态。

同样被仿真算法证明，神经网络和晶体，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经济系统。经济系统中，各部门通过相互作用与其他部门联系起来。这里的相互作用关系是生

^[1] 这里的随机指的是服从概率，在细节上不可预测，但平均的行为可以预测。

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代替了突触连接或静电力，但在抽象层次上是相似的。

注意图 6.3 中的神经网络和投入-产出矩阵的相似之处。图中的纵线表示右侧的神经细胞的输出。突触传递给细胞的输入由横线表示。在横线上，他们的输入所激发的水平被加起来。输入激发的等级反过来决定（轴突）细胞的输出。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用投入-产出表的列来代表一个经济部门的行为水平。我们把突触标记上权值 S_{ij} ， i 随行改变， j 随列改变。 S_{ij} 处的数字表示，要生产第 j 个部门的一单位产品，需要的第 i 个部门的产出产品的数量。神经网络理论证明，这样的网络将进入这样一种激励模式：与突触上的权值相一致。细胞的激励水平将表示相应部门应当运行的合适的强度。神经网络可以在数学上建立模型。也就是说，我们能用神经网络中的松弛数学技术来使经济保持均衡。需要做的是找到某种可以最小的化的，类似于能量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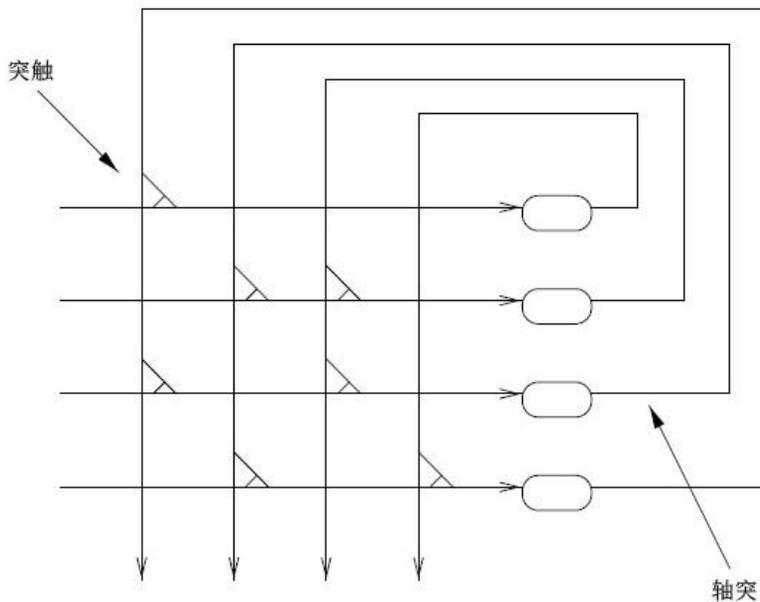


图 6.3 模式化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的研究者们经常反过来看问题——不再试图使网络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称为调和值的东西最大。形式上，这只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观的说法。神经网络在学会对外界刺激给出“正确”答案时，拥有最大的调和值（harmony）。

我们可将调和值的概念应用于经济。我们为每个部门定义一个调和函数，如图

6.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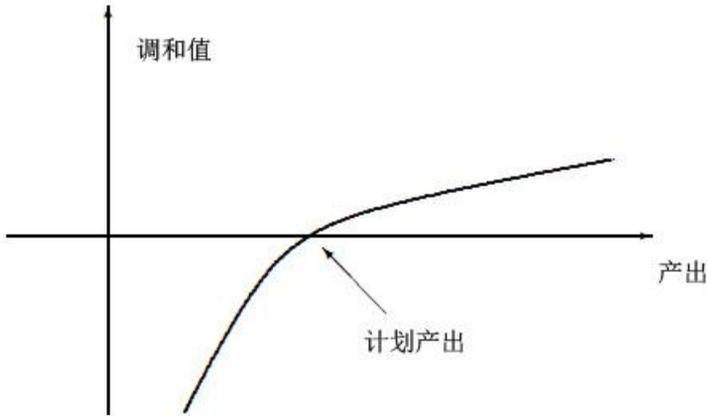


图 6.4 和谐函数

如果某产品的网络输出（允许其他部门耗尽）低于目标，调和值将迅速变为负数。如果我们达到了目标，调和值将逐渐变为正。这是用来说明，短缺造成的问题比剩余带来的好处要更厉害。下面是一种具有该性质的仿真函数的代数形式：

$$\text{令 } u = (\text{产出} - \text{目标}) / \text{目标}$$

$$\text{若 } u < 0 \text{ 那么 调和值} = -u^2$$

$$\text{否则, 调和值} = \sqrt{u}$$

人们每消费的一额外单位商品，所获得的满足感是逐渐下降的。当你第一次从亲戚那里得到茶壶时，你的感谢是真诚的；但第五次时，感谢就显得勉强了。这里蕴含的意思是：来自超出目标的产出品额外社会满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们对于短缺十分不安，而对于充足的愉悦程度并不如前者那么大。我们可以用之前的调和值函数来表示这一点。

当产品输出正好符合目标时，我们定义调和值为零。如果输出过量，调和值为正，而如果输出不足，调和值为负。调和值函数被计算机用来调整输出。我们的目的是令整个经济的调和值最大，来使全体处于平衡。

算法步骤

(1) 为各部门随机分配资源。这只是计算机中进行的名义上的分配。在真实的世界并没有发生。因为如果我们的松弛技术是有效的，那么任何初始值都一样好，所以初始值随机选择即可。

(2) 对于每个部门，找出该部门目前可用的资源中，哪一种资源是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即成为生产瓶颈的资源。

(3) 各部门拿出多余的资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对于需要有盈余），放进一个公共蓄水池。这一步不会降低生产力，所以调和值没有变化。注意，这次的重分配还是在计算机内存中进行；在整个算法完成之前，与真实的世界无关。

(4) 算出各部门的调和值。

(5) 算出整个经济系统平均的调和值。

(6) 将各部门按调和值排序。

(7) 对调和值最高的部门，减少它们的产出，直到其生产力水平使其调和值等于平均调和值。由于调和值函数是可逆函数（即，从调和值反推出产出和从产出计算调和值是同样的过程），这是很容易的。于是又有资源进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 对调和值最低的部门，为他们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资源来增加其产出，直到他们的生产力使得其调和值等于平均的调和值。

(9) 算出新的平均调和值。如果这与之前的有较大差别，返回步骤（6）。

该算法能够均衡各部门的调和值。如果迭代是成功的，在大约十几次迭代后，平均调和值的变化范围将不超过 1%。然而，仅仅靠这个算法，会使经济系统产生局部的最大调和值。在实际计算中，该算法常常剩余大量资源而总产出远低于预期。由于不论从怎样的平均调和值开始，算法都有很强的偏向性，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理解这一点。

这点可以通过引入增加产出的偏移量来克服。在步骤（7）中，不再减少高调和值部门的产出，而是将其产出调整为（均值+B），B 即为偏移量。在程序开始时，我们将 B 设置得较高，随着迭代的进行逐渐将其降低。这样的效果是，只有调和值特别高的部门产出会减少，而调和值较低的部门产出总会增加。总之，平均调和值趋向于增加，系统最终稳定于一个最大平均调和值。

如果仔细选择数据结构，该算法在运行时基本是线性的。也就是说，100 个部门

的问题将花费 10 个部门的问题十倍的时间。回顾之前关于投入-产出分析的讨论，关键点是不用矩阵来表示投入-产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阵的稀疏性，用链表来表示它。算法的复杂度大致可表示为 $n*m$ ， n 表示部门数量， m 表示每个部门的平均输入数量。这样，算法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曾经在 Sun 公司的工作站上运行 300 秒左右，就完成了对拥有 4000 个部门的经济系统的计划仿真。Sun 的工作站每秒运行约三百万次。由于其时间要求是线性的，要使拥有一千万种产品的经济系统的计划取得平衡，也只需要在 68020（一种流行的微处理器）^[1]上运行约一百万秒（不到两周）。同时还需要一千兆左右的存储空间。这个要求并不难；相当于一千台个人电脑，按现价（1980 年代末——译者注）是五十万英镑左右。

英国公司 Meiko 推出了一款多核处理器，将多达 1024 个微处理器芯片集成来加快速度。其设计的用途是粒子物理仿真，每秒钟可执行百亿次运算。如果我们可以拥有 1024 个集成块的 Meiko 平台上运行这个问题，每个集成块配 4M 内存，大型经济系统的计划将在十分钟左右完成计算。

此外，该算法也可以算出关键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门间的正确分配，得到可行的产出目标。这事实上正是计划者所需要的细节信息。

我们认为，只考虑物理可能性，不考虑金钱，现存的计算技术完全允许详细计划的进行。之前提到的这些技术，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计算机上实现，它们现在正被用于粒子物理和天气预报。可以把他们看作是对理想化的市场应该达到的那种均衡过程事先进行仿真。

智利的经济控制

计算机化的经济计划和控制最有趣的实例发生在 1972 年到 1973 年，阿连德时期的智利。斯坦福·贝尔设计了该系统，在他所著的《公司的大脑（The Brain of the Firm）》一书中有介绍^[2]。贝尔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实时的、分布式的经济控制系统。由于他的系统提供了一个使用我们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实例，分析这个系统的特征是有益的。

^[1] 68020 是摩托罗拉在 1984 年发布的一款处理器。68020 处理器的主频为 12MHz 到 33MHz。该处理器配套的浮点运算单元 68882 的浮点运算能力最高可到 528kFLOPs。目前家用 PC 机使用的 i7 处理器的浮点运算能力达到 50GFLOPs 左右，比 68882 提高了近十万倍——译者注。

^[2] 又见 Afterword to Beer（1975）。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传统的统计方法，当经济统计数据到达决策者的桌上时，常常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于是，直到经济危机发生几个月后，解决危机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来。由于政策工具同样低效，决策结果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当股票市场在1987年崩溃后，英国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减税政策。当这一政策发挥作用时，需求已经开始增加了，于是1989年发生了通胀。数据搜集的滞后意味着完全不合时宜的行为（但是在这里意识形态也对减税也有很强的要求，而无论宏观经济形势如何）。

这种不当效应在反馈中会进一步产生更糟糕的经济震荡，只有决策者能得到实时的信息并能实时干预系统，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在智利，一套计算机网络系统被建立起来以完成这项工作，使怀疑者们吃惊的是，其建设只用了四个月时间，而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几年。这项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计算机技术和智利这种贫穷国家简陋的通信系统基础之上。微波和电传连接将所有关键部门中心与首都的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即使有技术落后上的限制，它还是能够为政府提供一天之内的经济信息，更现代化的设备当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号的形式显示的。“作战指挥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显示着加注释的流程图，表示经济单元间的相互作用。图形显示避免了计算的麻烦。不同单元间流通的量由线的宽度来表示。各部门用包含柱状图的块来表示，显示其生产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间里提供七个座位，这是能够有效讨论的最大人数。扶手上的大按钮能够控制显示，或突出不同的图表。

“作战指挥室”的概念来自于空战防御。在战争中，即时决策需要实时的信息。决策可以由计算机仿真，来检验如果采取某项行动将引发怎样的结果。在打破私有卡车公司发起的反政府抵制的斗争中，“作战指挥室”就像战时总部一样被用了起来。计算机网络使政府能够使用所有可用的运输手段，使货物流通起来。

“作战指挥室”本打算被用于所有部门的所有分支。复杂的统计学程序从系统底层的数据流分析，来寻找有意义的变化。决策者从超量的数据中解放出来，只了解对决策有用的数据。当某个分支有任何异常发生时，就会向对应的“作战指挥室”发出报告。如果计算机检测到危机，它们将向“作战指挥室”发出警报并启动计时。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作战指挥室”没有及时作出有效的回应，就会向更高一级的“作战指挥室”发出警报。这给了每个单元在权限范围内本地解决问题的自由，同时不会威胁到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当时的设想是，工厂级别的“作战指挥室”将由工人

委员会进行管理。民主假定认为，现代化的显示技术和计算协助能使人们不经复杂训练就有管理工厂的能力。

伴随着使皮诺切特上台的血腥政变，智利的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经济实验开始了，而所有这一切都被扔在一旁。“作战指挥室”和阿连德、民主被一同埋葬在了总统府的废墟中。

（未完成的乌托邦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第七章

宏观经济计划和预算政策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样，宏观经济计划必须要考虑不同部类的产品在最终使用上的总体平衡问题。宏观计划还必须确保这些产品的组成的一致性并且确保其总数满足总需求。要完善我们的宏观计划，还需要一个与之一致的会计核算方案。宏观经济的三个方面——理论、政策目标和会计系统之间密切相关。例如，凯恩斯在三十年代创造性的工作使得国民收入核算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反过来，合理可靠和一致的国民经济核算也是凯恩斯主义在战后得以推行的先决条件。苏联式的经济体采用了另一种不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这种核算方式在理论上源自对马克思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的相当狭隘的解释。而我们提出的计划需要一种基于劳动时间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这一概念虽然也源于马克思主义，但与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相当不同。

本章将首先讨论在整体经济中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时间核算，然后谈到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所面临的政策问题，以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核算制度。一旦这样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我们将可以研究一些与之相关的具体问题，如储蓄、信贷和税收政策。

建立在劳动时间上的宏观核算

我们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总产值定义为在给定的—段时间，例如—年内，所生产的劳动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根据劳动的来源，可以将生产总值分成两个部分。大的部分是当前劳动的投入，即在给定时期内劳动的投入。我们称之为当期劳动。此外还有过去劳动，即从前—段时间生产的产品“转移”过来的劳动。这些劳动可能以上—期生产而在当期使用的存货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使用逐渐磨损的耐用生产工具（机器、厂房和设备）的形式存在。我们将这种过去劳

动的转移整体看做是**折旧**。这一分析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宏观核算恒等式：

$$\text{生产总值} = \text{当期劳动} + \text{折旧} \quad (7.1)$$

我们还可以把**净产值**定义为总产值的劳动量中超出需要用于补偿过去劳动消耗（折旧）的部分。因此我们有了第二个恒等式：

$$\text{净产值} = \text{生产总值} - \text{折旧} \quad (7.2)$$

现在我们制度的基本分配原则是，工人们应当得到与他们所提供的劳动量直接对应的劳动券（见第二章），虽然就个人而言我们承认某些资质上的不同，但在全经济范围来说仍然是有效的：每一时期发行的劳动券总量等于完成的劳动总小时数。用**当期劳动券**表示当期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劳动的劳动券，我们就有了第三个恒等式：

$$\text{当期劳动券} = \text{当期劳动} \quad (7.3)$$

由（7.1）和（7.3）我们可得到

$$\text{当期劳动券} = \text{净产值}$$

我们姑且假设能够把全部的当期劳动券作为“可支配收入”拿回。还假设他们希望将所有的收入用于消费品。我们提出的制度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消费品以劳动券表示的价格应该等于该产品的劳动量，至少作为初次近似应该如此（下一章将会阐明这一提议的细节）。由此推断，如果工人把全部当期劳动券花完，他们的消费就会耗尽净产值。根据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费完全部总产值，因为他们的收入（当期劳动券）比总产值要少，差额部分用于折旧，以此保证有足够的资源用于补偿过去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消耗。但即使是这样，工人消费会耗尽净产值的论据也是站不住脚的，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除了个人消费以外，社会产品在最终用途上还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给社会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为了增强经济的未来生产力而进行的生产资料的净积累；还有可能贷款给其他经济体。这三方面简化来说分别是，社会、积累和贸易（贸易顺差），并且如果把个人消费表示为消费，那么我们有：

$$\text{净产值} = \text{消费} + \text{社会} + \text{积累} + \text{贸易} \quad (7.4)$$

等式(7.4)将净产值分为四个基本用途。如果计划要求积极的社会支出水平和积累,很明显,消费必须低于净产值,因此当然也就必须低于当期劳动券,即为当期劳动所发行的劳动券。要达到这个目的,一种方法是对工人的劳动券收入征税。但征收的税款不一定要与当期劳动券和该计划的消费限额的全部差额相等,因为工人们可能会决定将他们的部分劳动券储存起来,这样的行为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为消费以外的用途“释放”资源。我们后面会再谈到这一点。

第二,计划中总的个人消费中的一部分必须提供给非工作者——退休人员、残疾人、半失业者。如果购买个人消费物品是使用劳动券的唯一途径,那么必须通过国家预算使无工作者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劳动券。为了让发行的劳动券和劳动者完成的工作保持等价,这些给无工作者的劳动券不能简单的“印出来”(这将会导致通胀);相反,他们必须向劳动者征税获得并且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

在转向税收和存款这些实质性问题之前,把上面的想法应用到“流动资金”账户情况中是很有用的。这使我们能够检查他们的一致性。让我们把经济分成两部分消费群体:家庭部门和政府部门。家庭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社区,而政府部门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经济单位。我们假设在生产资料中没有私有财产,所以没有单独的企业或金融部门需要考虑。我们将通过程序确定每一个部门详尽的资金的来源和使用情况。

从家庭部门来看,基本的资金来源是发行的用于交换当期所做劳动的劳动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们有一个把劳动券(转移)给非工作者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转移支付**。家庭部门可以用三种方式使用这些资金。他们可能会用来交税,可能会花在消费品(**消费**);或者可能会流入净储蓄部门(**净储蓄**)。如果这个关于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计算是全面的,那么这两个总数必须相等,因此:

$$\text{当期劳动券} + \text{转移(转移支付)} = \text{税款(税收)} + \text{消费} + \text{净储蓄} \quad (7.5)$$

转向政府部门,其基本的资金来源是税收收入。另外,在它作为“金融机构”(下面会谈到)时,政府部门将吸收家庭部门的净储蓄。政府部门利用其资金将劳动券转移支付给非工作者(**转移支付**),提供社会福利供给(**社会**)和积累(**积累**),和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贸易**)。同样,如果我们这些来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们可以得到:

$$\text{税收} + \text{净储蓄} = \text{转移支付} + \text{社会} + \text{积累} + \text{贸易} \quad (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种方式重组。一个简单的变化是令税收和转移支付不变。我们定义净税收是税收减去劳动券转移部分(税收-转移支付)。这就是净劳动券“财政收入”,国家可将其用于消费之外的活动。作了这一修改之后,可以重写(7.5)和(7.6)如下:

$$\text{当期劳动券}-\text{净税收}=\text{消费}+\text{净储蓄} \quad (7.7)$$

$$\text{净税收}+\text{净储蓄}=\text{社会}+\text{积累}+\text{贸易} \quad (7.8)$$

把两个方程相加我们得到第三个方程。如果我们把(7.7)和(7.8)相加,净税收和净储蓄抵消可得到,

$$\text{当期劳动券}=\text{消费}+\text{社会}+\text{积累}+\text{贸易} \quad (7.9)$$

但由于当期劳动券等于净产值,因此我们实际上又再次回到了7.4,这证明了我们劳动时间账户的一致性。

我们发现在上面的证明中借用资本主义货币核算的术语(“税收”、“融资”、“资金”等)是很有用的。但是正确理解计划经济的宏观经济,我们必须探究这种语言背后的东西。在这一体系中,劳动券纯粹用于家庭部门采购消费品,政府部门发行劳动券直接换取国民经济中的劳动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们获得产品,本质上是因为国家被认为拥有除了卖给消费者的产品以外的所有产品。假设建立一个医院:国家以每小时一单位劳动券价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劳动力,但不必须“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个完成的建筑。政府永远不可能用完“钱”(在这个制度里没有钱)。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劳动券,因为这仅仅是以工人的名义创建一个会计账户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员的名义——见十二章)。

然而,存在一个关于宏观经济平衡的真问题。如果足够的消费产品可以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且没有一个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的劳动券,政府必须确保在第一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实际上,抵消了)它发放给劳动者的劳动券。例如,假设整个宏观经济计划要求55%的净产值用于消费品。为简单起见,我们还假设,消费者没有储蓄部分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必须通过“净税收”抵消45%的劳动券的发放。如果净储蓄和税收少于这个数量,劳动券在消费者支出中的流量将超过用于消费品生产的社会劳动总量。结果将是“劳动券通货膨胀”(在价格稳定下的则会表现为短缺和排队现象)。另一方面,如果净税收过度,消费者用于支出的劳动券将少于生产出

消费品的劳动价值。造成劳动券紧缩或剩余产品的堆积。

上面的例子中依赖于简化假设，即消费者不进行任何储蓄。显然，如果消费者储蓄一部分，那么对于一个平衡的税收政策要求会变得更加复杂。下一节中，我们将解决在家庭部门的储蓄和借贷的问题，之后再回过头来研究税收政策的细节问题。

家庭储蓄和信贷

为什么人们储蓄？对一些人来说，储蓄跟美德一样，回报可能在自身，但是经济学家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理性的动机并且展示给我们储蓄动机的层次性。

在最低层次的水平上，存在着消费品的储蓄。生活中有一些节俭的穷人和中产阶级下层会把钱存起来用于高档品：汽车、自行车（在作者写作本书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仍算是高档消费品。——译者注）或度假，因为用于购买这些东西的花销超出了当期的收入。还有一些人选择储蓄并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以后不能工作时准备的。而最模范的储蓄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考虑自己现在而是考虑未来，把钱投入信托基金为后代提供教育或把遗产留给他们的继承人。

在现有社会的水平上，人们选择储蓄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艰难时刻：失业、严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过早死亡。另一方面，有些人节约是因为“不得已”，即当期的消费需要已经得到满足，收入却没有花完或者没有足够的产品能够刺激消费者额外购买。这一类人是指成功的资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指在东欧和苏联由于缺乏消费品而“被迫储蓄”的消费者。

上面谈到的导致个人储蓄的各种原因，其中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可能会减弱。例如，公共义务教育的升级（即使私人教育没有被禁止）和减少收入差距将削弱对教育信托的需求，并且还能够维持教育信托。一个适当的养老金制度将减少私人储蓄的必要性。如果你不害怕晚年贫穷，那为什么不在可以享受的时候花钱呢？毕竟，你可能活不到退休那一天。

随着充分的就业和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因失业而导致的收入减少做准备的需要就会消失。如果你对你的孩子的未来有信心，而且他们不可能没有财产收入，你不太可能为给他们留下遗产而储蓄。

现在让我们探讨一下现期个人贷款的主要原因。短中期贷款主要为了及时向购

买耐用品的消费者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必须储蓄——尤其对于一些期望收入在未来能增值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个人长期贷款的主要原因很显然是为购买房子。

在当前环境下毫无疑问地存在着与个人信贷相关的“贷款推动”的因素，鼓励个人承担无法偿还的债务。虽然这些储蓄的原因很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还继续存在，但过度负债的情况不会再出现。此外，用于购房的储蓄的存在和规模取决于现期可用房的状况，并且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租赁部门会降低对拥有房屋所有权的激励。

尽管社会主义可能会减少一些导致个人储蓄和信贷的动机，但是这些现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储蓄和信贷的基本原因是人们希望以相对独立于收入曲线时间表的方式，来计划他们的消费曲线的时间表。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储蓄代表滞后消费，而信贷提倡的则是提前消费。

但关于什么对社会是合适的和关于对个人是合适的之间有一个重要区别，而这在以前社会的市场结构中储蓄是很容易理解的。囤积粮食为了匮乏时期的消费。埃及法老或毛时代的中国会在非常物质化的意义上进行储蓄。毛泽东建议中国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他显然在主张滞后消费。在伊索寓言里聪明的蚂蚁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储存粮食，而蟋蟀却只是吃、唱歌和尽情的享受快乐。

在现代社会，个人储户可能对储蓄仍然有这个简单看法，钱已经取代谷物，但它仍然可以“储蓄以备雨天”。所以保险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伞。但囤积金钱存在着一个悖论，而囤积粮食并不会有这样的悖论。在迈达斯的寓言中，古希腊人认识到了这一悖论。黄金不能吃，钱也一样。除非你花钱去购买东西否则储蓄钱根本没有用。个人囤积黄金可能度过饥荒。一旦发生饥荒，粮食的价格就会上涨，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现金的人可以买到吃的。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的发展不是靠一些现金储蓄者。只有真正的谷物库存才能防止饥饿，所以饥荒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没多少而穷人饿死。

那些把钱存在银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仑金币的农民更进一步脱离了“自然节俭”的状态。在战争时期，自然或经济灾难导致他们很可能看到他们的储蓄在恶性通货膨胀或银行崩溃下消失。当战争的破坏或战争的赔款带来的混乱使一个经济体失去了市场上的货物，这种真实的产品供应短缺表现出来就是货币的贬值。最后那些在战败后手握一堆贬值纸币的人，通过这种艰难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训。

普遍的说，今天的储户仅仅能意识到他们明天的财富不等于他们明天的收入。为退休后的30年进行储蓄的人可能认为他是在推迟消费，但他肯定不乐意年老的30

年里以面包为生。实际上，没有任何商品的消费是滞后的。相反，储户获得的是允许他们索取未来社会的部分产品的法律所有权，当然前提是金融体系得以幸存下来。退休的人实际上不是靠他们的存款生活，而是被社会的年轻一代赡养着。人寿保险和全面的养老金制度避免不了人口老龄化的物质负担。年轻人仍将是唯一的赡养老人的人，从孝道转向互惠基金并没有改变这一现实，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会是这样。

在这方面储蓄是和未来的一个契约——一个奇怪的契约，契约中将要提供最终产品的一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来订立契约是一件不确定的事，年轻一代可能违背契约。他们可能会追求通货膨胀下工资增长，尽管会影响到他们退休后固定收入。他们可能会发动一场革命，毁掉股票市场。

尽管如此，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今天的储户可能会增加明天的实际收入。通过今天的储蓄，人们放弃对当前产品的部分支配权。因此他们“释放”了原本要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源。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危险，那就是释放出来资源会被闲置起来。当消费者决定储蓄他或她的部分货币收入时，这个不消费行为本身并不会传递出一个固定的信息来说明，在未来的一个确定日期内哪些消费品会被消费并且消费的数量是多少。最多不过是，储蓄的增加通过利率下降传达一般性的信息，即为了将来销售进行的生产更有利可图。但凯恩斯认为，即使这种途径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凯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尔·莱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1981年）。因此储蓄增加可能降低对商品的总需求，导致经济衰退。

另一方面，在计划经济中，没有理由不把通过储蓄释放的资源使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率。在我们设想的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最小总积累率是由民主决定的。积累率决策的第一个输入是人口；面对人口中退休人员比例增加的前景，积累的比例应当增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充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满足未来对生产工人数量的需求。这显然是以牺牲当期消费水平为代价的。但考虑到这是基于共同的决定，当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许个人偏好在边际上影响消费和积累划分的情况。什么机制能够保障个人选择的合理范围，并且同时符合总体规划的限制呢？这里有一些建议。

(1) 当前劳动券可以自由兑换部分种类退休金（例如在未来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开始每年度返还一定数量的劳动券）。这样的交易将依赖于一个统一的国家“金融体系”，以便于它们的总量能被计划机构监控。

正如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对应这种储蓄的是从消费品生产中释放的当期劳动力，计划者的合理反应是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分配到当前用于生产资料净积累（社会决定的超过最低积累的比例）的生产中。这将使未来更高的消费品产能成为可能。计划者能否通过制定好储户在未来某个时期想要消费的精确的产品数量来使用“释放的”劳动时间，这一点显然是没有保证的。这取决于战略规划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经济体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预测。尽管如此，计划者可以集中考虑流入的储蓄量，以确保如此“释放的”劳动时间得到充分利用。

(2) 允许短期的灵活性，储蓄存款也可以交换当期劳动券。为了购买各种耐用消费品，休假等等，人们可能从储蓄存款中取出劳动券。如果这类存款的流入大于每周流出，那么余额就可以用来为个人借贷提供资金。如果需要，这些信贷的期限，尤其是还款利率，可以用来使信贷的需求和来自净储蓄的供给相平衡。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会是个体消费者中间的变化，而不影响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

(3) 除上述被认可的储蓄形式，个人不允许囤积劳动券。这种囤积将扰乱劳动力分配计划，但可以通过使劳动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银行拒绝兑现超过规定时期的个人支票一样来避免这种情况。

这些关于储蓄和信贷的要点可以用到我们在本章的第一部分阐述的关于资金核算的内容。我们指出，家庭净储蓄（**净储蓄**）作为家庭资金使用的一部分，也作为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讨论净储蓄的细节。总储蓄是家庭对于退休金的获取（**退休金获得**）和消费者在储蓄账户的存款（**储蓄存款获得**）的总和。

获得净储蓄，我们必须减去家庭部门在退休金中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从消费者个人储蓄账户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费信贷（**新的信贷**）。

我们得到方程：

$$\text{净储蓄} = \text{退休金获得} + \text{储蓄存款获得} - \text{退休金支出} - \text{取款} - \text{新的信贷}$$

或者，把获得退休金的和消费者存款和贷款的项目用括号整理在一起：

$$\text{净储蓄} = (\text{退休金获得} - \text{退休金支出}) + (\text{储蓄存款获得} - \text{取款} - \text{新的信贷})$$

关注消费者储蓄和信贷——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储蓄存款获得减去取款再减去信贷）的数量是作为国家净资金的来源。这个术语代表了流入到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的净资金。上面已经建议过，把上面这个资金流设为0，通过设置不同消费者贷款

的条款，使信贷的需求刚好耗尽净流入的存款。这一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决于能否制定达到这种平衡的条款。

考虑个体消费者更趋向于储蓄而不是信贷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一些关于信贷的“免费”的条款，甚至定成负利率。以这种目的而使用所有净储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并非最优的政策：流入的部分资金可能被看作是一个能获得更高社会回报率的积累的“资金来源”。

这个解决方案的潜在问题是，消费者储蓄存款是相当具有流动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贷是快速自动清偿的，而用这些资金去购买的生产资料不是“流动的”^[1]，在积累项目“成熟”之前，我们面对一个未预料到的存款外流，国家不得不创造多余的劳动券。而这提高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破坏我们提出的核算系统。

这就是凯恩斯发现的问题的本质，即储户希望以流动资产的形式储蓄，然而他们的储蓄被用于购买非流动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个问题在国家垄断的金融体系中是可以解决的：国家能够告诉储蓄者，它并不能吃掉他们的蛋糕。如果消费者储蓄存款/信贷系统产生盈余，政府可以宣布，这些存款的流动性是有条件的，还可能实行配给制，而不是当对流动存款有大量需求时通过发行劳动券引起通胀来解决问题。

如果消费者储蓄/信贷系统产生赤字，即使消费信贷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类似的问题也会出现，难道还会用别的来源的资金（如退休的盈余账户）来支持额外的贷款么？或者应该配给消费者的贷款？

现期在退休金账户上存在盈余的人要求为未来支出做积累，确保这些要求能得到满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将盈余用于生产资料积累的生产。这要求在退休金账户和消费者信贷上有严格的界限。另一方面，消费者在紧迫的时候取出贷款，（尽管对于借方来说是现实的——很显然这是同意贷款的条件），相比未来获得劳动券而言，他们是在减少自己对未来产品的索取。但这种减少应该“适应”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会具有谨慎的灵活性：尽管不是操作一个完全分离的账户，但通过储蓄存款/信贷账户配给可以避免过度赤字（或盈余）。

储蓄的利息？

从上面的讨论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私人部门的储蓄是否应该支付利息。

^[1] 这样的存款可能仍由类似于现有的储蓄法规限制，正式规定国家可以让储户等待资金，尽管如此，正常情况下还是可以推迟。

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在这样的储蓄上的“名义”利率为0所带来的结果。如果这样，人们就能够从系统中提取出恰好等于他们过去所缴入的劳动券的累积总和。但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劳动量在下降，所以劳动券实际上变得“更有价值”了，也就是在劳动券的储蓄中存在着一种隐式的利息。并且人们能够在他们长期的储蓄上获得这个“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的不消费（储蓄）使生产资料的加速积累成为可能，而这又引起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却没有要求任何额外的报酬^[1]。

在传统的、充分就业的资本主义模式中，储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够的储蓄来为投资提供资金，但在我们设想的系统中，投资是社会化的，并且用于积累的资金的基本来源是税收。从某种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账户上的是当期剩余（资金），个人储蓄也许会对资金的积累作出一些贡献，但这是次要的。没有必要鼓励个人储蓄，因为当积累和税收计划制定出来时，社会储蓄率（也即不消费的比例）也就被民主地决定下来了。

税收政策

无论对于处理家庭储蓄有多么精密的安排，税收政策都将在平衡宏观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应该以何种形式向赚得劳动券的人征税？在苏联式经济中，传统上大部分的税收收入是通过“流转税”取得的。通过这项税，国家使商品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销售者所取得的价格有差异，而这些差异就流入国库。这样的一种税与我们所提出的制度是不一致的，因为它将导致系统定价下的消费品的价格高于它们真正所包含的劳动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们更赞成所得税；我们也建议国家适当地收取级差地租作为一种补充税。

社会主义所得税应该像什么样子？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累进所得税（在这种所得税体系中，那些有着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税率缴税），依据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够承担更大份额的税收负担。事实上，累进所得税被视为在资本主义下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一种方式（尽管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

^[1] 更值得商榷的是这种隐含的利息是否可以在消费者短期的储蓄中取得。留出的劳动券在这种储蓄中不会得到，在上面提到的方案中，使积累超过边际贡献。为了消除隐含的利息，必须使劳动券保持与劳动生产率相同的速率贬值。但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回购一些可以产生消费信贷资金的存款，以消费者愿意支付的利息，就有理由使得存蓄的劳动券不必要贬值。

这种税收体系是否达到了这一目标仍然是具有争议的)。但如果正像我们已经提出的,个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么累进税所适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统一税也许是最公平的税收体系:每劳动力每月或每年征收一定量的劳动券。

统一的劳动券税率传达了如下的信息:每一个处于工作年龄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为共同体完成一个基本量的工作。与贡献的劳动相交换,人们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人们想要一个额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来获得消费品,他们将必须工作超过这个基本量的最小值。我们在工作时间上设置最大的灵活性,这样个人就可以选择他或她的工作时间,如果一个工人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那么他或她可以享用这带来的好处而不用交额外的所得税。

统一税也具有对于税收收入的可预测性较高的优点。从按比例征收的所得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取决于人们赚了多少钱(在这个系统中,也就是人们选择工作多少),但从统一税中获得的税收收入仅仅取决于工人的数量。这种可预见性将对确定社会供给和积累有好处。假设计划者在社会劳动时间中除去个人消费后分配出 x 百万小时使用,那么统一税就可以被定在能够产生 $x-z$ 百万劳动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 z 百万劳动券是预测的家庭净储蓄的水平^[1]。

将这种统一税与英国绿党(GreenParty)的提议相比较是有意义的。绿党的提议是,所有的公民,不论他们工作与否,都应该被付给社会保障收入。这个社保收入可能来自于普通税收,包括所得税。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们的提议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因为我们所提出的统一税可以被视作一种负的社会福利。绿党的建议是十分可行的,并且相较于现行制度中发放救济的好处有着更大的价值,它避免了声名狼藉的“贫困陷阱”^[2]。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这一社会保障收入的提议有两点批评。第一,它似乎暗示已经接受了失业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考虑到一定有失业,绿党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处理它。我们不接受这种看法。我们认为,经济是能够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运行的。收入平等、充分就业和统一税的结合消除了“贫困陷阱”和抑制就业的因素,这比绿党的计划更有效。第二点批评是由于隐含的妨碍,社会保障收入系统需要一个高税率的所得税为其提供资金。我们设想了一个零边际税率的所得税,结合灵活的工作时间,这使得个人可以自己决定何时从额外时间的工作中获

^[1] 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对于挣得劳动券的人只征收统一税这一种税。实际上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开发更多的税源,如下面要讨论的地租。

^[2] 对生活福利发放的调查,收入低的人面临着很高的边际税率。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并开始赚钱,你就有责任缴纳国民保险和所得税。这使得提高你的收入变得很困难,并且抑制了你工作的积极性。

得的收益能与必须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绿党的计划——实际上允许人们选择过有补贴的懒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养懒人的大多数人劳动者所怨恨。

地租

我们参考其他系统的产权关系来支撑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概念（见第十四章）。这涉及到国家土地所有权。虽然我们不反对私人对于一部分住宅的所有权，但国家应保有对于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权。房屋拥有者应负有支付基于他们宅基地的可租用价值的租金。在这些情形下，某个买了一个房子的人只是买了那个建筑，为相似规模和装修标准的房子所支付的价格在伦敦和在布拉德福德一样。超过那个价格的部分，是占有者向国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税，反映了他们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适上的差异。这样的租金会对国家财政做出重要的贡献^⑤。

如果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讨论的系统的税收中发挥宏观作用，显然它们需要能够被用劳动券来估值。但这样支付的劳动券租金会与劳动券只用来购买根据它们所含劳动量定价的劳动产品的一般原则不符。

消费税

在税收上的最后一点也许值得一提。我们已经说过，消费品总的来说应该根据它们所含的劳动量用劳动券定价。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出于某些原因——一般来说是因为这些物品的过度消费被认为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酒精、烟草等）——对某些消费品征收消费税，以限制它们的消费。除了取缔这样的商品以外，社会主义国家也许希望实行相似的政策。注意，这不是一般的营业税或增值税而是对选定的消费品的特殊的收费。

征税和积累

在西方经济体中，新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是分离的。私人部门的积累是公司自主决定的结果，并且主要是通过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资金，但有一部分会通过金融机构再流通的储蓄进入积累。传统上公共部门的积累是通过举债获得资金的。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情况恰恰相反。公共部门的积累主要通过国有企

业的流转税供给资金，而再流通的储蓄则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们也设想税收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但附带条件是所有的税收水平必须由民主投票决定。

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批评就是，关于增长率，以及因积累率的决定事实上是由一些政治精英做出的。这使得积累部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性质。为避免这一点，有关多少比例的国家收入应被投入积累的备选方案应该被提交给公民投票。如果投资应占总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过，那么接着国家就有权征税来为此提供资金。考虑到积累的资金还有其他来源——也就是，储蓄和租金——积累的全部成本将不会全部来自于税收，但不同的税收会为平衡社会预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顽执、中华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第八章

消费品市场

外界对苏联式经济体的一个普遍的批评，就是它们对消费者的需求反应迟钝，且提出这种批评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诋毁者。因此对我们的总论点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明计划经济也能很好地应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都听腻了的短缺、排队和无用商品的过剩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内在特征。本章主要讨论消费品中的社会主义市场概念。

切入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回到我们在第四章中对计划所做的总体介绍。我们将计划区分为宏观经济、战略和详细计划这三个层次。在宏观和战略产业计划的范围内，详细计划主要考虑如何选择最终产出的目标模式，并确保有足够的资源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是针对消费品的最终产出目标是如何确定的？我们需要怎样的机制根据消费者们的反馈来调整这些目标？

我们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实很简单。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它们的劳动价值（即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间接社会劳动时间）来标记。我们在第三章中对这些价值的实际计算进行了讨论。但除此以外，以劳动券形式表现的消费品实际价格将尽可能按照市场出清的水平来确定。假设某产品需要 10 小时的劳动来生产，因此它被记为有 10 小时的劳动价值，但如果该产品在 10 劳动券的价格下使人们对它产生了超额的需求，就需要提价来（大致地）消除这种过量需求。假设该产品的价格碰巧是 12 劳动券，那么该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就是 $12/10$ ，比值就是 1.20。计划者可将每种消费品的这个比值记录下来。我们可能会看到比值随产品的不同而变化，有时在 1.0 左右，有时要高一些（如果产品需求旺盛），有时可能会低一些（如果产品相对不太受欢迎）。然后计划部门可以遵循这一规则：对比值超过 1.0 的消费品提高其产出目标，而对比值低于 1.0 的消费品则降低其目标。

这里的要点在于这些比值为我们测量社会劳动在不同行业中是否有效满足了消

消费者需求（按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叫“使用价值”）提供了一个参考。如果某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和劳动价值比大于 1.0，这就说明人们愿意花比生产该产品所需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券来购买这个产品（即工作更长的时间来获得它）。但是这同时又说明为生产这一产品所投入的劳动取得了高于平均水平的“社会效益”。反之如果市场出清价格低于劳动价值，这就告诉我们消费者并没有按其完全的劳动内容来给它“定价”：即投入该产品的劳动取得了低于平均水平的社会效益。相等或比值为 1.0 则是一种均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从他们自身的劳动时间出发，按社会所需消耗的生产成本来确定某一产品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这种“市场算法”的总体思路，而在本章中我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拓展这一思路。首先我们将考虑的问题是，确立市场出清价格是否总是合适的。其次，我们将说明市场算法和前一章讨论的宏观经济计划之间有何关系，并从中对该算法给出更正式的解释。第三，我们将讨论我们的建议与资本主义体制利润机制的关系。最后，我们将对诺夫针对“劳动价值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能发挥作用”的批评做出回答。

市场出清价格

市场出清价格是对商品的供应（在计划制定时预先确定的）和需求进行平衡的价格。从定义上看，这些价格是为了避免表现出短缺和过剩。出现短缺（即过度需求）将造成价格上涨并使得消费者减少对某一产品的消费。这时供应就会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钱的人。而出现剩余则会造成降价，从而鼓励消费者增加对某一商品的需求。

当某件商品相对于消费需求发生供应短缺时，在调价之外的一个办法是实施定量配给。我们可以正式地做到这一点，比如像战时那样发放定量配给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实现，简单地让人们去排队或加入等候名单即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愿意早起去排队等候的人就能获得产品。而我们的市场算法依靠的则是在每个时期按市场结算水平来设定价格，然后用这些价格与劳动内容之间的差额作为下一个时期增加或减少生产的参考。那么定量配给对解决短缺是不是更为公平的手段？同时在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上，我们的算法预先假定某个商品的均衡价格按照其劳动价值测量应该等于其生产成本。不过是否存在商品应该获得补贴，即应该以低于生产成

本的价格提供甚至长期提供给消费者的情况？

答案取决于如何在社会中对收入进行分配。在表 8.1 中我们对不同定价和配给政策的适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时，配给制是确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为它能防止富人囤积居奇。我们可以拿食品来做个例子：正式的配给能保证每个人都获得生存所需的足够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贫困使得某些人无法吃饱饭，那么实施粮食补贴就成了合理的政策，尽管我们不清楚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也许给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发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时候就尝试以降价的形式来进行食品补贴，那么现有的供应就会从商店里消失，而任何时候只要有新的供应到来那里就会排起长队。这种情况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会发生。无论是今天的欧盟委员会通过提高粮食价格让农民受益，还是前苏联为稀缺的粮食提供补贴，这两种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这两个例子中，变革都因强大政治压力而受阻）。

表 8.1：市场价格和配给制

商品供应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给
充足	不平等	补贴
稀缺	平等	市场价格
充足	平等	市场价格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么以市场价格获得的分配也就趋向于公平，因此补贴就没有必要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些存在严峻形势和供应中断的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采取配给政策是合理的。不过总体上我们将制定市场出清价格视为是一个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会主义共同体的最佳政策。

消费品和宏观计划

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不同最终用途之间的社会劳动分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在该背景下我们通过消费这一概念指出了用于消费品生产的总体社会劳动。现在让

我们通过劳动券消耗的概念来说明购买消费品的总劳动券支出。宏观计划的目标是让劳动券消耗与消费尽可能地接近相等。这同时涉及到(a)确定税收水平和(b)对家庭的储蓄行为进行预测。计划制定者确实有一些能够影响到家庭净储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预测要素却可能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劳动券消耗和消费之间不太可能达到相等。如果净储蓄低于预测,那么劳动券消耗则会超过预定的消费水平。这种情况下计划制定者可在下一阶段通过增税、鼓励增加储蓄或增加对消费品的社会劳动分配等手段来处理。或者,如果计划制定者认为低于预测的储蓄只是暂时的现象,那么他也可以选择不出回应。而如果储蓄高于预测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恰好可以用到并行推理。

这个意思是说,尽管劳动券的消耗与消费相等只是一个目标,且这个目标应该在一段时间内以“平均”的方式达到,但劳动券消耗与消费之间的比值在不同的时期却应该围绕1.0这个目标浮动。这里我们应注意该比值可被视为是各类价格水平的综合:它可代表在消费品市场为购买一个小时社会劳动产品所需的劳动券的平均数。我们在上面讨论的市场算法是将每一消费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的比作为重新分配资源的指标。当我们首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我们曾假设在所有消费品行业中这个比值的平均数都应为1.0。可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想法有些过于简单了。如果我们对某个时期中所有的消费品都形成一个加权平均的价格与劳动内容比,并用某商品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来对每个商品加权,那么这个平均数将恒等于劳动券消耗与消费的宏观经济比值,这个比值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1.0。

出于这种宏观考虑,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确地重新制定消费品市场算法:

(1) 中央市场机构(CMA)向生产企业下达各类消费品的订单,前提是订单代表的总劳动内容应该与计划的总体消费限额相等。

(2) 中央市场机构收到其订购的产出并将其以市场出清价格销售给消费者。

(3) 计算每个产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的比,并记录下劳动券的总支出,即劳动券消耗。然后对每个产品运用以下决策规则:

如果价格/价值 $>$ 劳动券消耗/消费,则增加商品订货。

如果价格/价值=劳动券消耗/消费,则保持商品订货数量不变。

如果价格/价值 $<$ 劳动券消耗/消费,则减少商品订货。

因此我们对于价格/价值比高于平均的生产线要加大资源投入，而对于比值低于平均的生产则需要撤回资源。

(4) 回到第 1 步。

这个算法中的某些步骤可能还需要详细解释一下。第 2 步要求市场部门为所有消费品确定市场出清价格。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确定一个接近市场清算价格的规则是很容易的：如果对某商品有超额需求就提高其价格，如果其供应过剩就降低价格。但是这个价格变化幅度应该是多大？如果没有经济学家们提供的诸如“瓦尔拉斯拍卖者”这样的理论虚构，则我们很难确定能够清算所有消费品市场的价格。严格来说，我们只能说按接近市场出清的水平来确定价格。计划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须试错，要像今天的资本家公司用市场力量来确定他们自己产品的价格一样通过对需求弹性所做统计分析的结果来得到正确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场价格（即在流量需求与当前生产之间完全平衡），但我们也不清楚这是否是合理的。这有可能引起超额的价格波动。对于任何可储存商品，改变库存是减少价格波动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减少库存，而不是调整价格来部分地满足超额需求。

更详细地了解一下第 3 步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这一步骤要求计划部门根据消费品的价格/价值比是高于还是低于社会平均值来增加或减少不同产品的生产。这里的目标是生产足够数量的产品以使市场出清价格能够等于其劳动价值（即比值为 1.0）。和我们发现每个时期的市场出清价格一样，这也必须是一个（在充分了解情况后的）试错过程。确定产品的产出水平并让市场价格呈现某种特定的水平，是将给定某种预先设定的供给水平下发现市场出清价格这一问题反过来。只有我们确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应（即某一商品的价格变化可能影响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详情，我们才能直接地解决这一问题。第二个复杂情况是劳动价值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目标：即改变某一特定产品的产出规模也可能带来单位劳动内容的变化。如果规模经济占主导地位，那么某商品的劳动价值就可能会随着该商品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报递减是主要趋势，则劳动价值就会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们应该把消费品的市场算法看作是始终在朝“价格=价值”这个条件运动，而不是要达到“价格自始至终完全等于价值”这种静止状态。

由于这个原因，该算法有一个特征值得注意。用劳动价值和市场价格来标记每个商品的做法可能引发某种投机行为，从而限制市场价格的波动。我们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现有劳动价值会为其可能的长期价格提供指导。假设某一特定商品当前是

以明显高于劳动价值的价格在交易。看到这种情况，某些消费者就可能推迟消费该产品，希望它在未来会降价。相反如果某一产品的售价要比其劳动价值低很多，这就会给消费者一个“现在买这个商品会很划得来”的印象，从而可能暂时地提升对它的需求。通过压低对高于价值产品的需求和刺激对低于价值的产品的需求，这种在需求上的投机性变化常常会限制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偏离。

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比较

我们建议的市场算法与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机制有何关系？我们认为两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商品的生产水平是随着盈利的变化在一段时间内进行调整的，其中更多的资源流向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从利润低于平均水平的行业中流失。在这里我们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很明显也扮演了和利润相似的角色。我们比较了在各种情况下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支付意愿与生产成本（以某种方式来进行测量）。

在支持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一个标准论点中，市场价格据说是对消费者为不同商品“投票”的记录。如果某商品被消费者认为有很高价值，那么它的价格相对于生产成本也就高，由此产生的高利润就会造成那些高价值产品生产的扩大。对资本主义这一论点的明显反对主要来自于消费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费者的“票数”要高很多倍，因此生产结构也就倾向于满足前者的需求（无论这些需求多么没有价值），而穷人的需求却因为无法以货币需求的方式来记录，从而无法得到满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么这种反对就会消退，而投票的类比是有一些力量的。

除了消费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们的消费市场和资本主义体制还有其它什么不同？让我们重点考察我们的“成功指标”（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之比）与资本主义盈利这一成功指标的对比。资本主义体制下商品生产的利润来自于市场价格与产品生产（货币）成本之间的差额。这种“生产成本”是在将每次投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乘以每单位产出所需投入的数量相乘之后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中对生产成本的计算就预设了生产投入的市场（在经济学术语上叫做“要素市场”）。正是在这些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原料、机器等货币价格。

而在我们设想的计划经济中却并不存在这种“要素市场”。我们只有消费品市场，

并使用这个市场的“信号”来指导如何对不同类型消费品所需的投入进行分配。而一旦最终产品的模式被确定之后，我们将对支持这种模式的资源投入规模进行集中的计算，同时由计划部门对所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分配（见第六章）。单个的企业并不是对生产资料进行处理或买卖的权利主体（更多这方面的详情见第十四章）。典型的资本主义企业的资源主要是其供应商在愿意卖掉产品的条款下提供的，并以此来得到这些资源的价格，但社会主义生产却并没有这样的“提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成本”必须以社会的方式来计算，同时（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那样）我们相信直接和间接劳动内容总量（即“劳动价值”）是对社会成本的合理衡量。

我们提出的调整算法可以应用于无要素市场存在的情况，但除此以外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它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指标”，即利润，部分取决于企业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例如，如果两家企业生产同一种产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术，支付工资更低或强制劳动时间更长的那家企业取得的利润也就越高。而我们提出的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却与企业内部的剥削无关。一家企业只有通过（a）生产能吸引消费者或者消费者愿意支付高价（从而提高市场价格）的产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产方法来降低产品的劳动内容这两种手段才能达到特别“成功”的业绩（即高价格价值比）。企业不会因为支付低于平均的工资或执行长时间劳动而得到“回报”。

结论

本章所提出的论点尽管并没有得到完全详尽的阐述，但是这些论点却支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需要对消费者需求无反应”这一看法。我们对能够按需求变化而调整消费品产出模式的机制做出了概述。虽然这种机制依靠各种各样的市场，但它却与资本主义机制有明显的不同——它既不取决于生产方式中的私人财产，也不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用生产资料的市场价格。

在形成了我们的基本观点后，让我们回顾一下诺夫（1983）对在社会主义计划中利用劳动价值提出的批判。诺夫和许多其他经济学家一起，声称不管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对分析资本主义有多大的优点，它都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无关。假设劳动价值能够充分测量社会生产成本，即使这样，诺夫说它们也是误导性的，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评价。

而通过我们本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对意见与其说谬误，倒不如说是弄错了对象。的确，一件商品的生产需要 3 小时还是 300 小时这一事实本身并不会告诉我们这件产品对消费者有多大用处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适的生产规模应该是多大。简单来说，这种客观的生产方信息必须要得到需求相关信息的补充。如果我们知道在当前生产规模下，某商品的劳动内容是三个小时而它的市场出清价格也是三个劳动券，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生产规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场出清价格大大高于三劳动券，那么我们当前的生产规模太小，而如果价格远低于三劳动券，则这个生产规模又太大。于是计划部门就能够做出适当的调整。主观地将价格设定为等于劳动价值很可能带来不良后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 19 世纪对此种结果的建议中指出的那样^[1]，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背景下对劳动价值的唯一可能的使用。

（袁军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1] 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1936）。对这个观点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考 Cottrell and Cockshott (1993a)。

第九章

计划和信息

我们正提出一套计算机计划系统。这套系统涉及到对经济行为的极其详细的模拟。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计算机提供大量的技术信息，例如，生产的产品清单和每一个生产过程中所用技术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计算机系统则将记录每一种原材料的库存量和每台机器的型号，使得这些约束可以被加入到计划过程中。

信息问题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技术方面的。我们不仅需要优良的硬件和软件，也需要正确的措施和激励，这样提供准确的信息就能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研究这两个方面（该主题的相关材料见第3章最后一节和第6章的最后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们讨论的是信息交换如何参与劳动价值计算的，第6章则概述了斯塔福德·比尔在智利阿连德时代下建立的控制论系统）。

信息和财产

显然，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计划系统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够支持数字信息传输的国家电信网络。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这一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可能有些落后）。但仅拥有通信网络是不够的。商业机密已经影响过去数据通信系统的发展方式，且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产计划所需的信息。详细的生产工艺只掌握在私营企业的管理层手中。虽然资本主义国家的电信部门已经铺设了计划所需的有线网络，且其他必要的生产数据也已经放在公司电脑的文件存储器中了，但是这些计算机并不会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开放。

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担忧是所谓的“数据保护”或“计算机安全”问题。许多计算机公司会花费数百万英镑来专门研究和完善限制访问计算机信息的机制。计算机上的数据都以某种方式被加上电子标签，并根据公司等级只供特定的授权人员使用。计算机的用户可被分配不同的权限，以此来规范他们对计算机文件的访问许可。

这种对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以致于从未在计算机行业里被质疑过。在现实中，建立一个只让管理者了解员工工资而禁止工人知道老板赚多少钱的系统已经成了数据库设计中的一个典型教学案例。

所有这些努力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因为信息是作为一种私有财产而存在的。但这是一种奇怪的财产，原因是它一边可以被窃取，一边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实上信息并不适合作为一种财产，因为它很容易被复制也很难保护。但不管怎么说，计算机产业还是围绕着信息保护和隐蔽的理念而发展了起来。而要建立自由、开放的信息流来支持合理的计划系统，则我们不仅需要废除商业机密这样的法律条款，也要重新设计当前大多数已在使用的计算机软件。

一个统计服务的需求

让我们思考一下，如果是以国家统计服务这种方式来开展计划，那么我们需要什么东西，以及如何通过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将它建立起来（所谓“技术上可行的手段”，并不是指人们上街随时就能买到的产品，而是指在当前水平下可以实施的技术）。

产品编码

计算机处理的是符号；它只能模拟以符号来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们想写一个电脑程序来计算如何将资源分配至不同的生产流程，我们要用一些方法将资源进行识别。在写程序的时候，一种简便的方式是跟随经济理论学家的思路，简单地将资源的所有类别贴上从1到n的索引号。但是如果这一程序必须要有客观指示物，那么这些数字就得要以某种形式与真实的产品联系起来。这一计划过程会涉及大量进行着信息和指令交换的计算机，如果它们之间使用不同的标识符，就会造成混乱。

如今，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库存控制代码编号系统。同样的产品可以分别被初始制造商、批发商和使用产品的公司分成三个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码。这样的多重代码系统会给计划过程带来很大的麻烦。为此我们需要一个通用的产品编码系统：即每一类产品将被分配一个特定的识别号，而该代码可以在所有的计算机信息交换中使用。

一个标准化的编号系统具有如此明显的优点，以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也有很大的压力将其采纳。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条形码来识别产品。用于识别

产品类型的条形码已经包含了计算机计划所需的大部分属性。条形码有 12 字节的标准长度，可被机器读取，并且每个码只标识一类产品。不过它也有一些不足，就是来自不同公司的相同产品会被分配不同的代码，但这是一个操作上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统一的库存控制

接着我们将产生第二个需求：一个标准化的库存控制系统。我们可能会希望为条形码加上额外的字节使其功能得到延伸，这样一个特定的编码就不仅能精确地识别某产品的类型，同时还可以确定它的来源和/或位置，从而使得库存控制系统能够在整个经济流通过程中跟踪到每一个产品的走向。我们在计划方法上所做的一个理论预设是资源可在选择性使用之间进行切换，但是这需要计划系统准确地知道每间工厂里有哪些资源目前正在使用，并能针对重新分配的对象发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统一的信息格式

计划系统预先假设在不同计算机之间存在着日常的信息交换。比如货物的流向、库存状态、可用的最优生产技术等信息都要进行交换。这就要求信息交换的技术要有一个标准。当前国际电信机构国际电报电话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简称“CCITT”）便制定了通过电子方式进行图文交换的标准。而对于经济数据的交换我们也需要一个类似的标准。

获取技术系数

从前面的各章节我们应该清楚，计划的有效性取决于是否能获得生产工艺的准确数据。但收集这些数据存在技术上和社会上的障碍。技术问题主要与必须收集的数据纯粹数量有关；这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故意提供不正确的信息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将在下一节讨论。

虽然收集每一个应用于经济目的生产工艺信息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任务，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信息正在被记录下来。它们可能被正式记录在公司的内部计划或者非正式地记录在公司的采购订单中。一个公司的采购信息为我们展示了该公司所用技术的轮廓。因为多数公司都实行计算机管理，它们的订单便以计算机可读的形式来保存。而大公司已经开始利用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来完成生产计划的制定。只

要进行相应的标准化，这类信息便可以提取用于计划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计算机的电子表格做计划，所以在任何时候市场都会由几个电子表格程序所主导。可以想象的一种情况是，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计划可以用几个软件来完成，而它们的功能中已经包含了将现有技术的详情传到计划网络的能力。其中从工厂层面详细阐述技术的过程中所捕获的数据将被用于制定国家计划。

信息：社会问题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企业管理人员在统计报告中将数据虚报给规划部门这种系统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假如企业管理者想过得“舒服一点”，他们便倾向于低估当前技术的生产力，对应的便会对该技术的投入产出系数有所高估。如果这些高估了的数据得到规划部门的认定，企业会被分配比完成实际生产指标所需还要多的资源，让企业“松弛”下来并更容易地完成计划（当然这种结果也可被认为符合当前企业工人的短期利益）。另一方面，当涉及到对投资项目的评价时，企业管理者对资源则会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国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夸张地描述对他们的业务经营范围加大投资将会取得怎样的好处。

我们应该使用单一的程序来记录当前生产和未来投资的技术详情，以尽量避免这种扭曲。假设我们有一个系统能让生产工程师通过它将技术记录在计划计算机上，那么他们就会对所需的投入和预计产出提供详细的信息。在对不同生产技术进行集中评价的基础上，规划系统会选择每一项将要被使用的技术的强度。然后要求生产项目用某个已经记录的技术来开始生产。因为某个工艺流程的提出者事后可能要对它加以实施，因此尽可能准确地指出该生产所需的投入和预计的产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激励。

信息、绩效衡量和激励

为了进一步讨论，我们不妨将它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一种情形进行对比来说明这个问题。上面提到的那些倾向，即管理者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而高估当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时又夸大他们自己业务范围长期扩张的好处，也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一个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假如这些部门是通过公司内部规划而不是经由市场而整合的，那么在这个范围内，那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考虑的因素对它们也同样适用。

但当涉及到独立的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关系时，这些倾向就会被市场竞争力量所制约（假设我们所说的市场本身确实存在竞争的话）。

资本主义的公司也时常会希望“过得舒服”；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且如果进入他们这个特定市场的门槛并不太高，那么更有进取心的企业就有机会进入该行业，而这些新的企业会通过接近现有技术极限的方式开展生产并削弱现有的公司。这就迫使原来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要承担市场份额丧失、盈利减少，甚至最终走向消亡的痛苦。另一方面对于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很明显其最大阻碍是资本主义企业必须为投资目的所借贷的资金支付利息，因此过度借贷无异于自杀。为此人们有很强的动力来对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估（尽管如此，严重的投资错误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下还是时常发生）。

那么我们如果也将这类制约对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企业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为进行模拟的话，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解决两个新问题：即如何对企业的绩效进行评价，和什么样的奖励与处罚是适当的。

评价企业绩效

关于绩效评价，第8章里清楚地说明了针对消费品的市场相关准则（这与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产品的市场清算价格与该产品劳动价值的比率。有人认为该比值越高就意味着越“成功”，且会导致更多的资源倾向有关企业。对于生产消费品的企业来说，这应该会阻止对投入需求的夸大，因为高估会导致更高的劳动价值，从而使得市场价格与价值的比要远低于对投入需求的正确估计。

我们希望强调这一点，因为选择一个合适的绩效衡量指标对于经济合理性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会责任感，希望促进公共利益，但如果实施欠考虑的绩效衡量方法也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诺夫（1977）指出苏联历史上曾因为目标设定错误而产生企业投入越大（比如尽可能多地使用钢材）反而越受奖励的荒唐故事。

这个特定的标准，即市场价格与劳动价值比，仅可直接适用于具备市场价格的商品或服务（即我们所提出的系统下只针对个人消费品）。但是，同样的原理通过归属方法也可以间接扩展到这些进入消费品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后者的产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费的就不会有市场价格，但以它们作为投入而生产出来的消费品的价格对评估其“社会效益”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生产资料企业的统计评估

我们可思考一下这个公式：产品 X 的市场价减去产品 X 的劳动价值。出于在第 7、8 章中解释的原因，我们会希望这一公式针对所有消费品的平均值都接近于零，然而，会有许多独立的作用力推动这一差值偏离零：比如伴随着供应方面短期和长期的变化（如技术的变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模式的各种变化。这个被统计学家们所熟悉的“中心极限定理”原则告诉我们：大量的独立随机变量作用的总和趋向于“正态分布”，即形成一个带有知名统计属性的光滑对称的钟形曲线。因此当我们认为在所有的消费品中，市场价减去劳动价值的差将遵循一个近似零均值的正态分布时，这种假设看起来是合理的。对有些产品其差值可能为正，有些则可能为负，而与零偏离得越大，则与零发生任何特定绝对偏差的可能性会在可预见的方式下减小。

现在假设一个产品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是用于生产大量消费品所做的投入。消费品的相关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产品的一个样本。如果我们从这些产品的零均值正态分布的数量中随机选取一个样本，我们也希望得到一个样本的零均值。只要我们能确定该数量的标准差（即对数量的要素围绕它们的平均值分布的广度所做的测量），那么正态分布的列表能让我们对随机样本的平均数提出概率推断。例如，随机样本的平均值有 95% 的可能存在于零加上或减去数量标准偏差除以样本大小平方根两倍的这个范围内。

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来判断为消费品生产所做的各种投入能带来多大的社会效益。假定我们有这样一个投入，譬如某种类型的机床。我们记录使用机床所生产的每份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异，同时计算这些差异的样本均值。假设该均值最后大于零这个“预期值”。这或许只是碰巧，但运用上面提到的统计推理，我们应该可以对这种可能性进行评估，并发现这仅仅是一个随机事件。与此相反的假设是，上述大于零的平均不仅仅是随机的，而是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的机床本身是在高于社会平均效益下生产出来的（比如它可能是为某项工作特别设计的产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别高的质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用最少的劳动和最少的材料损耗生产的）。所以这个有社会效益的投入导致与其相关联的各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和劳动价值之间产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规划部门应该能够识别哪些投入在社会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

果我们发现使用该投入而生产的消费品中，其市场价格减去劳动价值的结果明显为负数，那这一投入就应属于这一类（在该语境中的“明显”一词意思是指与零的差值远大于单纯可用几率来合理解释的情况）。

那么我们的建议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对所有用于生产消费品而投入的生产资料进行例行评估。只不过这种方法是概率性的，它并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因为即便几率很小，某种生产资料碰巧得到一个明显的“好”或“差”分数的可能性却始终存在。但这个程序的结果可被合理地拿来做进一步详细研究的基础，比如针对那些从表面上看做得特别好或很差的企业。^[1]

反垄断

一些商品和服务是不可以用于直接消费的，且它们也不直接作为生产资料投入用来生产消费品的。这些商品没有市场价格，此外也不能随意拿消费品的市场价格来间接地对它们进行评估。但即使在这里，劳动价值的计算也还是有帮助的。只要存在一个以上的产品生产者，计划部门就可以对来自不同企业所生产的相同产品计算出来的劳动价值进行比较。对于在某些情况下的劳动价值超过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释，否则就应该促使高成本生产企业进行整改。换句话说，“竞争”也是有优点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要用资本主义模式，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也应当防止在某个特定产品上形成一个垄断的供应商^[2]，除非对重复建设生产设施的论证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奖励与处罚

我们已经强调对经济表现采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为这样的衡量能够让企业觉得提供正确的信息以及与中央计划部门进行合作是有利的。但问题出现了：如果经过衡量后的业绩会影响到工人的财富，那会怎样影响呢？此外工人们在雇佣他们的企业所取得的“成功”中能获得什么利益？

^[1] 对类似一般类型企业的监控由斯塔福德·比尔在智利实施过。比尔并不关心对劳动时间的测量，但是他的系统与我们相似的一点在于它能进行实时的数据收集，同时有一个智能的统计过滤器将无意义的随机差异筛选出去。详见第6章。

^[2] 苏联的计划部门通常只为某一特定产品建立一个工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知道其它的生产工艺是否会更有效率。不过应当注意的是我们前面提出的统计方法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有用的。

那种认为金钱激励是人类的最大动力的观点是一个商品生产社会的产物，而并非源自普遍的人性——这种观点在西方经济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观点的狭隘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业的成功，在那里雇员对公司的忠诚要远高于对个体激励的重视。

我们只需想想商业之外的职业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标准的重要性，如士兵们的荣耀、解除他人痛苦的护士，对学者的尊敬和演员的声望等等，并由此意识到有些回报比起金钱来说毫不逊色。虽然穷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希望得到金钱来维持生存，而富人对它渴望主要是因为它是成功、地位和声望的象征。

然而我们却仍然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保守派会如此狂热地相信金钱动力对获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须的。对资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标准是自我扩张，这确实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对于资本家个人和其理论的提供者庸俗经济学家而言，所有一切似乎都颠倒过来了：金钱似乎成了行动的必要激励或奖励。事实上，将崇高的意义附加到对金钱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资本的内在必要性鼓吹的结果，或是这种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经理人和企业家不得不将金钱看做是人类动机中的最终驱动力。

当然，这里的矛盾是，一个资本家的利润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决于他的员工如何努力为他工作。对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长时间内都要先让别人富足，而资本家的最终成功恰恰就建立在这些慈善家自我牺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对东方传播的这些信条是由西方自由放任 (*laissez faire*) 经济学家从自我激励的必要性出发对其宣讲，并且是按照其表面意义被他们所接受的，那么人们将被迫得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结论。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被说服为了他们雇主的利益而自愿奉献自己呢？^[1]

因此我们并不建议将奖金与企业的价格价值比挂钩。当然这会与第2章中的分配原则相冲突。的确，某个行业的高价格价值比意味着该行业需要扩张。企业可以通过开发一种人们非常喜欢的产品，或利用一个特别有效的生产方法来达到一个高比率，这两种做法都是值得赞许的。但我们还可能遇到与工人的工作绩效完全无关的价格价值比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因为企业的一些不可控制，甚至无法预测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产技术、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资源的成本和获取上发生了变化

^[1] 资本有自己的手段来确保他人服从，这在 Harry Braverman (1974) 对现代生产流程的记录中有精彩的说明。

等等。我们并不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区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来的，哪些是靠运气的来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现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为坏运气造成的。只不过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是一个问题：好运气和良好的判断力都会获得回报，而坏运气和磨洋工也会受到同样的惩罚。但我们希望这种任意性不要进入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体制。

即使我们避免将个人薪水、奖金与企业绩效挂钩，但是对效率的激励却仍然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奖励。从消费品营销算法形成的结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会劳动力上特别有效的企业将被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因此工人也就会获得更多机会（比如有更好的晋升前景，有机会参加和打造一个不断增长的业务等）。而当企业呈现出持续低于平均水平的效率时，那么该企业就会缩水，同时他们的工人将会被分配到别处。而要让这一机制得到良好的运转，工人们就不应该在任何固定的企业或行业内长期工作下去（虽然他们有被聘用的权利）。我们将在第14章对维持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所需的财产关系进行讨论时再回到这一点。

（袁军、政南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第十章

对外贸易

如果两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时则强三分之一或百分之三十三，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文版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14 页）

社会主义运动缺乏确定的外贸理论。马克思打算在《资本论》中用一卷的篇幅来讨论国际贸易，可是这项工作还没开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数与社会主义经济如何运行相关的问题都很难从马克思那里获得明确指示，但起码他通过对资本论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应用到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概念工具。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体上来源于李嘉图，而且因为马克思缺少关于贸易的具体理论，所以显然应该从李嘉图开始。李嘉图认为当各国在生产商品时享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才会产生。因此理解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概念相当重要。起初人们认为一个有着高生产率产业的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几乎无利可获。德国服装行业生产衣服消耗的劳动力可以少于中国服装行业。德国的汽车行业在生产汽车上消耗的劳动力很明显要少于上海后街生产汽车需要的劳动力。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德国在生产力上比中国有优势，但尽管如此，将奔驰汽车出口到中国，同时把中国进口的棉织品进到德国却是经济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德国汽车行业有着相对更高的生产力。在生产力方面，与手工生产相比，奔驰汽车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汽车行业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贸易生产力可提升空间就没那么大。尽管德国服装公司在生产衣服时效率更高，但其优势并不如汽车行业那么大。因此德国将其劳动力集中在这些有着最大优势的工程行业。

假设在德国生产一辆奔驰需要 1000 小时劳动力，生产一件女装衬衫需要 1 小时，

而在中国生产同样一辆奔驰车需要 5000 小时，生产同样一件女装衬衫需要 2 小时。根据劳动价值论，在德国奔驰车与女装衬衫的相对交换价值比可以是：

$$\text{一辆奔驰车} = 1000 \text{ 件女装衬衫}$$

然而在中国其交换价值比则是：

$$\text{一辆中国豪华轿车} = 2500 \text{ 件女装衬衫}$$

假设在自由贸易情况下，一资本家在德国购买奔驰车，运往中国，然后换成衬衫，那么这位资本家可以大赚一笔。他能够以低于高效的德国服装生产商的价格来竞争。国际市场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从中国进口的衣服往往会压缩德国国内市场衣服的价格，同样从德国出口的汽车也会降低中国市场内的豪华轿车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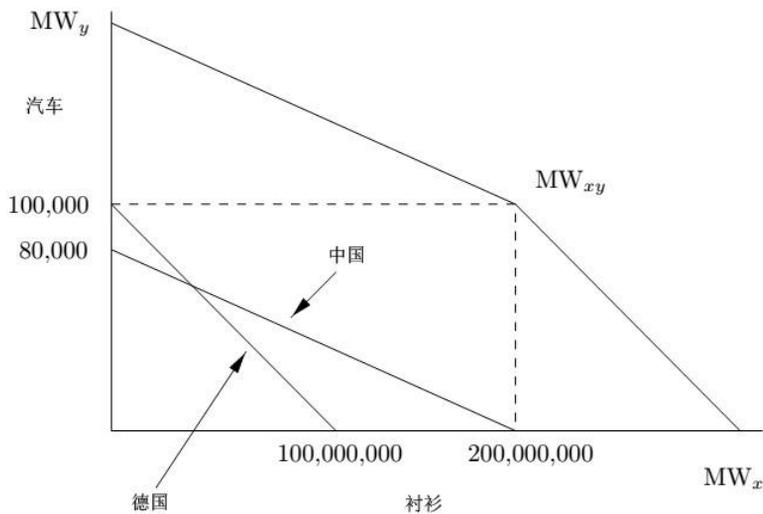


图 10.1 国际生产可能性

假设德国人有一亿小时的劳动力可以花在汽车或衬衫的生产上，而中国人有 4 亿小时的劳动力，根据图 10.1 我们可以得出，没有中国的参与，德国则可以生产 10 万台车或 1 亿件衬衫或根据公式可以得出的这两种商品的任意组合：

$$\text{总劳动力} = (\text{汽车数量} \times \text{德国劳动力/台车}) + (\text{衬衫数量} \times \text{德国劳动力/件衬衫})$$

另一方面，中国可以根据公式单独选择任意这两种商品的组合：

总劳动力=（汽车数量*中国劳动力/台车）+（衬衫数量*中国劳动力/件衬衫）

整个世界都受这两种关系约束：全球汽车产量=德国+中国汽车产量，而全球衬衫产量=德国+中国衬衫产量。受这些关系约束，结果就是：

(1) 全球汽车最大产量 (MW_y)=德国+中国最大产量=180000

(2) 全球衬衫最大产量 (MW_x)=中国+德国最大产量=300000000

MW_{xy} 这点对应的各自产量是 2 亿件衬衫和 10 万台汽车。当德国只生产汽车，中国只生产衬衫时，这种全球产量交叉现象才会出现。这也表明如果每个国家既生产汽车又生产衬衫那么就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多汽车和衬衫。从两国完全专业化生产的起始点开始，让德国生产 9 万台汽车和 1000 万件衬衫，让中国生产 1 万台汽车和 1 亿 7 千 5 百万件衬衫，那么全球汽车总产量将保持在 10 万台不变，而全球衬衫总产量则会从 2 亿件跌至 1 亿 8 千 5 百万件。任何分工上的变动都会减少至少一种商品的产量。这就是李嘉图在其有关鞋子与帽子生产的寓言故事中辩论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这类问题是个典型例子，可以用数学中的线性规划解决。国际贸易中可以通过分工实现全球总产量的增加。

附加产量构成利润来源，且此利润不包括对工人的直接剥削。在古代或中世纪时期，那时生产的直接受农业奴隶主阶级或地主阶级掌控，商业资本能够利用这一利润来源。商人能霸占一部分剩余资本的能力，构成了像罗兹和威尼斯这样的贸易城市的财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发展而成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个国家的商品均衡价格与其劳动力占有量成比例。关于世界价格，这一理论能有什么样的预测？^[1]让我们考察两个国家没有进行完全分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将会受到其国内劳动力价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衬衫表示的汽车价格将处在 1000 件上衣（在德国）和 2500 件上衣（在中国）之间的某个位置。它的数量不会低于 1000 件上衣也不会高于 2500 上衣。因为两种商品在两个国家都进行生产，不廉价的国内产品就要和相对廉价的进口产品竞争，所以汽车的相对价格在中国下降，而衬衫的相对价格则在德国下降。两种不同价格比率的存在恰好造成了国际商人的利润。

既让两国进行完全分工，并将产量固定在图 10.1 中的 MW_{xy} 所对应的值上，这

^[1] 检验劳动价值论应用到市场经济时的有效性似乎超过我们现今工作范围。Farjoun 和 Machover(1983)给出了一个有趣的当代评价。

是不可能的。要想两种商品产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这似乎太过偶然。所以，均衡条件可能是一个国家进行完全只生产某种商品而其他国家两种商品都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出两国市场商品交换率受没有完全专业化生产的国家中的劳动力价值比例决定。因此如果汽车总需求大于 10 万台，同时衬衫总需求小于 2 亿件，那么德国在汽车生产上会进行完全分工，中国也会做出改变，既生产汽车也生产衬衫。这样看来中国国内价格比例将决定世界价格比例。德国汽车生产商继而能通过以更高的价格向中国市场销售汽车来获取超额利润。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维持各国间贸易平衡这个重要角色由货币往来扮演。假设德国与中国进行贸易却长期维持贸易逆差，那么为了支付进口货款德国商人将不得不以人民币同其中国货物供应商进行结算。但是如果进口商品数量不大，那么将用金银结算。为了支付进口商品货款，德国不得不动用一部分金币或银币库存，这就可能造成国内市场货币匮乏并且导致价格降低。国内通货紧缩将导致进口商品价格相对上涨以使贸易回归平衡。

一般来说，此种论断形式实际上不仅仅只适用于国际贸易——国内地区间贸易也同样适用。如果苏格兰与英格兰进行贸易并获得贸易盈余，那么就会出现向其边境北部货币净流通现象。这会导致当地通货膨胀（比如房租变贵等等）。但是会刺激进一步消费从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区内贸易失衡现象。如果国内市场贸易中商品有统一的价格，那么与关于国际贸易所下的论断相同，各个地区会集中生产那些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商品。

经典的外贸理论非常抽象，没有考虑到现代世界市场的许多细节。比如说，现今的全球货币机制不再像李嘉图的时代一样基于金本位。因此，通过金银流通手段减少贸易失衡是不可行的。信用货币，以及利息率变动导致的投资活动现在已经造成了长期性的贸易不平衡。当李嘉图写书的时候，人们还没见过存在贸易流量系统性扭曲的国际债务。更重要的是，比较优势的理论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比较优势会产生。

技术和贸易伙伴

尽管李嘉图的理论确实提供了一些关于造成外贸的原因的信息，但是这是从比较优势的起源中抽象出来的。为什么有些在特定产品的生产上具有优势呢？贸易往

来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可以用矿物资源状况和分配来解释。沙特阿拉伯出口的矿物油和希腊的橄榄油可以用自然禀赋论解释，但我们不能用日本能过轻松容易获得的沙子来解释日本出口的硅片。

随着技术发展不平衡，只有一些发达国家有能力生产某类商品。因此当美国在飞机生产上有着绝对优势，在生产大型喷气式飞机和皮革制品上我们不能用比较优势来把印度尼西亚和美国进行比较。在李嘉图理论框架下（通过计算得出生产属于自己的飞机印度尼西亚需要消耗多少劳动力）进行比较是可能的，但是这会掩盖技术发展不平衡这个更重要因素。工业化国家中的贸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专业技术领域决定。一项先进技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一个国家有利：

- (1) 它能提升一个国家的总的劳动生产力，进而提高其总体生活水平。
- (2) 它能帮助一个国家生产特有产品用于出口以便获得很难生产出的产品。

技术优势带来的贸易是不稳定的。优势是暂时的，因为技术迟早会成为人类共有的知识。许多主要工业国家不断根据科研成果引进新的生产部门，借此发展新的比较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销售的产品代表其内在的科学与工程研究价值。他们出口的这类产品每年都在发生着变化，而那些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在进行“专门化”的，也正是开发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经济体

传统行业在面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竞争时会遭遇衰退，这是发达国家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过去一、二十年间这类行业衰退现象对美国及西欧的工薪阶级打击很大，造成大规模的失业。这就导致采取保护主义以防止失业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盛行的那种状况，当时主导工业力量想要保护他们的本地市场，而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不仅抗拒这种压力，还要进一步推进自由贸易。资产阶级政府抛出了那种老生常谈的观点，即比起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将会带来更多的产品以及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这就使得工会和政党只能通过对保护主义的辩护来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认为，第一世界里的失业是和第三世界里的低工资经济体竞争的结果。尽管这个议题和我们的主题——社会主义经济体的外贸政策——没有直接联系，但既然社会主义政党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选举掌权，就不得不处理这一议题，因此就有了间接联系。

显而易见的是，这个议题关键在于，低工资经济体和高工资经济体的自由贸易是否损害后者的产业。从直觉上来看，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廉价货物明显将会大量涌入从而造成失业，但李嘉图的理论却认为，这种直觉是错误的。为了能单独显示出低工资的影响，必须要抹去国家之间其他的不同之处。我们必须假设，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并且之间没有因为矿产储备之类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优势。在这种情形下，两个国家的商品相对价格才会一样。如果生产的汽车和洗衣机所需要的劳动在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么在每个国家洗衣机和汽车的相对价格将会一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国际贸易变得毫无利润，进口商品不仅不会涌入高工资国家，连国际贸易都不会有了。

有一种例外的情况，那就是当一个政府系统性地高估它的货币，这种情形下，所有涌入的进口商品都会显得廉价并引发国内失业。但高估的货币和工资率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都可以在短时间高估其货币。劳动价值论认为，资本家在低工资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这不会威胁到高工资国家里的工人。

造成这种和直觉和经验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的原因之一，是高工资国家和低工资国家之间拥有不同的技术。纺织业产品和重型机械制造业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率先进入的行业。这些行业是这些国家具有很大比较优势的行业。是这种比较优势而不是低工资解释了它们的出口。印度航空工业的低工资威胁到了西雅图航空航天工业工人的饭碗。

为什么李嘉图的预测看上去不切实际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只关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们把资本的运作考虑进去，前面的结论就站不住脚了。现在，在高工资经济体里的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利润的地方。这种资本在高低工资经济体之间的转移会引起高工资经济体内的失业。

随之而来的是，输出资本的资本家将会以他们的跨国所得为生。流回本国的利润将会增强宗主国的货币，这样确保进口商品会大于出口商品。过量的进口和工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认为是前者带来后者。这种争论的意义在于，对一个社会主义政府来说，监管资本流通，要比监管进口商品更重要。只有当资本能够流向国外时，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支付的低工资才能威胁到发达国家工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动本身并不会影响国家内部的收入结构，尽管这可能会引起生产部门中的结构转型。

贸易赤字的优势

通过上面的分析，你是否发现你通过只向外国人出售而不进行任何购买这种办法，获得了什么东西吗？你是否通过这种方式赚到了钱？但你却不能保有它，从你的手中流过却不能利用它们分毫。增加的越多，价值减损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价值则按比例增长。

(梅西埃·德·拉·里维埃, *L' 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经济学家为了解经济的深层次的运作方式而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他们想要理解，在金钱的“面纱”下，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行的。提出能够能对抗占重商主义的理论，是他们的目标之一。重商主义认为，调整对进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为一种阻止货币流出国内的手段。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担心货币流动毫无意义，并且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贸易顺差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有贸易顺差意味着一个国家把有用的商品换来了毫无用处的黄金。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贸易顺差则意味着，它将每年生产的一部分产品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却得不到回报。贸易顺差不仅不可取，反而使得一个国家贫穷。

英国工党政府无视这种洞见，投向了重商主义的怀抱，欢迎贸易顺差。不光是工党政府，在全世界，资本主义政府都说贸易顺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许多好事那样，通过牺牲和传播希望就能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牺牲就是通过紧缩方案，通过牺牲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释放资源进行出口。

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虚无缥缈的好处。但是这种错觉是如此冥顽不灵，不能再被欺骗者的愚蠢来解释了；它一定是起源于现实的社会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国的压力是很明显的。为了付清他们的债务，他们被迫追求贸易盈余。在债务特别高的国家，贸易顺差也许全部用于给外国债务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贸易顺差的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债务国家的无产阶级被逼迫到饥荒的边缘，然而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向了华尔街和伦敦城。

对于债权国，则没有这种外部压力，但它们只有通过牺牲国内消费才能获得贸易盈余，所以贸易盈余必定体现了某些内部群体的利益。这些群体可以从中获利。

受益最大的是制造业资本家和金融机构。贸易顺差使得国内制造商获得更多货币利润^[1]。通过下面的说明，可以简明表示出来。在资本主义部门中产生的总收入(I)，是由工资(W)加上各种可以我们称为利润(P)的财产性收入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这种收入来源自销售，这些销售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卖给工人(S_w)，卖给有产者(S_p)，卖给外国人的净销售（贸易顺差，S_f）。因此：

$$I = S = S_w + S_p + S_f$$

如果我们假设卖给工人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即 $W < S_w$ ，可得：

$$P < S_p + S_f$$

总而言之，利润是被有产者的购买和贸易顺差所限制。贸易顺差带来更多的金钱利润。货币利润超过了有产者的消费和投资(S_p)，而通过金融系统的中介，作为海外资产的股份积累起来。

社会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贸易

要讨论社会主义国际贸易，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就提前预设了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国家。目前，这是一个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记住的是，一些像中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几个民族组成的联邦。最好是从国家间贸易而不是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考虑。这种国家间贸易有三种情况，经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以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贸易。

我们先来看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之间的贸易。既然李嘉图对于国际贸易的解释是以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为依据，比较优势就是国际贸易的动机。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对生产力，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具有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相同的相对生产力。因此，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就会具有优势。

^[1] 这个观点是由卡莱斯基（Kalecki）提出的；参见他的《动态经济学研究》（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第五章。

如果和资本主义世界贸易，这一系列的政策问题将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时，应该追求贸易顺差，贸易逆差还是贸易平衡？应该是双边平衡呢？还是多边平衡？外汇政策应该是什么呢？如果货币正处于消灭的过程中，那么外汇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国家对于外汇的需求

传统上，社会主义国家竭尽全力想要获得资本主义的货币。它们的动机为了支付进口的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商品。国家的计划一般会有一笔预算来进口固定设备以及一些最终消费物品。计划者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他们无法在购买进口产品之前预计这些产品的价格。这是整个计划的不确定之处。但至少对于国内计划而言，原则上可以提前计算不同行业的需求和产出，因为这些行业都服从于中央计划。外国供应商在计划体系外，计划机构在三年内并不知道他们的开价。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达成长期固定价格供应合同，但这只是特例。如果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太大，这些不确定因素会影响经济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特别明显，如果计划依赖于进口的工业设备，而缺乏外汇则会导致机械设备不可用。

任何国家都能通过旅游业，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或者来自他国政府或银行的贷款获得外汇。在社会主义国家，主要的不同在于，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由公共机构而不是由私立机构来控制的。这样说来。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给了公共机构更大控制贸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国家独占了进口，那么万一在计划出口收入不足时，就可以削减进口。这同样可以控制资金流动，比如说，如果外国贷款只能从国家银行那里获得，那么最近几年，在英国和美国发生的用不受控制的贸易赤字来资助私人借贷这种事，将会不再发生了。

但是这种对进口的临时控制，也许会带来巨大内部负效应。如果某些工厂依赖于进口的原件，那么削减进口也许会带来生产减少。可以做优先级排序，让工业投入优先，消费品其次。尽管可能实现，但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生活水平的降低。不得人心的消费品短缺与部件短缺造成的经济混乱的恐慌相结合，导致某些社会主义政府（特别是波兰和匈牙利）^[1]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严重依赖贷款。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钱，西方的银行在一段时间内非常乐于借出这笔钱。接着就是利率上涨

^[1] 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解释为什么称他们为社会主义。

以及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条件普遍恶化，导致这些贷款变成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为了偿还利息，不出意外，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全球资本的代理人，通过减少实际薪水以及将产品投入出口市场，从公民手中榨取剩余价值。

鉴于这些让人沮丧的经验，社会主义国家跟随毛泽东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证贸易平衡并拒绝从资本家的银行那里贷款。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只能通过自己的出口劳动产品来换取进口。不是现在出口，就是将来为了付清贷款加利息而被迫更多地出口。海外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他们知道他们借出去的钱会生钱，而且债务会被反复地偿还许多次。

外汇的替代品

苏维埃社会主义模式是维持一个在国外不能流通不可兑换的货币体系，同时用美元或者马克来支付进口食品。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国内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内，货币结束它作为一种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劳动券所替代。劳动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钱，而是公民们用来支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劳动券不能流通或者用作资本。当这种方法用在对外贸易问题上，就意味着一种在某些方面与苏联模式的外贸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这些国家用硬通货来支付外贸并且通过外汇管制的方法来限制本国货币流出。在 1940 年到 1960 年间，英国政府就采取类似政策。

我们所提出的政策大体上与之相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进口商品是用劳动券来支付的，劳动券能够出口也能在国外流通，但是不能在国内流通，并且宣布流入进来的外国货币为非法。我们希望防止货币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在国内经济中形成。这就是为什么劳动券不能在国内流通的原因。在资本主义世界内，货币资本已经存在，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联合体（commonwealth）之间^[1]，流通劳动券不会遭到反对。一家资本家的公司给社会主义联合体提供进口商品，那么外贸部会给他一个账户并给其中打入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然后，这家公司能从贸易部那里获得可流通的信用证书。

劳动券证书可以作为一个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据，这样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场

^[1] 自从前苏联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后，“联合体（commonwealth）”这个词就具有了新的弦外之音。这个词源自将拉丁语的“res publica”或者是“republic”翻译成英语。这是附在 17 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推翻了君主制后建立起的革命独裁上的标签。在这个世纪这个词继续和革命交织在一起，而英国社会主义者将这个词用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同义词。这个词最大优点是其字面意思就直接表达了共同所有的思想。在前殖民地，为了给 20 世纪的君主制一些大众主义的合法性，英国政府募用了这个革命话语。在这种保守的伪装下，这个词显然十分符合叶利钦的胃口。

上对其进行出售来换取他们想要的货币。对于这种票据的需求来自想要购买联合体出口商品的公司。联合体贸易部无需创设汇率，这是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事情。既然进口和出口（以及国际交易）都是由劳动券来结算，在决定进口什么和出口什么时，就可以无视世界市场上这些产品的美元和日元价格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只需要关心外国产品的外国货币价格和汇率。

这样看来，国际贸易仅仅是一个生产进口产品和消费出口产品的特殊分支。这就使得国际贸易能够融入整体计划模型。由此可见，既然计划当局拥有不同生产工艺的相对劳动耗时数据库，计划当局应当决定进口哪些货物出口哪些货物。给某些商品设定一个目标产量，计划当局就可以决定怎么做是最优的，是在国内生产还是进口。只有产品的当（劳动券）价格高于生产它们的劳动投入时，才能会把这些产品用于出口。只有当这些产品的劳动价格售价比在国内生产所需劳动还低时，才会采购进口品。如果这些条件都满足了，那么不言而喻的是，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外贸总体上是帮国家节省了。

图表 10.1 劳动时间国际收支平衡

货物	国内产品	国际出价	决定
石油	一百万工作小时	一百五十万工作小时	出口
汽车	两百万工作小时	一百五十万工作小时	进口
出口贸易额	一百万工作小时国内生产单位		
进口贸易额	两百万工作小时国内生产单位		
劳动贸易赤字	一百万工作小时国内生产单位		

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当以国内劳动单位衡量时，联合体将会一直保持贸易逆差。比如说，挪威联合体出口石油并且进口汽车（见表 10.1）。挪威人花费一百万劳动时间来生产出口石油并且得到了他们要在挪威花两百万工作时间才能生产出的汽车。因此。在国内条件下，他们进口了两倍他们能出口的，尽管以实际付出的价格来说获得了贸易平衡。当事物以劳动成本来计算的话，很明显一个国家除非具有贸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纯利润。这是在社会主义财产关系下，李嘉图理论对商业利润

做出的一种预测。

国际贸易生产部门要不同于其国内分支，因为其投入产出比高度不稳定。国际价格的经常波动也许会导致其价格太高而使得国内经济没办法有效地追踪。实际上，既然商品价格波动是供需关系的时间常数的表达式，这一切就几乎不可避免。比如说，电脑储存芯片在世界市场上是以两年到三年为一个循环而波动。在价格达到顶峰的时候，联合体也许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以劳动价格来看，进口的芯片劳动价格要高于在国内设立新厂来生产电脑储存芯片的劳动价格。但是设立投产生产线的要花上一两年时间，到那个时候，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就跌倒了低谷期，这就使得进口要比国内市场更便宜。这种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取决于两个时间常数——新生产设施投产需要的时间，以及芯片价格较低时，寻找计算机新用途所花费的时间。因为这两个常数都属于同样的时间顺序，所以会出现价格波动。如果半导体晶片生产商能像生产汉堡包那样生产的话，生产时间常数就是几周而已，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也不会波动，而只是稳定地随着通货膨胀而提高或者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降低。

为了应对这种价格波动，计划当局将不得不对价格运用加权值来抑制短期变动。计划机构将会依据长期价格走势而不是实时价格来决定是进口还是出口。

汇率，旅游业以及黑市

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游客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被肆无忌惮的外汇黑市所震惊。也许是作为外国人的独特位置，使他们在印象中夸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这的确是一种社会弊病，至少在政治上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货币黑市，和其他黑市一样，腐蚀了社会价值。这就造就了与社会主义伦理相冲突的半犯罪小资本主义者的亚文化。并且，遵纪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并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之中。当这类事情经常发生的时候，社会主义法治的权威受到严重的挑战。人们习惯了欺诈和虚伪，从而产生愤世嫉俗的态度。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汇黑市的出现。除非官方对国内货币估价过高，否则黑市商人无利可图：黑市的存在意味着个体公民为了获得外汇，愿意比国家付出更多。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呢？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前社会主义国家内，有许多只能使用的外汇特殊商店，部分商店卖给旅游者纪念品和奢侈品。

苏联的小白桦 (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制品和毛皮大衣。虽然在普通商店也能买到,但是在小白桦商店却更便宜。这就鼓励了游客花更多的硬通货,买卖的受益则流进了国库。除此之外,这些商店也出售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五花八门的大路货,同时也出售各种各样的国产消费品,比如洗衣机和汽车之类的。外国游客不大可能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给能使用外汇的苏联公民。由于官方高估了汇率,立即给黑市商人提供了动力,并且国家也可以通过黑市来大量吸收美元和马克。为了剪游客的羊毛,国家和黑市商人共谋破坏自己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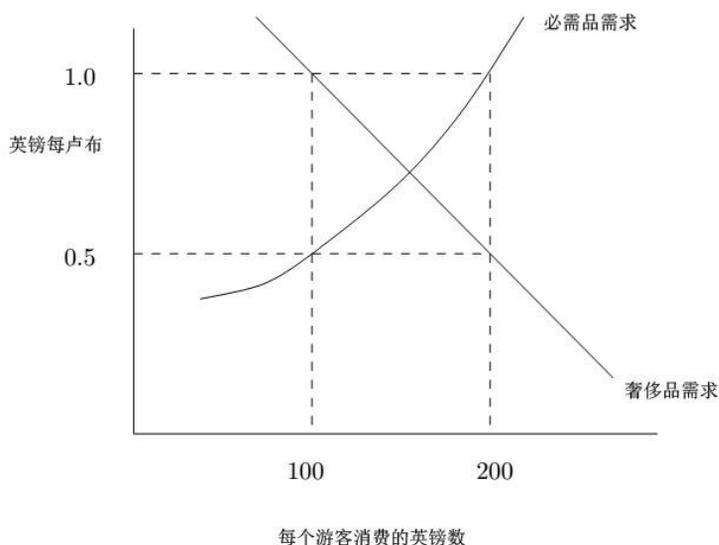


图 10.2: 汇率和财政收入

这个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来看看游客对于奢侈品和像食物和住宿这类必需品的需求曲线。如图表 10.2 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对固定不变:比如说,游客们用餐的次数对汇率不敏感。因此卢布的官方高汇率(比如一英镑兑一卢布而不是 50 便士)会使得出售给游客的住宿和食物的总英镑收益增长。另外一方面,奢侈品需求则更有弹性,因此低价的卢布将会带来更多的外汇。当一卢布兑一英镑时,游客也许会花 100 英镑,而当五十便士兑一卢布的时候,游客也许会花 200 英镑。通过给不同的产品提供两种汇率,国家获取了外汇收入利润最大化,这就使得黑市活动有利可图。

如果外国游客只是凤毛麟角的话,这种代价也许能被接受。但现在国际旅行已

经司空见惯了的今天，黑市的影响越来越坏了，并且来自旅游业的额外利润是否能够弥补带来的损失，也是值得怀疑的。简单地说，如果国营商店只接受国内货币（或者国内劳动券）的话，黑市交易的范围会大大缩小。

购买私人进口货物是公民们想要获得外汇的另一动机。这些货物也许是国家不进口的货物——可卡因、黄色录像之类的——或者是要收大量进口关税的货物。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走私的问题。这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影响的问题。当走私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时，执法部门的努力就化为乌有，无论他们想要维护何种社会制度。西方海关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贸易所遇到悲惨的失败证明了一点。国际毒品卡特尔虽然还没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后，这一点可能会改变。

当社会主义政府在当代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掌权后，都不得不处理这样一种局面。剥削和绝望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染上了毒瘾。在一些资本主义大城市的贫民窟里，毒瘾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还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尔要求以硬通货付款。街头交易以现金付款。影子公司总是能将非法收入洗白再转入银行里。对于公民或者私人企业来说。可自由兑换货币制度下，个人或公司可以通过银行家的汇票能够在国与国之间转移资金，这对于从毒品消费国到其他国家的资金转移来说，是非常理想的方式。

我们提出的代替货币的不可流通的劳动账户，将会使得这种黑市交易变得困难。没有了现金，街头毒品交易怎么付款？我们不应该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资本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国货币和黄金是货币两种直接替代物。盗窃带来了大量购买毒品的钱，珠宝总是盗窃首要目标，但是在盗窃得来的黄金成为进口毒品唯一方式时，毒品贸易的规模将会大幅缩减。所有的国内采购将会使用塑料卡片。和资本家银行做好约定，让外国游客来到联合体旅游时，能用他们的信用卡。

联合体公民想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的最后理由是想去资本主义国家内旅游。只要允许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旅行的时候，使用他们的劳动券信用卡，这一需求就得到满足了。一位联合体公民抵达东京后前往日本当地银行用他的劳动券卡来兑换日元。整个程序也许会是这样的：

- (1) 公民将他的 20 小时劳动券交给日本银行。
- (2) 日本银行给他兑换等价的日元。
- (3) 电子记录传送到了联合体贸易部的电脑上，这样日本银行的账户上就多了

20 小时劳动券出来。

账户里的劳动券被日本银行用来购买联合体的出口产品。

尽管公民在国外能够自由地将他的劳动券来兑换日元，但他也许不会将日元带回国内或者将日元兑换回劳动券。相对地，虽然公民能将劳动券转移到资本主义银行的账户里，但是银行不能将劳动券转回公民的账户里。这是为了阻止外国货币作为一种能在国内流通的兑换手段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确保用上述的汇率政策来保持贸易平衡呢？一个社会主义联合体用国内劳动券来支付国际贸易的话，就不会聚集起资产或者以外币标价的债务。从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来支付它的一切国际贸易。这并不能保证美国贸易平衡——美国经常有贸易赤字——但是这也意味着，不必和特定外国进行贷款协商就能得到融资。美元贸易赤字导致外国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这代表美国财政部的负债。从会计学解释来看，这相当于美国以外的世界借给美国的贷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来看，这要比明着从IMF 借贷所承担法律责任小得多。

从长期来看，美元的超发导致了美元兑马克和日元贬值。这就导致美国市场上的德国和日本进口商品价格过高以至于无人问津，如果不受资本流动干扰的话，这会使贸易再次平衡。美国用高利率引诱海外美元持有者将他们手上的美元兑换成美国国债以及其他一些美元证券。这种资金的流入使得美元汇率远远不能将贸易带回平衡。

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行不计息的劳动券用来进行国际贸易。资本主义货币市场将会创设起一个有效的汇率来让主要货币兑换劳动券。由于没有资本流通带来的复杂性，这种汇率将会使得贸易很快回到平衡。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给国家贸易设置了五个预算目标：

- (1) 进口生产资料货物的计划数量
- (2) 进口消费品货物的计划数量
- (3) 出口商品的预期数量
- (4) 从旅游业中获得的预期收入

(5) 公民在国外旅游的预期花费

所有的这些过程都是以国内劳动单位计算。如果国内汇率保持变化，那么计划者只会预测在预算(1)方面他们会买什么原材料和资本设备，并且能够拟定出相应的生产计划。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进口消费货物。在另外一方面，关于预算(3)和(4)，只能进行预测：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国家会成功出口多少货物或者有多少游客会选择来旅游。另外一方面，计划当局不得不为了生产用于出口的商品做好准备，即使这些产品最终卖不出；还要为外国游客准备旅馆房间，即使这些旅馆住不满。原则上讲，能够通过控制游客能够带出国的劳动券的量来对第五项进行调节。

让我们考虑两种可能需要废止计划的情况：

- (1) 一部分出口商品一直卖不出去。
- (2) 国际价格变动(比如原油价格上涨)意味着进口交换比率对联合体更有利。

出口商品滞销

出口不足导致汇率下降，结果使得最初的进口预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计划中进口商品。计划者不得不消减进口或者试着阻止人们到国外度假。这就涉及到了削减进口商品的优先次序，以及采用一些政策手段来控制人们在国外度假时的花费。^[1]

进口交换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价格上涨，一个出口原油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现它的汇率升高了。进口预算会花不完。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从长远来看，可以通过减少计划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计划好的进口来调整计划。从短期来看，进口预算账户上的盈余可以用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以便能在国内市场上折价出售。

这里有一种替代政策。从短期来看如果保持最初计划好了的进口水平，这样供给外国人的劳动券就不会扩张，从而使外国人购买这个国家的出口产品受到相应地限制。社会主义经济体还有一个选择是接受用外币支付其部分出口产品。这是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会累积起外汇资产，比如说美元，并能在将来用这些美元去购买额外的进口商品。在某些情况下，比怂恿现在就购买额外的进

^[1] 从长远来看，汇率的变化将会使得个人调整他们的假日消费，但是没有办法保证它可以足够快地自行变化。给游客带出去的劳动信用征收弹性税收，显然成为了政策手段。一位公民在国外用她的劳动券信用卡购买任何东西时也许会付出特殊的额外费用。

口消费品来说，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费从进口交换比率的变化中获得的“意外之财”，这个国家也许能够选择可以更好的满足其总体计划目标的进口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能获得美元结余——这些美元都在国家银行的手里。）

（Integral、一支离弦的箭 译 黑夜里的牛 校订）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

上一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通过讨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或者说的更加笼统一点，经济关系）来拓展我们的分析。

贸易与所有权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应该存在长期的贸易。贸易假定了持续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权概念，即使是国家所有。但是在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概念并不应该存在。我们可以代之以设想一个制度，在该制度中生产性资源和产品归属于国际组织。这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后，这确实是苏联的真实情况。1936 年苏联宪法规定：

土地及其蕴藏、水流、森林、工厂、矿井、矿山、铁路运输、水上及空中运输、银行、交通工具、国营大规模农村企业……城市与工业地点公用企业及主要住房，概为国家财产，即全民财产。^[1]

尽管 1936 年宪法的有关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没有被兑现，而更多地是被践踏，但是在国有制上的规定上却很符合现实情况。关键在于，在这里讨论的“国家”^[2]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国家”。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作为一个超国家的计划组织，

^[1] 此段为 1936 年苏联宪法第一章第六条，参照宪法翻译，与原文稍有出入，参见《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 & 苏联宪法》，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1950 年，第 47 页。

^[2] 在原文中，作者使用了 state, country & nation 三个词来表示国家，nation 倾向于指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前两个词则有可能代指复杂的国家实体。作者将苏联视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集合

对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尽管不同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都参加到了一个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中，但他们并不是被国际性贸易联结到一起的。

在劳动分工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1]仍然适用。例如，出于自然资源的原因，阿塞拜疆共和国在石油工业上拥有比较优势，乌兹别克共和国在棉纺织工业上拥有比较优势，等等。无论社会制度如何，这样的优势持续存在，所以对于计划者来说，出于经济性理性的考量，就应当使这些共和国分别成为石油工业和棉纺织业的中心（虽然我们下面会谈乌兹别克^[2]棉纺织业的一些问题）。

这种类型的劳动分工与国际贸易所创造的劳动分工存在着几个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国家的工业产品属于一个超国家的组织，而不是一个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国家。产品跨境流通，并不是通过销售与购买，而是根据计划预见到的需要，在这种单一所有制系统中对其进行分配。因为不存在所有权变化，而且分配是根据计划而不是市场，所以在不同共和国之间的交换不需要参考相关商品的国际价格。每个共和国也因此免受价格波动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于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环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虑世界市场价格。如果比起通过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劳动分工生产，可以长期从资本主义经济体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那么计划者显然应该考虑。

社会主义内部经济联系的总特征也使一个统一的国际劳动支付体系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各个国家的工资标准不尽相同。一个刚刚工业化的经济体，农业仍占较大比重，那么他的农业部门的生活水平就会限制工资水平的提高。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会阻碍工资的大幅度提高。而在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工资水平不取决于市场环境而取决于国家政策。国家可以为一个工作设置标准的、国际性的工资水平。因此，在苏联不同加盟共和国的工资差异，要比那些经济文化发展相仿，但是起点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小的多。

体，所以在后文中会提及它的超国家性，苏联内部各加盟共和国的联系作者也以国际关系来表述——译者注。

^[1] 一个国家在本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量）低于在其他国家生产该产品的机会成本的话，则这个国家在生产该种产品上就拥有比较优势。也可以说，当某一个生产者以比另一个生产者更低的机会成本来生产产品时，我们称这个生产者在这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比较优势——译者注。

^[2] 乌兹别克共和国，下文按照原文翻译为乌兹别克斯坦，苏联加盟共和国。

欠发达国家

在国际贸易系统中，一个欠发达国家只有（a）通过更高水平的内部资本积累，或者（b）通过向更先进的国家借钱来提供资本积累所需资金，才可以赶上一个更先进的国家。如果这个国家不能获得内部投资，它的发展就有可能减缓。但如果它借钱，那它就有可能严重负债，同时大部分其劳动成果进了外国资本家的口袋。然而，在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的国际体系内，中央计划可以分配资源用于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不会有不断借钱的后顾之忧。想象一下，产自俄罗斯的设备的使用，促进了西伯利亚冶金工业发展。要是在贸易体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这些转换，那西伯利亚就会成为俄罗斯的债务人。通过国际性的计划就不会有债务产生，因为没有所有权关系的转换。

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下，国家或是区域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则上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债务残余，但是，它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情况。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发达国家愿意去帮助欠发达国家吗？这个问题与一个 20 世纪 20 年代争论有关，它讨论的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俄罗斯，即使加上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也不可能独立的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作为一个整体，实在太落后，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优先选择了鼓励西欧的革命力量^[1]。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他认为在战前德国和其余地方的革命运动失败的情况下，苏维埃国家别无选择，只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苏联不能坐等西方。而且，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潜在革命，牺牲世界上唯一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这种风险是无法承担的。如果苏联的生存需要与资本主义列强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和解，如果这种和解需要以限制苏维埃支持西方革命作为交换，苏联也只能接受。

显而易见，每一边的观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考虑到西欧革命并未出现，托洛茨基会被轻易当成一个失败主义者。在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苏维埃计划经济的建立，斯大林的观点看上去似乎是对的。然而，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情况来看，当苏联已经崩溃，人们可能会想问，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诊断的那样，苏联的落后与

^[1] 苏维埃政权建立早期，确实试图通过第三国际对西方国家输出革命，例如德国和匈牙利。

孤立是促成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衰弱的决定性原因。当然，苏联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选择，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

无论如何，与我们此处讨论特别相关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假定一旦革命广泛传播，西欧的工人阶级会愿意帮助他们东方的同志去创造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在上文间接提到过，国际性的联合和理想主义吸引着托洛茨基。问题又来了：这种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现实的？

为了比较，简要的考虑一下原因，为什么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想要以某种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励欠发达国家的发展。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原因，考虑这些原因可能是有意义的。

(1) 剥削在欠发达国家可获取的廉价劳动力（也可能被用来当做一种手段来压制宗主国的工资水平）。这可能包括在欠发达国家建设工厂和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外包给这样的国家的工作更可能是那些不需要什么技能的（组装或者类似的活）工作。

(2) 扩大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的来源。同样地，这可能包括在某种程度上在欠发达国家建立工业体系（例如采矿业和种植经济）。但是这样的发展带来了一点风险，它使欠发达国家陷入一种附属关系，依赖一种或是少数几种产品的出口作为收入。因此就贸易而言，这样的行为反而会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更加脆弱。另外，大规模的自然资源开发可能会造成环境破坏。

(3) 发展欠发达国家的市场，以便为宗主国经济提供产品。这个原因是由罗莎·卢森堡指出的，她认为缺乏新市场的持续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会遭受内在的生产过剩的危机。

(4) 最后，我们应该承认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经济利己主义，推动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动机。意识形态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要么是殖民地的变化（与宗主国被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联系在一起。热心的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这种文化和政治制度传授给当地人），要么就是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社民主义形式。尽管后者的实际影响是很有限的。

我们可能现在要问，上面谈到的原因，如何与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在它和欠发达国家的关系中的可能动机相关？原因 1 在社会主义内部关系中基本不存在。原因(3)也与此无关，因为在一个计划经济体系中应该不存在内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2)和(4)了。关于第(2)点，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确保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供

应，基于此，它也会对供应这些产品的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兴趣。因为上面提到的风险，即使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出发，它也不得不对这种发展路线保持小心谨慎。

过去苏联骄傲地自夸，那些更先进的地区比如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为像中亚这样的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固有的剥削关系。尽管这些说法并不是毫无意义，但是当我们关注这些国家的发展路径时，其实道理不多。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实际上只种植棉花作为单一经济作物。跟苏联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欠发达国家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并不受国际市场棉花价格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中亚荒漠中生长的棉花需要大规模灌溉，里海海水就被引流殆尽，这导致棉花经济有关的环境破坏十分严重（但是应该讲，这种忽视生态的发展政策不仅仅限于苏联的边缘地带）。

最后，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种动机：意识形态。我们希望，在社会主义语境下，发达国家或地区会愿意调配资源去帮助他们的欠发达邻居，而不是出于任何直接的利己主义考量，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边界。这是否太过幼稚？暂且不讨论拉升苏联相对落后地区的考虑，我们也可以援引在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例：“区域性政策”。这种政策看上去确实包含了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转移支付，并不是毫无争议，但是尽管如此，它已经作为法律被广泛地接受。我们认为这一案例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尤其是在当区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资源转移支付和用于国际援助的相对较少的物资数量作比较时。那就是，当我们在一个单一的国家不同部分之间，而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之间施行区域之间的平等主义时，这一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来。当拉升收入水平发生在“他们的国家”时——即使他们的国家和苏联一样大，一样复杂——人们似乎更倾向于认为拉升收入水平的计划是公平合理的。

在没有一种发达的超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没有对应于这种观念的超国家机构，发展性转移支付制度会被认为对那些更发达的国家不利。一个更为先进的国家而不是欠发达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仇恨。这样的例子是在面对苏维埃国家的合法性不断衰退时，经济成熟的苏联波罗的海国家^[1]产生了经济自主的要求。任何对于发达国家的让步都是以欠发达国家作为代价的。

^[1] 在苏联经济各加盟共和国中，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而这三国苏维埃也最早宣布脱离苏联。

相比较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情况，战后阶段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像中国、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联合的国际计划。他们之间的劳动分工通过贸易而产生，这种贸易一般需要在国与国之间进行平衡。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时，这表现出双重的劣势。首先，一个多边贸易和货币兑换体系所能提供的劳动分工空间，要比双边贸易平衡系统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组织了全球性的技术分工，为他们的生产描绘了国际性蓝图。举例来说，福特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协调其汽车生产，在不同的国家的分厂分别专门生产车身、引擎等等。缺乏这种国际性组织，社会主义国家苦于基础工业的重复浪费和小规模生产。

我们倡导什么？

因为前文所阐明的理由，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体系利益，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自己的经济从属于一个国际性的计划体系。这涉及到国家主权的出让，可能——起码一开始——会遇到强大的政治反对。

同样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民族国家同样会发现他们的主权正在遭受世界经济国际化的侵犯。经济全球化所采取的形式包括贸易自由，跨国公司不断增长的作用，以及像是欧洲理事会这样的国际性国家的原型的形成。同样地，国际化的进程产生了政治的阻力。一些民族政治家，看到他们自己组织性力量被削弱，尝试阻止这一进程。在做这件事时，他们可以运用从资本主义历史的更早阶段遗留下来的一整套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那些反对国际化的政治家是在反对历史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撒切尔夫人未能带领保守党和她一起反对欧洲货币联盟。

大体上而言，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产阶级政客已经比社会主义者更不容易屈服于反动的经济国家主义。资产阶级政府阻止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的正常行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这种贸易保护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出现过。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更不愿意让他们的国家经济从属于一个单一的计划体系。为什么？

一种可能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层拥有（或曾经拥有）远超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性。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拥有最强大意愿的阶级是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脱产干部阶层应该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场经济不断发展而获得最大利益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国家政客自然考虑他们的利益诉求。在资本主义国家，高层政客常

常也是商人。他们可能是将政治当做爱好的富人，或者在他们上升到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进入公司的董事会。在任何情况下，在商业和政治生活之间都存在着个人角色的转换。

两者中，商业生活在经济上能带来更多回报。如果资产阶级政客决定弃政从商，他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政治精英成员和工人阶级之间，这种转换模式并没有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家重新变成工人阶级，收入和社会地位会有所下降，就像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所经历的那样。这样的转变很少是自愿的。

社会主义政治家的收入和境况完全依赖于他们在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地位。他们对于保持国家独立有着强烈的个人动机，无论长期的经济论点怎样反对这一点。这种经济论点没有任何内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对于国际化有着长远利益，关于这一点他们是直言不讳的，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可能还没有这样的看法。贸易和跨国公司的经验教会了资产阶级国际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在一国之内度过一生，被他们自己的国家雇佣，可能很少关注这一点。

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它见证了数以万计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2]，作为战士、医生和教师进行志愿服务。但是正如最近历史所展示的一样，各国政客也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强化他们的国家机器。

因为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没有政治上的联合，他们不可能在经济层面上国际化。如果共产国际^[3]没有在二战中解散，它可能会提供新生的无产阶级达成国家政治联合所需要的动力。一个单一的国际政治党的存在至少会缓冲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1] 杜布切克，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位期间推动了一系列改革，引发了1968年的苏联干涉，之后杜布切克被外放出任驻土耳其大使，1970年被开除出捷共，到布拉迪斯拉发国家森林管理局工作，后任总机械师和总工艺师。

^[2] 安哥拉内战期间，古巴派出大量人员支援安人运。

^[3] 共产国际又名第三国际，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总部设于苏联莫斯科。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5月26日，共产中央发表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

国家主权的重要性

随着经济关系变得更加国际化，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越来越成为一个明显的问题。一个国家仍然保有的最为重要的权力，是选择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当撒切尔夫人抱怨她没有从英国土壤中消除掉社会主义的破坏因素，使得它在欧委会的保护之下被重新引入时，她认识到了这一点。讽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正是为了捍卫这同一个权利，与反对者进行了数年之久的血腥战争^[1]。

假如政治环境允许，并且该国能够保卫国土，甚至小国都有可能挣脱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小国以阿尔巴尼亚的模式保持着独立自主的政策，它的经济发展会受到阻碍。矛盾的是，对于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保护其赞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决策的最好办法，是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上的联合。

(Adolf Stalin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1] 1979年9月，尼加拉瓜多派联合实行武装斗争，推翻了亲美独裁的索摩查军人政权，建立了民族复兴政府。新政府成立不久，国内出现了由美国支持的反桑迪诺解放阵线执政的游击队组织，引发尼加拉瓜内战，造成中美洲局势长期动荡不安。1990年6月27日，持续8年的内战终于结束。

第十二章

公社

关于“社区”，有很多官方的伪善言辞在四处流传。我们听到有人谈论“社区护理”、“社区项目”，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却正在毁灭社区的一切有机的基础。社区存在的基础是协作共享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区域并不是社区，而只是居住区。人们从居住区出发穿过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别的城市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们很少知道邻居是谁；他们的朋友们通常居住在各个不同的区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离的，认识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数英里之外。社区只是对那些就近入学的孩子才存在。对孩子们来说，社区只是通过他们的母亲才体现出来，但是长大后，由同龄人组成的社区就慢慢消失了。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化。这种价值观非常适合资本主义，却不能很好地支撑社会主义。对人们来说，如果一代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和平中而没经历过军事团体中的纪律和凝聚力的磨合，个人主义倾向会加重。社会主义的兴盛需要社区的根基，需要习惯于为集体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们共同组建的社区。不过社区不能凭空变出来。它需要现实的经济支撑。必须有能把人们聚在一起满足实际需要的机构，而且这些机构相比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区机构的最宏大的尝试出现在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实验，涉及约八亿人口。这些公社规模很大，大多在 30000 人以上。他们从事农业和轻工业，并且为他们的成员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通过民兵组织提供基本军事训练和防卫保障。公社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农经济的组织形式，并使得超越了小农经济的视野的土地改进计划和社会供给（social provision）成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显著提高。

如果我们试图将公社的理念运用于发达工业社会的话，这种制度显然必须进行

大量调整。如今，由于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不多，我们必须依据城市公社进行考虑。

城市公社的活动

公社最主要的职能是取代家庭。中国公社取代了作为农业劳作单位的家庭；现代城市公社必须要取代资产阶级家庭中经济职能的残余。由于城市市民进行大量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在城市或城市的一个区这样更大的经济中满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国公社的内部自足度^[1]。鉴于此，我们将集中关注公社替代家庭经济的潜在职能。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排除了相似的组织原则可以适用于更大规模的经济如小村镇和大村庄的可能性。

然而，在开始下面的讨论之前，应该保证一点，那就是我们不会设想强制集体化。这里的关键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论可能性；而在实践中探索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来的社会主义联合体(commonwealth)的公民来完成了。只有当公社证明它希望替代资产阶级家庭时才会繁荣起来。

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列出以下活动。公社将围绕这些活动来代替家庭：

- (1) 住房
- (2) 食物制备
- (3) 保育
- (4) 休闲活动
- (5) 扶助老人

我们一一考察这些活动领域，以及这些领域中产生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应该有多少人为宜。这是一个影响所有其他问题的问题。我们设想其人数要比中国模式小很多——也许 50 到数百对成年人。依次讨论不同领域的公社活动时，这种规模的选择可能会根据经济问题而调整。

住房

我们假定公社会给成员提供住房。虽然已经有居住合作社在做这件事，不过在那些情况下，并没有出现侵蚀家庭经济的尝试。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为成员家庭提供一系列单独的住房。公社应该在更

^[1] 中国的城市街道也具有和乡村公社一样的政治经济职能。

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为成员个人提供的住宿。

前苏联的公共住房通常与过度拥挤和设施不全相联系；公社公寓比较小，而且不是专门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变成一个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须能够为个人提供他们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获得的那样多的空间，同时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够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假定每个成年社员都拥有一个房间供自己独享。把这一标准扩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员可能是可取的。

什么样的建筑类型适合公社，在这个问题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郊区的“半独立式立体住宅”或者塔式大厦中的公寓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适应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须发展一种新型的建筑风格。最近，达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于他们关于丹麦“生活社区（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一种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有趣的讨论。这些建筑师并没有设想太多我们所建议的那种程度的公共性，但他们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设施，以及共享仓库，干洗设施，摄影暗室等等。这种设计很可能是学习了宗教社区或者大学的建筑风格（尽管，这两种类型的公寓建筑大体上是为单身的人准备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间）。

食物制备

我们假定公社成员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说，他们至少有些时间会在一起吃饭。这就意味着公用厨房和餐厅的存在，拥有或者起码配备大型烹饪设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制备任务的劳动力。我们可以设想两条原则，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可以组织烹饪。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两个原则跟共产主义原则是兼容的。在一种情况下，社区聘用某些社员为全职领薪厨师，而在另一种情况中，则是有一个执勤制度安排轮岗。下面我们回到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优点上来。

社区单位的规模决定了更广范围的食物制备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见。例如，在单个家庭中每天烤面包是不经济的，但对于 100 人来说就相当可行。

保育

决定公社的规模时，就要使它足够支撑起一座幼儿园，也许是一座小学。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将把相当大比例的女性人口从个体儿童抚养这种劳动生产率很低的活动中的解脱出来。这些妇女可以参与到劳动

生产率更高的社会劳动中去。这样做，她们将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同时获得独立的收入。

一些休闲活动

我们来设想公社有足够资金提供一定的运动或休闲设施。而这些设施，目前只属于上层阶级。比如说 100 人规模的公社应该能供得起一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馆和一到两匹给孩子们骑的矮种马。公园可以配置秋千、攀爬架等部分设备。提供有空间跳舞、演奏音乐的公共休息室，也应该是经济的。像帆船这样的设备是大多数个体难以企及的，对于公社来说也许不成问题。一个城市公社或许在乡村拥有房屋，这样成员可以在此度过假日。他们会拥有一辆或两辆面包车，或者一辆轿车，以及自行车，这些都为出行提供便利。

扶助老人

集体烹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设施，以及楼里面年轻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帮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洁和干洗服务也是由公社提供，那么老年社员不用住进单独的“老年之家 (old folks' home)”也能受益，而这种“老年之家”往往是与耻辱和孤独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健康的老年社员，公社会为他们发挥活跃的生产性的作用提供机会，而不是让他们饱受退休之后被迫无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获得规模经济。正是这一点，使得公社比个体家庭更优越。正是因为公共保育节约劳动，所以它才是进步的，能让人感受到解放。很明显，如果实际情况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儿童需要花费更多人时，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为公社辩护。公社的经济效率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劳动的节约，二是生产工具的节约。直接劳动会更节约，因为在现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并不是以有效经济规模完成的。为 50 个人做晚饭比 50 个人给自己做晚饭花费更少的劳动。说得实际点，50 个人的公共烹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户中分开做饭更节省劳动。

生产资料的节约则更微妙一些。考虑下如厕的问题。如果你在一个典型的英国

住房中，那里面只有一个厕所，通常还位于浴室中。如果另外一个家庭成员正在洗澡，有时候是很让人抓狂的。但如果换一种角度，50个人生活有20个厕所的大房子里，厕所被全部占满的情况微乎其微。确实有可能在减少人均厕所的数量同时，保证一直有一个厕所是空着的。减少厕所剩下来的空间和资源可以被用于其他活动。

适用于厕所的论证也可以推广到其他设施。公社可以证明安装小型内部电话交换机设备是必要的，因为就相同数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线路，肯定比分散到各个配置自用电话的个体家庭要少一些。办公室设备如电脑和复印机也一样。一个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而公用会更有效率。把一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员可以比个体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设施。

我们的建议是，城市公社应该要比中国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这种看法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上面所讨论的经济性到了几百人的规模，就多多少少被耗尽了。在经济学中，“最小经济规模”（MES）是指在特定产业中，能获得所有重要的规模效益的最小规模。最小经济规模在不同的工厂中差别很大；例如炼油厂的规模比塑料玩具制造厂的规模大得多。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够确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经济规模，就没必要要求城市公社一定要大于EMS的规模，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也许我们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这个口号，但是很明显，集体民主决策制和互相关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区中更易实现，而且公社的意义就在于在获得经济效率的同时，追求这些不太有形的收益。

付酬制度与对外贸易

在中国，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给社员所做的工作付酬。这些都是公社维护的内部会计单位。在收获的季节人们得到所收获谷物的一份，份量的大小取决于这一年他们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账上记录的工分跟中国通行的人民币不同。工分是对公社资源的索取，并没有直接赋予国家资源给公社成员。这项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基于层次化公有财产的经济体制。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在一个城市公社体制中起作用的。

社员做的工作分为两类：在公社内的工作和为了国家经济所做的工作。这种工作上的划分，可能对应于从主要为国家经济工作和主要为公社工作的成员上的划分，但也不可能不对应。国家经济中所做的工作产生了商品和服务的形式价值。这些商

品和服务首先属于全体人民，然后国家共同体给做工的人分配劳动券。这些劳动券可以让做了工作的人从商店里获得等价值的产品。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公社的成员是为国家经济工作，那么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劳动券，应该归她个人，还是归公社呢？

原则上，两种制度都可以实施。如果个体获得国家劳动券，那么公社就会收取成员费。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公社成员的劳动就当成了公社的财产。类似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外包商手下员工完成的任务量就是外包商的财产。如果 J&M Consultants PLC 给政府提供咨询服务，政府就将服务费支付给 J&M 而不是 J&M 的雇员。J&M 捞取利润之后，才会把所得中员工的那一份付给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剥削，但相似原则是适用的：向国家经济“出口”劳动的所得归公社全体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个人。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内部和外部的劳动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厨房工作一天还是直接为国家经济工作一天，我作为一个个体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这些工分可以用来支付公社社费，公共食堂用餐的费用，或者以现行兑换率（exchange rate）转换成国家劳动券。我们提及兑换率，因为公社能够与国家劳动票证等值交换这一点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系统地看一下公社的账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一个整体。假设公社社员在给定的会计期中给所做的一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劳动券的形式归公社所有。国家税收是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征收的。由于我们假定国家劳动券是直接支付给公社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假定纳税义务是集体的。

在这种制度中，公社劳动券形式的总收入，实质上是公社成员外部劳动的总时间。它的税后净收入等于总收入减去在这一时段公社社员应该缴纳的国家税收总额。在对国家产品进行集体购买后，公社还剩下分配基金。这就是可以用来分配给公社社员的劳动券总量，让个体社员能够给自己购买国家产品。

现在考虑一下个体社员。如果公社为了内部会计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她所做的内部工作小时数和外部工作小时数加在一起，就得到她的总劳动贡献。我们就说社员简干了 36 个小时。现在我们必须想想社员对公社集体基金的义务。这个基金必须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费（国家税收和集体购买国家产品），但另外它必须支付任何公社内部劳动需要，比如供给非生产性社员，以及基本公社服务，例如清洁和维护公社设施。对于我们的个体公社社员在基金中所占的份额，我们说是 12 小时。那么归她使用的工分就是 36 减去 12 等于 24 小时。她可以用这些

工分购买非基本的公社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并能根据会员权获取，而是要单独收费——比如膳食或者理发）。或者她可以将它们兑换成国家劳动券去购买公社外部生产的产品。在这里兑换比率的问题就出现了。

假定我们的公社社员简想把她的 16 小时价值的公社工分兑换成劳动券。其他社员也会想要兑换他们的一些工分。面对一定的兑换的总需求，在什么条件下公社能够将内部工分与国家劳动票证等价兑换？这取决于总需求和上述讨论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间的关系。如果它们数量相等就没有问题——在 1:1 的兑换率下，对国家劳动券的总需求，等于可供兑换的劳动券。假如公社保留了一些缓冲库存的劳动券在手上（例如以储备金的形式出现——参见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间的临时随机偏差也不会是问题。但如果存在长期差异，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的等值兑换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么公社将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 1000 单位国家工作时间的价值，而在一定时期需求量是 1200 工分，那么稳定的交换比率就是 1.2 公社工分兑换 1 国家劳动券。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讨论一组说明性的公社劳动账户（如表 12.1）可能是有用的。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总工分等于（a）总分配基金（上面讨论过的）加上（b）总的非基本内部工作。（关于后一术语的定义，参见该表的注释。）在这个案例中，它们的价值都是 2200 小时。但是，这里的等值并不是由于图表中的数字选择得比较特殊——它是从我们设想的会计关系得来的，只要公社的集体基金是平衡的，总收入就等于总支出。

给定平衡的集体基金，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国家劳动券之间可持续的 1:1 的兑换率需要什么条件。公社成员只能用他们可以支配的工分做两件事：花在非基本内部劳动产品上，或者兑换成国家劳动券^[1]。所以，如果社员花在内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务上的工分等于这一领域的总劳动的量，那么兑换国家劳动券的需求就恰好等于可用分配基金，一对一的兑换率就是可行的。在表 12.1 中，有 2200 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 1000 工分，另外有 1200 小时记在非基本内部工作。如果这 1200 可用工分用于购买非基本内部工作产品，那么国家劳动券的供给和需求就都等于 1000 工分。

^[1] 人们也许并不想把每个季度的所有收入都花出去，但我们假设他们无法将公社工分“储蓄”起来。如果一个人想要储蓄，他必须先获得国家劳动券，（关于储蓄的形式，见第七章）。

表 12.1 一组说明性的公社账户

1, 可分配基金的计算	
外部劳动记入	3000
减去税收义务	1100
减去集体购买	900
等于 分配基金	1000
2. 记入公社的工分	
外部工作	3000
加上内部工作, 其中:	
基本工作	1800
非基本工作	1200
等于 总工分	6000
3. 集体资金债务	
税收额度	1100
加上 集体购买	900
加上 基本内部工作	1800
等于 集体基金开支	3800
4. 总可支配工分的计算	
记入总工分	
(上述两类)	6000
减去 集体基金投入	
(等于集体基金支出, 从上述三类得出)	3800
等于 可支配工分	2200

“基本”内部工作产品指的是作为一种权利可供公社成员使用的产品，而非基本内部工作的产品实际上是通过借记社员可支配工分账户的方式“出售”给社员。

那么在这里，可持续的 1:1 兑换率需要三种条件：公社必须正确地管理账目；公社必须维持平衡的集体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内部劳动的预算要与公社成员的需求相同。劳动券相对于 1:1 兑换率下需求的持续短缺，就必然意味着一个

或多个以上条件被违背了。例如，假设公社提供给厨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于从就餐中“收取”的——那么劳动券的需求就会过多，这就会使得工分以低于等值的比率兑换。这是个简单的会计问题。或许就餐的工分“价格”太低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得到修正。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实的分配问题。如果投入到厨房的劳动相对于公社就餐需求过多了，这就需要社员的劳动时间进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设在外部经济中是充分就业的。这就不是问题。公社并不需要扮演“最后雇主 (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内部活动中抹平过剩劳动。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价的话，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么做。

这些论证都假设公社出于会计目的将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视为等值的。这就是说，公社已经决定将成员每小时的工作记为一个工分，而不管他们是在公社内部工作还是为国家经济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交换比率必须统一，而任何持续的偏离等值的压力，都意味着会计错误或者劳动分配的错误。但原则上讲，公社可以选择让外部劳动高于或者低于内部劳动。比如说某一公社的成员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内部工作更没有吸引力，因此认为给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要求工分兑换率应该与用于会计目的比率相一致，所以如果公社认为对外部工作多付 10% 是合适的，那么，一个成员在国家经济活动中工作一小时应当记作 1.1 工分，而且兑换率也应维持在 1.1 个工分换取 1 劳动券。既然公社的目标之一就是打破劳动的性别，确证人类平等的设想，我们就不应该推荐这样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一个可能性而已。

任务分配

公社在任务分配时，可以遵循两个原则。在一种情况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长期分配给社员。公社需要全职工人，全职厨师，全职育幼员等，而其他成员则为国家经济全职工作。而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则是轮流执行任务，这样一个人可能先当一天育幼员，再当一天园丁，然后在接下来的三天中为国家经济工作^[1]。

这两种办法各有利弊。轮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的性别决定角色的风险，而长期任务分配能够使人们对工作更熟练。任务轮值的激进形式会对国家经济造成约束。

^[1]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了这种轮岗，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一个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假如连项目成员在每个工作日出现都指望不了，国家经济项目的效率肯定会受到影响。

公社的法律性质

公社可以拥有自己的楼房，以及适合内部生产的生产工具，包括餐饮设备、炉子、搅拌机等等。另外，一些轻型的运输工具比如小轿车和面包车也属于公社所有。我们假设他们从公共土地机构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权跟公共机构签订合同的话，这对公社来说会是一种便利。很显然，他们要能够与国家签订劳动供给合同，不过他们也可以签订合同使用公社劳动去运营整个项目^[1]。这就意味着国家经济租借给他们其他的生产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经营一块城市区域内的牛奶递送服务，送奶车也会租给他们。

公共政策

至于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组建一个机构把想要组成公社的人聚在一起——有点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应该专门用来鼓励建立公社。

他们会得到储备的公有房屋，或者给他们赊账修建特别设计的公社住宅。税收政策也会调整为对公社比对核心家庭更有利。另一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确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因此能够为公社成员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这就不太清楚他们是否愿意长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许，社会主义政府希望鼓励实验，通过系统性地支持公社的过渡性政策来克服社会保守主义。

(大师 译 飞飞、黑夜里的牛 校)

^[1] 对于“项目”这个概念会进一步讨论，以及“项目”与传统社会中“企业”的区分，参见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论民主

在大众心目中，乌托邦社会的实践是和残暴的独裁以及对公民社会自由的压迫联系在一起的。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历史，这种情况是意料之中的。虽然在英国，人民日益认识到宪政改革的必要，但就这一改变所指涉的内容而言，却是很审慎的。也许公开讨论将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议会选举制度是可以的，但废除议会民主制度本身却不可思议。本章的目标就在于去思考不可思议之事。具体而言，就是要论证一种激进的民主体制。我们将勾勒出古代希腊民主的一个现代的版本，并且证明这种民主制度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珠联璧合。

民主与议会制度

历史上最为讽刺的事情是，几千年来都被视为寡头政治标志的投票选举制度，竟然在当下被认定为民主的标志。

在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之中，乔治奥威尔发明了“新话”（new speak）这个词来讽刺英语语言的堕落，连“自由即是奴役”“战争即是和平”等说法都能被人们不加察觉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语言对于我们思维的控制力。当权力当局可以重新定义词语的意义之时，他们使得“颠覆”真就变成不可思议的了。“议会政治”就是“新话”的一个例证：一个被伪装了的矛盾。让我们重新回到古希腊民主意义之源头。这个词的另一半含义，即是“权力”或者“统治”（power or rule）。因此就有独裁政体——由一人统治，以及贵族整体——由贤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统治。民主制度的意义在于由平民（demos）统治。大部分评论家将其翻译为由“人民（the people）”统治，但是平民（demos）有一个更加具体的意义，那就是普通人或者说穷人。

亚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处时代的民主制度时，对于民主即是由穷人进行统治这

一事实有清晰的认识。对于认为民主仅仅意味着由多数人统治，他给出了如下的例子作为反驳：

假设一个城邦共有一千三百人，其中一千为富人：倘使这一千人占据了治权。对那三百个出身贫穷而同他们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职，人们总不能说这是平民政体！（《政治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设，“毕竟现实是富人在哪里都是少数，而穷人在哪里都是多数”。于是他给出的具体的定义即是：

“平民政体”（英文版为 *democracy*，即民主，《政治学》中译为平民政体——译者注）一词的确解应该是自由而贫穷——同时为多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整体；相似地，“寡头政体”一词的确解应该是富有而出身（门望）较高——同时又为少数——的人民所控制的政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1290 第 312-313 页）

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他进一步说道，在希腊“抓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政治学》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294b）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家所谓的民主程序，应该叫做 psephonomic 程序（希腊 psephos：用纸票来投票）才更为准确。通过粉饰阶级关系的实质，这种意识形态将投票的权利与对于权力的运用加以混淆。事实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财阀寡头制政体。财阀制度即是有钱人的统治；寡头政体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

上述即是现代国家的独特原则。现代国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自罗马共和国以来最佳的阶级统治模式。然而当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权之时，却总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竞争。有效的力量处于一系列同心圆之中。当他们通过议会或者内阁与首相或者总统接触的时候，这些同心圆便会聚集收缩，成为贵族制。统治者以资本的名义公开地行使这一权力，现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职能是服务于商业目的的说法。而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财阀制度。

财阀集团的权力产生于其对雇佣劳动的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专政本质，并没有因为投票的权力而被废除。Psephonomia 或者说选举，只是选择个别寡头的程序罢了。选举的程序同时赋予了寡头们统治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员。即便是最好的情况，选举也不过是将寡头制变成

贵族统治。

亚里士多德将寡头制视为对贵族制的背离：

“无论怎样试图从字面上区分贵族制和寡头制，贵族制描述了一种基于美德而非基于财富的统治。然而寡头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并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经被看做是贵族制。”（《政治学》，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贵族政治”这一用词的变化，集中体现了自19世纪初以来英国社会的历史性变化，即议会向那些有美德但不一定具有优越出生的人开放。但是关键问题并不在于那些出生微贱的个人被招募来担任公职，而是谁掌握权力。其他所有都是虚幻的。

“区分寡头制和民主制的是统治者财富的多寡。其本质，是政治权力衍生于经济财富权力……即是寡头制。不具有财富的人拥有权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们方才所说，世上常常是富户少而穷人多。”（《政治学》，1279）

代议制政府和民主是两个相反的两个极端。民主制度是基于穷人和没有地位的人的多数人的统治；代议制，是职业政客的统治，而他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阶级立场上都是属于寡头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写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时，明确地追随亚里士多德对民主的定义，其中写道，“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暴力推翻贵族政府，建立无产阶级统治，对于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来说，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们在1852年就讲过，无产阶级统治即是无产阶级专政。

“独裁者”产生于罗马共和国而非希腊。它指的是在紧急状况下，一个个人按照法律条文被授予暂时进行统治的权力。然而这种临时性的独裁权，有变质为终生统治的自然倾向。列宁和斯大林就曾是罗马共和国意义上的独裁者。但是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么？当然不是。他所指的是一种大众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摆脱了捍卫私有财产的根深蒂固的宪法权利的约束。两千五百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描述这种民主制度的：

有一种平民政体同上述这一种类似，凡属公民皆可受职，但其政事的最后裁断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在这种政体中，[依公民决议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为依归的平民政体，主持公议的人

物都是较高尚的公民，这就不会有“德谟咯葛”^[1]。德谟咯葛只产生在不以法律为最高权威的城邦中。这里，民众成为一个集体的君主；原来只是一个一个的普通公民，现在合并为一个团体而掌握了政权，称尊于城邦。（《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292）

一个民主制度要对于无产阶级有用，群众必须成为统治者，能够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颁布违背成熟的土地和资本财产权的法令。^[2]

一个民主制度要对于无产阶级有用，群众就必须成为统治者，能够不受法律规则的约束，颁布违背成熟的土地和资本财产权的法令。

直接民主还是苏维埃式民主？

在左翼历史中，有另外两种可选的制度能够替代议会制：苏维埃制度以及共产党专政。后者统治了苏联和东欧半个多世纪。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极少数西方人依旧支持这种制度。不过，依旧有许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恋苏维埃的理念。他们把还未被列宁式专政败坏的苏维埃，视为无产阶级权力的最初的纯洁形式。我们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一词，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虽在内心深处向往苏维埃体制，却十分愿意以“现实主义”为借口接受议会政府。苏维埃的构想成为了某种道德保障机制。

我们并没有低估了苏维埃的信奉者作为暴动机构对于推翻议会政治的重要性。但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经验做出某些概括：

(1) 只有在一个专制制度或绝对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时，才倾向于形成苏维埃制度。它们似乎很难从议会制度下产生。

(2) 苏维埃制度仅仅当他们被武装（成为工人士兵的苏维埃）之时才会产生革命的影响力。只有在军事上失败的情况下，才会形成武装的苏维埃：1871年的法国、1905年和1917年的俄罗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 只有当苏维埃被一群意志坚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带领，才能推翻现有统治。否则，就像巴黎公社那样，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员会，他们无法抑制地倾

^[1] 德谟咯葛本意为“平民领袖”，其人常常为公民大会的“演说家”，旧译为“奸雄”或“民众煽动家”。——中文译注

^[2] 作者注，对于政治煽动家角色之讨论，见 Ste Croix(1981, chapter V). 译者注，群众煽动者，可见古希腊的历史书《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记载。

向于脱离现有的国家权力，直到他们自我解体为止。

(4) 他们为一党国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这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受限制的公民权，以及从低级到高级苏维埃的间接选举制度。这样就有利于团结共产主义者中潜在的大多数。这样的共产主义统治很可能是任何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的先决条件。

苏维埃是短暂的过渡阶段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国家体制形式。一旦这样的制度被规定下来，就很有必要将原先的制度进行修改并记录下来，以确定谁有投票权谁没有。委员会不能仅仅模糊地由工厂工人和士兵组成。然后就会出现用普选定义地域选民的压力，所以就有了 1936 年的斯大林宪法。缺乏详细明确的备选宪法方案的话，苏维埃政权会很容易发展为一党专制或者资产阶级代议制。

对于斯大林主义（乃至列宁主义）之前的纯粹苏维埃民主的怀念，来自对列宁《国家与革命》的无批判的接受，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思乡情结。在这本书中，列宁为马恩思想，尤其是他们对于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辩护。基于俄罗斯的现状，他认为应当“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这样一种真正的民主国家，工兵代表苏维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某种相当不同的东西。

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苏联的历史进程是布尔什维克政党代替了无产阶级，中央委员会代替了党，最高领导人代替了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强调。这一列宁时代就已经确立了的进程，在斯大林手里走到最后。

新制度的西方社会主义者批评家通常都赞同《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概述。他们只是强调列宁的理论与后来的实践之间的矛盾。一些人责怪列宁和他的政党理论，还有些人责怪当时俄国艰苦的社会环境，或者归咎于斯大林、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但是很少有人将矛头对准列宁最初描绘的工人委员会的构想。

仅仅对比理论和实践，好的动机与肮脏的行为，这并不是批判。相反，我们必须弄清楚由《国家与革命》中的理论模型导向苏联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这个模型描绘了一个从工厂工人与士兵当中选取市级、省级乃至国家级会议代理人来组成最高苏维埃的体系。为了保证代理人对工人负责，代表们必须服从罢免，并且他们只收取与工人的平均工资。后面的条款源于巴黎公社的经验。针对伯恩斯坦将巴黎公社谓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宁如此辩护道：

“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这一段很关键。这个反问句也是恰当的。但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必须问，列宁对于“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够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征是，所有的市民被无一例外地召集来执行国家的职能。但是这样执行的制度比列宁能够设想的一切都要激进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1]中的多数投票进行统治，是古希腊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征。一般是通过公民大会（eklesia）上的举手表决。平民（demos）主权并不是像在资产阶级制度中一样，委托给的选举产生的职业政治家的议会。与之相反，普通的劳动人民，即当时的农民和商人，聚集在一起探讨、辩论以及投票表决与他们自身利益切实相关的问题。^[2]通过五百人会议（Boule）而不是“政府”来执行行政职能。与现在财阀统治的议会不同，五百人会议不是由选举，而是由抽签决定的。会议的职位会轮换，个人在服务一年之后，也会被更换。^[3]

^[1] 公民资格排除了女人、奴隶和 metics（用现代术语叫做外籍居留者）。

^[2] 公民大会（eklesia）和现代工人民主中那些自发组织，和资产阶级世界如此仇恨的大罢工会议的相似性是一目了然的。

^[3] 亚里士多德总结的古典民主主义者的论点如下：

这些精神法意就是平等政体所产生的基础，我们凭这基础进而研究它的各种特征。[在行政方面，]有由全体公民从全体公民中选举官职的任用制度；又有全体挨次进行统治，也挨次而被统治的安排；又有抽签参加政治机构的规定，至少是那些无需经验和专长的政治机构可凭抽签轮番参加；又对于任官资格完全没有财产定额的限制，或仅订立极低的财产资格；还有这种成例，除了军务以外，一切职司各人都不得连任，如真有连任的必要，也只限于极少数的职司，偶然可以有一二次的例外；最后还有这样的规定，一切职司——至少是尽可能多的职司——的任期应该短暂。[在司法方面，]有公众的法庭制度，这些法庭由全体公民或由全体公民中选出的人们组成，有权审判一切案件，至少大多数案件，包括那些最重大的案件，例如审查政务和财务报告、法制事项以及公私契约。[在议事方面，]有最高统治权应属于公民大会的制度，一切政事或至少是军国大事必须由公民大会裁决；反之执政人员就应该没有主权，至少应该把他们的权力限制得很少很少。

在各个行政机构中，如果一国没有充分的公款作为支付公民出席全体大会的津贴，则议会就是平民特征最为显著的机构。倘使城邦国库充裕，公民们一旦可以取得津贴，他们就on开始把一切政事包揽到（公民大会）自己的掌握之中，这在我们前篇专注中已经提及。这种津贴制度是平民整体的又一特征。[按照平民政体的理想，]最好是一切机构——公民大会、法庭、行政机构——全都给予津贴；如果实在不可能，则凡出席法庭审判大会、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公民，在开会期间，必须给予津贴，执政各机构也必须给予津贴（薪水），至少是那些规定要参加公共食堂会餐的执政人员非给

这个会议没有任何立法权，而仅仅是负责颁布公民大会决定的政策。每个市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和表决，还能得到报酬，用于弥补由于参加会议而造成的收入损失。

第二个重要的机构是陪审法庭（dikasteria）。陪审法庭没有法官，审判官员（dicast）同时扮演裁判和陪审员的角色。他们使用选票和分配机器的复杂程序，以抽签的方式从市民中选择审判官员。一旦法庭上投票产生结果，就无法上诉。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通过控制陪审法庭来控制议会。

人们对选举充满疑虑，从不使用选举选择官员，军事官员除外。亚里士多德说过，选举制是贵族的而非民主的；选举制引入了独立选择的机制以及用‘最好的人’，即 aristoi，来代替所有人组成的政府。（《政治学》，1300）。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对于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在阶级社会里，“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穷人作为社会渣滓和乌合之众，当然“不适合”成为候选人。财富和声望密切相关。只有当选择像军事指挥官这种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职位的时候，选举才被认为是安全。我们的政治军事制度与之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由于行政机构由抽签产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务，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事务也是熟悉的——这就是我们的特点：一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注意自己事务的人，而说他根本没有事务。”^[1]

尽管列宁希望点心师治国，他却未能构想出实现这个梦想所需要的宪政形式。关于工人国家，列宁写道：

予不可。<这里，同寡头政体的特征，门望（出身世族）、财富和教育相对照，平民政体的特征适得其反：出身低微、贫穷和鄙俗。>平民政体的又一特征为废除一切职位的终身任期，如果某位职位在前代变革后还遗留着终身任期规定者，就须削减其权力，而且这类终身职位都不得再由选举而应改由抽签法来授任。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中译本 第312-313页）

^[1] 伯里克利，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册 中文版谢德风译 132页）

“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国家与革命》）

列宁在这里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议会制政府的国家形式之所以适合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形式，因为其基本原则是选举。亚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这是一条反民主的原则。无产阶级独裁可以由一个选举会议建立起来，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样，选举人和候选人都只来自无产阶级。但是这种制度无法通过选举长期维持。

“民主集中制”——一条死胡同

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从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为它试图在阶级统治的工具即选举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据这一制度，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优秀成员被组织在共产党里，通过工人委员会制度选举出来组建工人政府。虽然选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这一事实并不能防止选举制度成为一种经典意义上的贵族制度。政治成为了政客的专职。像所有的贵族制度一样，民主集中制堕落为自私自利的寡头制，并最终被“诚实的”资产阶级财阀统治取代。

有人认为罢免权是对这一过程的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这是很可笑的。罢免权作为条款被写入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宪法以及斯大林的苏联宪法当中，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罢免一名官员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签名。同定期选举相比，罢免注定是罕见的事件。但如果选举制就约束不住官员，为什么罢免制就行呢？至于官员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平均工资这一条，谁来执行它呢？什么可以防止选举出来的官员为他们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当下依旧可能么？

在约翰·布莱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一本书《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一种被他称为“demarchy”^[1]的制度体系，这与古典民主制度极其相似。他想象出一种不同于民主国家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权力是去中心化的，而决策过程由代表团中的代表进行，代表则是以抽签的方式，从与某个审议中的问题有正当的

^[1] 此术语是布莱尼姆自创，表示一种不同于当前选举制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没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于各种随机选取的决策者团体。——译者注

相关物质利益的人中选出。^[1]

民主制度的倡导者，似乎对 20 世纪官僚主义国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责。但矛盾的是，经典民主制度的实践却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于人们极有可能不自觉地抵制这种实践。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导者必须发起一个令人信服的提案，并回应一般性的反对意见。

现代政治学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义的。他们认为，现代国家的复杂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有专业政治精英才能应付。虽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许能够管理一个普通城市国家，但是他们在面对现代国家的全职官僚体系时就会措手不及了。因此，我们需要职业政客和有报酬的智囊团。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些职业政客在面对坚决的行政部门时，并没有实际的力量，更无法激烈地质疑给他们提供事业机会的现有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专业技能的论证混淆了两件事。一方面，在诸如公共健康、技术以及军事等领域的具体问题上，存在技术专家知识的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普罗泰格拉所谓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断的艺术。普罗泰格拉认为所有人都平等地拥有这样的政治判断能力。在处理利益分配问题上，德拉姆查珀尔的店员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议员具有同等的决策能力，因为他们都不具备所谓的相关的专门知识。

另一个反对经典民主制度的常见说法是，这一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因此什么也不能教给我们。一方面这种反对意见恰好是不相关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现代倡导者并不准备重新引入奴隶制度。此外，这个观点是以对古希腊社会的错误观念为基础的。雅典并不是奴隶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隶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数的公民并非奴隶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贫穷的农民以及工匠组成。德谟克拉西（*demokratia*）的体制，是他在反对富人阶层即大地主大奴隶主们的阶级斗争中使用的工具。后者更赞同寡头制度，并最终在罗马帝国的帮助下强行实施了这一制度。

一个更加乏味的反对意见聚焦于规模问题。不可能把现代国家这么多公民都集中在广场上来讨论国家事务。但这个观点忽视了现代科技的力量。电视技术已经造

^[1] 芬利也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讨论了古代民主机制的潜在意义（Moses Finley, 1973）。G. E. M. de Ste Croix (1981) 和 David Held (1987) 提供了更多关于古典民主的有用讨论。

就了地球村。^[1]在每一台电视上装一个控制台，让我们每次电视讨论后进行投票。这在技术上不成问题。时事栏目定期抽取观众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在节目上，普通民众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其严厉程度远超过通常质询他们的二流政客。他们会让一个普通妇女就阿根廷战争中沉没的贝尔格拉诺号，对撒切尔进行问责。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众有能力在每次辩论之后进行重大政治决策。

现代国家，如我们所言，是基于中心化等级化的原则。民主制度则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并没有政府、没有首相，没有总统也没有政府首脑。国家主权力量是在人民大会手里。国家的特定职能由抽签产生的法庭或官员执行。权力既不会一直在底层也不会一直在高层，而是分散的。我们可以大致设想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实行。首先，人民主权可以通过电视辩论之后的电子投票来行使。为了保证人们得以普遍行使这种权力，电视以及投票电话作为宪法权利应无偿提供。这就类似于雅典给穷人参与陪审法庭之类公职的津贴。

由于只有一小部分要在国家范围内作出的决议需要让全民投票表决，其他公共机构可以由有大多数票的陪审法庭进行监督。广播部门，水源管理局，邮政以及铁路部门都需要处于委员会的监督下。这些委员会的委员是从对应机构的用户和工人中抽签产生的。这样的委员会不对任何政府部长负责。恰恰相反，一个足够庞大的随机样本就能代表全体人民，是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原则。处于民主制度下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在这个时候被召去服务于某种委员会。并非所有人都会服务于某个国家级的委员会，但是每个人都有望参加某个学校委员会，地方健康委员会或是工厂委员会。如果人们都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我们就不会见到作为现代选民典型特征的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与计划

对于经济计划，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制度。其中有两个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的团队，各自制定的计划，然后由计划陪审团从中选择一个。只有最重大的抉择（税收水平、投资占国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决。

^[1] 在十九世纪，密尔（J. S. Mill）就已经主张铁路和报纸的发展使得古希腊广场（agora）的现代的更大范围的对立物产生成为可能。（参见芬利，1973，第36页）

前面章节提出的劳动时间决定价格的体系的重大优势之一是，它将国家预算政策的问题翻译成每个国民都能够理解的术语。而现在只有少数专业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媒体人能够对预算做出正确的评估。要理解预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镑为计算单位的国家收入有多少。这从一开始就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然后，还要知道国民收入各种类别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计不同收入所得税水平的回报。还需要知道销售了多少英镑的增值税商品，以及从中得到的消费税额。而在国家预算的另一面，还必须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项目以及通胀补贴的费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财政收支，则需要大量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只有财政部能得到。

用劳动时间为单位来表达的话，整个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人们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时的劳动贡献给了健康事业，四小时支持了教育事业。如果年度投票单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种类以及每项需要他们每周花费的劳动时间，人们看到投票单后，在到底愿意在这些服务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问题上，会形成自己的观点。

假设对于健康服务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 $x\%$ ，有人希望不变，而有人希望减少 $x\%$ 。^[1] 这些投票都会被记录，并取得平均数，来增加或者减少国民保健体系预算。电子“投票单”很容易让人们必须做出不矛盾的选择。（例如，他们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几年之后，可以预见支出水平能够稳定下来，然后随着民意缓慢改变。在通常状况下，希望增加和减少预算的人将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变都会很微小。

尽管在财政支出水平方面进行民主决策是可行的，但对税收的独立的民主控制却不能与之相结合。如果税收和预算取决于不同投票结果，那么财政收支平衡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国会的预算和税收都是通过一系列不一致的投票决议来决定，其恶果也是众人皆知的。）更确切地说，单一基本税的水平会自动调整，以支付人们投票决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贴。选民在国家预算的支出方面下决定时，必须考虑到税收的影响。作为这一问题上的一个变量，选民可能首先要选择总体支出的水平（因此还有税收水平）。然后当她在某个公共支出类别上做出自

^[1] 我们把怎样更精确计算选票的方法详细阐述如下。

令 $x\%$ 为预算中一个项目在一年中可能改变的最大值。假定 $y\%$ 的人投票赞成这一项增加。这样，在排除掉非投票者的情况下，就有 $(100-y)\%$ 的人投票反对增加。假定支持者占多数，则增加 $[y-(100-y)]\%=(2y-100)\%$ 。费用改变的结果应该是 $(2y-100)x/100$ 。如果所有人都投票支持这一增长，则预算增加 $x\%$ ；如果多数投票反对，则它减少 $x\%$ 的某个分数。

己的决定时，“投票单”程序会表明在一个领域内投票作出的支出改变对预算的其他方面带来的影响。

无领袖的（Acephalous）国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书作者提出的这一套民主制度——译者注）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依旧是一个国家。其中依旧包含一个少数人必须服从的有组织的公共权力^[1]。平民（demos）可以用它来反对任何残余的或者新生的剥削阶级，以维护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会是无领袖的（acephalous）：没有国家领袖的国家，没有国家作为阶级剥削工具标志的等级制。

各种公共权力的机构，都是通过由抽签产生的公民委员会来控制。媒体、公共健康卫生、计划与市场机构、以及其他各类工业部门都会有他们的陪审团。每一个陪审团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权限范围。比如能源工业的委员会常常需要决定能源政策相关的细节，但是同时不能忽视公众的投票，比如逐步放弃核能的应用。会议的席位并不需要从公民中平均地选出。比如公共健康会议，可以一部分从医药工作者当中随机选出，另一部分则从普通公民中选出。就如同布莱尼姆曾经说的，原则应该是所有那些对此问题有正当利益的人都必须有机会参与管理。

这个观点与社会民主和现实社会主义都有极大的差别。比如，计划不再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受普通公民通过抽签组成的监督委员会控制。由于这一委员会是抽签产生的，因此其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劳动人民。这些委员会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看做是类似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的自治机关——独立的中央银行，广播机构，艺术委员会，研究机构等等——的机构。这些机关都并不一定需要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们的章程和它们管理者的社会背景会保证它们的运行。如果社会主义的类似机构有可供公众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体人民的监事会对其进行监督，而且它们的审议也是完全公开的，那么公众对于这些机构的控制就是有保证的。

无政府民主（Demarchic）委员会的权力要么是监管性的，要么是经济性的，或者二者兼具。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需要一个复杂的控制机构才能得以运行。在当下

^[1] 需要提醒读者，作者在此处似乎混淆了镇压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在国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执行公共管理职能的权力机关了。——译者注

的社会当中，我们把某些监管认作法律。政治家们制定出这些监管规章制度，然后由国家权力执行。不过很多规章制度已经产生于自治机构了。职业的机构规定约束其中成员行为的规章制度。贸易组织规定工业组件的标准，这对于迅速的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国际机构规定用电话、电报以及传真传输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标准。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规章仅仅影响某些特定生产分支或者社会活动，相关调控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也应该被限定为该领域内部的成员。在其他对于公众利益有直接影响的领域——比如广播电视或者某些对于公众健康有影响的过程，监管委员会就需要扩展到多数公民，通过抽签选举来代表公众利益。

无政府民主委员会的其他权力，都源于其对于人力和非人力资源的控制。一个委员会可能被委托管理某种公共不动产：建筑、古迹、交通线路、能源、供水设施。就它们是不动产而言，主要矛盾可能产生于使用上。人们在这里会想起，资产阶级主导的负责古迹的委员会是如何拒绝让穷人进入巨石阵的。但是，就这些财产会逐渐损坏因而需要维护而言，即使不动产也必须以人力和物资的投入为前提。

一个委员会也会被委托管理机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动产。这对无政府民主管理的制造过程更重要，因为它对所有制造过程都多少会有影响。我们假设所有这些动产最终都是由国家计划来分配的。管理项目的委员会可以使用这些财产，除非出现了更加紧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后，还有委员会管理该项目成员的劳动。由于这一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可能被用于其他活动，从国家账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会劳动。相似地，流向这一项目的公共动产也是以用于再生产这些动产的那部分社会劳动为前提。因此，作为一种流，它也是抽象的社会劳动。一个委员会的动态经济权力最终都是对社会劳动的管理。

这种权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劳动预算的小时数来衡量的。但是以什么权力来获得这一权力，而谁又来规定这一权力的大小呢？

这一权力要么是从上往下移交，要么是人们自己来进行委托的。考虑一下管理学校的委员会的例子。它的权力是从某个地方或国家的教育委员会下放过来的。这一教育委员会拨给学校委员会一笔年度预算。让我们假定学校是当地的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教育委员会的预算是由当地选民决定的。这些选民会每年决定从他们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时用于教育。

至于制造业委员会的情况，代表则是更加间接的。它的产品——也是铅蓄电池——所对应的需求，并不是具体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较间接的社会需求。社会所需要的电池数量，是汽车、电话更换量、收音机等制造量的一个函数。只有国家或者长期联盟的计划机关才能对其进行计算。因此，只有计划机构可以决定电池生产的预算。

无论是当他们自己投票决定税收，或是投票决定委托在预算之内提供免费服务的无政府民主的会议，亦或是通过投票来选择商品的购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用劳动时间来投票决定这些商品的生产），在所有的情况下，民众都是权力最后的委托者。

古希腊平民（Demos）统治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们制定出的防止上层阶级篡权的复杂宪政机制。这一平民的统治，在被马其顿和罗马帝国摧毁以前，繁荣了两个世纪。在那段的时期，他们创造了灯塔式的艺术、建筑、哲学、科学和文化，照亮了此后的黑暗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黄金时代——启蒙运动，即是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觉醒。而这尊火炬只有在现代平民（demos）获得权力的时候，才会重新燃起。

（懒羊羊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第十四章

产权关系

自人类文明有历史记载以来, 财产所有权——奴隶、动物、土地和手工制品的所有权——一直是社会的骨架。财产所有权决定了社会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被以某种方式改变所有权的愿望所驱动的。整个 20 世纪英国的政治一直围绕着公共和私人的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进行。工党政府在 20 世纪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自 1979 年以来, 保守党政府推行了国有财产私有化的政策。后面这一变化被认为是充分彻底的“撒切尔革命”。

我们提出的关于所有权变化的建议要比最近政府承诺的更多。这些建议的激进程度堪比苏联在本世纪（指 20 世纪, 译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国在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里（指毛时代, 译者注）所做的。但我们提出的完全不同于之前在英国盛行的那一套, 并且与苏联模式也有本质的不同。

产权关系系统对于我们来说, 是既熟悉又复杂的。因为人们倾向于接受熟悉的东西, 所以我们认为从最基本的原则开始研究是有价值的。

谁拥有什么?

这是任何关于产权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产权关系的基本单位是所有者与所有物之间的关系, 而产权关系制度就像由这些原子构成的分子。最简单的产权关系是“A 拥有 B”。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 这样的财产所有权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拥有土地产权的农民和一个拥有小麦产权的商人来说, 所有权有着不同的现实意义。我们认为所有权由四个部分构成: 使用权、购买权、出售权和继承权。在前面的例子中, 农民更感兴趣的是使用权和继承权, 而对于商人来说购买权和出售权就是一切。(对于继承权, 我们认为包括通过婚姻取得)。

所以, 我们可以把组成权利这样排序: 使用、购买、出售、继承。这些权利可

以视为逻辑上的谓词。逻辑上把一组关于 A、B 的判断称为一种关系。例如，用 A、B 表示使用权的关系为：A 使用 B。我们用四个不同的关系来定义产权。这些关系是：A 可以使用 B(A uses B), A 可以出售 B(A can sell B), A 可以购买 B(A can buy B), A 可以继承 B(A can inherit B)。给定一个例子，比如一个在小麦交易市场的交易员和一批小麦，当然可能不止一组这样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这一组（小麦交易员和一批小麦）就被包含在了买卖关系中。这是因为所有的潜在的卖家（买家）和他们可能出卖（购买）的物品都被包括在这样的销售关系中。

一类物品的拥有者 P 与另一类物品的拥有者 Q 之间的产权关系可以表示为一组关系 (p, q) ，这里 p, q 表示在实际中 P, Q 所拥有的。因此在实例中这类产权关系可以有 0-4 种。

产权的编码

因为任何形式的产权关系都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有限集合来表示，所以我们可以详尽的枚举出所有的产权关系。我们定义的四个产权关系可以组成 16 个不同的产权关系，以及由此得到的 16 种产权形式。我们可以按照关系的强弱将这些关系用 0-15 进行升序排列。这一序列在表 14.1 中展示出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产权关系进行排列^[1]。

在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而根据美国以前的法律，奴隶是没有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强制规定他们不能拥有财产。处在社会顶层的资产阶级却拥有完整的财产所有权：使用、购买、出售和继承。四种权利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苏联的集体农庄在改革以前就拥有使用权了，但没有买卖权，更没有继承权。

社会主义传统认为，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也有名义上的完整的权利，但实际上他们只有出卖自身劳动的权利。他们无法有效地运用自身的劳动力，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当然雇佣劳动者也有权购买使用和典当消费品，但是他们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仍然是自身的劳动力。

资本主义企业拥有财产的使用、买卖权，但并没有继承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通常会从它的父亲那里继承土地并将其传给自己的儿子。土地市场一般不发达，所以继承和婚姻成为财产转移的主要方式。

^[1] 这个数据和表达“布尔判断”的二进展开式一样。

表 14.1 财产权利的穷举

	A 使用 B	A 可以出售 B	A 可以购买 B	A 可以继承 B	举例
0	NO	NO	NO	NO	奴隶，美国法律
1	YES	NO	NO	NO	集体农庄，土地
2	NO	YES	NO	NO	雇佣劳动者和劳动
3	YES	YES	NO	NO	
4	NO	NO	YES	NO	
5	YES	NO	YES	NO	消费者和电力
6	NO	YES	YES	NO	商品交易者和商品
7	YES	YES	YES	NO	资本主义公司/工厂
8	NO	NO	NO	YES	
9	YES	NO	NO	YES	农民和土地
10	NO	YES	NO	YES	
11	YES	YES	NO	YES	
12	NO	NO	YES	YES	
13	YES	NO	YES	YES	
14	NO	YES	YES	YES	
15	YES	YES	YES	YES	资产阶级权利

什么能被拥有？

对于资本主义、苏联社会、以及我们提出的社群主义社会，我们将考虑什么可以被他人所有，以及谁所有。我们用 0-15 来比较所有权的强弱。

纯粹的资本主义和混合的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四个重要的财产所有者：个人、国家、私人团体^[1]和公司。我们在表 14.2 中展示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对财产所有权的确认情况。

^[1] 私人团体是教堂、教育机构和政党

表 14.2: 战后英国的财产所有权

所有者 被所有	个人	国家	私法人团体	公司
公司	15	15	15	15
劳动力	7	7	7	7
货币	15	15	15	15
信息	15	15	15	15
土地	15	15	15	7
建筑物	15	15	15	7
机器	15	15	15	7
矿产	5	3	5	5
电磁波频谱	5	3	5	5
交通基础设施	1	3	1	1
武器	0	15	14	14

根据财产的属性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类别。像资金、信息和技术等这样的物品是有彻底的产权的。各种所有者可以对它们拥有完整的产权：使用、购买、出售和继承。劳动时间则处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被所有者买卖，但显而易见，它不能被继承。公司是一种特别的财产，因为它可以是财产所有者同时又是所有者的财产。最后还有一些物品是有相对独立的产权的。某些自然资源，如矿产和电磁频谱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们出售（在一段时间内）给商业公司。还有一些物品是只能由国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军事武器原子弹和交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

1988年通行的产权制度与之几乎相同，只是有一少部分如交通基础设施已经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惊讶的是，撒切尔政府在产权方面只是做了相对很少的改变。但这并不是要否认他们在现有法律范畴内，对财产进行了大量再分配的事实。地方政府立法兴建的住房的所有权没有改变，除此之外，国家所有的财产减少了。

苏联模式

我们所说的苏联模式，是指从 1928-1931 进入中央计划起，直到 1991 年苏联解体之前一直通行的产权制度。这一模式如表 14.3 所示。

表 14.3: 苏联模式下的产权

所有者 被所有	国家	个人	企业	农庄
企业	1	0	0	0
土地	1	9	1	1
机器	5	0	1	3
劳动力	5	3	5	1
公共物品*	1	0	1	1
资金	2	10	2	2
建筑	7	15	1	7

*指采矿权、信息、电磁波和武器

如果我们将这些与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比，最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些产权关系是多么的“弱”。这里很少有资产阶级法权可以控制的东西：只有金钱、个人财产和房屋可以使用、购买、出售和继承。相比起来，这里存在着许多很“弱”的关系。集体农庄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买卖土地，因为土地的所有者是国家。但以资产阶级法权来看，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关系也是十分受限的，因为国家不能买卖土地。国家又能卖给谁呢？

相似地，工业机械设备是由生产单元进行使用，但在经典的苏联模式下，生产单元对这些机械设备是没有完全的产权的。斯大林时期集体农庄使用的机械名义属于国家所有的国营拖拉机站，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农庄才有权向国家购买设备。国营企业虽受到国家控制，但国家却无权买卖这些企业，所以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看，产权受到很大的限制。企业拥有生产资料的使用权，必须对此负责，也就是说，国家要就生产资料收费。除此之外，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工业设备有同资产阶级一样的权利，因为这些都是由国家按照计划分配给企业的。它们只能将生产出来的生产

资料卖给国家。劳动力的购买有很严格的限制。只有国家和国营企业能购买劳动力，但是却不能将其转卖，不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企业主能将自己员工的劳动时间租出去。个人购买劳动时间是严格禁止的。

作为矛盾焦点的企业

在两个很重要的方面，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企业的产权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首先，它们购买商品的权利受到限制，它们能够向个体劳动者购买劳动时间，但其他商品必须从国家取得。国家向企业收购货物，在这个意义上，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其他的投入看起来像是在购买，但这是在计划之下的购买。第二个限制是对企业所产商品的销售。在通常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这不能算是销售。它们为了达到计划的目标而生产，尽管国家也为取得企业的货物而支付卢布，但企业别无选择只能卖给国家^[1]。但国家和企业间的转让仍然采用销售的形式。它们看起来像是销售，是因为货物给了一方，而钱给了另一方。

苏联的企业是一种矛盾的经济形式。它看起来在进行着与资本主义企业相同类型的交易，但实际上完全服从于拥有它的国家。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与公司 and 股东之间的关系相当不同。公司的股东通常既不会是公司的主要客户也不会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商，更不会去详细的指示企业应当生产什么，他们通常只关心股息和红利。然而，在会计核算中，苏联企业的确为国家提供利润。国有企业的利润占了国家预算的很大一部分。

苏联的工业企业对于工人来说看起来也像是雇主一样，它们也为工人支付工资和各种奖金。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它又像一个资本主义的雇主了。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劳动法律使得企业很难解雇工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充分就业。与之相关的是，企业没有破产机制，因为企业是国家的，而国家是不能破产的。这导致了劳动力在各行业之间分配的低效。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正在降低的企业和行业，倾向于囤积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本应该更有效地用于别处^[2]。

这里我们看到苏联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中的一个很大的经济问题。有两个相互矛盾的条款，一方面要保障就业，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现代化的经济需要的劳动力的

^[1] 在后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改革虽然名义上授予企业选择自己客户的权利，但大部分的产出仍然受制于国家的订单。

^[2] 大卫·格兰尼克（1987）认为，通常将低效率归于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但实际上是劳动力不流动的结果，根源是苏联工人有权利保持现有的工作。

自由流动。工党政府可以通过允许破产来释放经济萎缩的压力，但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目标的妥协，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但是让这些老企业继续存在会浪费劳动力，国家必须不断补贴它的亏损。这些补贴，通常采用从国家银行获取信用的形式来进行，但这会扩大货币的供应并会导致通货膨胀。

最近的情况是几个原先的社会主义国家引入了破产法。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倒退。破产法和成本计算（经济核算）强调苏联企业资本主义的一面——他们扮演了独特的具有买卖财产能力的经济主体的角色——这有损于它们作为社会财产的角色定位。

这种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劳动力流动问题的方案必然会损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发生的混乱的经济情况一样。这两个国家已经实行这样的制度很长时间了。

我们相信存在着替代选择。这涉及到强化企业的社会主义方面，同时消除其资本主义方面。我们在下面阐述的这种方法既是对“自由化”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的回应，将使得资源集中到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时保证不会损害工人的社会权利和自由。

社群主义模式

我们现在描述的关于产权的总体结构是与我们在之前章节中描述的关于社会和经济的结构是一致的。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详细的讨论这种结构：个人产权、中央计划机构的产权和特殊经济“项目”的产权、土地所有权、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个人产权

社会主义联合体的产权关系必须要保证经济的顺利运转，并且保护个人和机构的正当利益，同时避免剥削的出现。一般来说，这些要求之间会出现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系统下，产权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当法律规定资源属于一个人的时候，就否认了资源属于另外的人。一个人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也就否认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这块土地。历史上一些财产的拥有者允许别人使用其财产。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权雇佣佃农，企业家和银行家利用资本所有权雇佣工人。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剥削是不公正的，但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看剥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没有有保障的产权，资本主义企业将不能发展，经济也将陷入停滞和混乱中。只要社

会还没有另一套机制来组织生产，资本主义企业就有合法的权利来剥削工人。物权法同时具有阶级性和经济性，一方面保护财产拥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

社会主义的物权法也必须具备这样类似的功能，但是在这里，要保护的是劳动者的利益，而要约束的是潜在的剥削者。在新的经济模式中，物权法必需给予工人积极权利并保护他们在新经济中合法利益，同时对可能扰乱社会主义经济或者重新带来剥削的任何行为施加约束。社会主义共同体应当把这些关键的积极权利给予人民：

- 1) 谋生的权利；
- 2) 有权获得他们劳动的全部价值的权利；
- 3) 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劳动成果的权利。

这些产权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它们是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终极目标是免于被剥削并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权利。谋生的权利还有另外一重社会合理性：只有让所有的社会公民都参与到经济生活中，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这些个人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公民有获得工作的权利，但只有在他能胜任并且需要工作的时候。人们有权获得全部劳动的收益，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纳税。劳动收益的一部分由个人处置，剩下的将通过民主的决策来实现共同的社会目标。个人处置收入时要保证不损害环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会主义共同体在给予人们这些权利的同时必须保证有一个合适的制度和经济框架。我们接下来讨论框架的三个方面：生产组织、雇佣的本质、环境保护。

计划和经济项目的权利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们从经济的观点讨论了计划存在的问题，但没有涉及计划有效落实所需的法律框架。在现有公司法的框架下，显然不能有效地实施计划，而我们也批评的前苏联的生产法律框架。如果社会主义要重获信任，就有必要探索替代性的法律框架。

我们在这里把制定计划的主体简称为**计划**。这里我们不考虑确保计划受到民主

约束的机制^[1]，而只考虑产权。计划假定自己拥有所有的集体经营生产资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谓的集体经营生产资料，我们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设备或设备的集合。计划拥有一切我们平时所认为的工业设备：铁路、公路、工业装备、电脑、网络等等。它还拥有中间产品和半成品库存。

计划是生产条件共同所有的制度体现。这种所有权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过于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权。当社会是生产资料的唯一拥有者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买卖它们（暂时忽略国际贸易），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继承它们。所有权缩小到只能处置和分配它们。作为生产计划的基础，计划分配决定着每一栋建筑每一台设备等物品的使用。

我们称一个特定的经济活动为“项目”。通过一个项目，我们意在协调一组活动以生产出一个有用的结果。一个项目可能是一个大型活动，如建造第三条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轨道太阳能发电站；也可能是一个没有终点的生产过程，如给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装牛奶或者为登巴顿（Dumbarton）提供医疗服务。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生产过程如出版一本书或拍一部电影，也可能是一个持续几年的过程如开发一系列新的计算机。不管它是什么，项目所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建筑和机器，都是按照计划分配的。每一个项目，包括计划的产量和资源的使用都将使用电脑进行登记。

这些生产项目只是生产单位的联合，而不是法人。在这方面，计划和项目的关系跟资本主义企业和企业所执行的个人活动的关系是一样的。一个汽车公司为生产新的车型可以进行几个项目，每一个项目将被再细分为几个项目，如车体的研发、电子设备、引擎和悬挂系统等等。这些项目的工作人员、工作区和设备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层制定的生产计划分配的。项目并不拥有它们使用的办公室和工厂，也不拥有雇工。项目只是经营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实体。

当然这可能引起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拥护者的争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计划经济体系看做是一个巨大的企业是对民主的威胁。相反，我们的理由是，公民对经济的有效控制恰好需要生产资料成为集体的公共财产。我们不认为国有企业和更缺乏独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恰当形式。

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己，而企业又属于国家。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

^[1] 这一点请参见第十三章。

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一些情况下，国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只有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这样的例证有英国对英国石油公司（BP）的所有权，而它的运营与其他资本主义公司几乎没有区别。

更高等级的公司国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气和电力董事会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服从于规定它们义务的特别法律，而且这一法律还规定它们的董事会由国家任命。这些措施比简单的国家持股前进了一步，因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控制了英国石油公司（BP）的行为，而公司的法定义务可以超出这种逐利性。但是这仍然受到很多批评，甚至一些最重要的批评是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的：

（1）国家的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企业的管理权可以用来——当他们选择这样做的时候——损害该行业中工人的利益。发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矿工人罢工正好证实了这一点；

（2）工人们并没有能取得企业的控制权；

（3）不同的企业是各自为政的，无法制定总体能源规划。每个企业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产品销量最大化以获得收入。相反，社会的目标在于试图使得能源消耗以及与之相关的污染最小化。

第一个反对意见只有改变国家性质才能满足。第二个和第三个则是矛盾的。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具体行业工人的个别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毫无疑问的是，工人对如下方面的管理将解决阶级性质的问题：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条件、采用工人的建议改进生产、消除车间的层级结构。但可能会出现像平均主义、劳动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这样的问题。而服务公共利益的更好的方式也可能是要，比如说，压缩煤炭生产转而支持使用天然气和节能。

此时重要的是，煤炭董事会、天然气董事会和电力董事会（包括那些雇佣的工人）因为它们有着明显的共同利益，所以不再被视为三个独立的企业，而是被看做一个整体，来协调能源生产的过程。这意味着必须有一个既有权威又有能力的公共机构为了公众利益调节这些行业。

所有权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优越性，可以通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的例子得到印证。在保守党重新组阁前，医院属于健康委员会，它们有义务组织资源为社区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在我们看来，医疗服务是工党政府引入的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因此它所代表的社会性，比我们倡导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业更高。我们认为，基本的社会主义工业应采取这种更高的形式。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遵循“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治疗是免费的，并且对病人所需进行无私和专业的评估。部分服从整体利益，医院不是一个企业，它的存在不是为了获利，而是在健康委员会的指导下服务于社区。

最近保守党把医疗系统改革成一些相互独立的企业—医院有权选择退出，会以提供服务的私人机构身份进行讨价还价。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工作的人员对于改革的一般看法是，改革将导致服务的恶化、员工士气的下降、医疗领域的社会阶层分化、以及缺乏地方问责制度。

英国经历的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产权和计划是工人阶级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将分裂为不同的集团并追求自己小集团的利益。在资本主义企业和 NHS，如果上级认为一个项目或者活动不再是划算的，可能会将其关闭并把资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苏联会有三种类型的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门和企业个体。国家计划委员会向特定的工业部门的官员设定生产目标，然后工业部门将其传达到自己管理的企业。在这种安排下，对资产的有效处置权被三个层级分享。对应于国有资产的这种分割，核算也有各种不同形式——实物平衡的核算、劳动力平衡的核算，并且在企业层面将采用卢布来对成本进行核算。过去，尽管对企业受到实物核算下制定的计划定额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货币核算上避免亏损。企业雇佣工人并支付给他们工资，但是考虑到价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会与实物计划发生冲突。在给定的价格和计划下，企业有可能是“无利可图”的。

一个亏损的企业在苏联模式对整个经济来说有可能是有净利益的，也有可能不是。这不是货币形式核算所能说明的。但既然企业拥有有限的法人资格（能够购买劳动力、出售产品、订立合同等），那么它在面对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不经济”时，都要做出困难的取舍。近年来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决定对亏损企业实施破产处理。说明在这些国家，成本核算已经成为首要的核算机制，企业不再首先被认为是国有财产，取而代之的是只关心股份公司的国有股份。这种特殊的产权关系的发展与我们的提议刚好相反。

在我们的模型中项目根据计划对劳动力的使用进行预算，这样可以控制它们使用资源的数量。虽然一个项目的资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预算的限制，但这种类型的资源配置在运行上是不同于货币预算的。它不是用来购买资源。这可以从劳动力的投入量得到说明。

比如运营一个本地的娱乐中心的项目。它的年度预算是 20 人年，以及合适的建筑。该中心的预算起着控制资源使用的作用。向规划部门登记的这个项目的预算有一半将用在员工上，其余的用在能源、设备和维护上。娱乐中心并不给为这个项目工作的人报酬。这些人的工作是从中心的预算中扣除的，但并不涉及资金的账户转移，而是直接划除。类似地，任何物质资源的使用如运动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没有人因为这些设备“支付”，因为资源和项目本身都同样的被视为共同的财产。计划当局将支付计划中心的工作人员的劳动，而不是由娱乐中心来支付。因为项目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主体（即产权主体），也就不会出现破产的问题。但如果一个项目被认为是不划算的，计划也必须有权停止这一项目。就像如果一个学校的注册人数不足以证明学校继续运营的必要性，那本地教育机关就可以将其关闭。

停止项目的决定，如果不是随意的，那就必须以理性的经济计算系统的存在为前提。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表明，在不依靠市场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计算是没有任何根本性问题的。同时，停止项目不能造成失业。通过平衡以劳动衡量的国家预算，来防止失业总体水平的升高。正如我们在第七章阐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过销售机构降低消费品的价格来补偿。这意味着不可能因为需求的不足而导致经济陷入衰退的漩涡，而这正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失业的主要原因。不过，虽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导致的失业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一些调整。如果你参与的项目终止了，你做的与之相关的活动也就成了多余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变得多余。你有权期望社会保护你的收入并给你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这个权利怎样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在我们设想的体制中，人们可以直接受雇于共同体而不是公司或者独立的“企业”。当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时候，工人应该被尽可能迅速并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这总是符合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会”变成雇主，那么这种利益共同体就是与生俱来的。

假设如果玛丽正在寻找一个新的项目来工作，她可以去职业介绍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记自己的职业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够工作的时间等等。职业介绍中心会利用计划当局的数据，在该地区找到与玛丽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项目。这意味着计划当局可以记录最新的可用劳动力的数量和类型，从而能够为整个经济制定劳动力总体预算。与现在的职业介绍中心不同的是，空缺的岗位可以跟寻找项目的工人在总量和相似类型上进行匹配。一旦玛丽决定了她想为哪个

项目工作，并且确信自己适应其工作，她就将与职业介绍中心签订协议并确认将为某个特定的项目每周工作的时间。然后，这一就业关系将登记在计划系统中。计划系统就开始往她的账户中存入她的工作时间。

劳动积分的社会功能与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有重叠之处，但它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工人从共同体获得的等于他为共同体所工作的。在扣除税收后，这些劳动积分能够使得工人从共同体获得包含相同劳动量的物品。显而易见，与钱的相似之处在于：劳动积分可以被“花费”在消费品上面。它们的区别在于劳动积分不能流通，在购买东西后就被销毁了。在这方面它们就像火车票一样，可以换来一次旅行，然后就被检票员销毁了。这一限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剥削再次出现，而金钱是一切资本主义活动的前提。

在这样的制度中，个人有权拥有个人财产、消费品和房屋。但他们不能拥有股票和证券（事实上，这些东西也不会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资本。他们也不可能拥有土地和任何只能用于集体生产的设备。个人也不可能雇佣其他人为自己工作，因为劳动积分具有不可转让性^[1]。

个体经营

社会主义共同体允许个体经营可能是个好主意。一些种类的活动最好在个体层面进行，例如管道建设和维修工作。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个体活动因为容易造成“黑色经济”而臭名昭著。根据古典经济学，个体经营并不会导致经济的不平等。当个体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相对价格将趋向于它们的劳动价值。只要进入个体贸易没有人为的限制，那么技术工人将获得与在社会主义部门中工作的工人相同的时薪[6]。

如果人们成为个体经营者，那么他们必须有权开公司或者与国有银行交易，这样就可以支付劳动积分。这就有产生变相剥削的危险，在实践中，所谓个体经营者可能将自己的劳动转包给其他个体经营者。可能防止隐蔽劳动剥削的最佳方式是利用被剥削者的利己心。如果宪法保障了工人完全获取自己劳动所得的权利，同时依靠于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2]，加上向被剥削者收取惩罚性赔偿，那么就不可能会有被剥

^[1] 类似的，资本主义制度禁止把人当做奴隶进行买卖以保护人权同时避免不公平竞争。一个更文明的社会禁止更多在之前社会中被容忍的事情。

^[2] 关于希腊的陪审法庭制度可以参见第十三章。

削的雇佣工人了。

土地所有权

在当代英国，土地像其他东西一样也是私有财产。它可以被使用、购买、出售、继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废除了并实行了土地国有化。在所有情况下，国有化都导致了一种比较弱的土地公共产权。例如在苏联，国家可以处置土地。计划机构可以在一块土地上建立一个工厂或者开挖一个矿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土地所有者的许可。但是当涉及到农业用地和住房用地时，这样的权力就被弱化了，因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承包给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法人团体（集体农庄）。这些机构可以有效地处置土地。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权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为回报。出于某种原因——可能是考虑到在过去租金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所以社会主义政府一直不愿意要求对国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一种倾向，即土地的公共所有权弱化为处置土地的人的私人所有。

在国家拥有土地的情况下却不收取租金，这既不公平也导致经济低效率。要理解这一点，掌握一些古典的地租理论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题外话

我们借用 19 世纪早期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他认为地租的出现是由于两个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同地块生产力的差异。

为了证明土地的稀缺是地租产生的第一个原因，他指出，在新的殖民地，由于土地是可以免费获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后他观察到人们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随着人口的增长，居住和农业生产都将扩展到土地生产力较低较难工作的地方。假设有三个等级的土地，如表 14.4 所示：

表 14.4: 不同的土地的生产力

等级	每蒲式耳需要的劳动	生产成本
1	10 小时	10 英镑
2	15 小时	15 英镑
3	20 小时	20 英镑

如果是在人口增长的第一阶段，第一等级的土地便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则玉米的价格将会是 10 英镑。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将会先后被开垦，而玉米的价格也会上涨来满足在生产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产成本。第三等级的土地也会被投入使用，而最终的价格也会上涨到 20 英镑。而此时第一等级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 10 英镑的成本，并产生 10 英镑的利润。结果是地主可以收取相当于最好土地上半数产出的租金，而不会榨干农民的产出。租种第一等级土地的农民现在需要把生产的一半交给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种第三等级的土地的农民，这样不好也不坏。情况如表 14.5 所示

表 14.5: 耕种三个等级的土地的租金

土地等级	每蒲式耳租金	生产成本
1	10 英镑	10 英镑
2	5 英镑	15 英镑
3	0 英镑	20 英镑

玉米价格=20英镑=生产成本+全部的租金=边际土地（第三等级土地）的生产成本

如果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当于得到了一份地租收入（一份“虚拟租金”）。在这个例子中，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在耕种第一等级的土地时，将获得超过他生产每一蒲式耳的生产成本的10英镑，因为第三等级的土地也被耕作着，而玉米“保护价格”是根据生产成本最高的土地确定的。我们可以定义这个剩余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给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认识到，在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中，土地对产品的价值没有任何贡献(李嘉图使用劳动价值论)。玉米价格高不是因为土地产生了地租，相反，土地租金是因

为玉米价格高。

古典经济理论证明，由于不同土地生产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我们是正在考虑狭隘的土地肥力，或后者从更宽广意义上看，认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这个理论都是正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力源于运输成本的节省。正如萨伊所说，“距离相当于贫瘠”。在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国有化的情况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承包给私人机构或者个人（家庭、农场和公社）。允许向土地使用者收取地租，实际上已经否认了公共土地所有权。在中国，不同公社之间财富的明显分化，与当地的农业土地生产力有关。拥有肥沃土地的公社相当于获得了租金。公平起见，私人 and 团体应当为使用土地而缴纳租金。这些租金可以用来补偿公共支出，减少一般税收，并且可以转移支付给耕作生产力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允许小农生产的回潮。这让农民相对于公职人员更加富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民拿走了地租。考虑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数的农民将耕作非边际土地并因此得到一笔非劳动收入。

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筑用地的地租。尽管社会主义共同体可能允许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应该允许宅基地的私有。业主有责任缴纳地租，而这一地租应该基于他们的房子使用土地的当前可出租租金。在这种情况下买了房子的人仅仅是买了建筑物，但是在这一购买价格之外，房屋所有者要向共同体支付地租或者地税，这一地租或者地税反映的是房子所在位置不同的便利和舒适程度。

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878页）。

在过去，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主要关注人类利益的冲突。地主的利益与佃农是对立的，政治提案中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表现的也是这些集团的阶级利益冲突。现在

再这样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恰当了。我们必须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的使用问题放到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利用这一更普遍的语境之下。人类活动导致环境破坏的程度和规模最近才被我们所了解。

现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几千年人类活动正在加速改变环境。的确有可能是我们祖先造成的生态变化反过来迫使他们改变生产方式。例如，推动美洲农业发展的动力可能是由于狩猎导致了大型动物的消失（哈内尔，1977）。导致古代地中海奴隶制文明的崩溃的一个原因即是由于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农业耕地的大量减少。吉诺维斯认为（1965），导致美国南方奴隶主集团和北方资本主义集团冲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带来的棉花密集种植。这迫使美国向西部扩张，并导致蓄奴州与自由州的冲突。

物种灭绝、森林砍伐与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现象仍然在我们周围发生，并且实际上是正在加速发生。而现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气的污染。环境改变不再只是影响当地社会和一个国家，而是通过空气和海洋对全球都产生了影响。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很可能改变了大气的构成并导致了全球平均温度的大幅上涨。可能的后果现在已经众所周知：沿海地区的洪水、极地气候带的变化、世界主要农业区的损失、非洲和美国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规模的饥荒。

这些灾难的间接原因是不合适的产权关系制度。关于自然资源使用的决定是私人、企业，甚至国家基于当前利益作出的。这些决定给全球带来的长期后果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看来最终的解决办法并不只是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国有化，而是国际化。从长远来看，工业社会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这些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赋予全球性的监管机构。它将负责为自然资源的使用颁发许可，而自然资源的使用只有在经过计算确保能保护和改良环境时，才会得到许可。这样一个机构的权力将远远超过只是有权使用土地自身的传统土地所有者。全球性监管机构将不仅仅监管农业、林业和矿产开发对土地的使用，还将包括排放到空气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向上一些尝试，如联合国关于海底的公约申明海底资源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蒙特利尔公约更进一步的规定了含氯氟烃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难想象在世界主要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实现世界资源的国际化。英国和美国拒绝批准海底资源公约，认为它侵犯了私有财产权——当然它的确是侵犯了。可能要等到社会主义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取得胜利，才能建立起世界性的资源管理机构。

而在此之前，关于这些原则的共同争议在于——自然资源应当控制在尽可能最大的公共机构下。至少所有权应当属于国家这样层面的机构，大洲更好。

控制权与收益的分离

自然资源被滥用，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资源的公共所有并不能避免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苏联，土地和自然资源是公有的，但仍然存在着广泛的环境破坏。里海被严重污染，咸海因为其支流被大量用于灌溉而逐步干涸。在这些情况下，公有制并不能提供保护。这可能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机构来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工业部门制定的目标使得工厂为了实现生产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对其进行保护。而咸海周围各共和国政府的目标是使得棉花产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咸海的渔业。一个国家乃至未来全世界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必须掌握在一个不会从开发它们中得利的机构手中。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称这个机构为环境信托（Environment Trust）。它拥有所有的自然资源。它将授予计划当局使用资源的许可。它将规定排放的条件和其他使用资源的工业项目需要达到的标准。它可以确定个人或公社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规定生产或者使用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的附加费。税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费不应当交给环境信托，而应当用来支付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支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因为它避免监管机构为了自身获利而批准自然资源的开发。人们希望环境信托在征收地租和附加费的时候能够像法院处罚款一样公正。

（达瓦里希 译 带Q过人 黑夜里的牛 校）

第十五章

对相反观点的考察

现在，对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原则，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全部的看法。在最后一章，我们将对近年来一些社会主义作家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回应，并将其组织在两个主题之下：分配、价值与价格，以及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两个主题多多少少都与市场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有联系。在第一部分，我们捍卫关于消费品市场的方案（已经在第八章详细阐释）。我们认为，为了确保计划的目标始终按照消费者偏好进行调整，这种类型的市场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节，我们明确地把我们的“市场”方案和“市场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考察两个最近几年的市场经济方案的案例，我们发现，就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而言，这两种方案都是不够格的。

分配、价值与价格

当我们第一次在《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杂志的一篇文章^[1]里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加万·达菲（1989）在同一本杂志上做出了回应。虽然我们同意达菲的一些观点，但我们认为他没有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在这里，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回应一些他的批评，来更清楚地介绍我们的想法。有两个要点值得关注。

首先，达菲认为，我们的观点在这一方面有些讽刺：虽然我们极为重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潜力，但我们并没有主张一个纯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价值或价格为中介的计划系统。达菲似乎把这看做是放弃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例如，兰格就把计算（computation）看做是对任何形式的市场的替代^[2]。正在兰格模式所

^[1] 科克肖特与科特尔（1989）。

^[2] 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兰格提出了一种市场社会主义的变体，但是到六十年代末，他认为现代计算机已经使得完全抛弃市场成为可能。可以参考兰格在1938年和1967年的详细论述。科克肖特

需要的技术条件即将实现的时候，科克肖特和科特尔竟提出了一种基于市场机制的解决方案！其次，达菲认为，假如有人从消费品社会主义市场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也没有理由使用劳动价值作为社会成本的基准：他认为“简单社会成本”更为可取。

关于第一点，我们应该强调，我们并没有建议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通过市场分配。我们承认“社会供给”部门（如卫生、教育和儿童保健等）的存在。这一部门的商品或服务应当作为基本公民权提供给所有人（见第五章）。在这里，社会保障的水平 and 形式不是使用市场价格来决定，而是通过民主辩论和民主政治来决定。尽管如此，我们关于在许多个人消费品上采用市场的主张并没有错。

我们的消费品市场有如下基本特征：

1. 由于完成工作或者转移支付，消费者得到劳动券形式的收入。
2. 商品有它的“价格”。价格也由劳动券来衡量，但由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可能会与实际的劳动量（也标记在商品上）有所偏离；
3. 当消费者通过市场取得消费品后，他们的劳动券的余额将会相应地被“消掉”，这样他们的购买就受到收入（加上一些消费信贷）的限制。

实际上，它向每一个消费者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你有权利得到某种确定额度的劳动时间收入，而且可以以任何你所希望的形式不受限制地享受它。

一个“纯粹定量”的替代系统，没有价格或者价值的系统，会是什么样的呢？国家必须为要生产的消费品设置一个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产，然后消费者可能会从商店免费获得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价格，那么“收入”也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能预先限制个人购买商品的数量。随着一些商品的存量减少，国家就简单地命令生产更多的产品，同时减缓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产速度。

一切都很好，但是有什么能阻止受欢迎商品的存货直接变成零呢？怎么在社会可用劳动力的约束下，确保生产能够长期保持在足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消费者能够以零成本获得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这样的“需求”的总和会不会超过社会可能的总产量呢？而实际结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吗？

有人可能会极力主张两点来反对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共产主义的“丰裕”和社会主义消费者负责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态度。但是，从所有产品都充足的意义来讲的

和科特尔在 1993 年曾详细的讨论过兰格的论点。

“丰裕”，在这些产品定价为零时，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术持续进步，由于需要解决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加上极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贫困人口的物质状况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消除经济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纵然社会主义的消费者有彻底的公共精神，不过仅有正确的态度是不够的。没有经过客观计算的社会成本的引导，人们没法知道消费多少的量算是“合理的”、“负责的”。

如果人们承认需要为个人消费加上一个社会决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总消费需求保持在生产可能集之内，那么，在明确的收入付酬和消费品（非零）定价之外，替代选择是什么呢？国家可以决定每个人的消费品的分配或者说“配给”，命令这些消费品的生产，然后将其直接分配给人民。但是，很难看出这样的系统如何能够恰当地响应消费者偏好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种各样的偏好和优先顺序。如果要让人民对他们的消费模式进行（受限制）的个体选择，那么，除了某种形式的市场，别无选择。受限的自由替换需要消费者的产品分配采取标量的形式（达到这样的总价值的任何你所喜欢的产品）^[1]，而不是向量的形式（商品数量的列表，或者配给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价不过是实行这种标量约束的手段。

当然，承认需要有消费品市场，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我们所提出这样的市场应该如何运行的具体做法。由此我们来谈谈达菲的第二个观点，即关于作为社会成本体现的劳动时间。

我们承认，用简单的劳动价值来衡量社会成本，容易招致批评。我们已经在第五章处理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使用劳动价值作为经济计算的唯一手段无疑会导致对有限自然资源的低估，而简单地应用劳动时间并不能“生产”出这些自然资源来。其次，严格的劳动价值计算忽略了社会劳动应用的时间尺度的问题。生产两个产品可能需要同样的总劳动时间，但这一劳动在日历上的时期却可能是不同的。如果这种差异有实质意义，那么，劳动价值计算必须又一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样是在第五章里，我们简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达菲建议，相较于劳动力价值，“生产的简单成本”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计量的方法更为可取。对此，我们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讨论，正常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成本”远远不简单。它假定了作为权利主体的企业的存在——实

^[1] 更一般地说，一个标量意味着一个数字，与之相对照的一个向量表示一系列数字，因此 4.57 是一个标量，而[3.9, 1.2, 6.7]则是一个三元向量

实际上假定了生产资料中私有产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没有“简单”的给定的生产成本；任何衡量社会成本的可选手段，都必须由社会来定义和计算。我们认为，劳动时间为这样的计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础，尽管必须对其加以补充。我们在第五章中说明了补充的方式。

市场社会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论点撞上了近期右翼亲市场观点的潮流。这并不是我们的错；我们相信，时髦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最终一定会被认作是错误的。然而，我们更关注这一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作家公然对“经典”的计划经济体制表示强烈怀疑，反而鼓吹各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1]。反对这种潮流的声音相当微弱^[2]。

在这一节，我们考虑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将论证，市场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目标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同意迪瓦恩（1988）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反映的，不是由社会主义理论家作出的大胆崭新的构想，而是对右派统治地位的有害的调和。葛兰西要求“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也就是讲究实际的同时，满腔热情地致力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而19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则暴露了“意志的悲观主义”，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提供任何真正与众不同的长期政治方案。

很明显，对于近来提出的所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我们不可能都提供详细的评论。对于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们聚焦西方的戴安·埃尔森（Diane Elson）和东方的阿甘别吉扬（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贡献。

戴安·埃尔森：社会化市场？

戴安·埃尔森（1988）认为，“社会化市场”提供了计划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种替代选择。我们则认为，她的社会主义市场方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让步过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对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说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亚历

^[1] 举例来说有：亚力克·诺夫（1983），杰夫·霍奇森（1984），戴安·埃尔森（1988），Abel Agabegyan（1988），大卫·米勒（1989）。

^[2] 欧内斯特·曼德尔（1986），尼古拉斯·科斯特洛（1989）提供了对计划模式的辩护，尽管这种计划由传统本恩工党左翼所提倡，但与我们的方案还是相距甚远。

克·诺夫宣称有效率的中央计划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说法，我们已经在之前的章节对其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反驳。

确切地说，我们认为：

(1) 通过将注意力从生产过程切换到交换过程，埃尔森抹去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重点；

(2) 她的社会化市场制度，保留了大部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因此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会更加准确；

(3) 它容易受到所有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不稳定性的影响。

埃尔森文章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说明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的理想市场相去甚远。埃尔森认为，从资源的运作来说，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及实际成本，也很少会有自由竞争，而且消费者主权实际上无效，萨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献来巩固她的观点。这种批评指出了彻底的市场拥护者的构想缺乏现实主义。尽管这方面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却似乎是要替代一个不在场的概念。在她对她所指的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中，剥削这一概念是缺失的。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产生，不是因为消费者对组织市场的方式不满意，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它的受害者试图解决的剥削制度。资本主义听任富人剥削穷人的劳动。社会主义是对资本家剥削工资劳动者的回应。

在本书中，我们提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剥削概念。在当前的语境下，重要的是，马克思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驳斥剥削产生自市场不完全运行的观点。恰恰相反，马克思论证了剥削产生自商品生产的逻辑。为了从理论上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商品按照劳动价值的比例交换”这一“宽松”的假定。这是最先进的资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提出的理想。马克思很清楚，一系列复杂因素——不同的资本密度，部分垄断等等——会阻碍真实的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与劳动价值成比例。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了这一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买卖都是等值交换。货币以黄金为基础，在每次买卖时，黄金中物化的劳动量就等于所购买的商品中物化的劳动量。换句话说，他假定交换过程不存在欺诈。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反事实的——工人通常会买到掺假的产品，资本家通过实物工资或者工资的额外扣除来欺骗工人们。但出于论证的目的，他说：“让我们承认市场是完全公平的，我将表明它仍然会导致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马克思认为，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的特殊性。劳动力之所以独特，在于它对资

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创造价值。劳动力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都按照再生产的成本进行出卖。当然，在许多情况下，劳动力低于再生产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职农民，不会从市场上购买他们所有食物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即使它确实以完全的再生产成本出售，剥削仍然发生。工作日被延长了，以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技术让生活资料更便宜，从而生产相对剩余价值。

从政治上看，这一论证是要驳斥那些认为公平交易、废除垄断和公正的工资水平就可以拯救无产阶级的人。恰恰相反，马克思认为只有废除工资制度本身才会终结剥削。任何对市场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中心的对抗。但是，埃尔森提出的正是对价格的改革。

埃尔森提出种种公立机构来设定价格标准。这些机构能够得到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的详细信息。在成本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利润，就可以为每种商品设定价格标准。（但是没有说清楚利润的基础是什么：是跟使用的资本成比例，还是跟经常性成本成比例？）设定这些价格标准——显然并不打算是有约束力的——加上发布其所依据的数据，被称为市场的社会化。

“社会化市场”这一术语是很有误导性的，因为市场从来都是社会制度。在资本主义时代，市场是私人个体进入社会关系的典型途径。当社会一词与市场一词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化市场，市场社会主义——我们应该有所警惕。考虑到剥削在马克思的很宽松的假定下都仍然存在，社会化市场也会允许剥削存在。社会化价格标准仅仅是指示性的，对买家和卖家都没有约束力：“价格和工资委员会可以生成价格标准，提供信息买卖双方，使之能够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监督’价格和工资。”（埃尔森，1988, 第33页）如果这些标准不被社会接受，那么要改变的，不是价格，而是这些标准。社会化市场和正常市场的主要区别似乎是，在前者是纳税人补贴某些通常是由买卖双方承担的市场成本。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这一市场比起没有补贴的市场调整起来可能会更平稳，但是其效果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看一下关于劳动力的买卖这一关键问题，埃尔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一系列用于调控剥削的价格和收入政策。工资和价格委员会为所有工资率制定标准。这显然不是废除工资系统，而是对其进行调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资等级由私人经济合同执行，现在则变成了公共政策问题，由国家机构将其合法化了。同时，毫无疑问，价格和工资委员会考虑到确保工业的利润率的需要。在这

里，我们进入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因为设置工资水平会影响到剥削率。任何试图设置更高的工资水平的企图都将被雇主抵制，而任何试图设置更低的工资水平的企图又都将被工会抵制。如果工资标准是有约束力的，实际工资率将由雇主与工会相对实力以传统方式决定：罢工、停工等。

埃尔森提出了一种能够显著地改变剥削率的方法。这种观点认为，应该保证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一个最低的基本收入，无论他们是否被雇佣。这一政策由绿党所倡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疑是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如果罢工的工人知道他们的家庭一直有饭吃，就能够强化自己的立场，罢工行动将会更坚决更成功。但是，我们不应高估这一系列无条件的社会保障福利的影响。埃尔森也表示这只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够买一点糊口的扁豆、几条廉价牛仔裤和几张地板上的椰衣垫。这听起来并不比靠当代的社会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会保障计划一样，它受到同样的矛盾因素的影响：必须保证人们的积极性而不是破坏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同时也不能征收沉重的税收负担。人们在工作的时候往往也有达成了其他的承诺：抵押贷款、分期付款等。当人们罢工或者失业的时候，社会保障金会很快被花完。

在资本主义国家，无条件的社会保障是一种有意义的改良，有助于减少贫困和促进阶级斗争。他们不愿意做的是，“消除劳动力买卖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出处同上，第30页）。劳动力的买卖是剥削的序幕，具有内在对抗性。购买劳动力的企业仍然是法律主体，其目标是劳动力赚取利润。它们是法人，有购买、出售和签订合同的权利。简而言之，它们就是马克思说的“资本的人格化”。它们可能是由国家所有，必须向国家的垫付资本支付利息，但是它们资本属性的减少，并不比国有的英国利兰汽车公司更多。事实上，埃尔森提议让一个叫“公共企业监督者”来确保国家的资本能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率。

在劳动力继续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围绕劳动力价格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失业是最终的工资调整者。当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经济性阶级斗争将使得工资上涨。通过有约束力的价格和收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调控也许是可能的，但这纯粹是一种自愿的机制，埃尔森认为它很可能是不稳定的。要么导致通货膨胀，恢复失业以惩罚劳动力的压力也随之而来；要么就将要求强制性的价格管制。社会将会面对这样的选择：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在写作本书的时候（1992），像波兰、匈牙利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正清清楚楚

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在经济领域恢复失业的“鞭子”，因为没有失业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劳动力市场；要么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在生产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会调控。这并不是要否认埃尔森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英国的环境下是进步的。人们可以将其看做是一条渐近线，与前撒切尔时期的社会民主一样，其发展方向是朝着：几乎完全国有化、自愿的价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因此，这一制度将比现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但是从经验看来，国家资本主义类型的社会秩序是不稳定的。它保留了货币和市场，以及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收入差距，同时消除了使得这些都起作用的失业，并且弱化了作为资产阶级纪律因素的国家。这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式，要么像英国一样恢复到私有资本主义，要么走向社会主义。相反的方向也适用。但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社会主义则绝对是反动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通过阶级斗争转向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尔森提出的社会化定价机构拥有计算机网络和生产的消息，而这正是向计划的有效过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将这种机构作为计划经济之前的过渡性措施，那是说得过去的。但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处于进攻态势，更可能向资本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提议，不过是通向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旅途中的临时中转站而已。

所有市场经济都受到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的影响。不稳定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衰退，当衰退发生时，产品卖不出去，造成失业；第二种形式是过量的需求造成通货膨胀。在那些回归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形式：通胀飙升，同时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聪明的左翼经济学家一样，埃尔森明显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这些倾向，但她并没有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无论人们要怎样说戈尔巴乔夫之前的苏联经济制度的坏话，但那时候价格稳定，也没有经济衰退。苏联制度不是没有问题，只有故意视而不见的人才会那么认为。但是，对于本世纪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何改变，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往前迈进进一步。埃尔森和与其相似的俄国思想家所鼓吹的，是从马克思退回到亚当·斯密。

^[1] N.斯科特·阿诺德(N. Scott Arnold)(1987)沿着这一思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证，表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社会经济形式。

阿甘别吉扬：行政方法和经济方法

在这里和之前章节所展开的论证也为我们批判苏联经济改革的概念提供了基础。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别吉扬提出的。他是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几个关键的经济顾问之一。在他关于经济改革的书中，阿甘别吉扬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经济的”方法的区分，并且强调要减少前者增加后者。他宣称，“现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征是行政的方法占有显著的位置，而经济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 20页），接着声称改革的本质就是“将管理从行政管理过渡到经济的方法”（23页）。

如果这仅仅意味着他反对专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细致的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经济的”），那这样的观点并不会引起争论。但实际上，在这一概念和有争议得多的解释之间，似乎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首先，阿甘别吉扬似乎确认“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计划本身。在评论斯大林时期的中央计划时期，他宣称，“从三十年代开始在管理中经济的方法在减少。中央集中分配资源取代了生产单元之间的贸易，市场也因此萎缩了”（出处同上，21-22页）。因此，这里的“经济的方法”与“集中的配置”是对立的。当他阐述经济方法的内容时，问题变得清楚了：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将联合体和企业转变为完全经济责任、经费自给、自主管理，以及在价格、财政和信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23页）。在别的地方，他把经济方法与市场关系的刺激以及利润的更大的作用联系起来（58页）。最后，他提出国家计划将被“废弃”，让位给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企业和联合体将制定和批准它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将不再服从上级的批准，也绝对不再有计划配置工作”（1988, 112页）。

虽然阿甘别吉扬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促进苏联的工业化方面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他实际上认为中央计划的“行政的办法”是过时的、专制的、官僚的和无效率的，而注重市场价格、利润率和企业财务自主并且完全废除中央计划指令的“经济的方法”是现代的、高效的和进步的。这样的判断可能是来自于苏联武断官僚的中央计划的经验，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判断。我们已经表明，中央计划并不必然是武断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确定义的社会成本的计算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说明，社会劳动时间核算的社会合理性是优于市场的。没有必要将消费品市场（我们之前倡导的总体计划制度的一部分）的出清价格，与通过给予企业完全自主权以瓦解社会主义财产联系在一起。宣称企业应该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

者，民主地组织他们自己的工作，以及积极提出新产品——这是一回事，而认为它们应当作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制定自己的计划来响应市场信号，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事实上，如果它们被授予后面的角色，那么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业内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别吉扬所做的这种讨论，隐含地支持了经济理性和市场过程，问题多多，必定会误导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这一逻辑带来了什么：全部有效经济计划的崩溃、失控的通货膨胀、普遍的经济混乱、大规模失业以及资本主义复辟的最终胜利。向市场方向的社会主义“改革”对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来说是空前的经济灾难。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改革重建了少数资本主义列强的宰制。1917年前统治世界的正是这些列强。在政治层面上，“改革”导致了这样一种形势，社会主义运动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会主义不复存在了。对于那些被剥夺的人来说，除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有什么希望呢？除非是一个比以往任何的社会主义更加激进、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会主义，一个建立在清晰的经济和道德原则之上的社会主义，一个不向令人泄气的市场神话投降并交出其完整性的社会主义，否则就毫无希望可言。

（达瓦里希 译 黑夜里的牛 校）

参考书目

Aganbegyan, Abel *The Challenge: Economics of Perestroika*, London: Hutchinson, 1988.

Arnold, N. Scott 'Marx and disequilibrium in market soci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vol. 3, no. 1, April 1987, 23-48.

Aristotle *The Poli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6.

Bacon, Robert and Walter Eltis *Britain's Economic Problem: Too Few Producers* (2nd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78.

Beer, Stafford *Brain of the Firm*, London: Wiley, 1981.

Beer, Stafford *Platform for Change*, London: Wiley, 1975.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press, 1974.

Burnheim, John *Is Democracy Possible?* Oxford: Polity Press, 1985.

Cave, Martin *Computers and Economic Plann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Cockshott, W. Paul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to economic planning', *Future Computing Systems*, vol. 2, 1990, 429-43.

Cockshott, W. Paul and Allin Cottrell 'Labour value and socialist economic calc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8, no. 1, February 1989, 71-99.

Costello, Nicholas, Jonathan Michie and Seumas Milne *Beyond The Casino Economy: Planning for the 1990s*, London: Verso, 1989.

Cottrell, Allin *Social Classes in Marx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Cottrell, Allin and W. Paul Cockshott 'Calculation, complexity and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once agai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5, no. 1, 1993a, 73-112.

Cottrell, Allin and W. Paul Cockshott 'Socialist planning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 vol. XXXI, 1993b, 167-85.

Dasgupta, Partha 'Positive freedom, marke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 no. 2, Summer 1986, 25-36.

Devine, Pat *Democracy and Economic Planning*,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199 Bibliography 201

Mandel, Ernest 'In defence of Socialist planning', *New Left Review*, no. 159, Sept/Oct 1986, 5-38.

Marx, Karl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36.

Marx, Karl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fter* (Political Writings, Volume 3, ed. D. Fernbach),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4.

Marx, Karl *Capital*, Vol. III,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Marx, Karl *Capital*, Vol. I,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Marx, Karl and F.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7.

Marx, Karl and F. Engels *Se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0.

Miller, David *Market, State and Community: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Market Social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Nove, Alec *The Soviet Economic Syste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Nove, Alec *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

Nove, Alec 'Markets and Soci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61, Jan/Feb 1987, 98-104.

Pugh, W., et al. *IBM's 360 and Early 370 System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

Ricardo, Davi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Sedgewick, Robert *Algorithms*, London: Addison-Wesley, 1983.

Smith, Adam *The Wealth of Natio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0.

Smith, Keith *The British Economic Crisi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Ste. Croix, G. E. M. de *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Stalin, Joseph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2.

Thucydides *History*, II (ed. P. J. Rhodes),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1988.

Tribe, Keith *Land, Labour and Econom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Varga, Richard S. *Matrix Iterative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2.

White, Lynn *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Wolcott, Peter and Seymour Goodman 'High speed computers in the Soviet Union', *Computer*, Vol. 21, No. 9, September 1988, 32-41.200 Bibliography

Duff y, Gavan 'A note on "Labour value and socialist economic calculation" ',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8, no. 1, February 1989, 100-109.

Durrett, Charles and Kathryn Mc Camant, *Cohousing: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to Housing Ourselves*, Berkeley, Ca.: Habitat Press, 1989.

Elson, Diane 'Market Socialism or Socialization of the Market?' *New Left Review*, no. 172, Nov/Dec 1988, 3-44.

Engels, Frederick *Anti-Duhring: Herr Eugen Du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4.

Farjoun, Emmanuel and Moshe Machover *Laws of Chaos*, London: Verso, 1983.

Finley, Moses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3.

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Genovese, Eugene 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5.

Granick, David *Job Rights in the Soviet Union: Their Consequ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Gregory, Paul *Socialist and Nonsocialist Industrialisation Patterns: A Comparative Appraisal*, New York: Praeger, 1970.

Hahn, Frank *Equilibrium and Macro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Harner, M. 'The ecological basis for Aztec sacrifice',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4, 1977, 117-35.

Held, Davi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odgson, Geoff *The Democratic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

Kalecki, Michal Theory of Economic Dyna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5.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Macmillan, 1936.

Lane, David Soviet Economy and Socie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5.

Lange, Oskar 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ism,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8.

Lange, Oskar 'The Computer and the Market', in Charles Feinstein (ed.) Socialism, Capit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Essays Presented to Maurice Dob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Lavoie, Don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Leijonhufvud, Axel Information and Coord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Lenin, V. I. Collected Works, vol. 25,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64.

Lubeck, O., Moore, J., and Mendez, R. 'A benchmark comparison of three supercomputers', Computer, vol. 18, no. 12, December 1985.

译后记

本书是由原少年中国评论 (review.youngchina.org) 主持翻译的。全书的翻译从 2013 年开始，完成的各章节译文陆续在少年中国评论网站上刊载，到 2015 年底全书翻译完毕。由于网站上的译文存在不少错漏，所以翻译小组对全书再进行了一次校订，然后制作成 PDF 版在网络上共享，以飨读者。

跟互联网上的许多知识资产一样，本书也是志愿性集体劳动的成果。有许多原少中评的热心网友都参与了翻译和校对工作。中文版序言、英文版序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由黑夜里的牛翻译的。尘沙翻译了第三章。未完成的乌托邦完成了第四章和第五章的翻译，并和黑夜里的牛一起翻译了捷克文版序言。第五章是由 Sunshine 翻译的。顽执和中华合作翻译了第七章。袁军完成了第八章翻译，并与政南一起翻译了第九章。Integral 和一支离弦的箭翻译了第十章。Adolf Stalin 翻译了第十一章。大师翻译了第十二章。懒羊羊翻译了第十三章。达瓦里希翻译了本书的最后两章。Siegfried、带 Q 过人、扫地工、飞飞、红色北极狐、人在江湖和人海沉钟等同志参与了全书的校订工作。在此我们对所有参与这项翻译工作的同志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的关注。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译介探讨关于新社会主义模式的著作，为中国左翼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最后说明一点，由于本书的译者多数都不是专业人士，水平有限，所以译文中难免会出现错误。如果读者发现翻译不准确的地方，请联系无产者评论网 (review.proletar.ink)，我们会根据反馈意见定期刷新本书。

无产者评论编辑部